

TU-862/45

2007

香港建筑百年

陈翠儿 蔡宏兴 主编 香港建筑师学会统筹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 / 陈翠儿等编著. —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410-3234-9

I. 空… II. 陈… III. 建筑艺术 - 香港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024 号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

KONGJIAN ZHI LU XIANGGANG JIANZHU BAINIAN

- 统 筹 编 香港建筑师学会
主 编 陈翠儿 蔡宏兴
作 者 陈翠儿 蔡宏兴 林社铃 何志清 冯永基 陈丽乔
张海活 杨炜强 长渊礼子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吴启聪 黄斯龄 朱卓雄 杜永德 源耀邦 吴永顺
郑炳鸿 黎东耀
责任编辑 侯 荣 李 成 陈 锦
责任印制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四川美术出版社
邮政编码 610031
制 作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90mm × 285mm
印 张 11.1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234-9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书名《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四川美术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原书号:ISBN 962.04.2495.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3048191

序言	林云峰	004
前言	陈翠儿	006
导论	蔡宏兴	008
早期乡村建筑——本地围村	林社铃、何志清	012
维多利亚城的规划	冯永基	020
公共建筑	冯永基	028
经济的结晶——商业建筑	陈丽乔	038
没有记忆的城市——《花样年华》的唐楼	陈翠儿	050
无重地带的建筑森林——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	陈翠儿、张海恬、杨炜强、长濑礼子	060
狮子山下的安乐窝——公屋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072
中产人士的选择——从洋楼到美孚新村	吴启聪	086
交通交汇处	黄斯龄	098
城市的公共空间	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	106
“神的庙宇”——教堂建筑	吴永顺	114
水上建筑——大澳棚屋	郑炳鸿	124
临时建筑——竹棚、戏台	郑炳鸿	132
迷人的都会空间——电影院	黎东耀	140
市井的怀旧空间——茶楼、酒楼、茶餐厅	黎东耀	150
百年建筑的人事境物——二十三位香港建筑师及事务所小传	吴启聪	160
	参考书目	172
	作者简介	174
	鸣谢	176
	图片出处	177

序言

百年人事几番新，从百年
的角度来宏观香港及其建筑，
再访我们的过去，继往开来，
认识香港建筑历史上的得失，
展望我们未来的香港建筑。

我在此感谢此书的作者
们，一群对香港及其建筑有
如此热忱的建筑师们，他们
在繁忙的工作中，牺牲了自
己的工余时间来撰写此书。
他们都视此为对香港建筑及其
历史作出贡献，别无所求，此
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从2001年开始，我得悉这
些建筑师们主动策划此书，这
些年间亦知道他们经历和面对
着不少的困难，但本着“建筑
师”的专业精神，仍从不放弃
出版此书的意愿，要为香港大
众出版一本深入浅出、有观点
和分析性的建筑书籍，实在精
神可嘉。

继往开来，百年似是转
瞬之间，回顾我们的建筑历
史，既有光辉的成果，亦有
可学习和改善之处。

“九七”前的香港，
就像是“借”来的时空，
叫人总不踏实。“九七”
后，作为历史的殖民地身
份结束了，无论是居住或
暂住香港的心境，亦有所
不同。

过往我们没有注重自己
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
的建筑。对于保留、保存和
发扬自己的文化和建筑，我
们也没有注意。不少建筑和
建筑师的历史都随时间而消
失了。

回顾香港的建筑历史，
亦惊叹香港惊人的生命力，
在高度“挤迫”和“艰巨”
的过去，创造了不少的典范。
“挤迫”和“艰巨”变成了
创造的原动力，令香港在现
今“高密度城市”中建立了
一定的位置。

《空间之旅——香港建
筑百年》一书是百年以来难
得的一个抱负，以群策群力
的精神，共同地为社会和建
筑历史作出贡献。

在此，本人亦感谢我们
的合作伙伴——三联书店，
出版了此“百年”难得一遇
的精彩建筑书籍。

林云峰教授
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

前言

■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这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生的建筑师，却对自己本土的建筑历史认识不深。

“九七”冲击

香港建筑，就像“无根树”般，随着经济、社会、功能上的需要，以及受到现代建筑理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

可是“九七”以后，香港回归中国，却为这城市带来了不少的冲击。香港不但面对经济转型的阵痛，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亦发生了不少变化。在经济、政治的大变局下，过往习惯了的模式，似乎都在这急速变化的年代里，变得毫无用处。

“无根树”过往扮演了英国殖民地的角色，今天角色改变了，这一代的人都忙于寻根，急于再认识这个陌生的祖国和自己的过去。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亦是在此时孕育出来。一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建筑师，对本土建筑历史只是略知一二，在三联书店编辑李安小姐的建议下，构思了本书，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手法，与大众分享对香港建筑的看法。于是建筑师们分头进行资料搜集，对我们来说，这亦是一个寻找自己过去的历程。

建筑教育的空隙

建筑教育是重要的一环。它培育了我们建筑师，亦间接由这些建筑师塑造了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城市面貌，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香港首个建筑系是在1950年开始的，系主任是由英国来的布朗教授(Gordon Brown)。布朗教授是一位年轻、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为香港大学建筑系带来了国际的视野，早期的香港建筑师都深受他对建筑热爱的感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大建筑系系主任黎锦超教授，从北美带来了新现代建筑的教学风格，同时亦鼓励学生认识自己的文化、城市和建筑，他深信，亦希望这些种子能培育出“香港建筑”。

建筑教育，包括对建筑历史的认识，可是，曾涉猎中西方建筑历史的我们，却对自己本身的历史一无所知。

“无根树”就像浮萍般，浮动不停。正面来看，它没有固定的定位，变得有极大的可塑性；但反面看，它却令人没有足够的信心，看清自己的位置和未来的方向。

寻找的历程

建筑师吴启聪选择了追溯香港二十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的建筑师，包括香港大学建筑系成立前由国内来港的著名建筑师，如朱彬、范文照、徐敬直等人。这些前辈的名字，我们都少有认识，就像只知万宜大厦，而不知道背后的建筑师。

在寻根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个年代都有他们的限制与机遇，历史上的得与失，甚至他们很多建筑物以至名字都随着时间而消失，乃被人遗忘。但是至今不变、仍被承传下来的却是建筑师对建筑的热忱。

历史此刻的选择

实在是无法于一书内说尽香港百年建筑，本书涵盖的内容只是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些选择。我们选择以时间为主轴，当中突出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历史片段：从早期华人聚居的村落，至英人建立的维多利亚城，至二十世纪初渐渐出现有香港特色的建筑。但诉说历史需要有深入的研究和严谨的态度，在历史的追究上我们仍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希望此书只是认识香港建筑的一个引子。

建筑是无形理念的表达

建筑，不只是盖房子，亦不只是地产。经济和地产有高有低，但建筑为人创造美好环境的意愿，却不会因为外在顺逆境而增减。今天我们看到的建筑，是我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理念等无形力量下产生的有形成果。城市建筑就是我们群体的反映。

因此，我们刻意的不以建筑物分类作为本书的结构，因为建筑不只是建筑物，而是生活背后无形因素的产物。

建筑历史的承传

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时代日新月异，建筑和城市的更新是自然的进化，但回顾和保育历史建筑物却是每一代的责任，因为承传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外形，而是在建筑上反映人的智慧与抱负，并延续到下一代。

香港建筑特色

浮浮沉沉，经历百载，一步一步的，香港建筑终于拥有自己的步法。回顾过往只移植英国或欧洲歌特式、古典主义，或现代国际风格，或聘用外国的建筑师，香港的建筑师亦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如廖本怀建筑师的华富村，是公共房屋的优秀作品；美孚新村是立体城市、综合功用性的先驱建筑作品，太古城也成为现代高密度混合式建筑的典范。

文化和建筑特色是人生活的自然产品，自然地流露出人的智慧和生命力。

自己的特色要由欣赏自己开始，但这欣赏不是盲目的赞赏，而是需要批判的眼光，正如建筑教育，在一连串的批判后，设计将变得更完备。

这一切都是从无根开始，希望借着此书分享我们这群建筑师寻根的发现。

感谢

此书由2001年开始筹备，至今才正式出版，实在要感谢作者们的忍耐，三联书店李安小姐的鼓励，前辈建筑师们如龙炳颐教授的《香港古今建筑》和钟华楠建筑师的《香港现代建筑》两书的启发，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会长刘秀成教授、沈埃迪建筑师、香港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林云峰教授的支持，以及香港建筑师学会的建筑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系及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学生的义务参与。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一书就如我们百年的香港建筑一样，是群体合作的成果，缺一不可。

在此再次鸣谢所有作者：林社铃、何志清、冯永基、陈丽乔博士、陈翠儿、张海活、杨炜强、长溯礼子、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严汝洲、吴启聪、林中伟、黄斯龄、乐素芬、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吴永顺、郑炳鸿、黎东耀对此书的认真和用心。

我们只是抱着一颗寻根和分享的心出版这本书，内容不足错漏之处，恳请包涵指正。

希望藉此书引发大家认识、欣赏香港建筑的现在与过去，本着承先启后的精神，共同创造精彩的建筑。

“无根树”的寻根之旅，由此出发。

陈翠儿

香港建筑师学会理事
(2004-2006)

导论

蔡宏兴

香港作为一个东西文化交汇、新旧矛盾的社会，“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已经不知不觉、无意识地溶解在香港特有的文化环境中。

问题是当人们被动地接收殖民地宗主国许多前设及世界观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呢？著名文化评论学者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具争议性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1978）中提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文化（书中分析主要以中东为对象）的刻意扭曲使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1993年，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更指出，西方社会试图对认为是次等的非西方文化作出选择性的遗漏和压迫，以夺取陈述历史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将统治者认同的世界文化观，作为人类生活进步模式唯一的合法版本。

在建筑史观中，以欧洲为中心的扭曲式叙述建筑进化比比皆是，更甚者是对非西方建筑如印度及中国建筑作出蔑视、偏见的诠释。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的权威建筑通史之一、由英国建筑史学家巴尼斯特·费莱兹（Banister Fletcher）主编的《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就把中国及印度建筑分类为“非历史样式”，而排斥于源远流长的世界建筑进化系统之外。

如何觅得论述历史及开展将来的操控权，巩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及开发有关联的知识理论更是扩张及重组权力网络者的南山捷径^{〔1〕}。

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处境，随着香港回归后骤然而至的中国热，以及对民族主体的歌颂，使我们更需要清醒的分析、判断香港身份的历史定位，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在探讨香港城市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更清楚地认识哪些是对发展香港本土文化构成不能逾越的障碍，哪些是有益于增强本土文化体系。

在霸权主义务求主宰全球化的模式、政府奢望香港成为全球化下的大都会策略下，当香港变成外国游客及国内“自由行”消费的商品大都会时，我们有否想到香港的文化特色是被遗弃还是被唤醒呢？

在重组香港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新认知图像时，我们固然不能只认同外来文化的准则，跟风地“超英赶美”去设计及建造一样的高科技建筑物；更不能在没有充分了解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理论时，便囫圇吞枣，或在“后现代”（post modern）的借口下，幼稚地模仿西方的古典建筑形貌。也不能只靠民族主义支撑，盲目地强调中国传统及自我，否则只会被以往中国建筑文化约束而成为历史的奴隶，逃避发展一个适合香港特殊环境及拥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建筑体系。

更可怕的是，过于表面地把中国建筑外貌作为代表未来中国建筑文化及香港公共建筑的取向，难道这就是所谓回归传统？低劣模仿的复古弊病不仅是“开倒车”，更连累市民对中国建筑精神及文化的误解，在一头雾水的情形下把无意义的表面抄袭，当作古建筑现代化的特点。

因此我们要时刻警觉，以现代化为名行全球化文化奴役之实的陷阱，同时我们亦要拒绝流入文化保守主义、僵化的创作自由，以免再度为封闭社会及文化知识体制所利用或压制。

建筑作为一门社会不能缺少的实用艺术及经济工具，广泛现实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意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刻对生活文化及道德的价值观。建筑和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关系。随着文化传统及权力操纵的变化，建筑形象及社会审美意识也将相应改变。中国建筑教育开拓者梁思成先生（1901-1972）说过：“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反映；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及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2〕}

从建筑历史看社会权衡取舍，可以意识到及印证出不同主体观念、政治思想、逻辑系统、东、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对香港的诉求及探讨。香港建筑作为香港文化具体表现的一部分，它创作上的探索及对香港城市发展的责任实在颇值得我们观摩、研究。尤其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从一个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过渡到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主义国家下的特别行政区，社会秩序制度都发生变化，使得我们无法回避本土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认同中华民族意识和“香港观念”的同时，我们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建筑师，能否把握机会创造一个人性化、高密度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大都会及设计出符合香港人独特生活方式的建筑物，将是一个迫切及有深远影响的大课题。

随着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在2000年第一次超越在非城市居住的人口,城市设计及高密度建筑将更受到各方瞩目关注。国内及外国学者和建筑专业工作者已经体会到亚洲城市,特别是香港,可能是一个新建筑思维及未来高密度城市生活的活生生实验场所,故近年来已多方面参与及研究亚洲、中国、香港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但在急速发展中的亚洲城市里,包括香港在内,原有的区域特色也在急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建筑符号,而非建筑物组成的全球单一化虚拟城市。难怪著名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 (Rem Koolhaas) 感慨地说:“Asia as such is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ing. Asia has become a kind of immense theme park; Asians themselves have become tourists in Asia. Apparently all the new phenomena take place without architecture, without remarkable architects, and without all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that we imagine to be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city. It is one of the great tragedies and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pectacl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Asia that this phenomenal explosion of the urban condition does not coincide with any explosion of Asian architecture.” [3]

香港建筑专业者因为面对求生现实,极多都盲目逃避本地建筑创作的危机,未能坦然面对失败和反省历史,更加上奉承文化弥漫,大多数报导分析均流于粗枝大叶,对什么因素造成香港今天的畸形建筑形态及如何影响未来设计创作,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及研究,企图回避批评建筑设计错误对市民带来的不便及生活环境质素的降低。有谁能肯定地说,过度挤迫的居住环境及恶劣的设计,没有助长一些社区成为治安不靖的“红番区”[4]及增加如514童党杀人烧尸事件[5]发生的可能性。香港城市开发及物业发展,包括政府公共设施,长期惯常地以金钱挂帅,严重忽略建筑设计要兼顾到人们对私人及公共活动空间的诉求、对香港自然环境和文物古迹作出适当有效保护的责任。建筑师失去用建筑语言去表达市民文化身份及都市时空网络包容性的能力;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如何平衡香港社会公义和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长期无视开发本土建筑体系及赋予建筑应有的价值标准,都在扼杀香港建筑界在世界设计舞台上原可享有的自豪。

香港社会多年来对本土建筑文化发展、研究和保存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都不太关心,旧的建筑物大部分已经拆卸,加上很多资料散失,所以要作较深入及系统的研究谈何容易。就是市民对建筑有兴趣,也可能感到茫无头绪,因为要分辨不同建筑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寻找一些建筑工作者对香港建筑及其发展的评语,并非易事。此书由多名香港建筑师及建筑工作者编写,汇聚了各人对香港建筑文化的解读及反省。在搜集香港建筑史料时,由于关涉的范围极广,只能以香港建筑和社会、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及对本土文化在新旧传统习俗、中西交错系统中发展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决定取舍,因此本书不能视之为一本香港百年建筑的完整叙述,只能说是一本尝试对百年来的香港建筑演变提出某些观点及描写,希望能藉此使香港市民多些了解过去的生活环境、时空观念形成之隐喻、建筑的功能、各类城市建设理念的优缺点及对文化的影响等。更希望在提升香港本土建筑文化、人民生活环境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如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需要重蹈覆辙,以为我们的子孙建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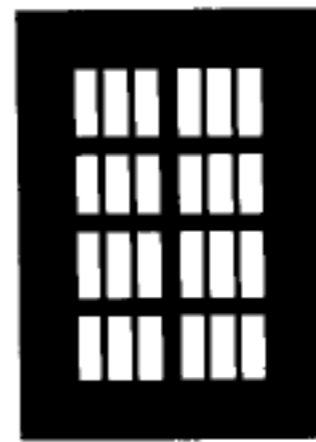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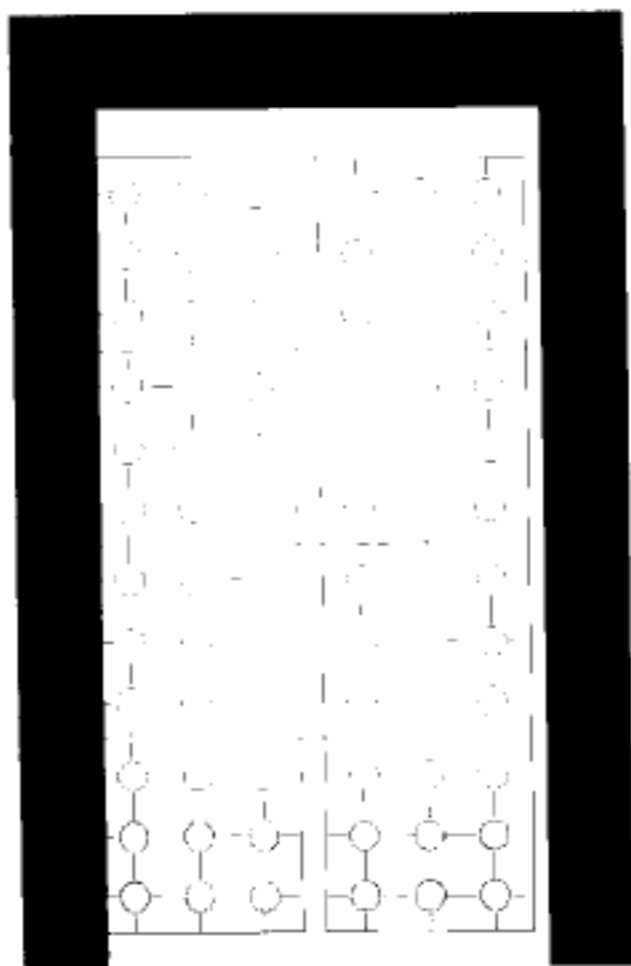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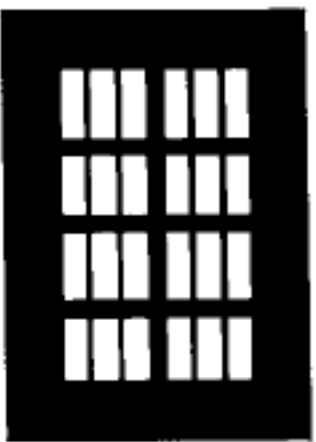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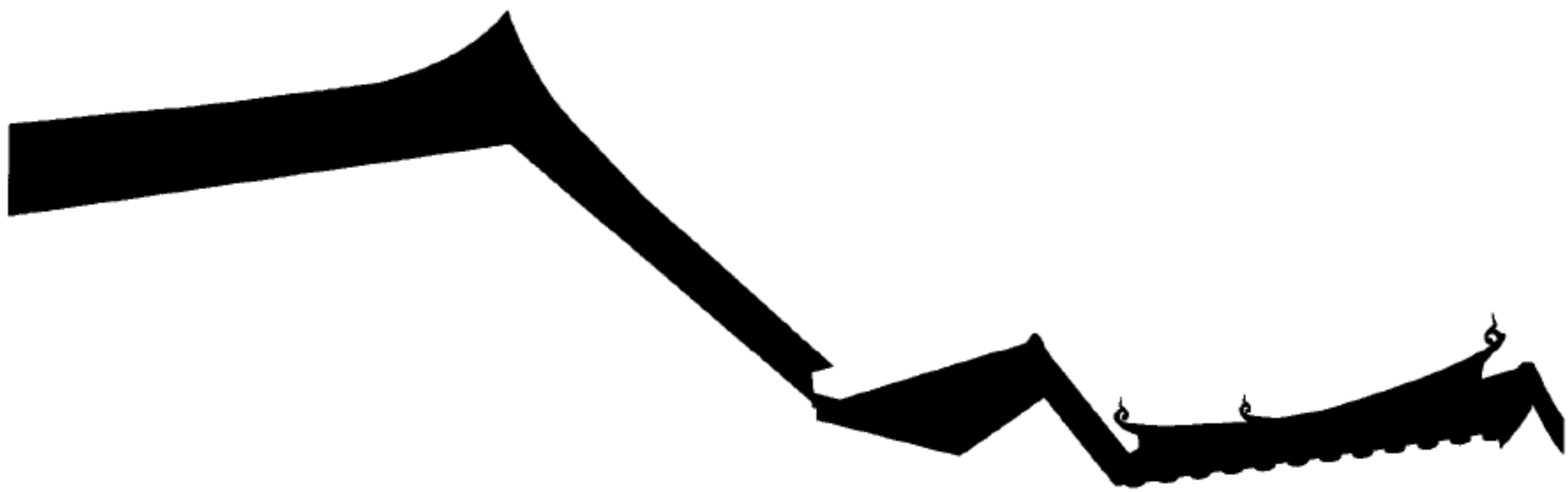
[1] “The realization of a hegemonic apparatus, in so far as it creates a new ideological terrain, determines a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and of methods of knowledge: it is a fact of knowledge, a philosophical fact. In Crocean terms: when one succeeds in introducing a new morality in conformity with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one finish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ion as well; in other words, one determines a reform of the whole philosophy.” — A.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狱中笔记》)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65-366. 对文化霸权 (hegemony [Italian: dirigere in Gramsci's writing]) 渗透的基础,可参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文化理论家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在《狱中笔记》中对文化霸权及知识架构成立的讨论。对知识结构的合法性及权力统治的紧密关系,可参考法国思想史学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作品,尤其是《知识的考掘》(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一书。

[2] 梁思成文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页3。

[3] Rem Koolhaas & Harvard Project On The City, Stefano Boeri and Multiplicity, Stanford Kwinter and Daniela Fabricius, Hans Ulrich Obrist, Nadia Tazi, Mutation, (ACTAR arc en reve centre d'architecture, 2000/2001), p. 310.

[4] 秀茂坪和慈云山徙置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有25万居民,居民都称之为“红番区”,反映其治安恶劣。前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先生在《香港公屋四十五年》一书(页97)提到他对徙置大厦设计的印象——“大厦内灯光昏暗,长长的走廊,像有一英里长似的,走来走去也还没有走完。那是一个叫人害怕的环境,我完全可以体会居民的不安感觉。”

[5] 1997年5月14日秀茂坪屋村发生一宗残忍的区内童党欺凌虐待杀人悲剧,14名年仅14至18岁的青少年把一名同屋村的14岁中三学生活活虐待3小时至死,后把尸首烧毁弃置垃圾房。



祠堂，都是排列在中轴线上；但本地围村的轴线却是空间的通

道，例如吉庆围中间的通道由门楼开始直达后围墙中间的祠堂，而颯龙围的中轴线主巷尽头则是神坛。直至今天，学者还未能解释这种不同空间布局的原因。

本地围村的平面布局多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而唯一的入口开在围墙的正中位置。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在十九世纪兴建的松柏寮家围，及在粉

岭龙跃头的老围入口都不是开在围墙中央。在围村的入口，一般都建有门楼，而门楼与角楼均是防止敌人进攻之主要建筑设施。在围村的建筑，门楼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城门，也有暗藏水坑，在敌人用火进攻时，可以放水保护木门不被火烧毁。

无论是哪一种平面布局、不同大门位置的围村，围墙内的房屋都是依据一个纵横交错的里巷网络方格式摆设，排列得井井有条。公用和私用的空间有明显的划分。本地围村的房屋都是集中在围墙内的内庭，除了在后围墙中央的祠堂或神坛外，厚厚的围墙也用作生活辅助设施的建筑空间，例如厨房、仓库或饲养家禽的地方。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这些空间改作居室之用。这些改变使围墙空间的使用较接近岭南围村围墙的用途。事实上，在广东及福建一带，无论是客家方圆土楼、各种形式的围村或围屋，

厚厚的围墙都是分割为居住空间，如果是多层高围墙，这些居所便成为独立的

多层（复式）单位。广东一带围村的厚围墙由于都作居住单位使用，所以屋顶都采用传统的瓦覆盖斜屋顶建筑模式，这与本地可供通道的围墙平屋顶有显著的不同，本地围墙的平屋顶在防御时方便互相照应支援，在平日则作为一个个晾晒谷物的平台。如前文所述，本地围村多为富庶家族所建以保护家族之妇孺财产，所以用料比较讲究（广东一般围村所用的材料大多因地制宜，所以多用夯土）夯。本地围村的围墙墙脚及基座都是用花岗石砌成的，花岗石墙脚的高度不一，视乎围村的财力而定。围墙则用青砖砌成，墙的厚度如粉岭龙跃头老围可厚达一米。大门是整个围村防御的重点，所以非常注重，例如吉庆围的熟铁花铁门，不但达到坚固的功能，而铁门上之纹饰也能显示围村之财富。



林社铃、何志清

早期乡村建筑

本地围村

香港人类聚居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但根据信史的记载，

则可追溯至宋末帝昀、其弟卫王帝昺逃避元军追袭，南逃暂居于现今九龙城半年；其后二帝西迁新会崖山，一部分士兵及军眷并未随行而定居境内。大量人口的增长则始于清完全撤销《迁界令》（一六八三年）后，当时迁回的人口不足一千七百人，但大规模的外地人——尤其是客家人，却由粤东迁徙至此。

香港最早兴建的围之一是衙前围村，也是现时市区内硕果仅存的围村，可追溯至宋末。

南迁的新移民不是散居在本地人的乡村里，就是聚居在较贫瘠的土地上，基于贫富悬殊，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的不同，难免与本地原居民有所冲突。因此富庶的村落，都建有围墙保护村内的房产，更有在围墙角加建更楼，入口装铁闸，及在墙外挖掘护城河。建于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锦田吉庆围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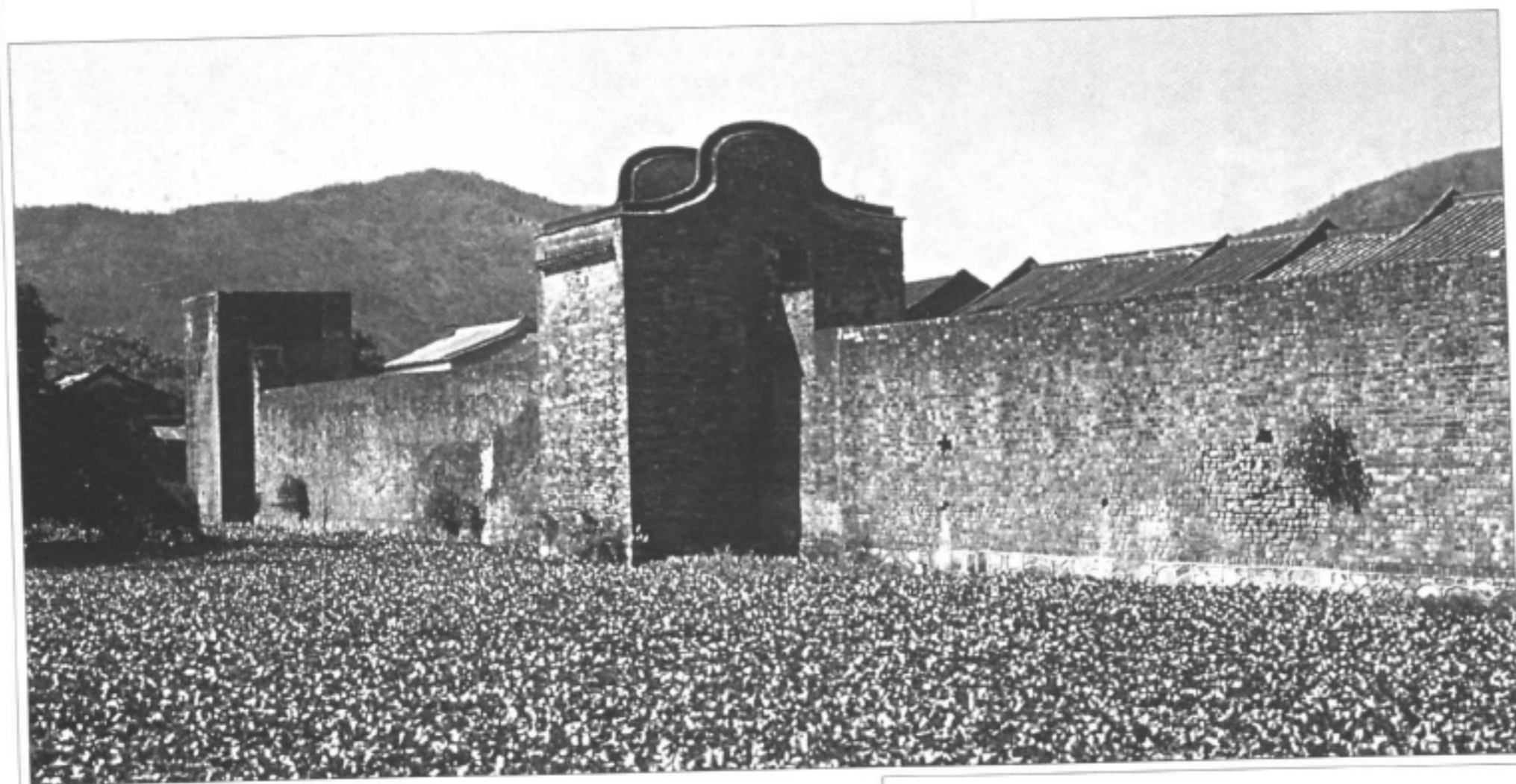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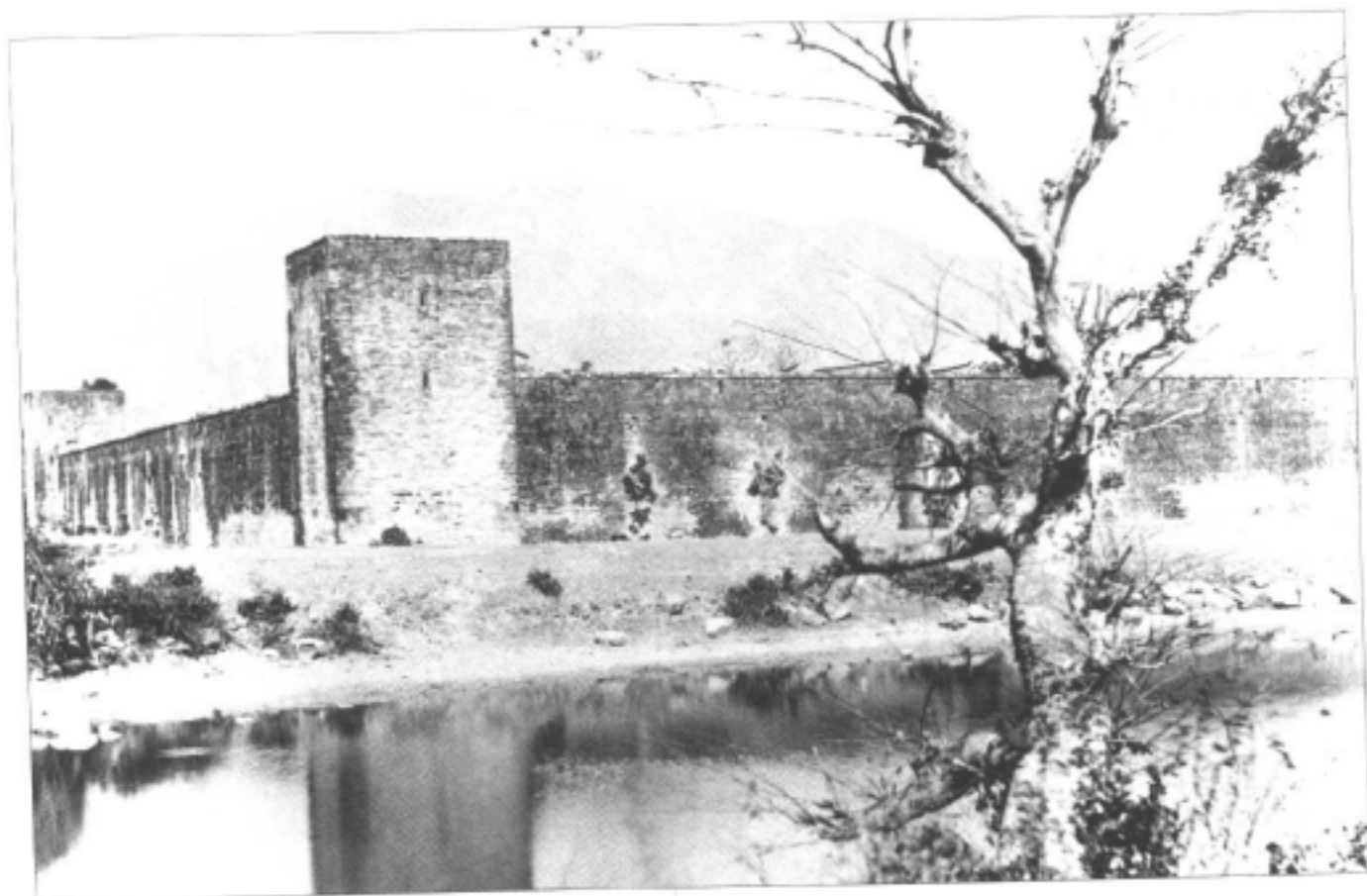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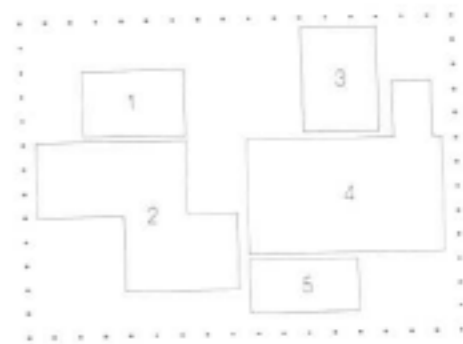
则是在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所加，而锦田吉庆围及粉岭龙跃头靛龙围可说是此类围村的典范。可是，今天这两个围村的护城河亦已填为平地。

根据《新安县志》记载，本港的围村在一六八八年只有十九条，在百余年间至一八一九年已增加至二十九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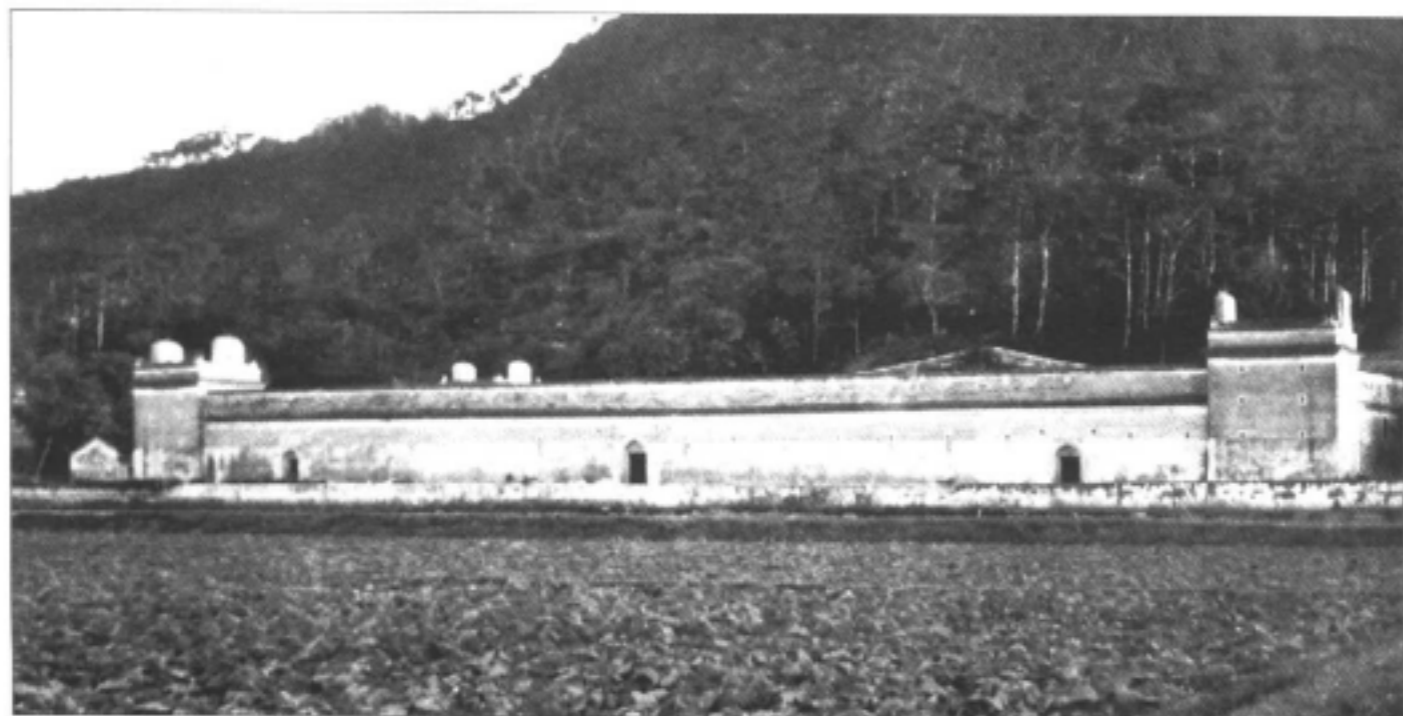
围村建筑除了达到防卫的功能外，实际上是由宗族管理的一个小区。因防御上的需要，必须准备长时期把入口关闭以抵抗强盗或敌人入侵，故围村内一定要有自给自给的基本能力，所以水井在每个围村内都是必须的，而且也会饲养家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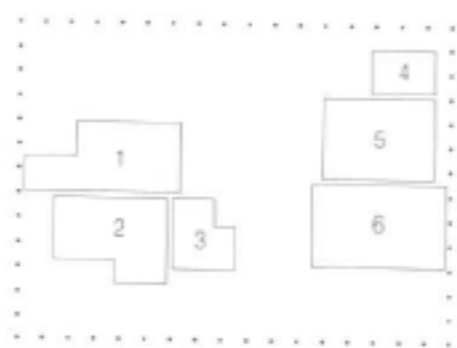
在广东一带，围村的历史发展比本地早，有历史记载最早的围村是南宋兴建的梅县松口蔡蒙吉故居。表面看来，本地围村的建筑形式明显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但也不乏自己的特色。

从整体上看，锦田吉庆围与龙南县西关新围的平面布局极为相似，整个村落的房屋都是由一道厚厚的、有更楼的围墙所保护。不过，西关新围的平面布局是门堂屋的典型代表，在中轴线两旁的建筑都是相称的，而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大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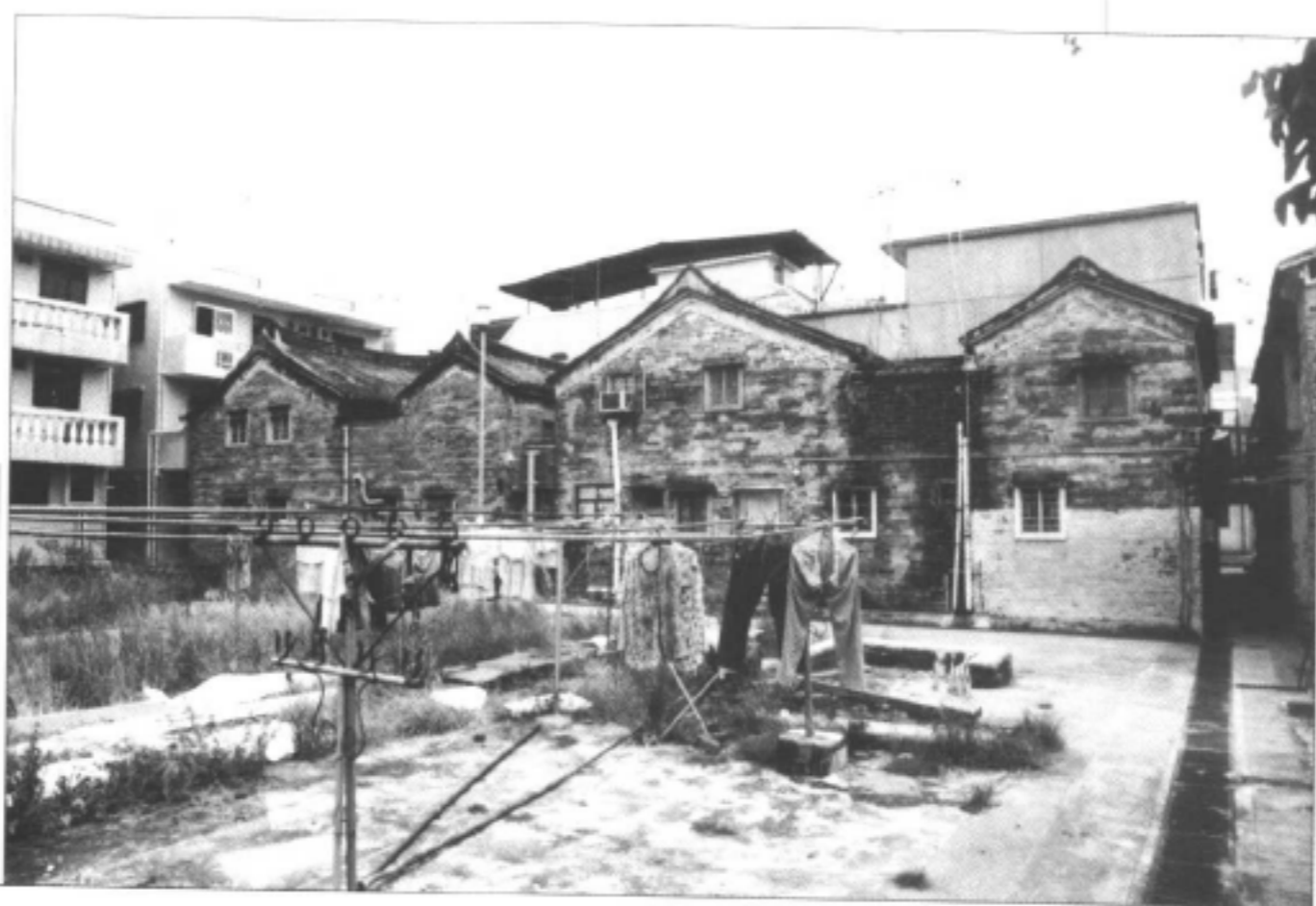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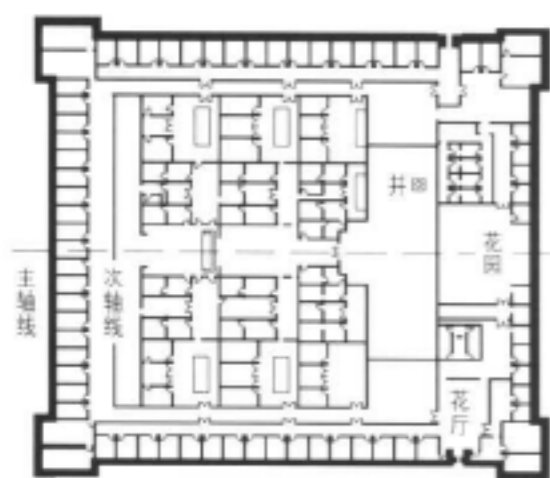
- 1 约1900-1910年的锦田吉庆围围墙及护河，部分护河现已填平。
- 2 一般围村都建有高厚的围墙，以及护河以加强防御作用。上图为20世纪60年代的吉庆围，侧围墙旁的护河虽未被填平，但已荒废及野草丛生。下图粉岭龙跃头老围（新围）的护河今已被填平。
- 3 粉岭龙跃头老围的入口并不是开在围墙中央，而是在侧面，这与一般的围村入口（在中央）并不相同。
- 4 因防御的原因，入口大门一般比较狭窄，较富有的围村例如吉庆围、泰康围、麻笏围及曾大屋等都有熟铁打成的铁闸，以增加防御功能。
- 5 20世纪初沙田的曾大屋，为打石致富的客籍人士所建，同样拥有高厚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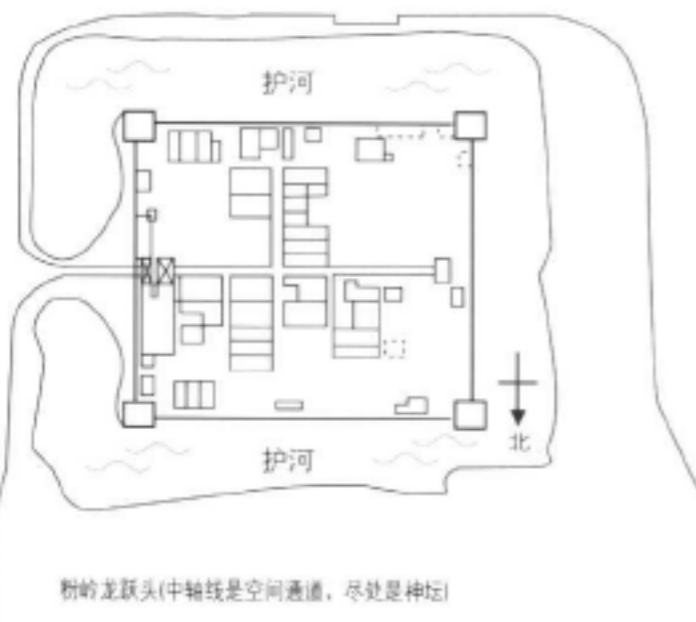


- 1 粉岭龙跃头靚龙围（新围）中轴线的通道，图右的建筑物是门楼的背后，围内房屋被拆卸后的平地，现作晾晒衣服之用。
- 2 围内一般都有多个水井，以供防御时自给自足之用。
- 3 从粉岭老围围墙内的枪孔，可见围墙非常厚，而围墙砖要比现时建筑用的红砖大。
- 4 从粉岭老围围墙顶可见围墙厚度超过一米。
- 5 大门入口后的通道，围内通道一般比较狭窄。
- 6 1993年的衙前围村，是现时市区内硕果仅存的围村，唯其围墙部分已被拆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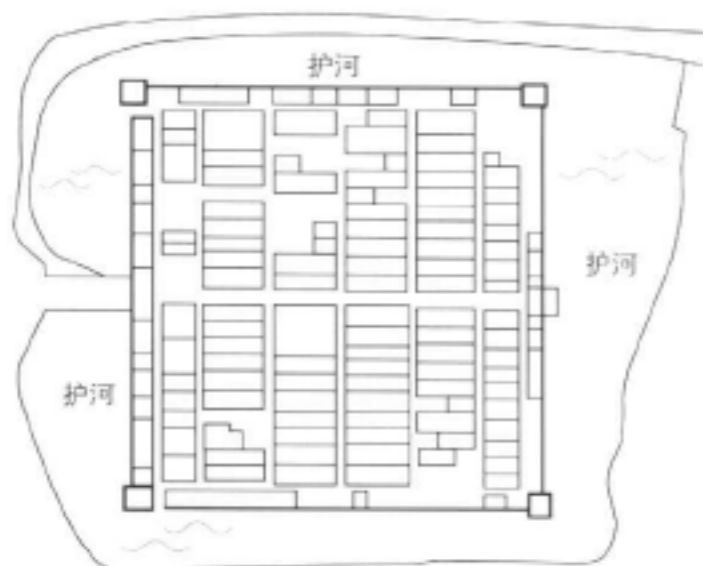




龙南县西关新图(中轴线上建大厅、祠堂, 两旁建筑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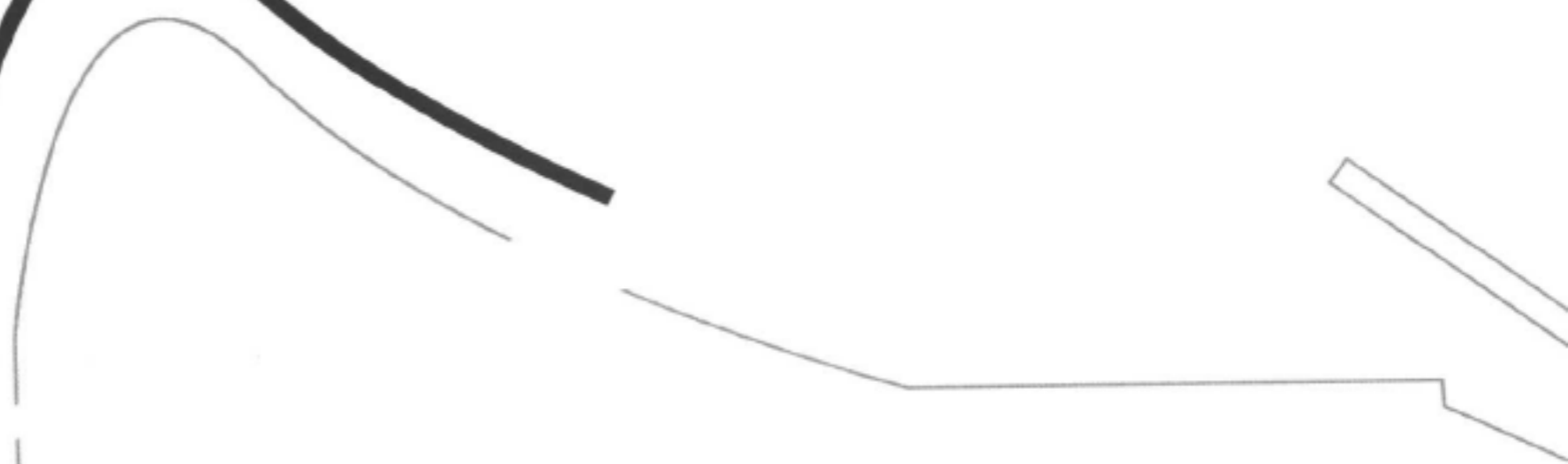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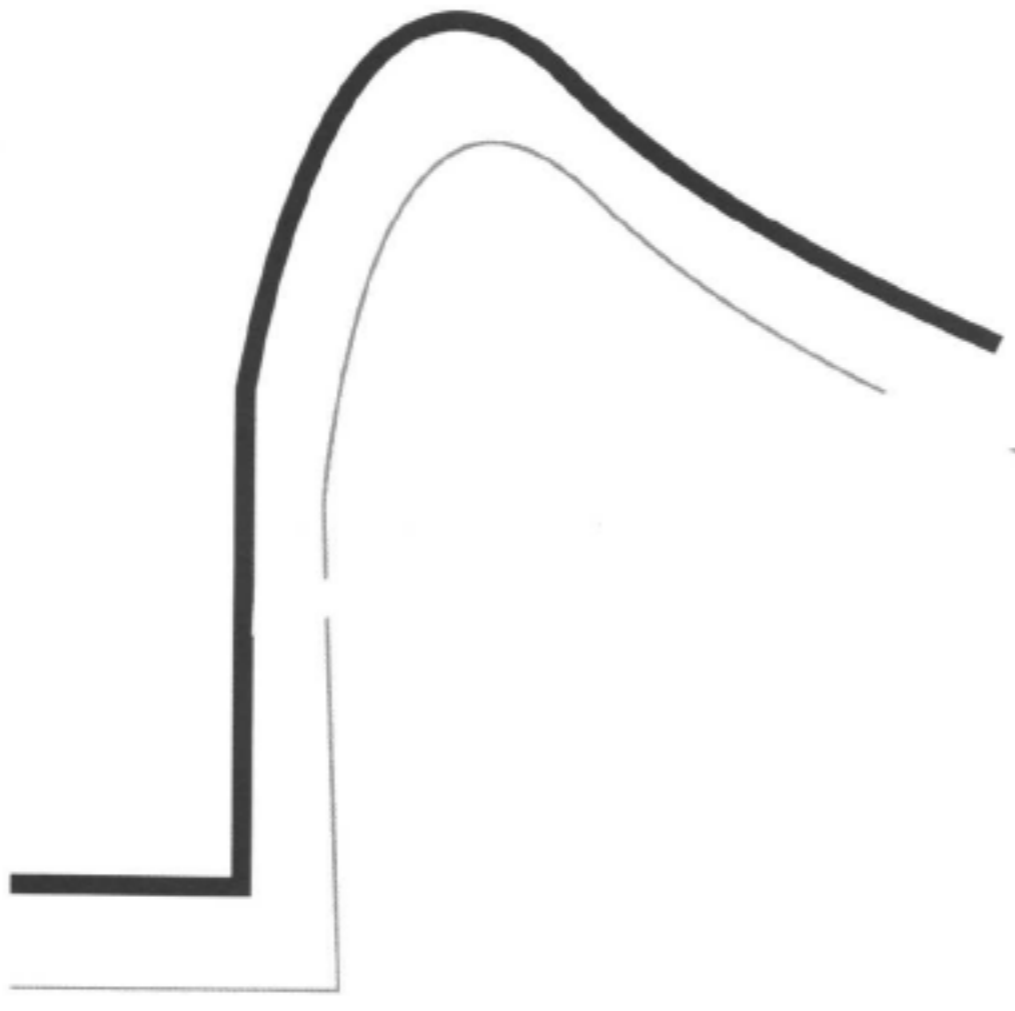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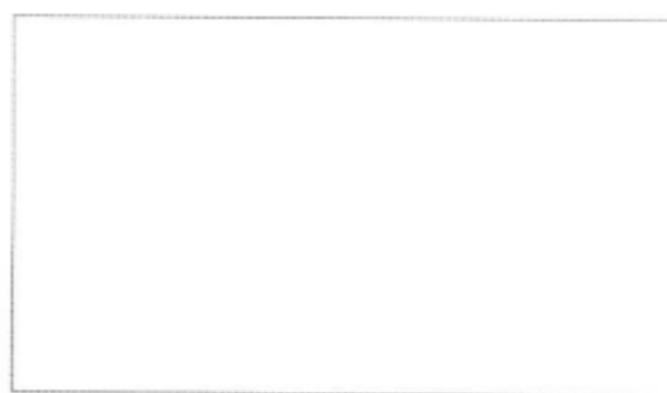
佛山龙跃头(中轴线是空间通道, 尽头是神坛)



吉庆围(中轴线是空间通道, 尽头是祠堂)







维多利亚城的规划

人人都说维港美，难以想象的是，百多年前太平山下静谧有序的欧陆建筑，配衬着巨帆飘曳的中式帆船，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1839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 (Charles Elliot) 因林则徐查禁鸦片而要求英政府动武，并令英舰驶往香港海面暂避。1840年，英舰组成的“东方远征军”抵达香港，并沿岸北上攻陷浙江定海和天津大沽，迫使中方代表琦善在未征得清廷同意下，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允许英军选择一地寄寓停泊，于是英军于1841年1月26日正式登陆港岛。及后英政府认为条约未能满足

所有要求，拒绝承认，并召回义律，再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条约包括赔偿、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及放弃关税自主权（需由中英共同协定）。

香港处于中国南陲及远东心脏的有利位置，既水深港阔（最深可达18米），又有九龙半岛阻挡台风，最适宜远洋轮船停泊所需。港岛北面的中区港湾因此被选为重点开发的理想城都，并定名“维多利亚城”。

经历半个世纪的开拓，维多利亚城已俨如一个欧洲城镇般，以方正的中央广场（今皇后像广场）为核心向四方延伸：北面临海为皇后码头及卜公码头（整个码头将搬往赤柱海滨）；南端（今汇丰银行位置）是第一座香港大会堂，亦是香港首次透过公开设计比赛征集的建筑物，由法国籍建筑师M. Hermite设计，属古典风格；东侧是前高等法院大楼（今立法议会大楼）及旧香港会所；西侧是各大洋商行所在的商业中心区。这些建筑物各自仿照当时的西洋模式，有维多利亚或爱德华风格的殖民地式建筑，亦有混合巴罗洛克或歌特式的趣味。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它渗透着一股独有的西情“东韵”，为这个传奇城市留下一点点的文化遗产。

维多利亚城以华人及欧人聚居点划分区域：自添

冯永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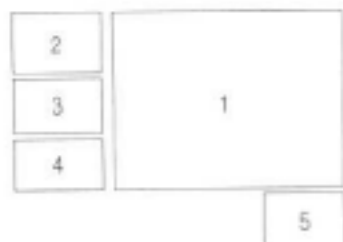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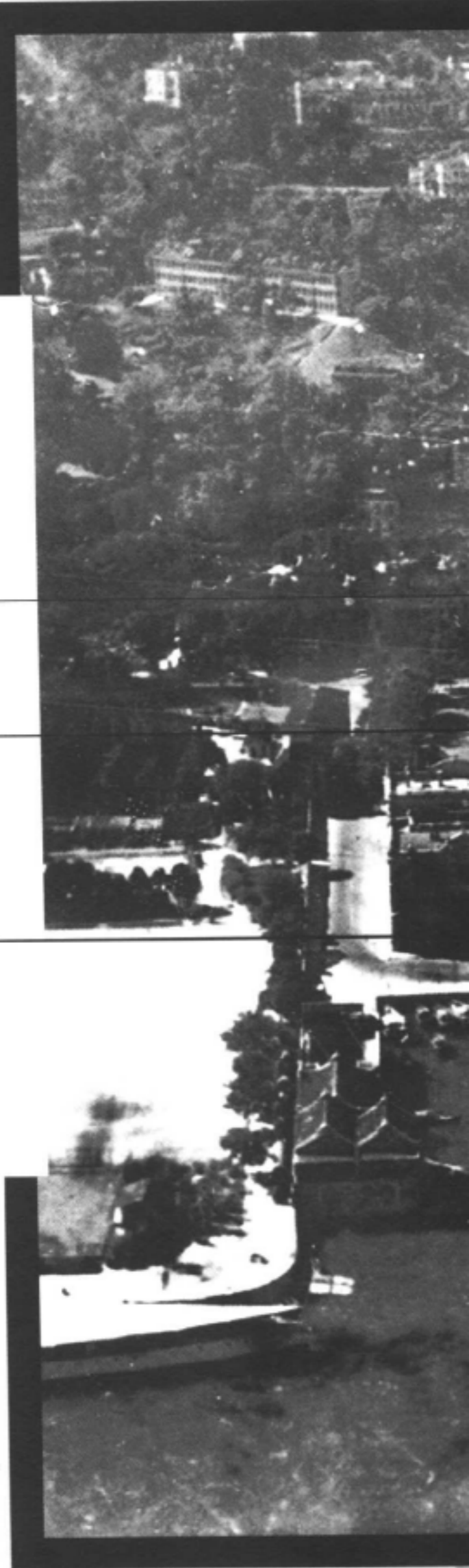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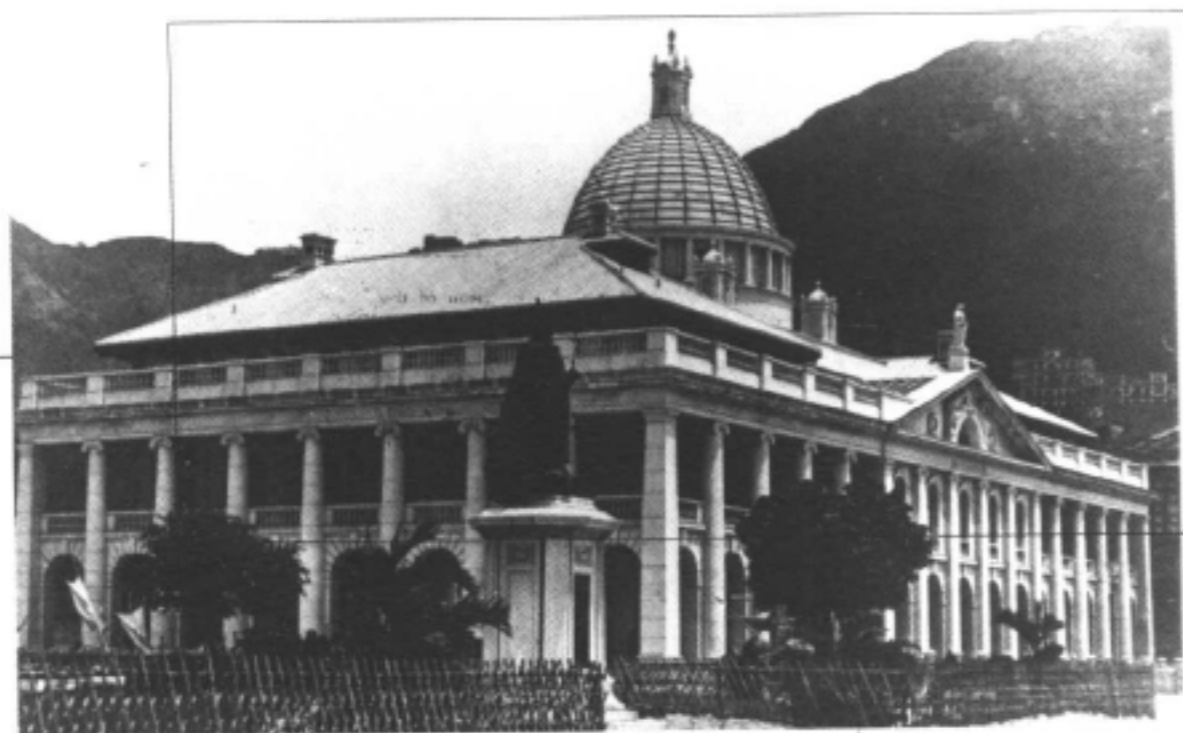
马舰海旁起，一直伸延至太平山山顶，是欧人居住区，并透过最先开发的缆车与山顶的西式民居连接起来。吊诡的是，港英政府将半山区划为洋人专用住宅区的政策，却意外地营造了独有的建筑风格，端庄典雅，令山顶成为欣赏西洋住宅的瑰宝。可是，这几年间，那里的房舍却面临不断被清拆的命运；而新建的屋舍，却越来越反映出财大气粗的主人心态。

花园道的东面，原为军事用地，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古迹中追溯到一些散落的军事设施，包括新中银大厦前身的美利楼（今已整幢迁往赤柱海旁），与位于香港公园的英军司令官邸（今茶具博物馆），都是现存最早的殖民地建筑（1846）。由于当时英军司令位高权重，故其官邸矗立于域多利兵营（今香港公园）最有利的位位置，以遥遥监视海港军事部署。

花园道以西的范围当时称为“政府山”，是涵盖宗教、政治及法制等各类建筑所在的权力中心，其中包括：会督府（1848）、圣约翰座堂（1849）、港督府（1855）、域多利监狱（1860）、中区警署（1864）、前中央裁判司署（1914）及终审法院（1917）。

为了便于管理，当局又把新城区分为四环九约，四环即上环、中环、下环（湾仔）及西环，目的是把不同种族分隔开，让洋人得占中环海港和较凉快的半山区，其余东西两端的华人区，则挤满了杂乱无章的“竹筒屋”。而港岛中部的黄泥涌大片郊野，则保留作华洋上流社会人士狩猎、郊游、赛马之用，“快活谷”因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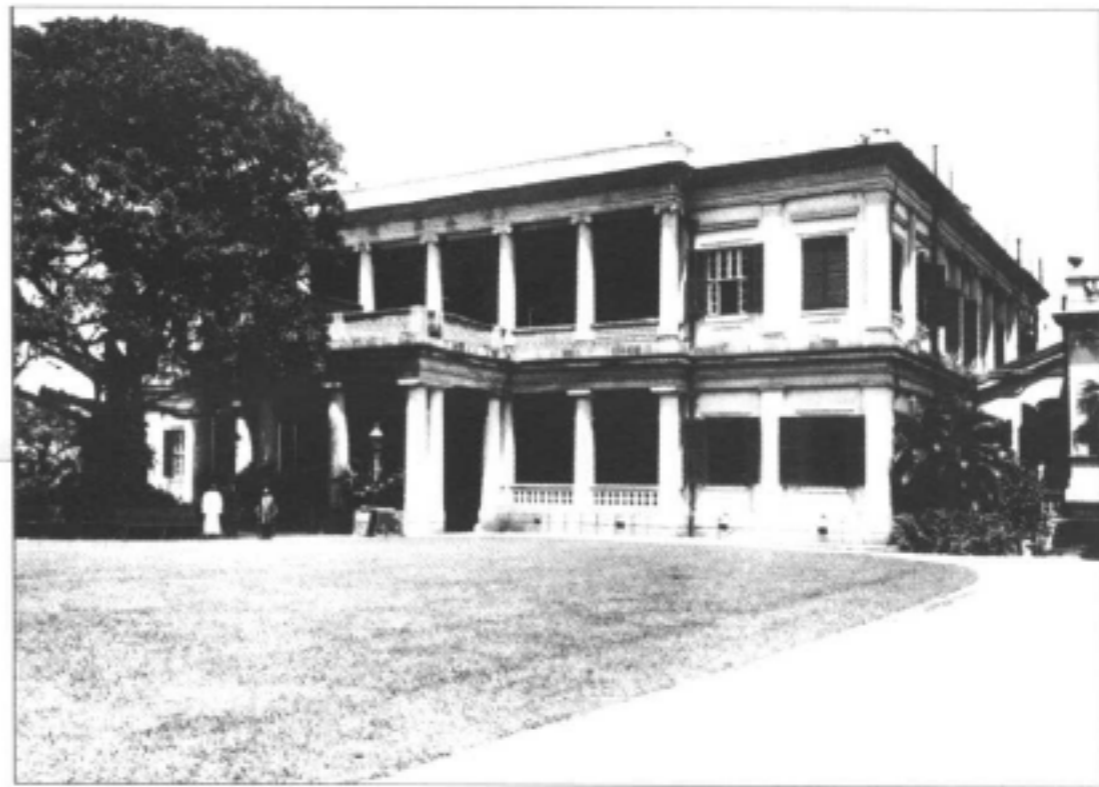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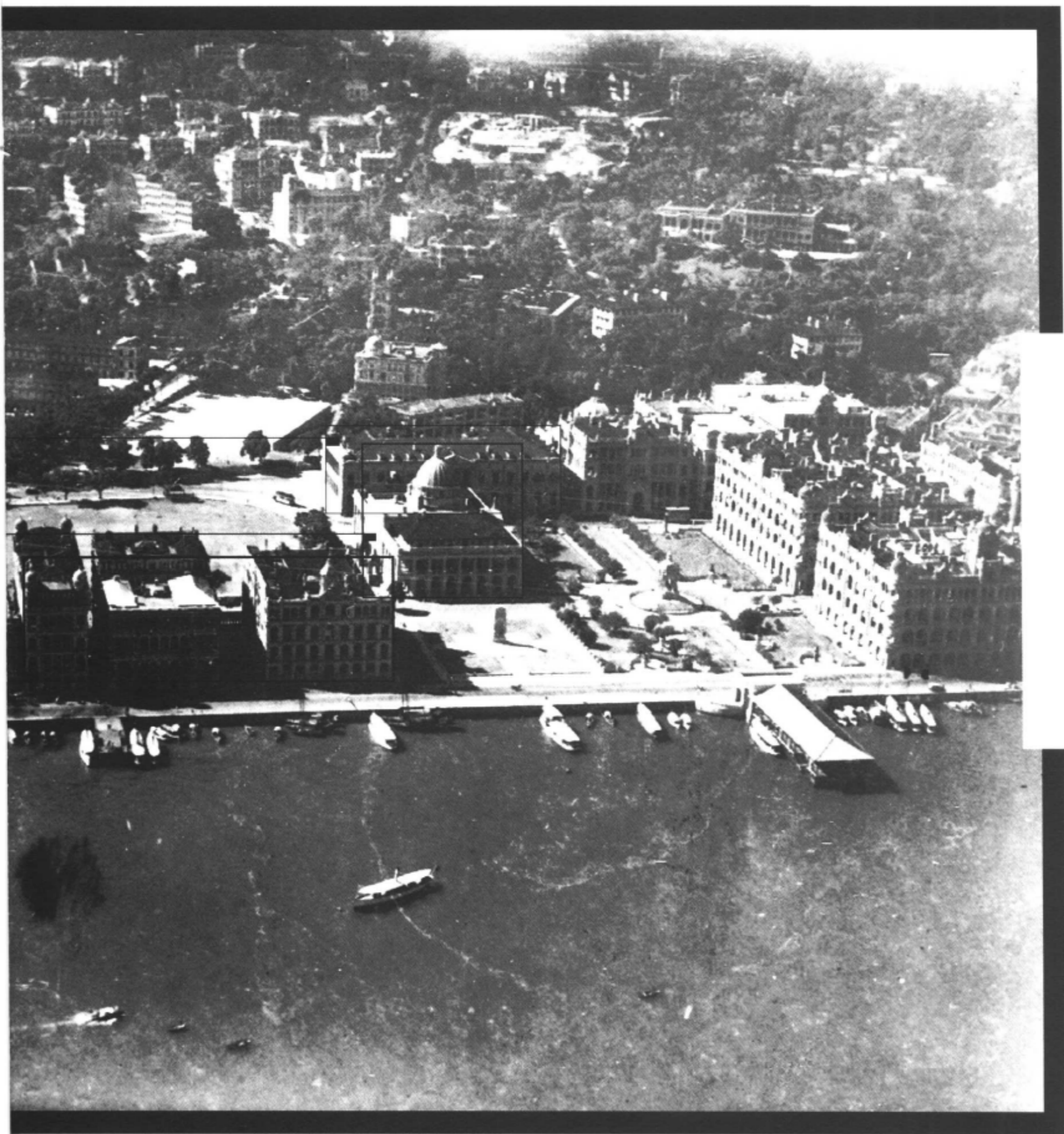


1 约 1930 年的空中鸟瞰图，清楚展示广场的方正布局，广场左边是军政区，广场右边是现在仅余的几幢旧建筑物，包括和平纪念碑、立法会大楼及圣约翰教堂，而海旁的卜公码头 20 世纪 70 年代被清拆后，曾移至黄大仙摩士公园，在 2006 年将于赤柱海旁“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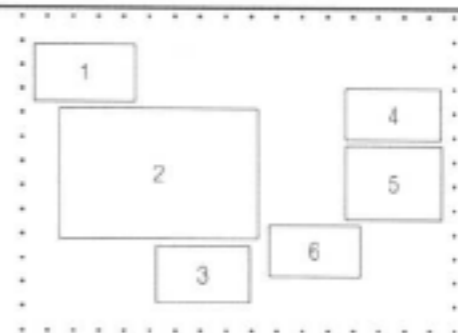
2 约 1875 年的香港第一座大会堂。大会堂于 1869 年开幕，内设剧院、图书馆及博物馆，其正门向南，门前有颠地洋行捐献的喷泉，1934 年拆卸，至 1962 年再在海边重建，并沿用至今。

3 庄严而壮观的高等法院于 1912 年落成，由英国 Webb & Bell 公司设计。后经内部装修改成香港立法局，“九七回归”后，再改名为香港立法议会。图为高等法院刚落成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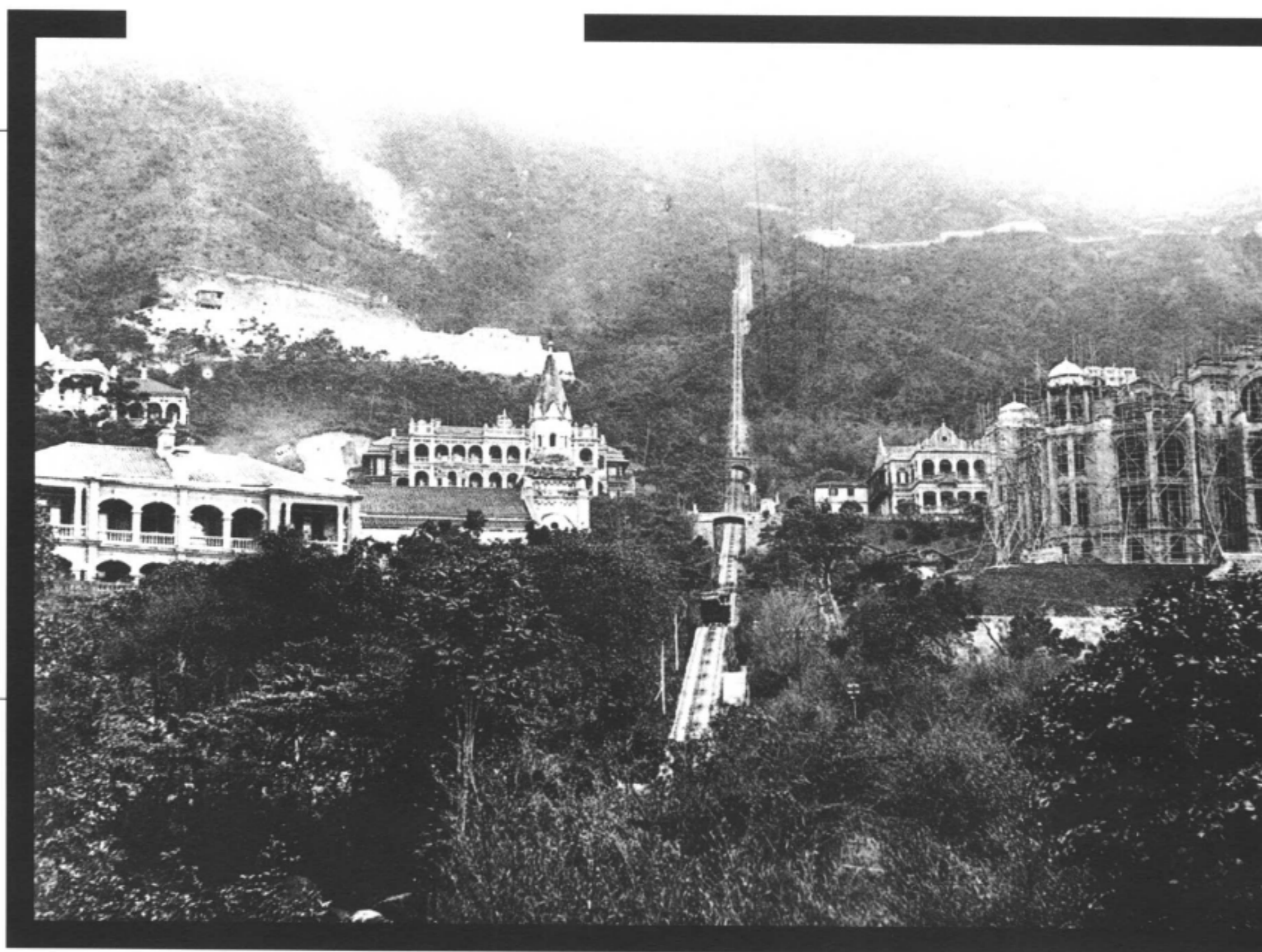
4 建于 1897 年的港会所，可说中区最后一幢拆卸的殖民地建筑。图左海可见海军船坞约摄于 1928 年。



1855年落成、位于上亚里毕道的港督府(现称礼宾府),约摄于1910年。自第四任港督宝灵爵士开始,港督府便成为历任港督的官邸,后曾加建新翼及增建塔楼(日占时期)。该建筑柱体为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主要的形式,上层部分采用爱奥尼式(Ionic Order),下层采用多利安式(Doric Order),设有深邃的回廊,窗户用木百叶帘更是殖民地建筑的特色。



1 中区以东为军事区，图为 19 世纪 70 年代的维多利亚兵房。该兵营一直沿用至 1979 年才交还政府，后改建成香港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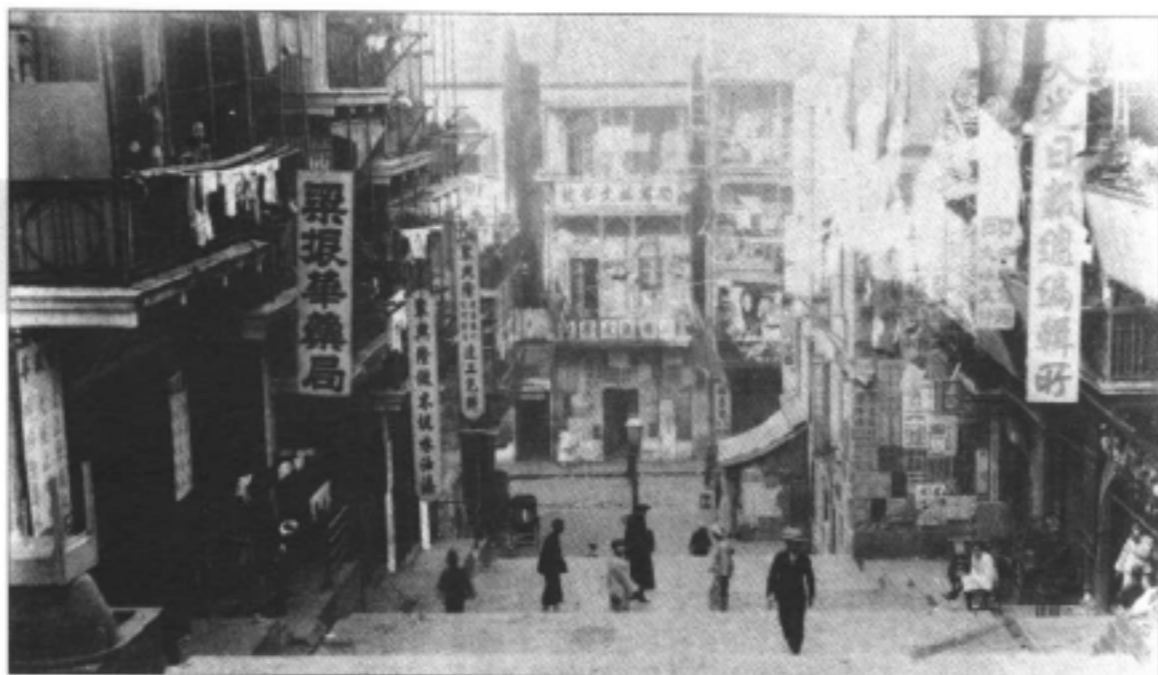
2 约 1890 年的太平山，山上的植林由 1860 年开始，幽美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外籍人士在此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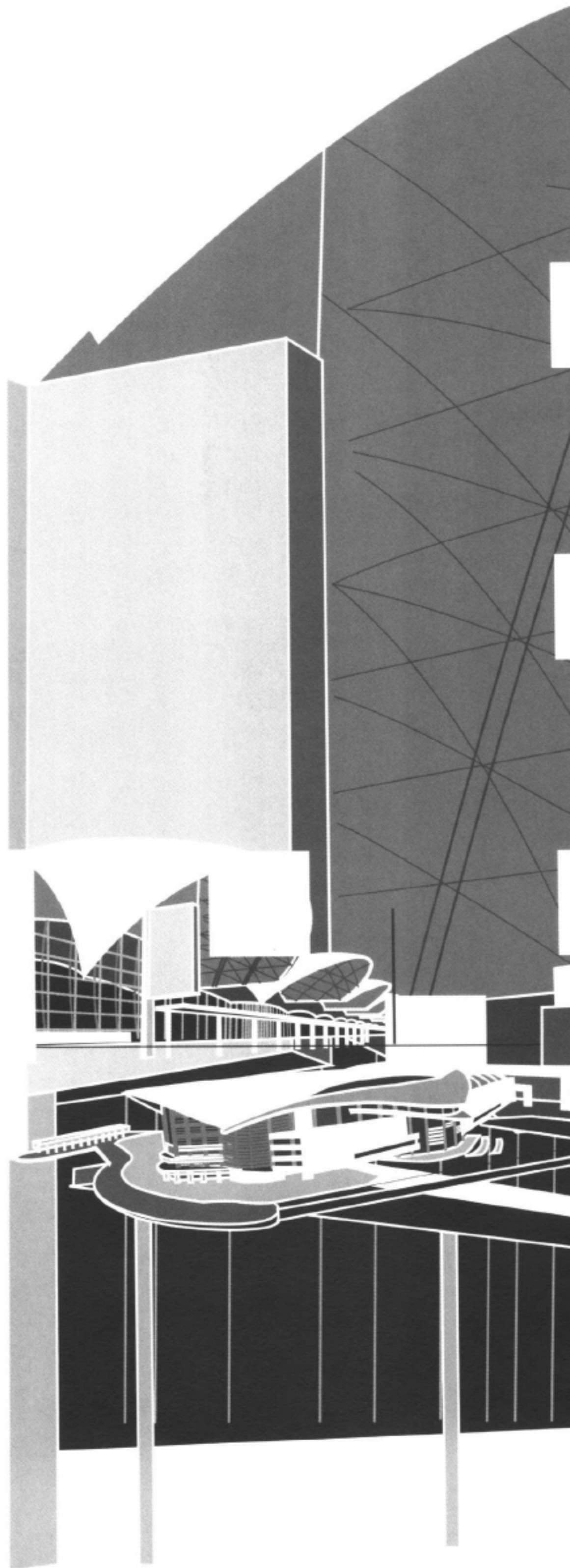
3 约 1880 年的中区皇后大道中，是外商云集的商业区，唯此后已渐被华商赶上。图中的钟楼为报时之用，建于 1863 年，后因阻塞交通而不得已于 1913 年拆卸。

4 约 1906 年的西区海岸，是华人轮船公司、商铺及海员客栈的聚集地。

5 约 1890 年的西营盘东街，它与正街及西边街一样，都是从半山般咸道直达海边的地区。

6 约 20 世纪 20 年代的城隍街，这里是华人聚居及经商之地。







在芸芸香港公共建筑当中，一九六二年落成的香港大会堂是唯一享有官方特殊地位的作品。它不仅代表香港人成长的集体记忆，也成为市民心中的文化符号，是公认六十年代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当局更会定期地为建筑物举行纪念活动。

迅即成为众人垂涎的尊贵行业，遂有所谓「香港发三师」的黄金岁月。而公共建筑继续由工务局直属的建筑设计处承办，并一直扩充服务范围；至一九八六年，再正式升格为建筑署。

直属的建筑设计处承办，证明透过比赛是达至最高设计水平的公认甄选模式。

特殊地位的作品。

社会普遍视学建筑为富有人家的专利，加上修读时间长，学位严重不足，及有艺术天分的学生无法进入门槛，设计水平非常参差。尤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为建筑署。

可是，经济急速发展的代价却是沉痛的，当时社会对

成长的集体记忆，

术天分的学生无法进入门槛，设计水平非常参差。尤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这时期亦是香港公共建筑建造量的高峰期，香港艺术中心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往后不少大型项目不断在各区涌现，其中香港文化中心、太空馆、艺术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移山填海』的殷切及憧憬，「去旧迎新」带来的商机，正好反映香港市民对急剧变化的都市新貌的期待，遂任由树林被砍伐、山脊被开凿、海港被堆填。有历史价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文化符号，是公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点，往后不少大型项目不断在各区涌现，其中香港文化中心、太空馆、艺术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化的都市新貌的期待，遂任由树林被砍伐、山脊被开凿、海港被堆填。有历史价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的现代主义建筑，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断在各区涌现，其中香港文化中心、太空馆、艺术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化的都市新貌的期待，遂任由树林被砍伐、山脊被开凿、海港被堆填。有历史价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建筑物举行纪念活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动。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香港公共建筑发展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高峰期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踏入二十世纪七十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年代，香港建筑界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进入华洋争持之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势。在充满机遇、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求才若渴的氛围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下，建筑师由于掌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握了呈交建屋图则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的法定权力，乘着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地产市道的兴旺，

其明显的是，在「多、快、省」的大前提下，设计千篇一律甚至取巧，致令这紧扣城市步伐的创意工业完全被矮化为金钱游戏，靠所谓「炒尽」每一分空间以满足发展商「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之道。

馆等庞大建筑群，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有关的公共机构如香港赛马会、贸易发展局、香港地铁、机场管理局等，亦利用其较灵活的机制，以不同形式的比赛或甄选，为香港建筑物增添异彩，其中包括：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球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及沿线铁路

值的公共建筑更是首当其冲，当中包括：尖沙咀火车站、中环邮政总局、海事处大楼、上环街市南翼等等珍贵文化遗产；皆相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拆卸或重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确是争议的焦点，这种以适应本土气候、物致香港建筑风格逐渐与关键在于「公共」二字，料、技术而衍生的建筑，国际潮流接轨。一九五〇年成立的香港大学建筑学系，更是香港建筑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里市形象，期望出类拔萃。

香港的公共建筑，自开埠的一百年，都是由英人主导的产物，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走向本土化，由本地建筑师参与设计，以及被公众评论。随着社会对公共建筑的认同日益提升，今天谈公共建筑，更易引发共鸣。

深受国际现代主义影响 一九一一至一九七〇年是香港公共建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泛指辛亥革命至战后香港经济重新定位的半个世纪，是国际现代主义影响的年代。期间由于战后百废待兴，且配合婴儿潮和从内地涌入的人口压力，间接地影响了公共建筑的发展方向。这时欧洲兴起追求简朴与功能兼备的国际新风格——包豪斯现代学派，正正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并导

在崇尚英国现代学派的哥顿·布朗 (Gordon Brown) 领导下的香港大学建筑学系，以探索俭朴儒雅与利用原产物料，为设计的主要元素，其影响延续至往后二三十年的香港建筑。遗憾的是，这个年代的作品，尽管在同业眼中被称许为香港公共建筑史上的优秀作品，奈何却敌不过商业的决定，纷纷被拆卸、重建或正面临清拆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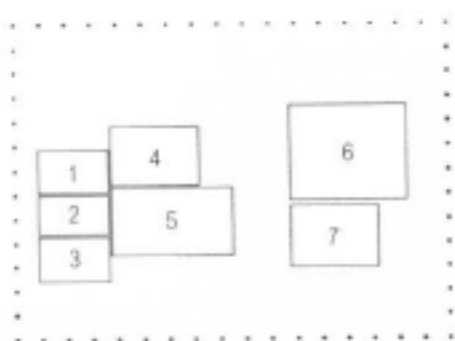
充满殖民地色彩时期

香港公共建筑的第一个时期（一八四一至一九一一）最能突显统一风格。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地式建筑，是一种完全附属于统治者的文化符号；标志着模仿英国的折衷主义，并加设深阔阳台与百叶窗扉的一种混合体。

现代学派，正正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并导

1 约摄于1903年的皇仁书院。前身为创立于1889年的中央书院，从1903年开始专门取录华人子弟。抗战后由于建筑被毁，遂于1950年搬往铜锣湾现址。

2 约1910年的西营盘国家医院，前身于1874年被台风所毁，并于1880年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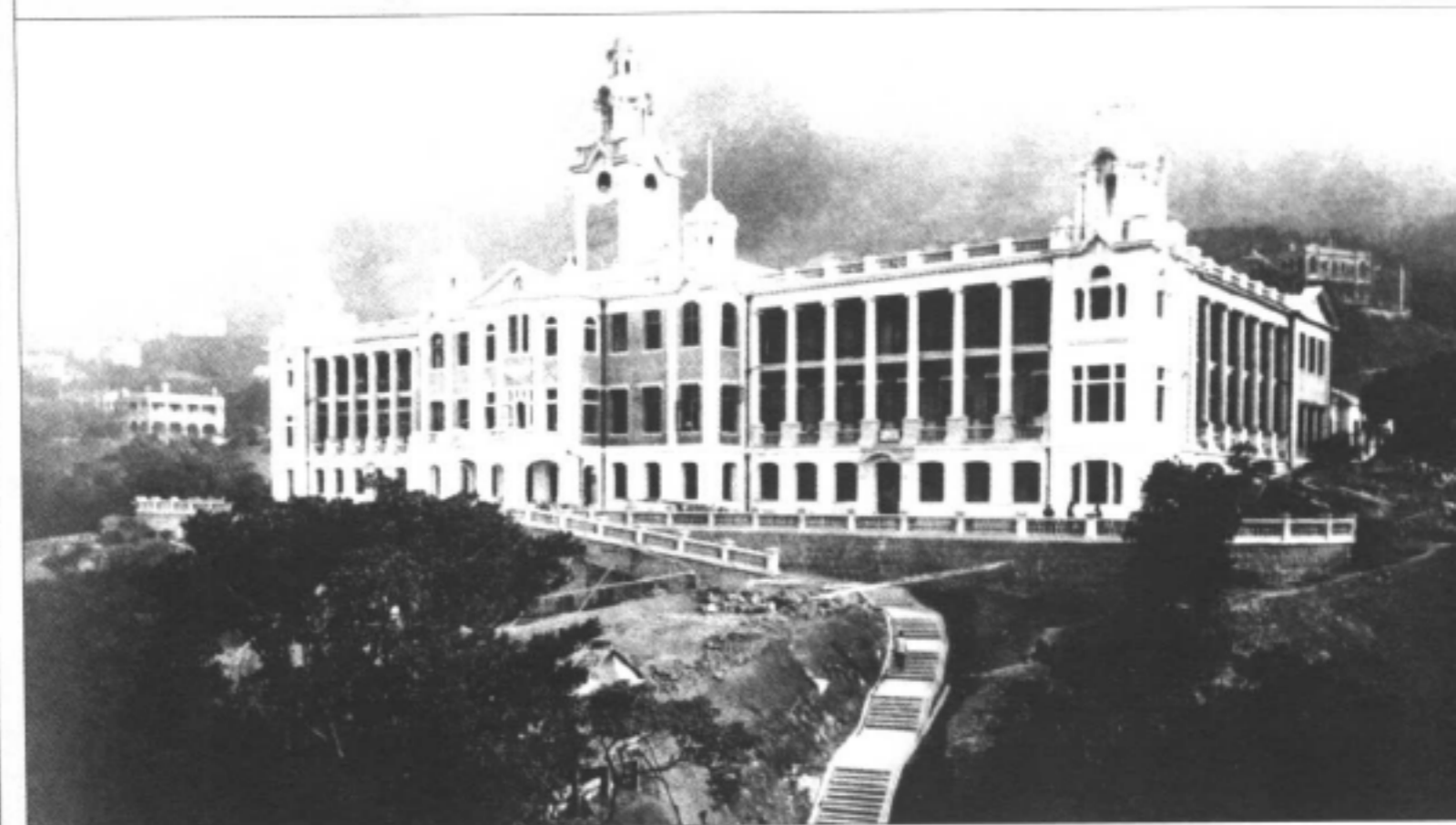
3 已被列为法定古迹的水警总部，建于1884年。后经公开招标，翻修为高级酒店，酒店前并设有仿古的西式广场。

4 约1920年的中区邮政总局。该建筑展现红砖横条图案的爱德华风格，建于1903至1911年间，四街角交错点的四根石柱，属爱奥尼柱式，现存于大埔的嘉道理农场山麓。邮政总局于1976年拆卸，重建为今天的环球大厦。

5 1912年刚落成的香港大学陆佑堂。建筑物富文艺复兴色彩，为当时远东一所最具代表性、专为东方青年人而设的西方文化与科学的最高学府。

6 约1910至1920年的中央市场。1895年建成的中央街市，其北面向新填海区，即日后的德辅道。图片显示市场的南面入口，面向皇后大道。该大楼在形式上稍别于当时的殖民地风格。

7 西港城前身为上环街市南翼，建于1858年，属于爱德华风的代表性建筑，当年的土地展局选定为保留文物，并聘了何弢建筑师负责将内部大修。



1841-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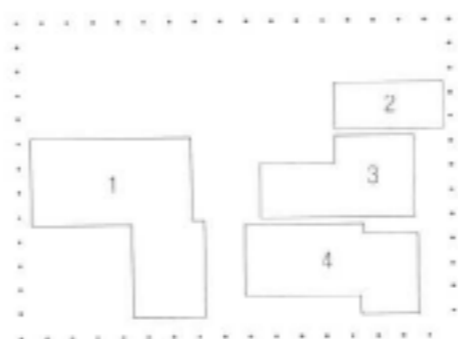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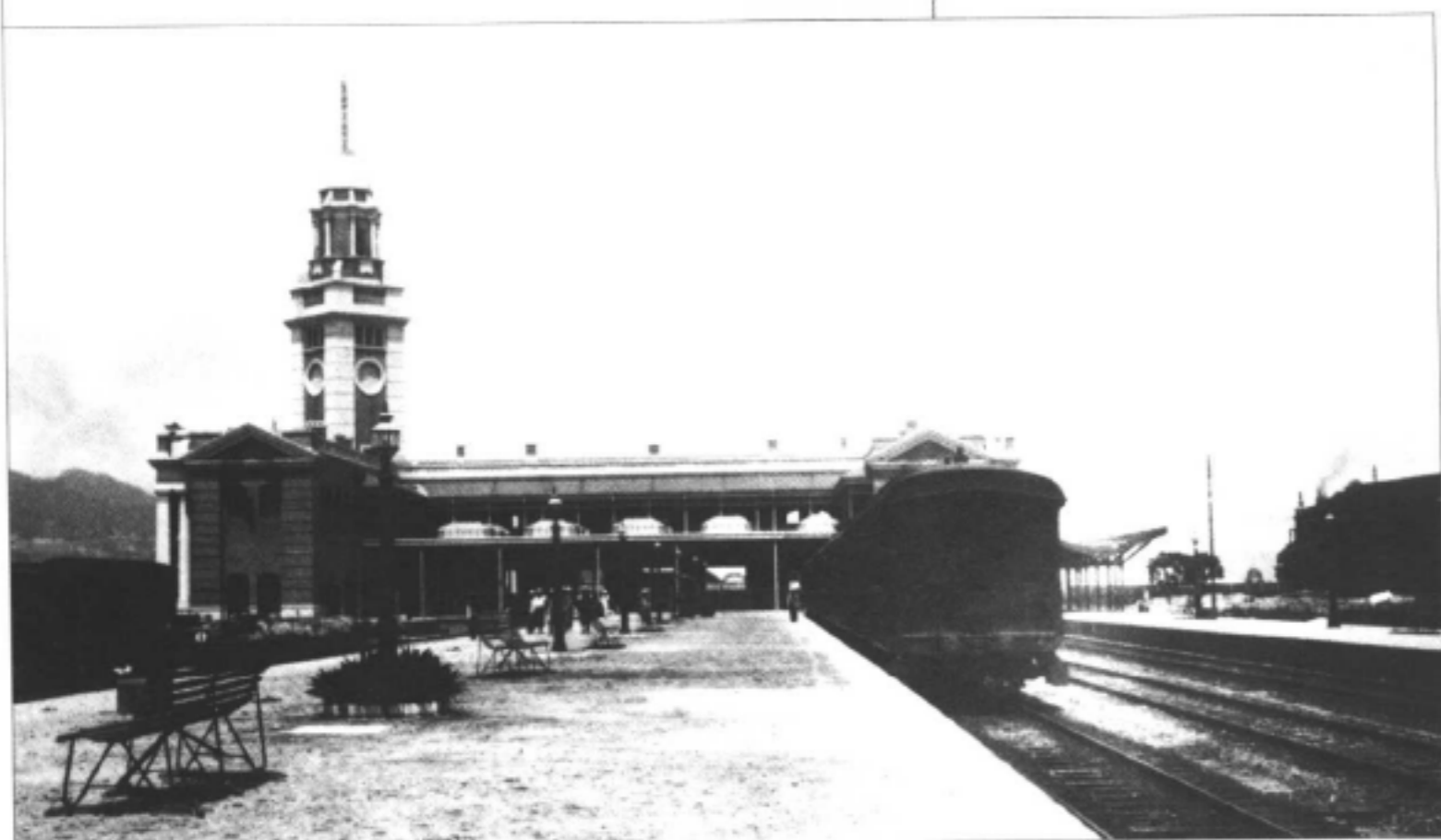
约1917年的尖沙咀火车站及今天剩下的钟楼。前者展现了铁路大楼、路轨登车月台及钟楼，该钟楼完成于1920年，已列作法定古迹。车站群楼的6根多利安式石柱，现矗立于尖沙咀东部的梳士巴利道公园门前，当局有计划稍后迁回钟楼的广场上，以重塑历史的足迹。

2

建于1922年的油麻地警署，位于人口稠密而富地区色彩的庙街及公众四方街旁。数年前，由于道路扩建的考虑而险些被清拆。



191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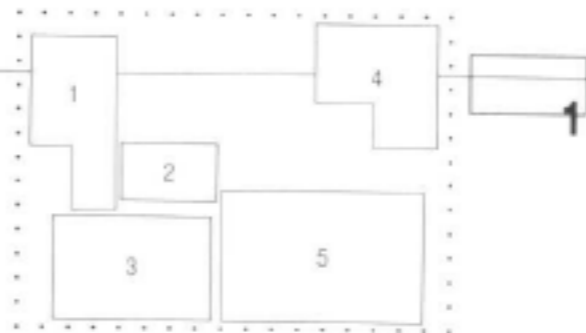
建成于1962年的香港大会堂是香港第二座大会堂，却是首个完全为香港人而设的文化中心，它包括有高座(图书馆、博物馆及婚姻注册处)、低座(音乐厅、演讲厅及展览馆、餐厅等)及中央的纪念公园，以纪念大战时为港捐躯的人士。大会堂曾于1992年大翻修以纪念30周年志庆，而纪念公园也作了全面变身以适应所需。

4

同样落成于1930年的湾仔街市(图左)及警署(图右)，是当年流行的公共建筑模式，其线条简洁，且在内外空间连接上甚有心思。前者更具包浩斯建筑风格，是湾仔居民最熟悉的地标。

-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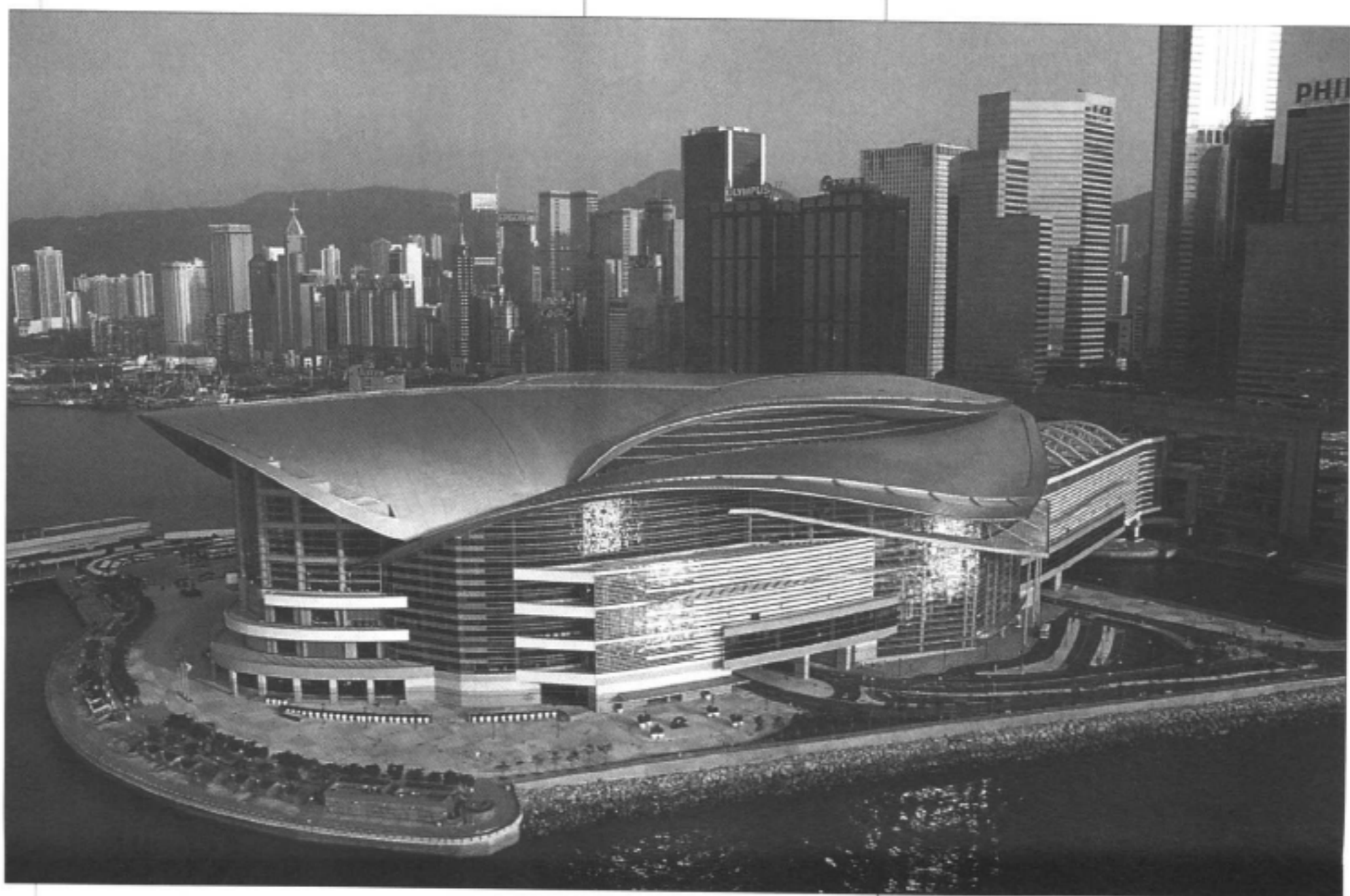




1 香港艺术中心，是由民间争取建成的第一所民营文化中心，坐落于一千平方米的街角上，为何强建筑师的成功之作。

2 1998年建成的东涌地铁站，是按一套系统化规范设计，其外形与内部均展示现代建筑的简约线条。

3 1997年落成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透过比赛选出的作品，其外形酷似飞翔中的海鸥，现已成为维港海边的一座地标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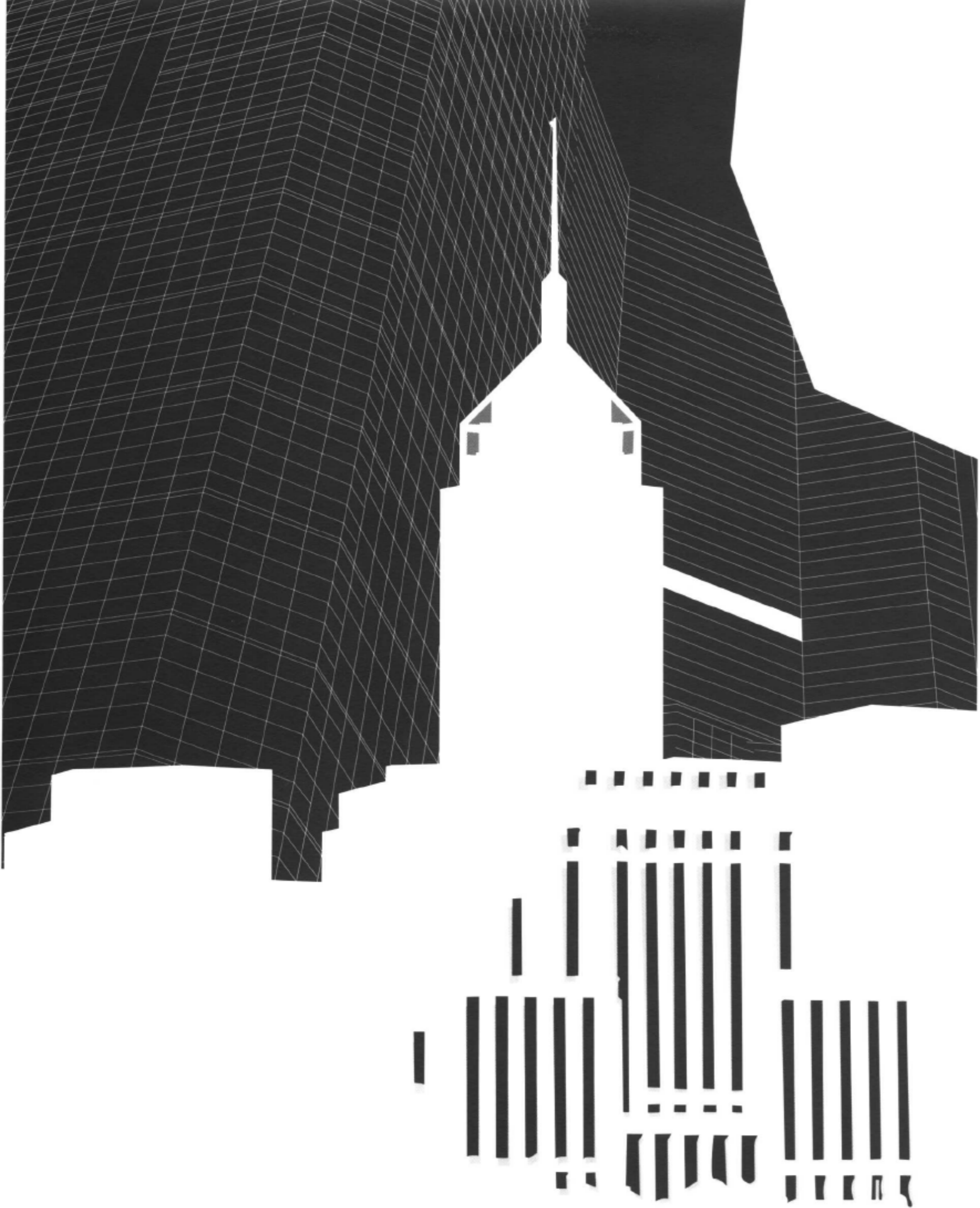
4 连续五年获选为全球最佳机场的香港国际机场，是国际著名建筑师 Norman Foster 透过全球招标中选的作品。其采用组件系统化理念，令结构、机电及消防等设计，均能达至最先进及环保的标准。

5 随着人们对公共建筑的需求日高，这所新近完成的香港湿地公园，是建筑署最新的作品，于2006年初启用，以提供一处静态主题公园作为本港重点旅游项目。



1970-





11 11111111

11
11

1111111111



商业建筑

陈丽乔

从服务南中国的转口港，到今天跃身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少商业建筑，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亚洲区，甚至世界建筑划时代的典范。商业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只要看看中区中轴线上屹立着的建筑物，便可知一二。

这些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大都属于自用，而非一般出租或出售用途，故利润多寡，并非主要的考虑因素，反而建筑物的公众形象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一般商行都愿意不惜巨资，投放更多的资源和时间，目的是提高公司的声誉。

这些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从低层发展到高层、超高层；从传统砖石承重结构，到混凝土、钢框架；从倚赖天然通风、采光及人手操作系统，到使用全自动机械操作及各种智能系统，真正见证了香港建筑百年走过的路。

第一阶段

华洋分隔、中西传统各异时期（约1840-1890）。开埠初期，洋商兴建的多为2至3层仿西方传统式样的建筑。为了适应香港炎热潮湿的天气，建筑物外围大多加建回

廊，以解决日晒、雨天通风的问题，这些建筑风格，被称为“殖民地风格”。建筑物多就地取材，选用本地开采的花岗石，广东、台湾出产的砖块，偶尔再加上生铁铸造的柱子、栏杆、配件，屋顶则盖上国内生产的平瓦或筒瓦。

这个时期的建筑，一般是左右对称，立面以横带分成几段，大多明显呈现“头、身、脚”部分。外墙处理，或是柱列、或是券拱、柱头装饰及券拱形状，要看式样风格而定。这些建筑物发展至后期，已高达五六层，个别建筑物，更安装了升降房间（电力升降机的前身）。

从事中国南北贸易的南北行、供应货品与各地华侨的金山庄（即往北美）、南洋庄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店铺大都集中在砵甸乍街以西，上环、西环一带，形成与中环商业核心区截然不同的华人社区。

华商店铺是2至3层高的房屋，建筑学上称为“街屋”（shop house），港人俗称“唐楼”。这些房屋，统一宽度约5至6米，正好是一根横梁木的长度，顶部盖上金字坡顶，平面窄而深，骑楼突出；沿街为店铺，店铺前有走廊，楼上作办公室或住宅之用。

第二阶段

华洋杂处、新旧交替、中西分野日益淡化时期（约1890-1950）。当时不少在中国上海等地大展拳脚的洋行，将基地移回香港。经过数度激烈残酷的竞争、收购、兼并后，余下约有10个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并大多在中区设有独立华丽的总行。

同时，亦有不少经营转口贸易，或为洋行作买办的华人富起来。部分华侨在外地掘得第一桶金后，亦相继来港发展，把昔日洋尊华卑的情况扭转过来。这时他们不单在商业及政治上，扮演

了较重要的角色，亦在一直被视为华人禁地的中区、东角购置物业，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

1889至1903年，随着商业发展日益蓬勃，商厦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土地渐渐不敷应用，港府遂在中区进行大规模填海，此时兴建的新厦4至6层高。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开埠早期兴建的商厦，虽然经历数度改建或加建，但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拆卸重建。加上升降机的不断普及，使楼宇突破了人爬楼梯的6层高极限，相继增至为8至10多层，如在香港大酒店原址重建的9层高告罗士打行、14层高的第三代汇丰银行总行及17层高的旧中国银行总行，都曾经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

由于建筑物不



断增加高度，传统中西风格的建筑式样，已显得不太适用。西式横向分段的外观，例如金字顶、圆顶及券拱等古典建筑标记，都与新的高度和规模不合比例。反观唐楼的承重墙结构，因严重阻碍了空间的连接，早已被摒弃，而改为采取框架结构，用钢筋混凝土兴建，使内部空间无须限于木材的长度而变得更灵活。

随着华洋杂处，中西式样的分野日渐淡化，而昔日讲究繁琐的细部与装饰，亦变得简单及几何化，以便机械的切割和使用。竖向发展的立面，无形中加强了垂直线条的运用，屋顶则多以平顶或多叠式平顶覆盖。不过在采取新的混凝土、甚至钢框架结构的同时，许多建筑物仍然保留了传统对称的布局，如“头、身、脚”的分段，以及抹不掉的立面装饰。当时，这种盛行于西方的风格，正是一种折中于新技术和旧审美观的设计，一种淡化地方色彩并过渡到国际大同的潮流，称为“艺术装饰(Art Deco)主义”。

第三阶段

工商业急速发展、简约“摩登”成风时期（约1950-1980）。这时期香港经历了一次大的经济转型，从过去的转口贸易为主，转而以轻工业为主。是次成功转型，实有赖一批挟资金、设备来港的实业家及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新移民。

在地价飙升、工资上扬的压力下，为了加快施工速度，香港紧随西方大行其道的“摩登”潮流，将立面进一步简化，包括使用矩形的窗、垂直或水平的线条、方盒式的外形，甚至所有花工夫的装饰亦全

部省去，不再忌讳混凝土墙的裸露。此时在工地以外预制混凝土外墙或玻璃幕墙大受欢迎。长江集团在中区兴建的环球大厦（旧邮政总局），便曾创下4天一层的施工周期。特殊的施工方法（如随浇随升的板模），价格虽然昂贵，但却因有助加快兴建速度而被先后采用，建筑物亦由10多层逐步增高至40层。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置地公司在中区新填海区的土地上，兴建了亚洲最高的52层康乐大厦（今怡和大厦）。它的高度直至八十年代方被66层高的合和中心所超越。

第四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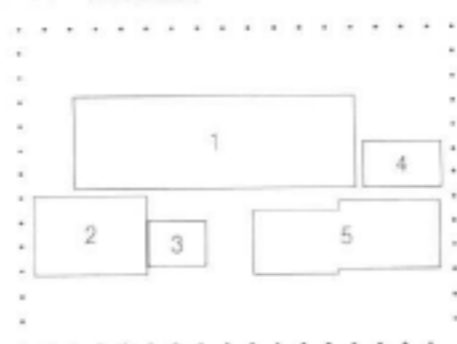
面向世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时期（约1980年至今）。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业的急速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初步确立。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成本低廉的条件，吸引了香港厂家将劳工密集的生产线转移内地，致使香港工业逐步萎缩，劳动力转投金融及服务行业。

凭着资金自由进出、法律制度完善，进一步缔造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

心。通过一轮激烈的收购战，不少英资的资产，逐步落入华商手上，而这些华商，又与个别英资集团进行收购合并。他们不少在地产业上滚存巨大财富后，已孕育成为一些实力雄厚的超级国际大财团。

这些财团纷纷寻找更大的地块，兴建更高、更大的商厦，如置地公司，就是通过合并、交换地块，发展了中区的置地广场；太古在旧兵房地段，兴建了太古广场，九龙仓亦将铜锣湾旧电车厂，改建成时代广场。这些大规模的发展项目，多包括数幢楼宇，综合多种用途如商场、办公室、酒店等，并提供了大型的中庭或广场予市民享用。当然，填海仍是大地块的主要来源，如置地在中区填海区兴建的交易广场，前身便是由4个股票交易所合并而成的联合交易所的所在地。位处湾仔却以中环为名、楼高78层的中环广场，更一度是香港最高的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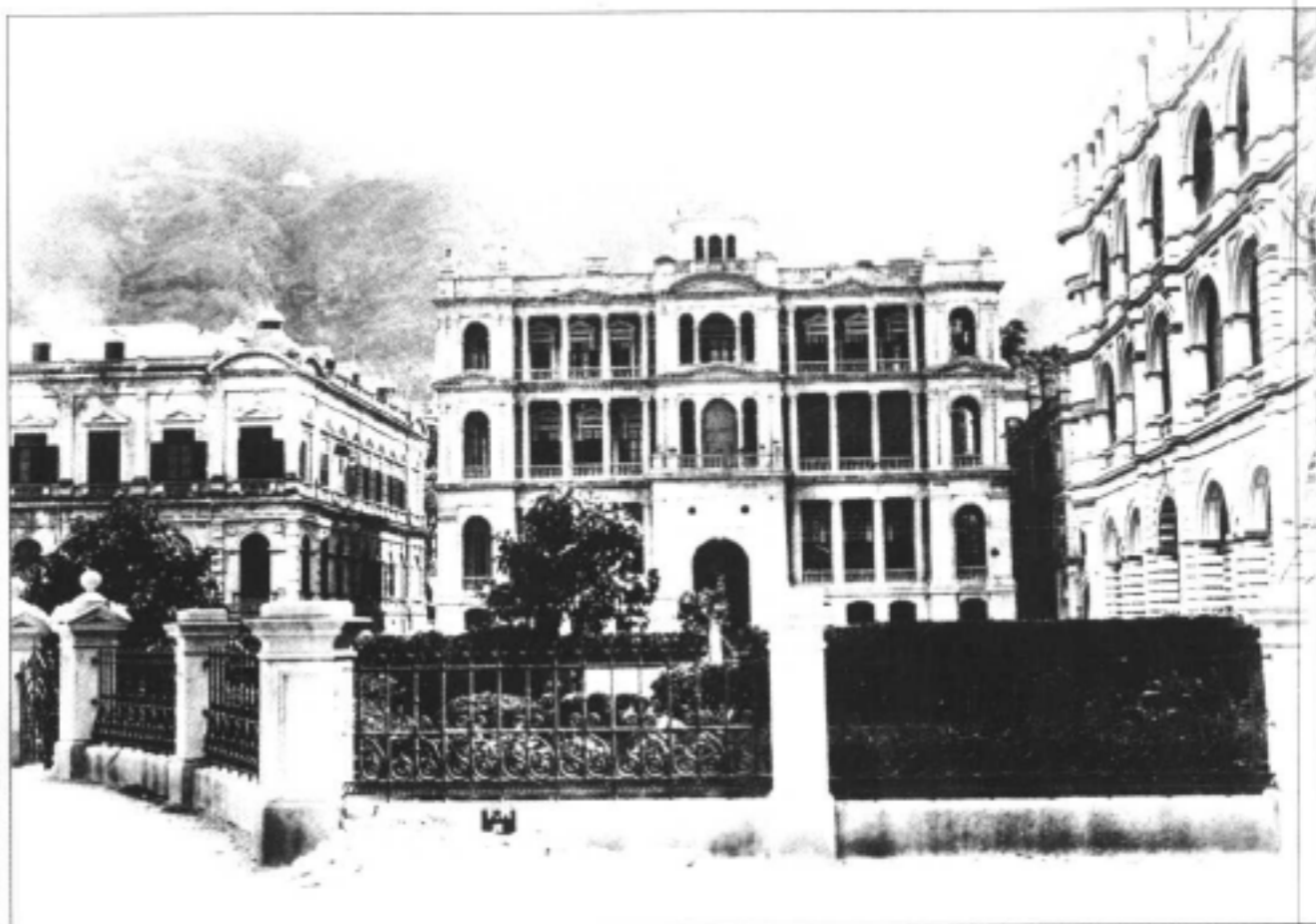
这时期的大财团已不满足于拥有一个兴建速度快，但没有个性的玻璃方盒子。他们开始对建筑物的外形花上更多的心思，以追求更富雕塑性的造型、更具有肌理的立面，以及讲究晚间的灯光效果等。此外也纷纷聘请举世知名的建筑师，设计他们的总部，以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声誉，例如香港会所、金钟的奔达中心、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二期、长江中心、刚完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计划在九龙站上，建筑过百层的商厦。当中尤以英国建筑师 Norman Foster 设计的汇丰银行总行，及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新中国银行总行，最负盛名，因为两者都先后尝试了前所未有的新结构概念与造型。



1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中区海旁。图中最左端之空隙处，可见毕打街，街口两旁是渣甸洋行及香港大酒店（此时的香港大酒店西翼，已加高至 6 层，并加入“升降房间”，是当时香港最华丽、设备最完善、升斗市民不敢贸然入内的宏伟建筑物）。渣甸

洋行旁的建筑物从左起为 3 层的 Hesse & Co，4 层高外形由尖拱回廊叠起的英国伦敦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英文简称 P&O，香港人习惯称之为“铁行”，皆因此总行上建有生铁铸造的骑楼），及 2 层高的连卡佛公司。图右方的对称金字顶建筑物是中央街市。



2

1870 至 1875 年的中区海旁。图中最右方为毕打街口，街口的右边为刚从东角（今铜锣湾一带）迁回来的渣甸洋行大本营（1906 年德辅道新总行落成时，易名为“怡和公司”），左边为未扩建前的香港大酒店（原址曾是香港首屈一指的颠地洋行，洋行于 1867 年倒闭后，由保罗渣打改建成酒店）。图中最左端为获利行，是香港汇丰银行成立之初，租用的行址。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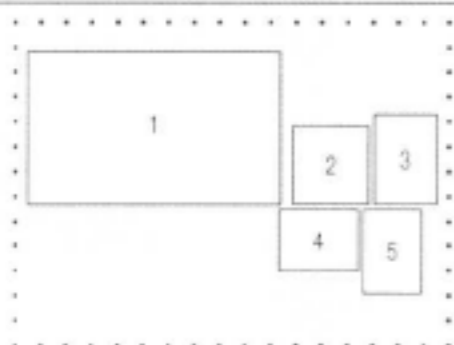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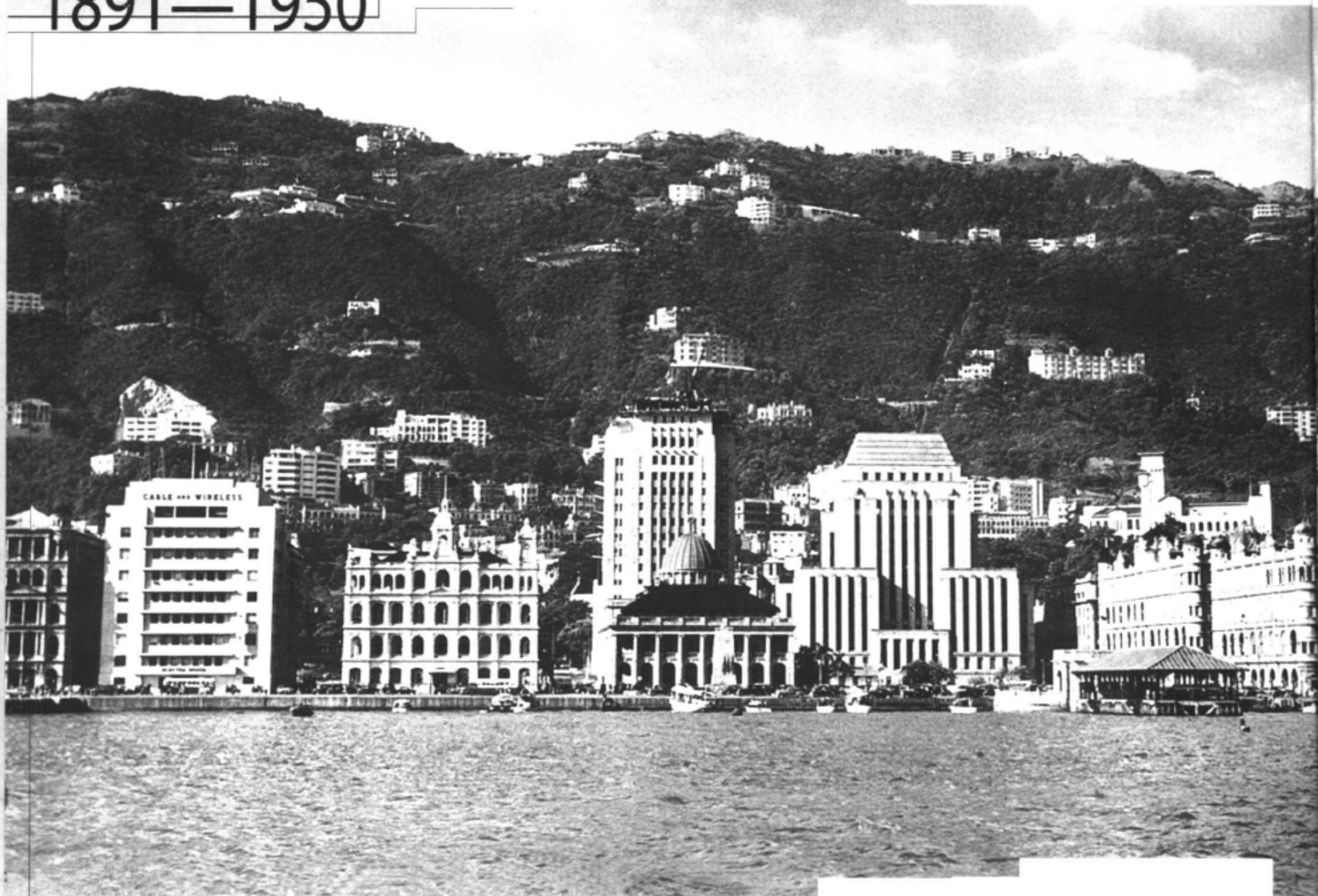
约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环海旁，可近观图二的建筑物，从左到右为渣甸洋行（1841）、德国 Hesse & Co（1861）、连卡佛公司（1850）、于仁行（1841）、船务公司 Douglas Lapraik & Co.（1870），当时 P & O 总行尚未建成。殖民地建筑风格，即以西方式样建筑为基础，再加上回廊、骑楼，并盖以金字瓦顶等，在这些建筑物上均可见一斑。

4

靠近上环南北行的唐楼，是华人商铺及海员旅店的集中地，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5

第二代汇丰银行大厦，于 1886 年以 30 万港元在银行原址上重建，由当时年仅 23 岁的 Clement Palmer 通过比赛夺得是项工程。设计由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物组成，向海一座楼高 4 层（右图），由叠起的柱廊所组成；面向皇后大道中的一幢则楼高 2 层（左图），外面围上一列古希腊式巨柱，支撑中间的圆拱形屋顶。据悉前后不同的处理是要协调周边的建筑物，在当时是香港最华丽的建筑物之一。



1

20世纪50年代的中环海岸。图中建筑物从左至右是水星大厦（今丽嘉酒店）、香港会所、高等法院、第三代汇丰银行、皇后行及太子行。屹立在中区轴线上的第三代汇丰银行重建时，曾与政府达成协议，将基地扩展至东侧的大会堂范围，占去原大会堂地块的西半部，并获得前面皇后像广场的制空权，取代传统城市中轴上以政府建筑物为主的位置，凭此亦可窥探香港经济挂帅的特色。

2

1935年落成的第三代汇丰银行总行。该银行总行楼高14层，是香港首批钢结构，外墙的垂直线条处理，建筑物楼身与顶部的叠级形态，都是典型的“装饰主义”手法。银行内设有中央空调及高速电梯，外墙铺上本地的花岗石，室内顶部镶了数幅描绘东西方发展、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马赛克画。该银行一度被誉为“从开罗至三藩市之间最先进的建筑物”。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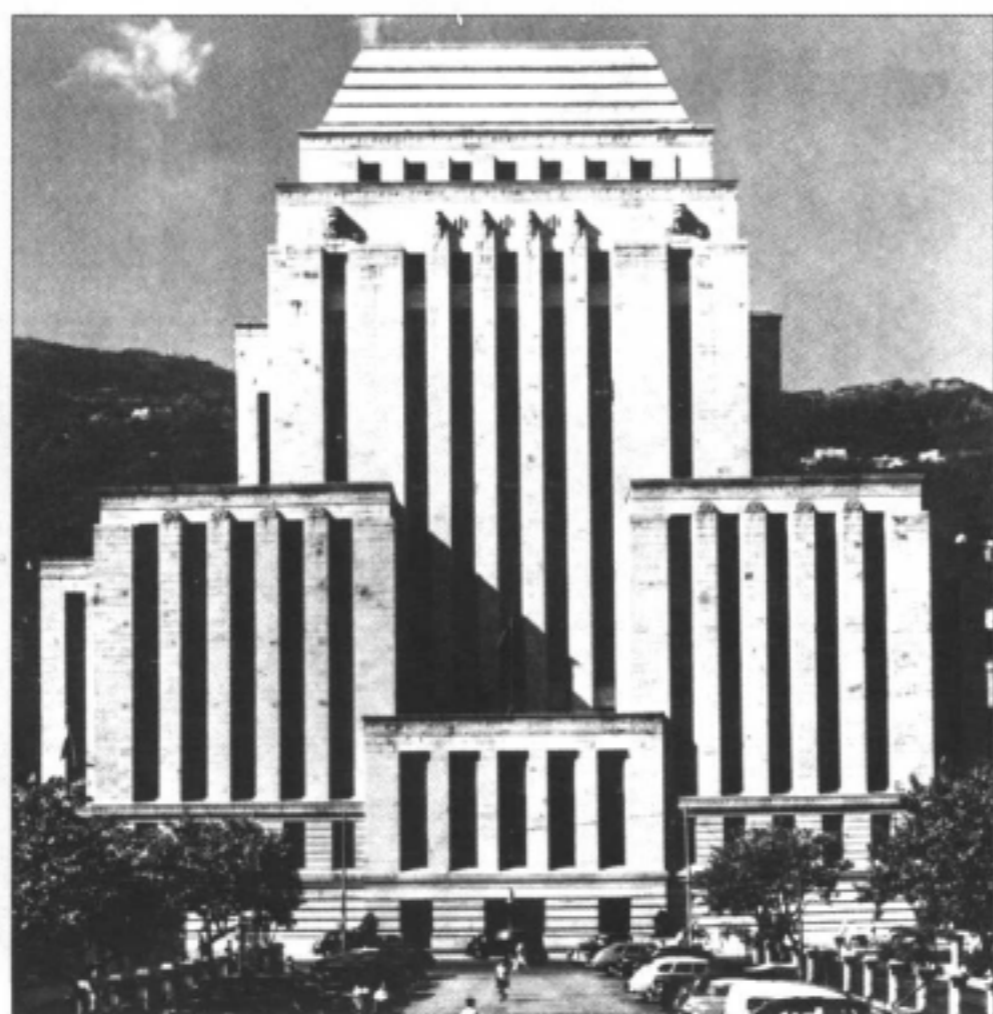
1950年落成的中国银行，该地段原是前大会堂的东半部（西半部已兴建为第三代汇丰银行总行），后通过破纪录高价拍卖售出，兴建17层高（另设一层地库）新厦，其外形酷似其在外滩的总行大楼（但没有总行的中式屋顶），外墙亦铺上与旁边的汇丰及后来的渣打银行总行相同、来自香港钻石山的本地花岗石，后来该大厦由中国政府接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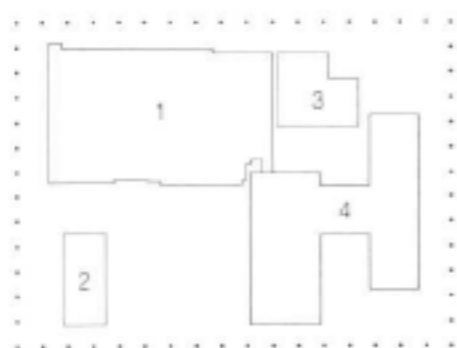
4

1905年落成的皇后行（图后方为今文华酒店位置），是置地公司首批完成的发展项目之一（其他包括了4层高的圣佐治行、5层高的皇帝行、6层高的于仁行，还有面向渣打道5层高的沃行，后3座建筑物于1960年合并发展成于仁行，后易名太古大厦，后再被重建成今天渣打道11号）。置地后来更收购了图前方的地段，发展成与皇后行外形相近的姊妹大楼——太子行，建筑物于20世纪60年代重建成今天的同名大厦。

5

香港大酒店北翼于1926年焚毁后，原地段以高价300余万元售与置地公司，发展成告罗士打行（图右）。新厦于1930年完成，楼高9层，用上了1500多条桩及6000吨钢柱梁，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建筑物内包括了酒店及办公室，而建筑物向毕打街的顶部建有一钟塔，形状有点像1908年被雷电击毁的毕打街钟楼。





1

20世纪80年代中区海岸景色，图中建筑物左起为奔达中心（今力宝中心）、美国银行中心、和记大厦、设有首个旋转餐厅的富丽华酒店、丽嘉酒店、澳籍建筑师Harry Seidler设计的香港会所、大会堂、第四代汇丰银行、文华酒店、康乐大厦（今怡和大厦）及交易广场。而交易广场右边中上环一带的建筑物，多为华裔于六七十年代发展的单幢办公大楼。此时期的沿海建筑，仍未突破港岛的山脊线，太平山协调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仍是维港的主要屏幕。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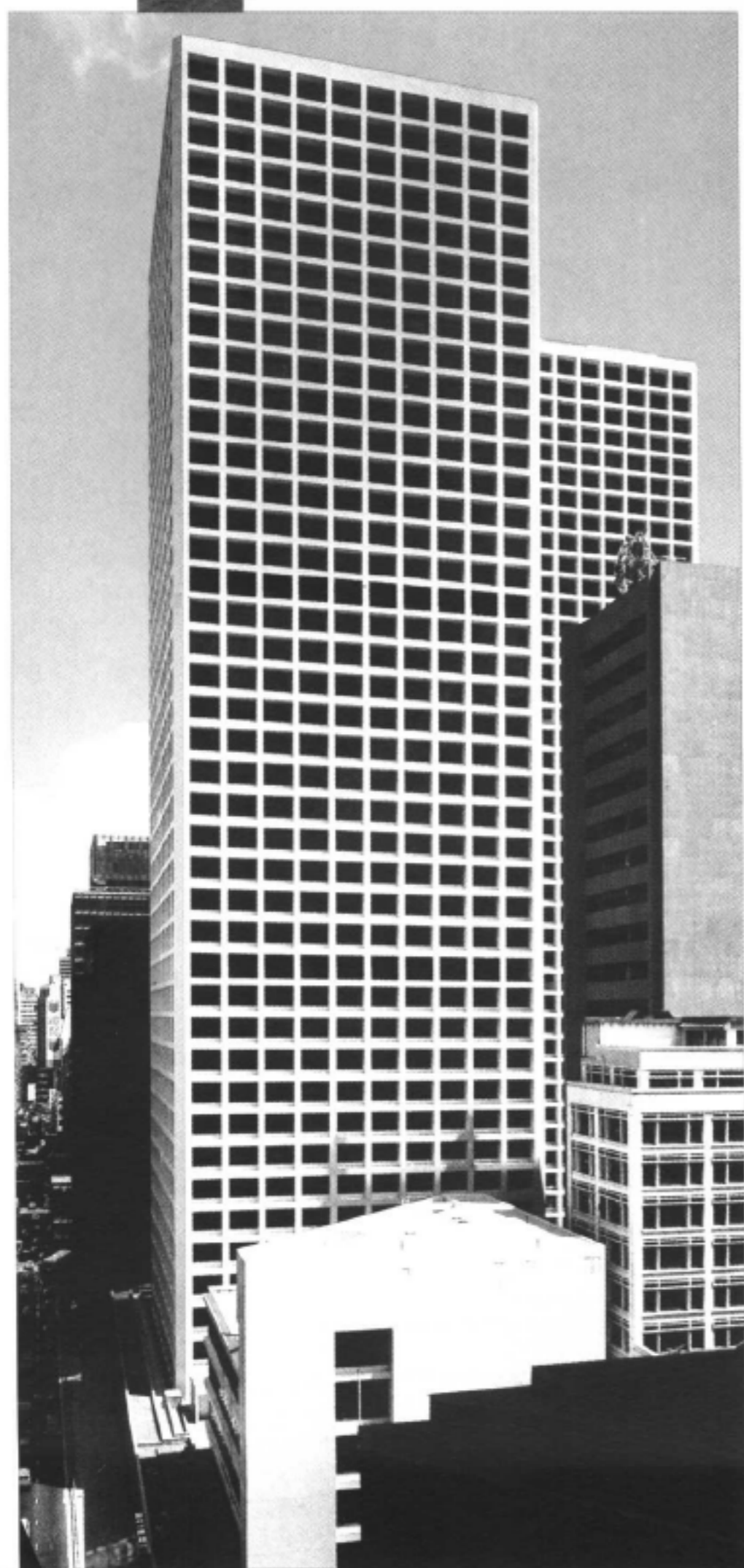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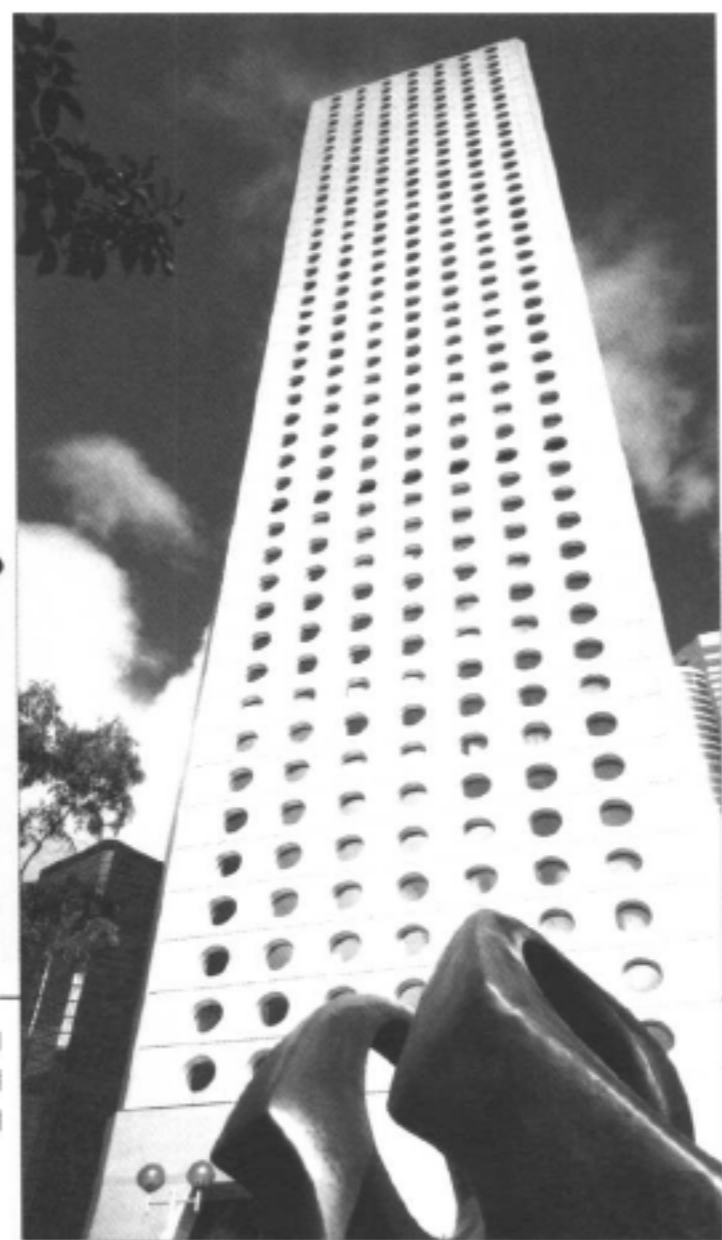
66层高的合和中心建于1980年，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圆筒直线条的外形，结合顶层的旋转餐厅及外挂观光电梯；大楼倚山而建，设有两层大堂，以连接差距17层楼高，分别在山脚皇后大道东及山腰的坚尼地道，商厦成为了市民的“垂直街道”，全球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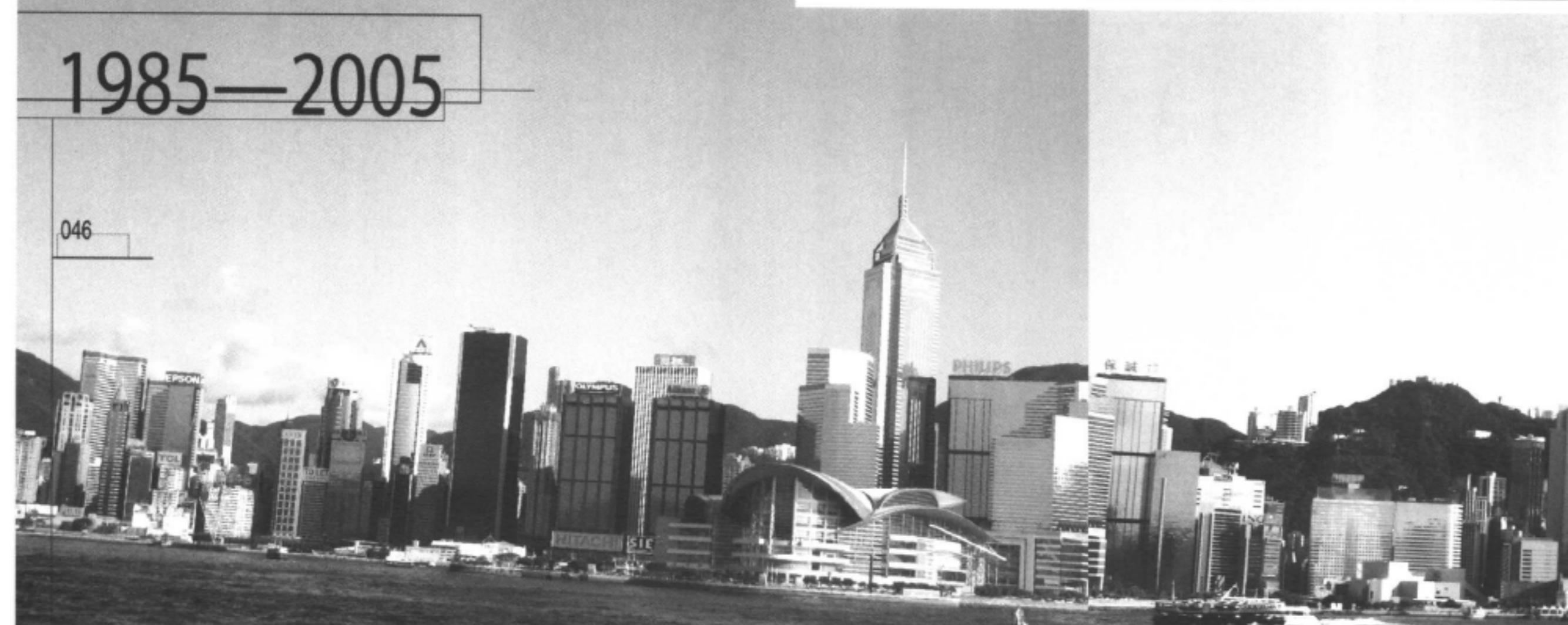
3

1957年建成的万宜大厦，在设计上曾多方面创先河。在窄长的地块上，建筑物的高度分别为向北14层、向南12层，中间7层，以配合当时建筑条例（高度受制于所向街道的宽度）；并继马会后，率先在港引入自动扶手电梯，以解决德辅道与皇后大道之间19尺的落差。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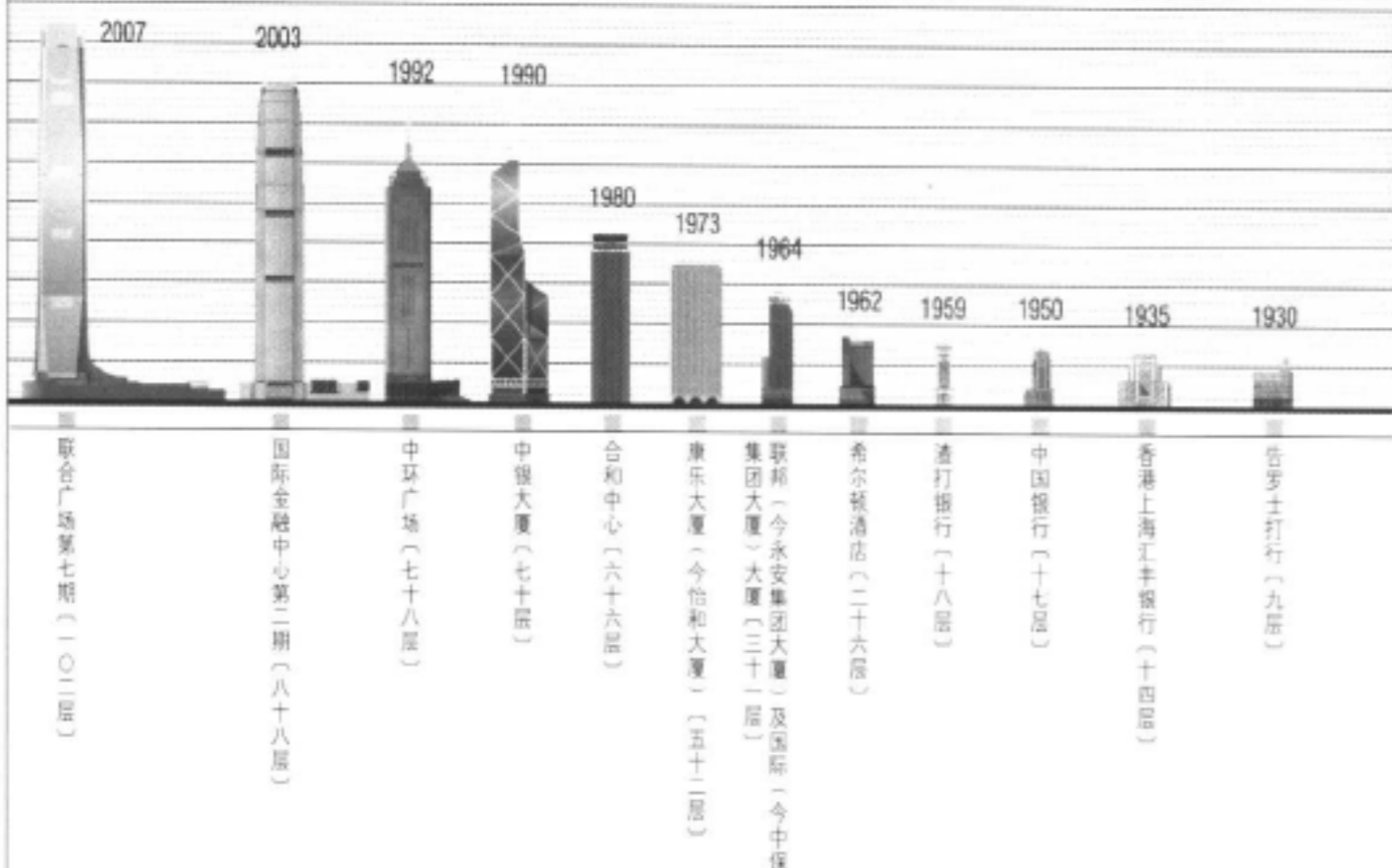
20世纪年代置地率先将旗下中区的物业以行人天桥串连起来（见地图），既为大厦的租户提供了全天候的架空道路及海水制冷，也在中区形成强大的商业王国。此举启动了日后中区完善的行人天桥网，概念更伸延至香港其他区域，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车争路问题，成为香港城市空间的特色之一。图为置地旗下的物业：于仁行（1960，后改称太古大厦）、康乐大厦（1973，后称怡和大厦）及置地广场（1981）。其中以52层楼高的康乐大厦最具代表性，曾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由香港加籍日裔建筑师木下一所设计，大厦采用“筒中筒”结构（即外墙与塔心皆用作结构墙），圆形的窗洞减低了对结构墙的破坏。为了加快兴建的速度，大厦采用光滑的外墙以便使用随浇混凝土、板模随着上升的施工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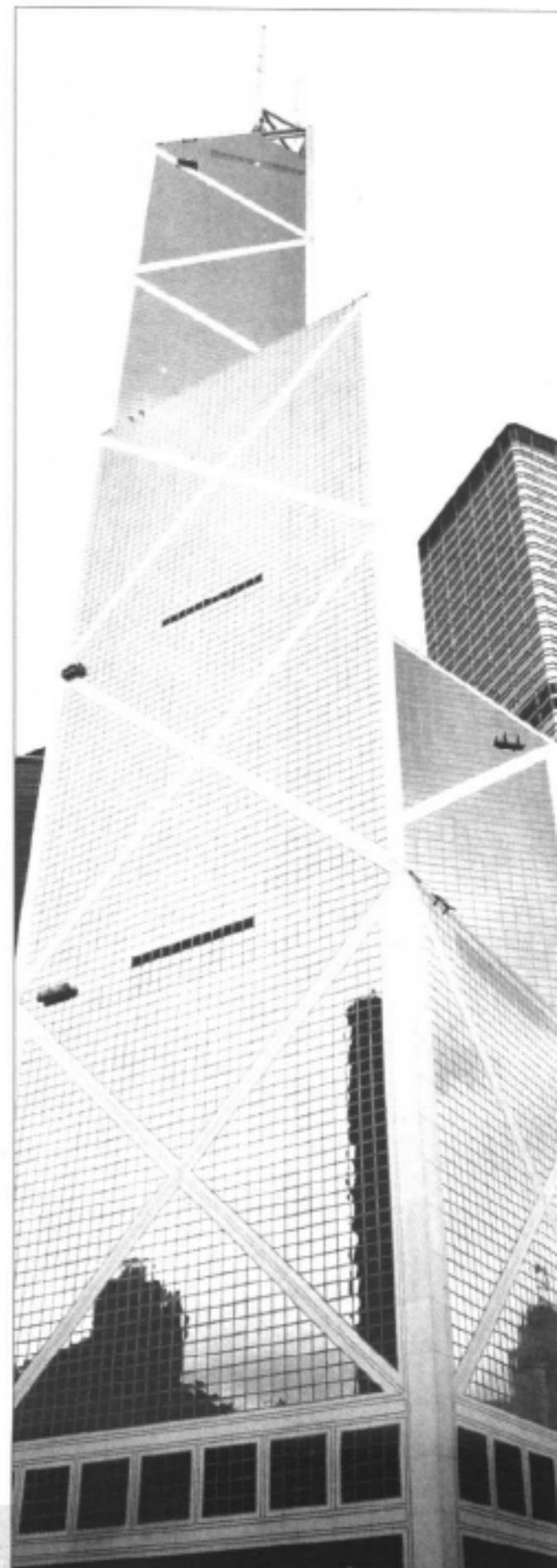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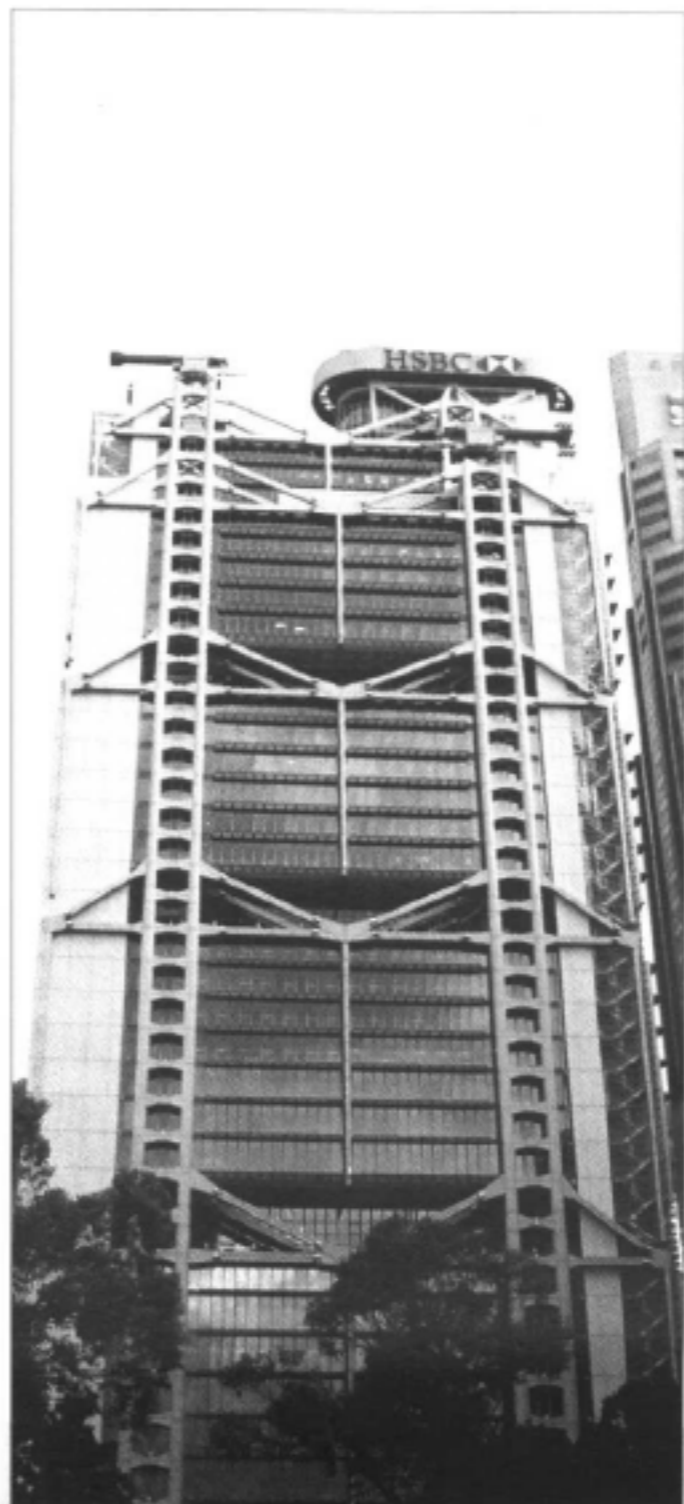
香港最高建筑物（开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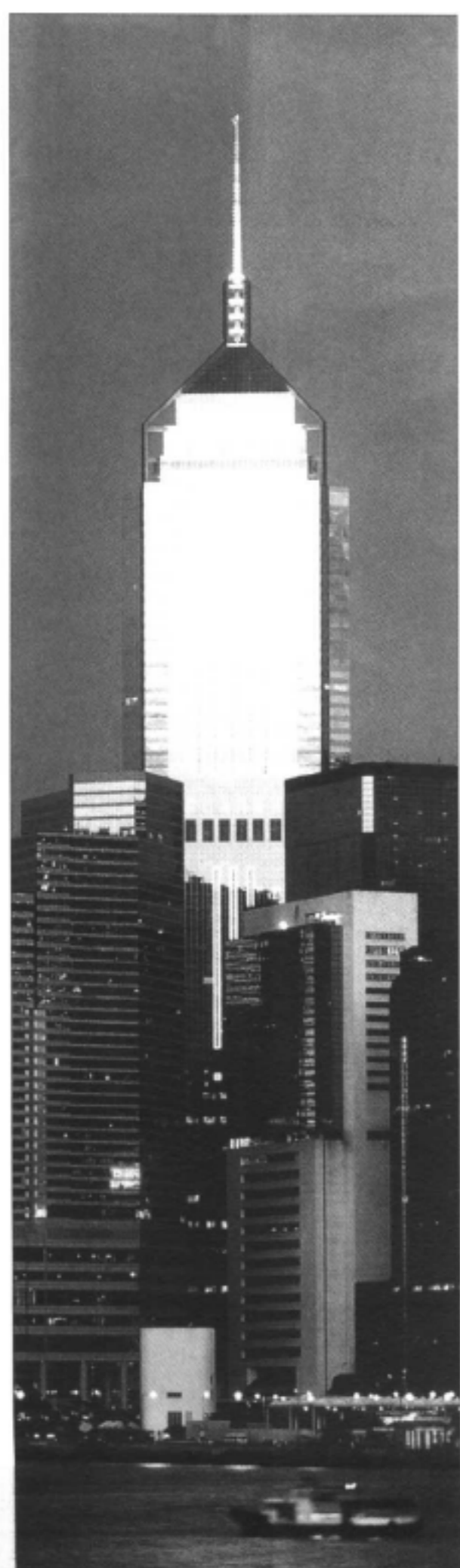
*此图资料根据已证实的资料整理而成，当中有可能遗漏。



1
2005年的中區海岸景色，当中最高者为刚落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它一枝独秀，成为了港岛沿海建筑的主角，与新中国银行大厦及长江中心一起，突破了太平山的轮廓。

2
1985年落成的第四代汇丰银行总行大厦，楼高52层，由英国著名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是当时全球尺价最昂贵的建筑物，总建筑费53亿港元（即每平方米成本48690元），亦是全球首座于高层建筑物上用垂吊结构的例子。其结构由两旁多对（四条一组）大柱为主支撑，上面架着5个形似衣架的金字构架，再在这些构架下垂吊3至7层的楼板，造成数个无柱的大空间或“高空花园”，突破了高层建筑一贯的承重结构传统。延续这个设计概念，建筑物底部亦故意留空，开放予市民使用，并将大堂搬到2层，一反银行稳如泰山的形象。此外，大厦亦作了多方面的新尝试，如用活动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中庭；预制所有构件，并以建筑物本身的结构作为工地起重机的骨干，尝试不用香港传统的竹棚作为临时的施工棚架等。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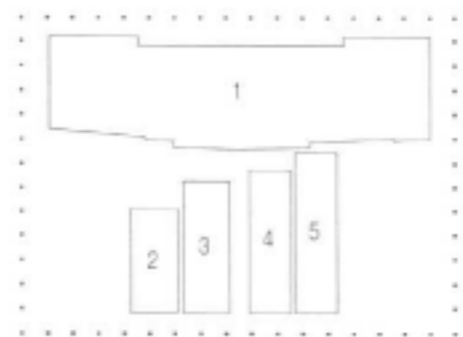
1990年完工的中国银行大厦，楼高70层，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是当时世界第七高的建筑物。建筑物刚劲而立体的外形来自其巨型的三角空间框架结构，贝氏曾表示其灵感来自竹子，寓意“中空内直，节节上升”，在商厦林立的环境下拔地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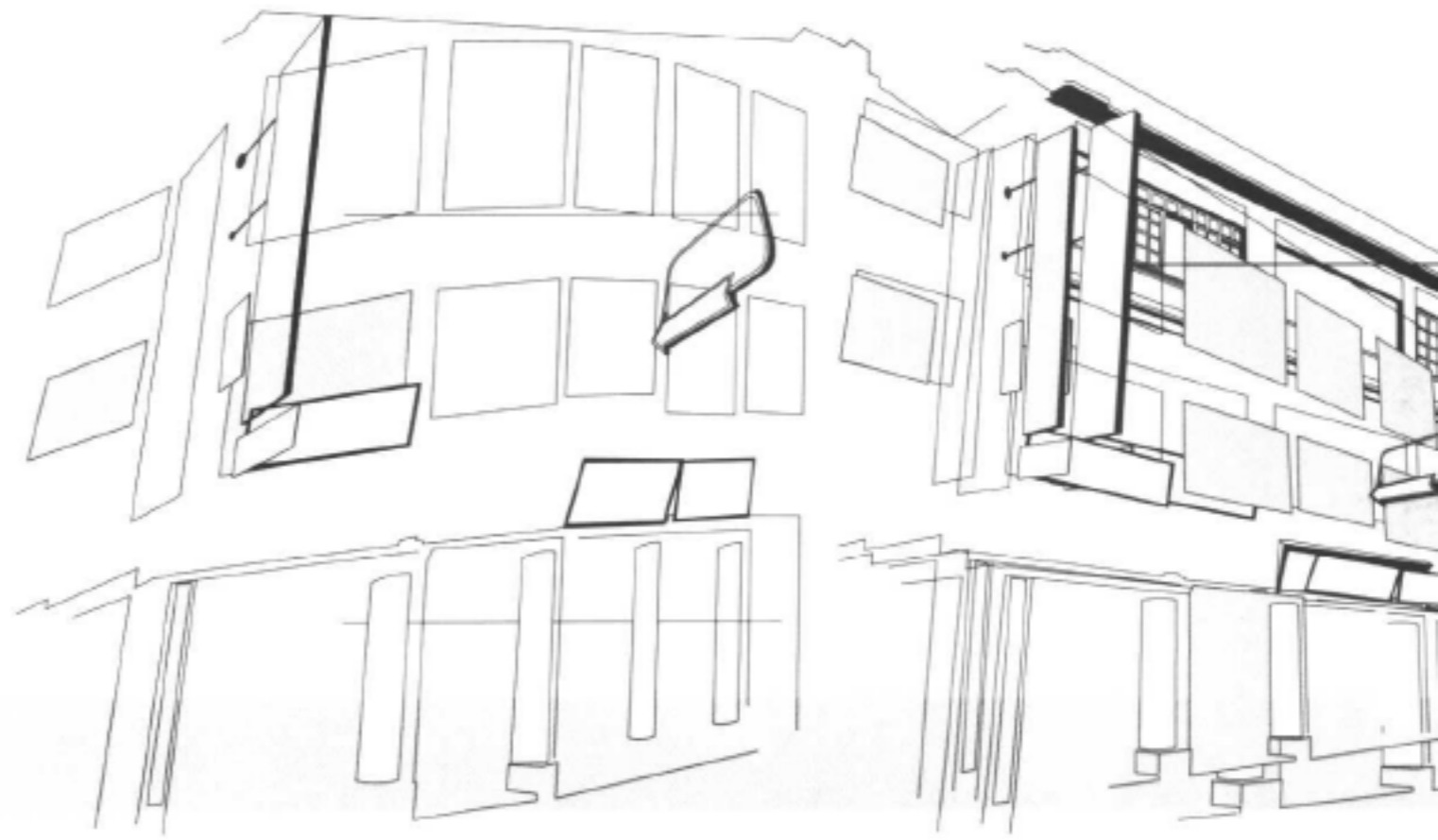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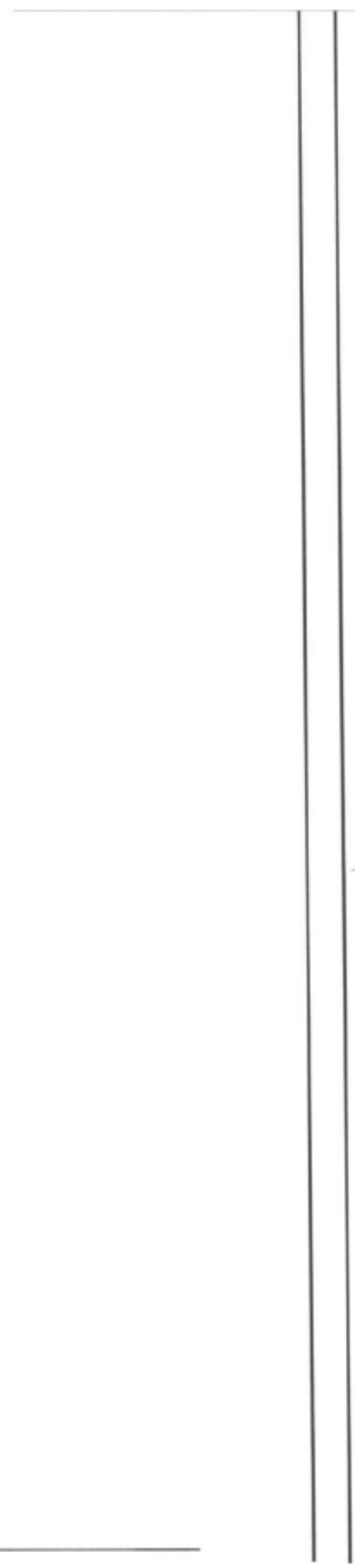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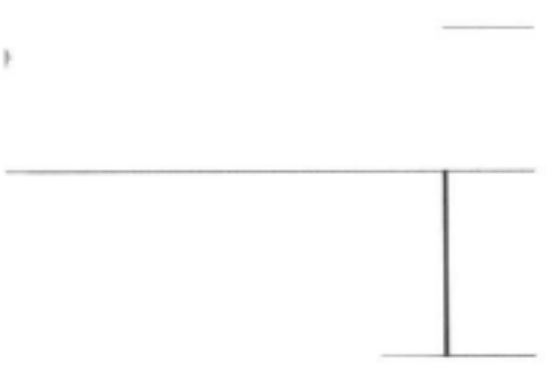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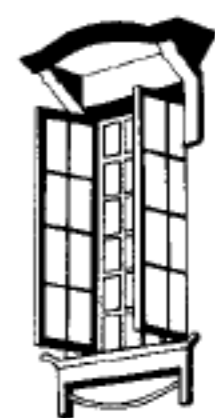
位于香港湾仔填海区、1992年落成的中环广场，是香港九十年代最高的建筑物，亦是香港首幢外墙设计结合电脑霓虹灯的建筑物。此后港岛沿海各高楼亦争相变成巨型灯具，合奏出维港知名的幻彩灯光效果。

5

坐落于中区海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地铁香港站的上盖物业，由一个连接车站的大型商场，数幢用作酒店、公寓及写字楼的建筑物所组成，当88层高的大楼与对岸九龙站上过百层高，同是新鸿基发展的写字楼遥遥相对，概念是要成为维港的“视觉大门”。







陈翠儿

没有记忆的城市

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穿着紧身的旗袍与梁朝伟的一段感情，含蓄又拘谨。他们邂逅的地方是街角微灯下窄长的梯级，观众所见的是分间房间的片段。当年的唐楼今天已不是花样年华，这些空间只能留在记忆及电影片段中。

香港，不愧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危楼”的日久失修，残旧及不安全的“唐楼”在时间的巨轮下已渐渐地消失在这个城市中。

唐楼的发展不独是在香港，类似的建筑模式在澳门、广州及东南亚的地方亦有出现。香港唐楼的变化亦是我们当时经济、政治、人民生活 and 价值观的反映。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人进占香港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港，作为经商的基地。带动了劳动力的流入，农村的劳动力迁移至城市，以当时本土的建筑技术和知识，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挤迫的“唐楼”，作为这些新劳动人口的栖身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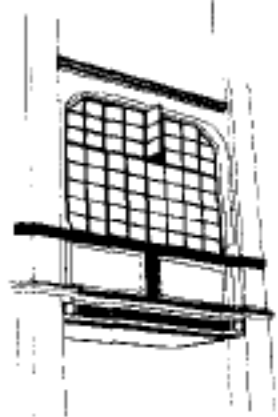
早期华人聚居的地方在阁麟街以西及太平山脚，即今荷里活道及坚道、水坑口街之间一带。

当时的唐楼，就像是将农村建筑移植于城市的环境中，拥挤在一起，没有规划地在城市中自然衍生。建筑物料只用石或泥的结构墙，结合木的屋顶结构。

这些类似农村建筑的“唐楼”，在城市中不单是横向的生长，而且在结构的限制下只能作出有限度的高空发展。阔度因受到木横梁的限制，“唐楼”变得又长又窄，当中只由窄长又昏暗的楼梯，将不同的楼层连接起来。这些早期的“唐楼”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衍生，造成日后疫症及传染病蔓延的祸根。

唐楼 (Tenement House) 的定义：“任何供多于一个租客之用的住宅或楼宇”。每一层的唐楼又可再细分为 27 x 3米大的房间，分别租给不同的家庭。

《花样年华》的唐楼



早期的唐楼

最早期唐楼的建筑物料，都是来自广东的青砖，外墙再加“批荡”，屋顶是木结构及盖上瓦面。其阔度为4至5米（主要是受横梁木长度的限制），而长度则可达9至18米，使唐楼变得又长又窄。它们大多都以“背对背”方式排列，可采光面非常狭小，最深处是厨房，或作贮物之用。

这些唐楼多建于太平山一带，之后更发展到上环（德辅道及杜老志道一带的填海区），1880年以后在坚尼地城和西环第一、二、三及高街，则发展了比较优质的唐楼。

当时W. H. Owen在他的书中形容唐楼是“又长又窄，亦没有空气和阳光。每层再细分为小的房间，房间的间墙不能完全到顶，让空气可以进入，整体来说，它只是一个大的房间，以‘屏风’式作分隔……”

挤迫的居住环境带来了在西营盘和西环一带的贫民区，这些居住环境既没有公共空间，也没有教育和文娱的设施。

1903年后的唐楼

1903年是唐楼新的一页。由于唐楼一般没有厕所及浴室，妇孺只能用“尿壶”、男性则光顾“公共厕所”，加上城市发展杂乱无章、人口的膨胀及挤迫的居住环境，终于在1894年爆发疫症。1902年一位卫生学工程师 Osbert Chadwick 受政府委任评核香港的排污及卫生问题，并在1903年提出及成立“公众健康及建筑物条例” (Public Health and Buildings Ordinance)，此条例首次列明基本的住宅尺寸要求：

- 每人有465平方米的空间
- 每人有15.56平方米的室内空间
- 房间深度最高限制为122米
- 房后的空间最低要求为屋的覆盖面积的一半
- 屋宇的高度不能大过街的阔度
- 每幢屋宇的后面提供不少于183米阔的后巷
- 每个房间要提供窗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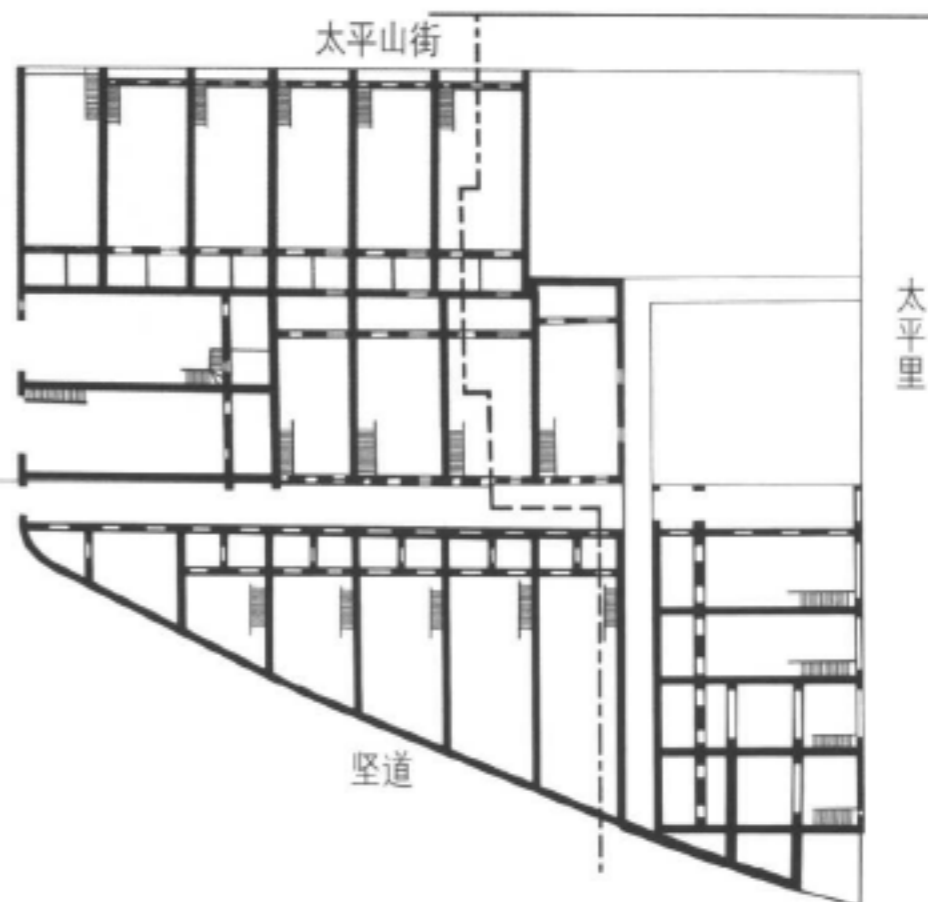
1903年后的唐楼，基于新的建筑条例，在建筑物料、卫生和空间的标准下无疑作出了改善，但挤迫的状况却一如往昔。何况不论新旧，唐楼仍要面对火警逃生的问题，唐楼的电源日久失修，窄长的楼梯都不足以作逃生之用。

踏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急速发展，人们对住房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不少建于战前的唐楼也难逃被清拆的命运。今天回过头来看唐楼对街的窄窄立面，也是颇有味道的。它们各有不同，有中国建筑的木扇门结合西方铁器的工艺，立面层次分明，细部精致。地下一层可能是商铺或住宅，2楼、3楼可作分租之用。为了让更多的空气与阳光进入，2楼、3楼或有铁栏和可供开合的扇门，门上有气窗可以让空气进入。而外面的“骑楼”，既可减低太阳的直射，又可种植盆栽，在有限的条件中，创出生活的趣味来。

1888 — 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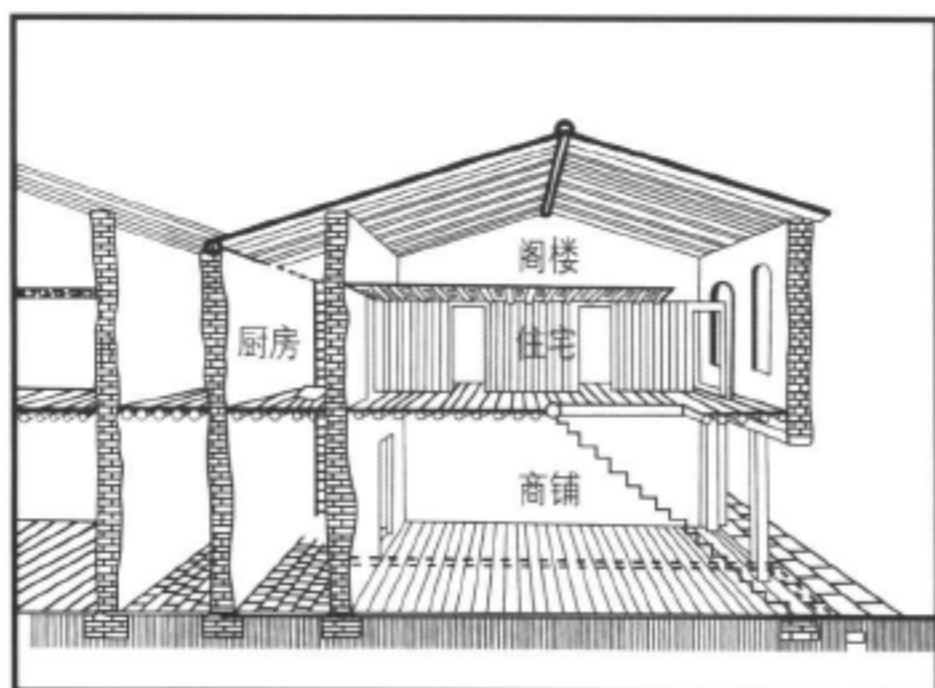
白坚道的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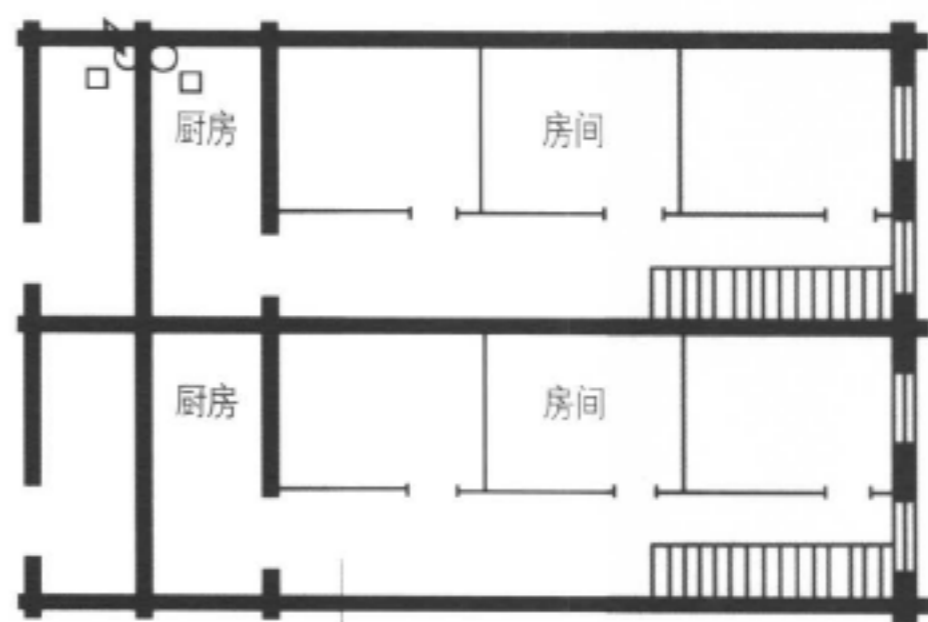
- 1 | 1880至19世纪90年代的香港岛，图右前方可见最早期的唐楼，它们只有窄小的向街立面，细小的窗户，貌似农村的建筑移植到城市中，不同的只是楼层较高而已。这些早期的唐楼不规则地在城中衍生，因要迅速安顿从中国涌入的新劳动力。此类早期唐楼的结构是砖石或木的受力墙，再结合天然中国杉木的横梁和瓦片，受力墙结构并不是传统的中国支架式结构，相信是受了由澳门传入的葡萄牙建筑影响所致。

- 2 | 早期位于太平山街的唐楼平面及立面图，从图中可见当年的唐楼又长又窄，建筑商尽量在细小的地面上建造最多的唐楼。背对背的唐楼群既没有通风设施，亦没有厕所，狭长而深的空间，只有一条楼梯连接上层，加上细小的窗户，就是日光也难以进入。（图则来自Osbert Charwick于1887年的卫生报告）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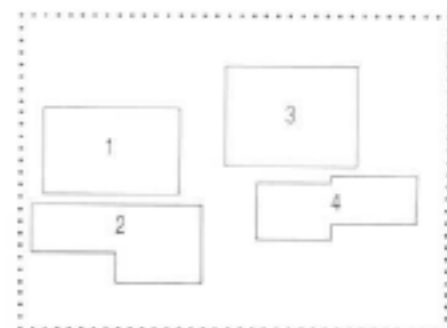
启明里第二号屋



启明里

3 1927年九龙大角咀被台风侵袭后一景，相片中可见一幢3层高的唐楼，墙身露出砖墙的结构和作防水保护的外层批荡，图中亦可见用作厨房通风的烟囱。

4 由1887年Osbert Charwick的香港卫生状况报告的图则中可见建筑物主要为广东青砖，屋顶为斜顶的木梁结构及中国瓦片，房子深度由9.14米至18.29米不等，只有前方有窗户，内里又黑又不通风，每层后面有煮食的地方，但只由细小的烟囱通风。没有完善排污的设备，加上挤迫的居住环境，终于爆发了疫症，看来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并不是新鲜事物，只是历史重演而已。





1 第一类：铁“骑楼”的唐楼

此类唐楼多建于1903至1935年间，主要为4层高，面积为41.81平方米至60.39平方米，向街的阔度为4.75米，并拥有只有0.61米阔狭窄的铁“骑楼”。后因1903年的建筑物条例，狭长的平面中有光井作厨房的通风之用，而建筑物料是受力的砖墙，横梁则为圆形木杉。

2 第二类：“骑”在行人路上的唐楼

此类唐楼建于19世纪末，楼高2至4层，每层楼高4米，立面阔度为5米，平均面积是51.10平方米至65.03平方米，阳台突出“骑”在行人路上，由砖柱支持着，形成行人道上的回廊，形状、设计受西方的影响。1878年的阳台条例曾限制阳台的尺寸：阔度不得超过2.36米，高度则不能超过3.66米。

3 第三类：没有“骑楼”及阳台的唐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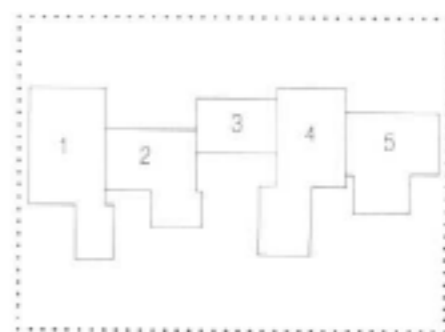
此类唐楼多建于1920年，只有3层高，面积比前两类都要小，只有41.81平方米。它们都没有“骑楼”或阳台，厨房只靠细小的天井通风，亦没有厕所的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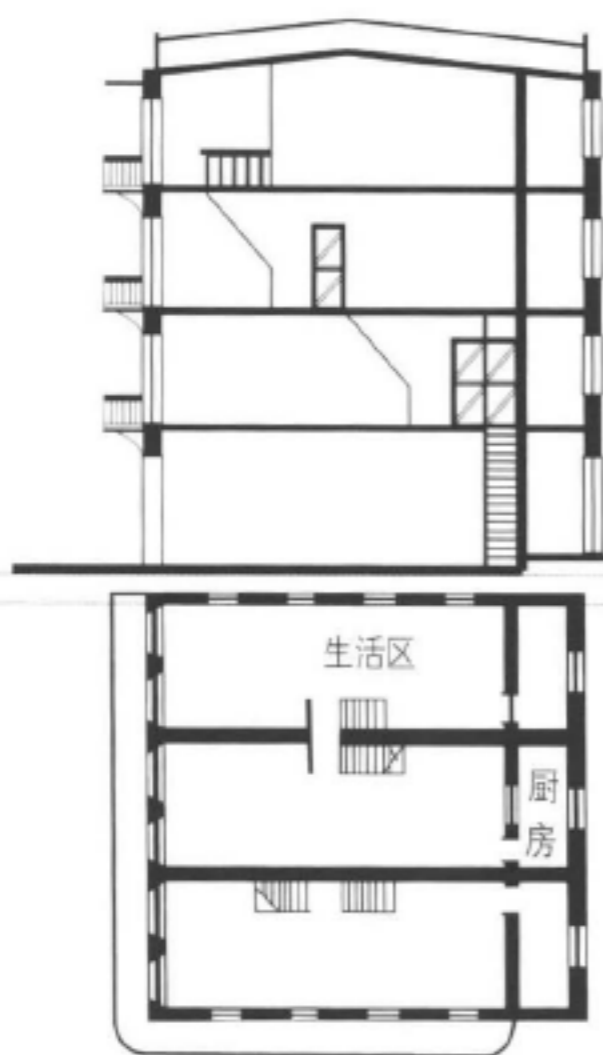
4 第四类：斜屋顶没有天井的唐楼
这类唐楼面积约60.39平方米，正立面为0.61米深的窄小的露台，没有天井，厨房通风只靠细小的烟囱。

5 第五类：后期混凝土建造的唐楼
这些较后期的唐楼，建于1935至1955年，面积为51.10平方米至65.03平方米，向街的立面只有4.88米阔。随着科技的改变及混凝土的出现，这些唐楼再不是砖石或木结构，而是采用了“新时代的新物料：混凝土”。这些新类型的唐楼并没有露台，但已有厨房和厕所的设施，楼梯亦改进了，由一条窄小的木楼梯改善为两边的“狗腿梯” (Dog-legged)。

(资料来源：Ferdinand K. H. Cheung, Tenement Building in the Light of Their Origin,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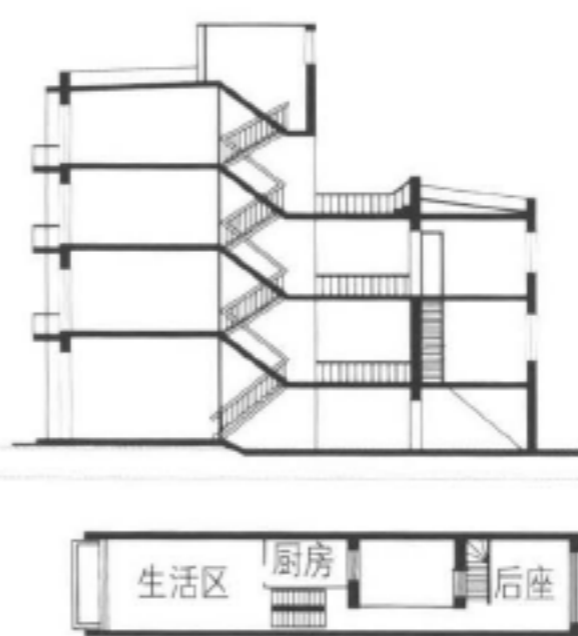
1903年前的唐楼



太平山街14,16,18号

此类唐楼建于1903年建筑条例前。厨房位于后方，没有对流通风，连接各层的是又长又窄的木结构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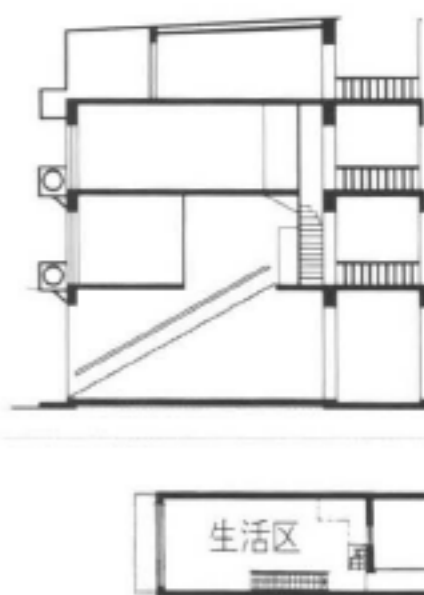
1903年前的唐楼



苏杭街49号

另一类于1903年条例前的唐楼，此类唐楼有前后座，位于中央有厨房和天井，帮助抽气通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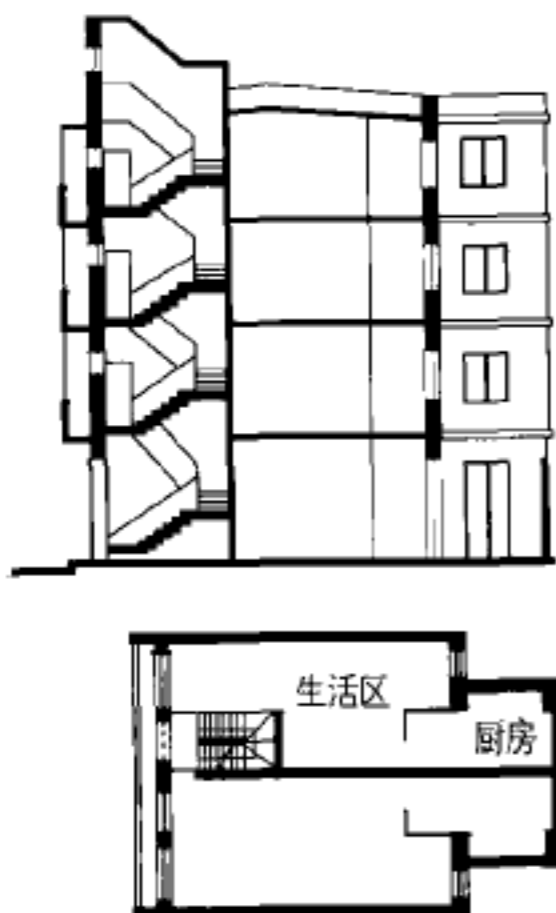
1903-1905年的唐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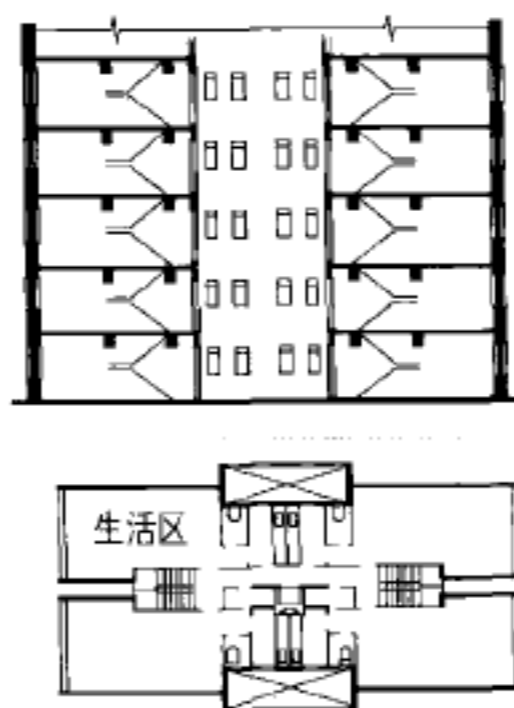
Lower Lascar Row 42号

1903年条例后的唐楼，修改后的条例要求有天井及对流通风，厨房位于后方，中间夹着天井作通风之用，可是楼梯仍然是木结构且窄小，火警时亦不能以楼梯逃生。唐楼直至此时仍没有厕所设施。

1935-1955年的唐楼



1955年后的唐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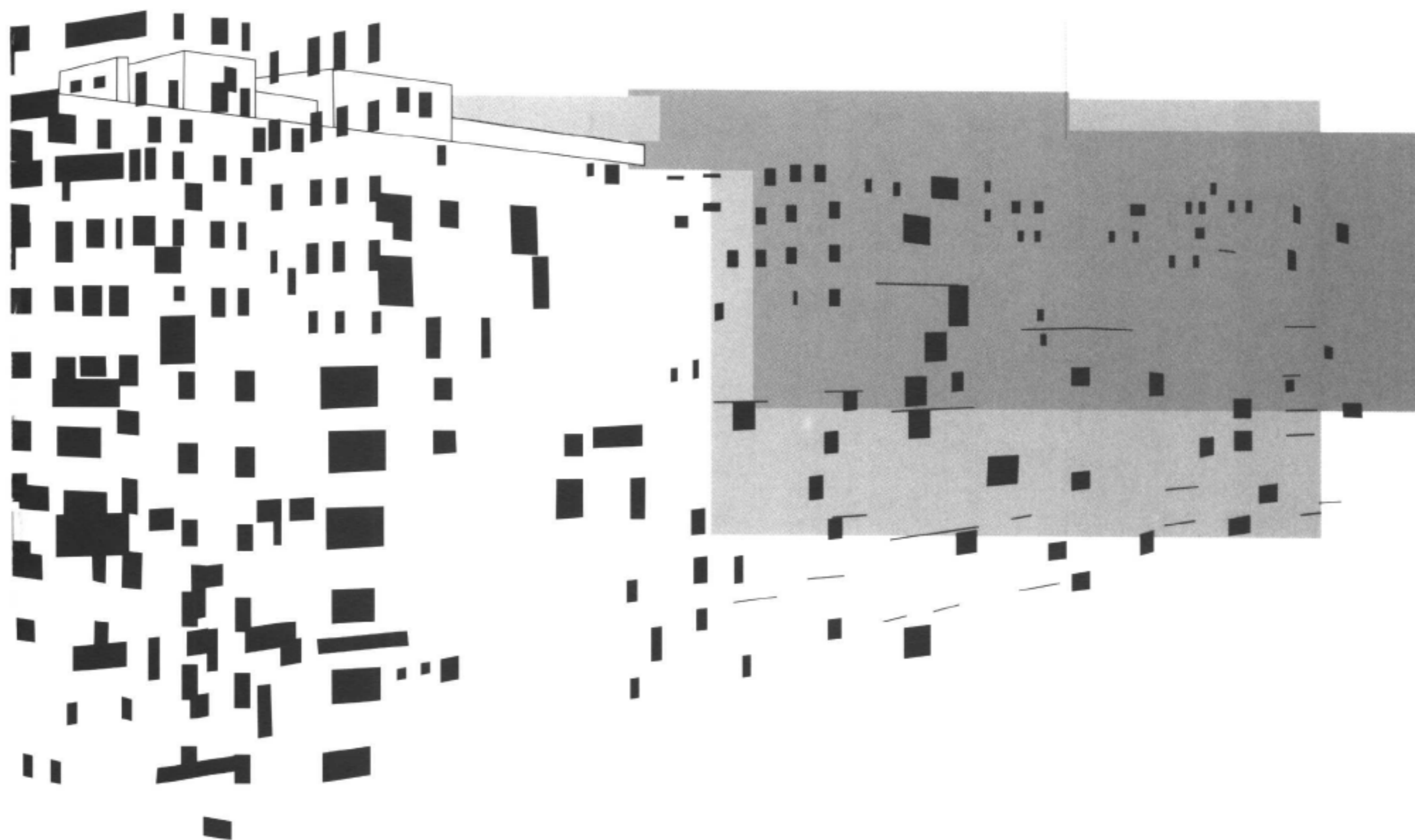
高街53至55号

这是1935年后受1935年建筑物条例约束的唐楼，楼梯已不再是一条斜梯，而是以混凝土建造，厨房亦有向外的窗户通风，生活区有两边的窗户，已不再是黑暗且没有空气对流的空间。

皇后大道西462号

这些唐楼建于1955年后，楼高14层，一梯四伙，有厨房、厕所、光井，生活区有更大的窗户立面，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已有电梯的设施。





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

无重地带的建筑森林

陈翠儿、张海活、杨炜强、长濑礼子

森林中的树木密密麻麻的，似是没有规律地生长，然而在没有规律的表面下，却仿佛有着某种定律。正如香港高密度建筑中的代表者——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看似没有规律、杂乱、迷离，却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就像所有物件均不能摆脱地心引力的物理原则一样，每幢建筑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并依循特定的规律发展。“无重地带”比喻建筑物因某些独特的历史、环境因素，导致其内部结构、空间布局、功能分配以及人口密度不依章法地发展，形成有趣的建筑现象。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就是这样的例子。

今天我们习惯了用功能分区 (Zoning) 来规划城市，简化及平面的设计方法，已使人忘却了生活中的自然规律——空间从来就不是平面的。

高密度的城市奇景——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使日本人为之疯狂，并将之变成电子游戏中的场景；让外国建筑师着迷，喻为是现代城市规划金科玉律之外的高密度城市奇景。城寨与城市建立了“寄生”的关系 (Parasitic Relationship)，依附和生存在城市之中，又不随城市的规律而成长。

“城中城”的重庆大厦

虽然没有城寨那独特的历史背景，但位处寸金尺土的尖沙咀黄金地段的重庆大厦，其复杂的空间张力亦不相伯仲，俨如一座建立在城市中的城市。在此我们借用城市的基本理论（元素）作类比，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重庆大厦。

从前的人喜欢聚居于土地肥沃的河谷，牧畜耕种，过着群体的生活。他们互惠互利，并慢慢发展为城市。假如重庆大厦是一座城，那么弥敦道便是河流，尖沙咀就是土地肥沃（商业/经济的河谷）。

重庆大厦的平面呈矩形（缺一角），西南角为帝国酒店。立体地看，重庆大厦是坐落在同一平台上的3座独立建筑物。建筑物的外墙相当于大厦的城墙，虽然此墙并非用来抵御外敌，但城墙确立后，当中的空间便可不断细分发展。城门是城墙上的洞，是过渡，也是空间与空间的接面。它连接外在世界，在分隔空间的同时也为城市的疆界提供可变性。重庆大厦共有12组城门，7组在地面连接商场，另外5组在天台。

一个城市最突出的公共空间，是供市民聚集或举办大型活动的广场，只是重庆大厦的广场不在地面而在天台，那里是最广阔开扬的空间，与楼下的挤迫形成强烈的对比。重庆大厦是由5座组

成，其中4座是两幢相连的，遂形成3个独立的天台，天台与顶层（17楼）只由一条“猫梯”连接，一般人要攀上天台并不容易。在秋冬时分阳光普照时，这里是休憩小聚的地方，也有父母带同小孩在此嬉戏耍乐。

一个城市独特的街道景观，往往构成人们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重庆大厦最低的两层是商场，食肆大都将桌椅放于走廊，就好像街边的食档，将热闹的气氛渗进每个角落。可能是那布置不一的商铺陈设，又或是不规则的立面及地砖装饰，使人游走其中，就如走在街上，穿梭往来。游人或坐或立，或聊或逛，或拉着行李四处张望。

城寨的形态反映了夹缝中生存的生命力，像野生的植物不断生长，唯一的规范只有地心吸力和飞机航道的高度限制。

1992年已被夷为平地的九龙城寨，位于昔日启德机场之西北面，面积小于2公顷，大概是4个足球场的总和，四周为贾炳达道、乐善道、东正道、东头村和联合道。在这片土地上，清拆前竟建有约500幢10至14层高的大厦，共8300单位，受影响的家庭10668户、人口31408名，此外更有1000个商业单位、87位牙医及74位医生（均未在香港注册）。

城寨（建于1847年）本是清政府官员的驻地，但随着1898年中英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强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大屿山岛屿后，寨内已没有中国官员驻守。港英政府因为条约所限，亦对城寨不加干预，致使当地成为“三不管”之地，居民人数日增，在没有组织和规管的情况下，城寨成了龙蛇混杂之地。

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拓展机场而把具百年历史的城墙拆毁，城寨界址遂变得模糊，抗战后又成大量难民栖身之所。

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城寨只能往高空发展，并构成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景观。建筑上它是没有规管下的奇异组合，每层或每个单位的作用都不一样，既是黄、赌、毒的庇护所，低下阶层的栖身之地，也是无牌牙医的聚集中心；此外社区内更设有庙宇、老人中心、教堂等。

城寨不断向上伸展，看似杂乱无章，却建立了一个自足的体系，人们可以走到不同的楼层解决生活所需。最让人震惊的是，由于楼宇间的相互紧挨，致令天台居然可以连接起来，成为人行的高空街道。其生命力之强，决非一些循规蹈矩的建筑可比。

走进重庆大厦很容易迷失，但城市会提供不同的线索让我们识别方向。重庆大厦商场的走廊便是道路，走廊相交形成路口。有些路口是升降机大堂，大堂里的告示牌显示了各层单位的功能，并起着地标的作用。有些招牌非常独特，好像一间在C座3楼的印度餐厅，便刻有常春藤的图案，令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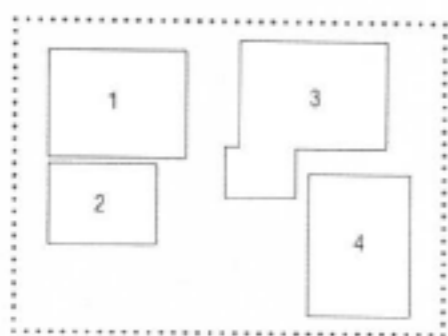
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形象是由一组相互关连、重叠的印象所组成的。它是人们对某条街、某个地区，以至整个城市的观察所得，但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城市的看法却可以不尽相同。当人们从弥敦道走进重庆大厦的商场，再乘升降机穿梭于不同区域及单位，从而形成重叠交错的印象：游客说这里是“议价购物”天堂；居民视之为社交联谊的好地

方；短途旅客则认为这里宾馆廉宜，选择又多，且甚具香港特色；然而对我们来说，刺激的咖喱味道才是这里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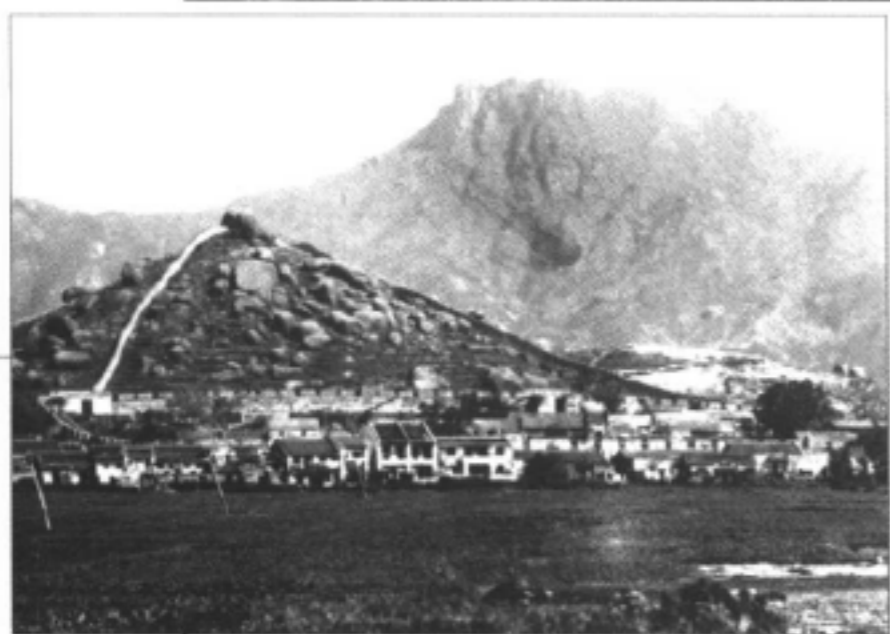
据 A. E. J. Morris 于《都市形态史》(History of Urban Form) 中提出，为了维持城市本身的防卫能力，城市不可能连续地以水平方式向外扩展。城市的扩展是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都需要建立新的城墙。重庆大厦虽然没有重重新建的城墙，但其立面和内部空间却随着她的扩展而改变。居民想尽方法去拓展空间，例如最初设计的露台被封起来，变成室内空间；外墙的僭建物不断增加，公共走廊和升降机大堂也被私人占用。唯一不变的是，天台上竟没有任何僭建物，至今依然保持开扬，实在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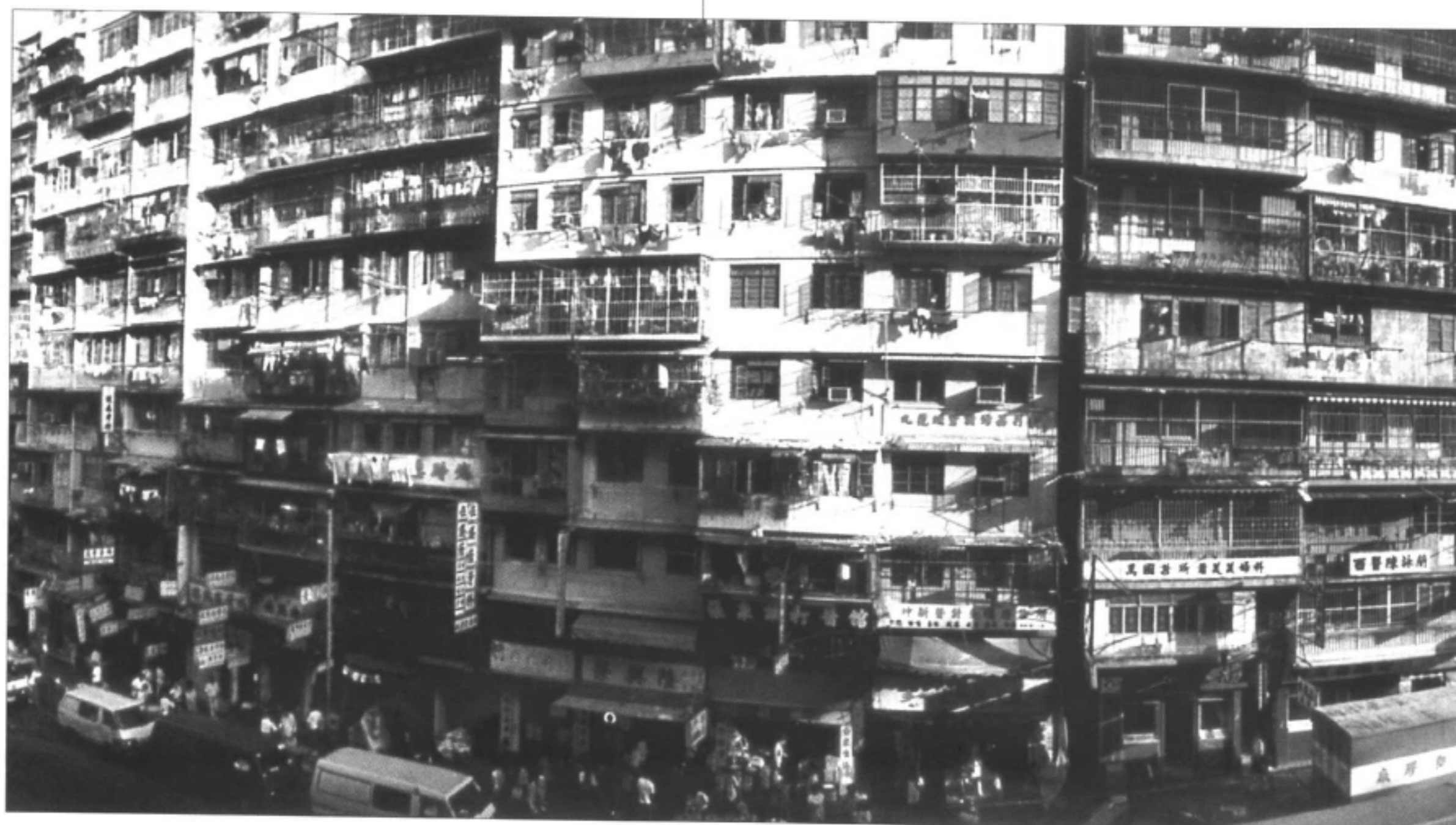
重庆大厦是一座城市中的城市。商铺及寓所就是城市中的地段，市民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等，各有不同的背景，有拉着行李箱的旅客、非法/合法移民、商人、外地劳工等等，他们的生活相互交融，但又能保留各自的传统，使重庆大厦成为香港一个独特的空间——既杂乱无章，又充满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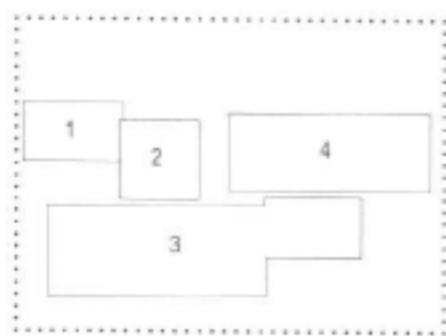
*本文重庆大厦部分摘自张海活、杨炜强、长洲礼子的研究报告“City within C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ungking Mansion”, Hong Kong, 1997, 由高珊中译。



- 1** 1900至1910年的九龙城寨沿海一带。图中的石桥名为龙津石桥，建于1875年，是城寨至海边的重要通道。1898年中英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租借界限街以北99年）列明城寨仍属中国领土，可继续保留原来衙署及码头。但自1899年，城寨内已无官员驻守，自此九龙城寨便成了“三不管”地带，其建筑物在不受寨外（港英政府）法规监管下而不断“滋长”。
- 2** 1900年的九龙城寨及周围的民居村落。寨城内的重要建筑物包括了1847年建成的龙津义学、天后古庙，以及炮台、魁星阁、惜字亭及猪屎寨等。
- 3** 1905至1910年的九龙城寨，图中清晰可见城寨的围墙、村落及田野，只是这些今天已不复见，剩下的只有城寨背后的狮子山。九龙城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6年动工，8个月后落成，内设有清政府衙署。城寨的围墙长120丈，高2丈，分东西南北门，南门为正门，上刻有“九龙寨城”四字。1942年围墙被日军拆毁，砖石用作扩建启德机场。城墙被拆后，城寨的边界遂变得模糊。
- 4** 1925年的九龙城寨内一景，当时仍是一片乡村小镇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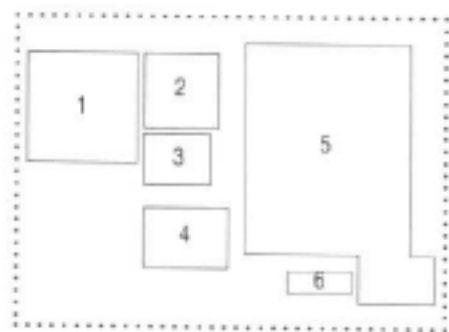






- 1 1968年的九龙城寨，图中可见个别楼宇已开始往高空发展。
- 2 从鸟瞰图可见城寨与外围的发展分别很大，整齐的外围规划与完全没有监管的城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旧有的城寨围墙是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由新建筑物筑成的新围墙。
- 3 20世纪80年代的九龙城寨。由于空间有限，城寨不断向外和向高空发展，向外扩张的空间包括在建筑物外悬挂的窗花和露台，以及户外篱笆上晾衣服，以争取更多的生活空间。
- 4 清拆前的九龙城寨，摄于1991年。城寨周围为开辟不久的城寨公园及单车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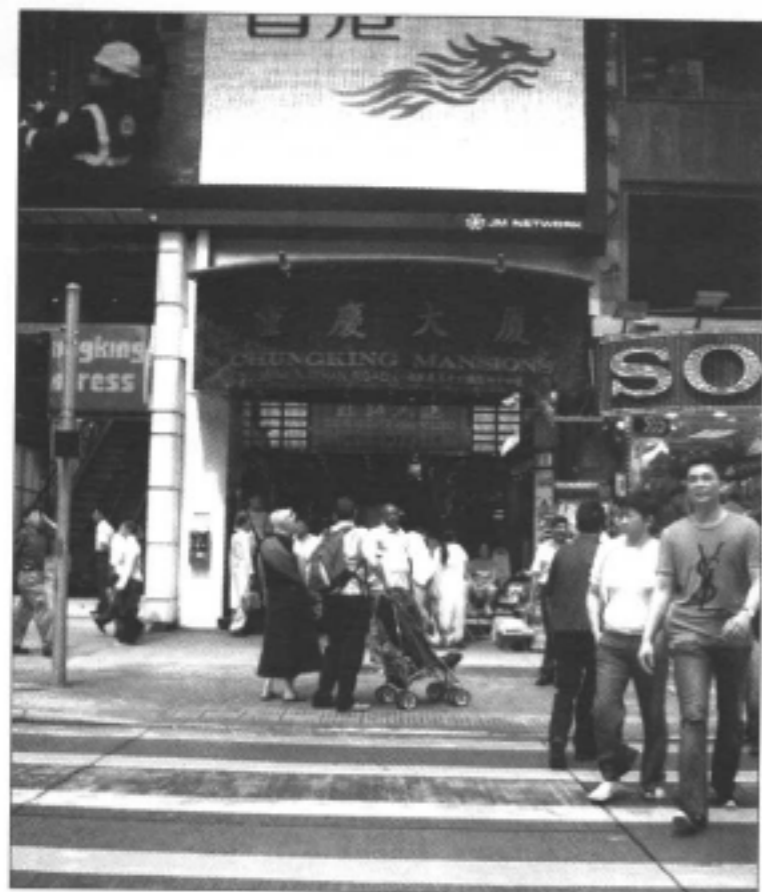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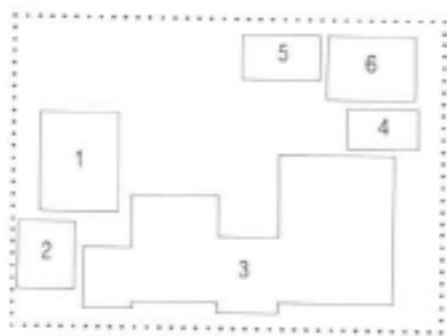




- 1 现在的城市住宅建筑空间大同小异，住宅楼宇缺乏交流的公共空间，邻居的关系变得疏离；反之，在城寨里公共空间重叠，增强了人的接触，形成无形的社区结构，相对现代城市人的疏离感，城寨是值得反思的例子。
- 2 没有天空的城市，城寨内四周被密集的高楼包围，里面变得阴暗不见天日，电线和喉管纵横交错杂乱，没有规律，令城外的人望而却步。
- 3 城寨内有不少食品加工场，因为没有相关部门的监管，卫生条件可想而知。
- 4 城寨密密麻麻的建筑物，于顶部连成一大片的天台空间，这个奇异有趣的公共空间，可以乘凉、观看星空及作儿童玩乐的活动空间。
- 5 香港政府于1987年1月宣布清拆九龙城寨，1991年开始迁移居民，至1993年才开始正式清拆。这异常的城市空间被夷为平地，并改建为一中式公园。
- 6 左图为临清拆前的九龙城寨平面图，内里500多幢的建筑物没有固定的设计，与现在的统一模式住宅大楼的设计大为不同，形成的居住空间亦变化万千。右图中黑色部分为建筑物，白色部分为街道，中央周遭的空间则是公众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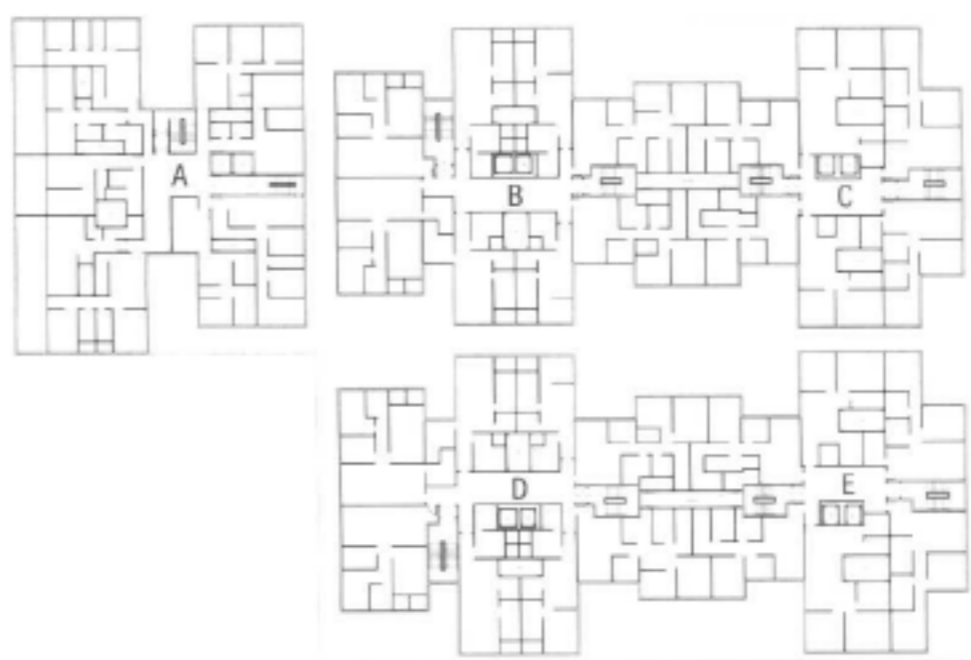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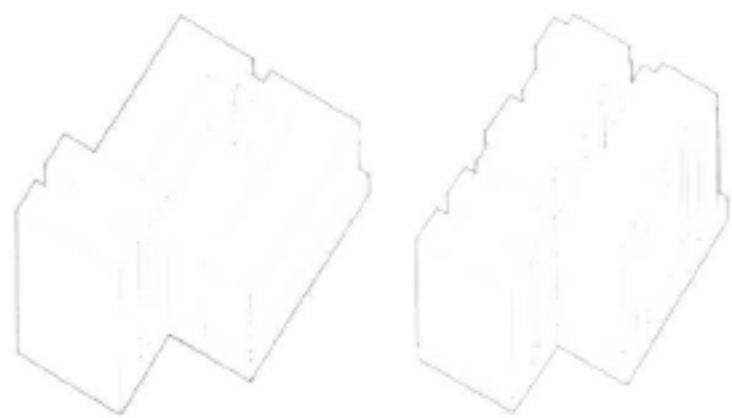






- 1 在城市理论中，有所谓“不明之地” (Terre Vague) 的说法，意指在一个城市里总有一些空间是用途不明，在地图上无法确认，甚至被当作不存在的。重庆大厦A座9楼、10楼正是这样的不明之地。两部升降机皆不停这两层，防火通道也被锁上，而面向弥敦道的整排窗户亦全数封闭。
- 2 图为重庆大厦在尖沙咀最热闹街道——弥敦道的入口。人们对重庆大厦的印象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 3 人们走进重庆大厦的商场，首先感受到的大概是那多族裔进出及经营的商铺及食肆。
- 4 重庆大厦的天台开扬，与楼下的混杂繁器，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人们休憩的公共空间。
- 5 1957年重庆大厦的原方案中（图左），面向弥敦道的一座为15层高的酒店、餐厅混合大楼，背后的两座为8层高的住宅，并于其中一端相连。住宅单位全部向外，而走廊开扬面向内庭，并全屋相通。北面一座与酒店、餐厅大楼连接，并共用一组升降机。最终被采纳的方案（图右），则绘于1958年。可以推想，重庆大厦落成于1958至1959年间，当时大厦的地库为停车场，但现在已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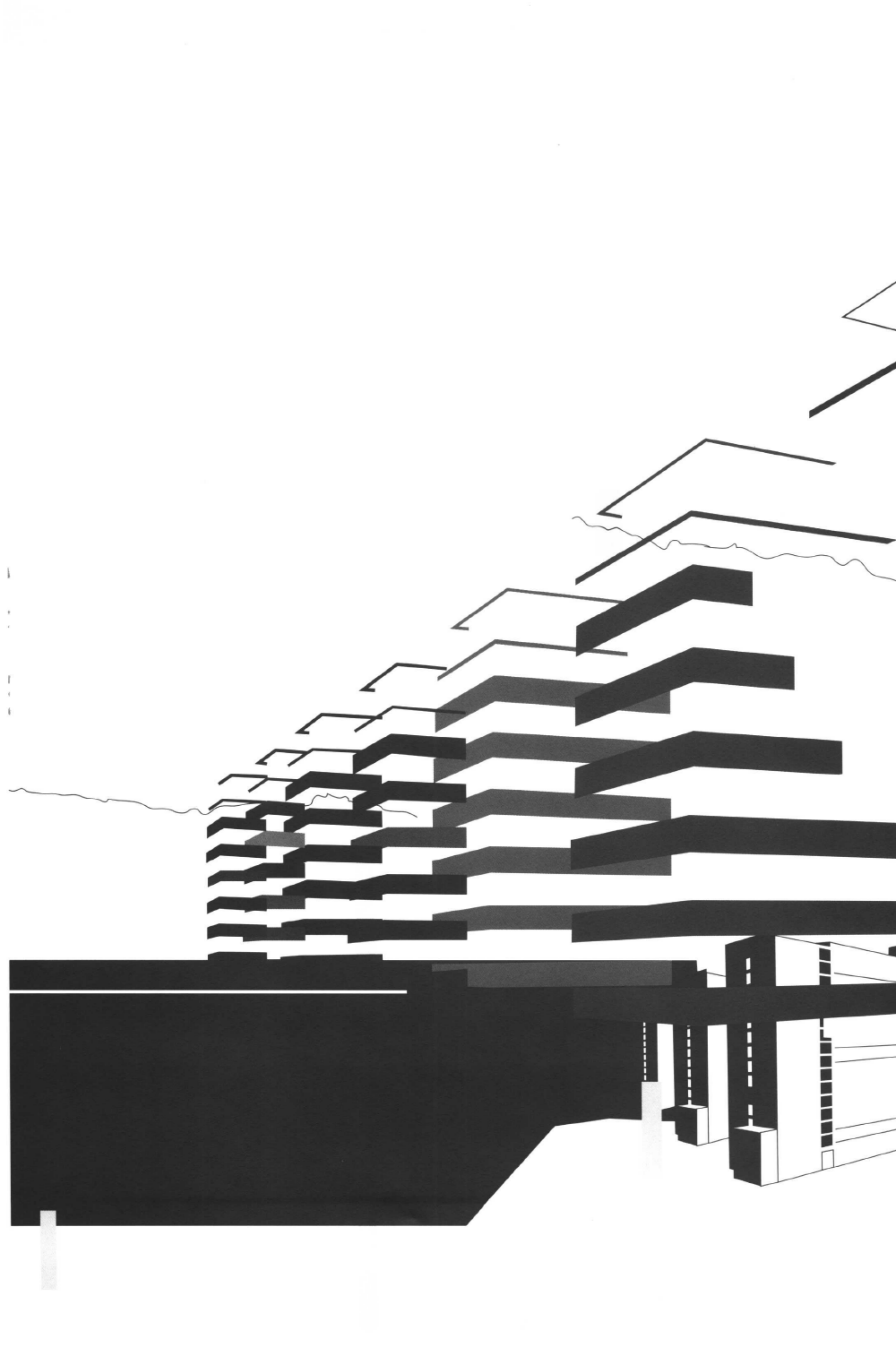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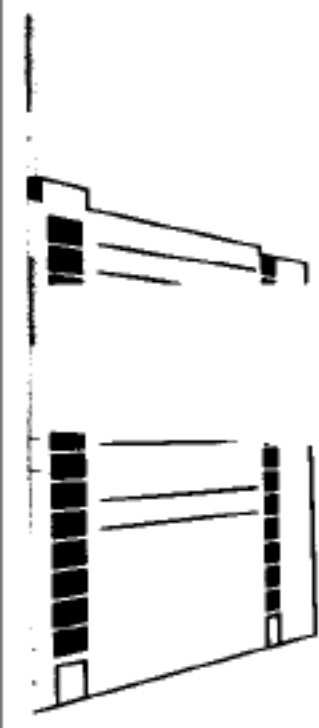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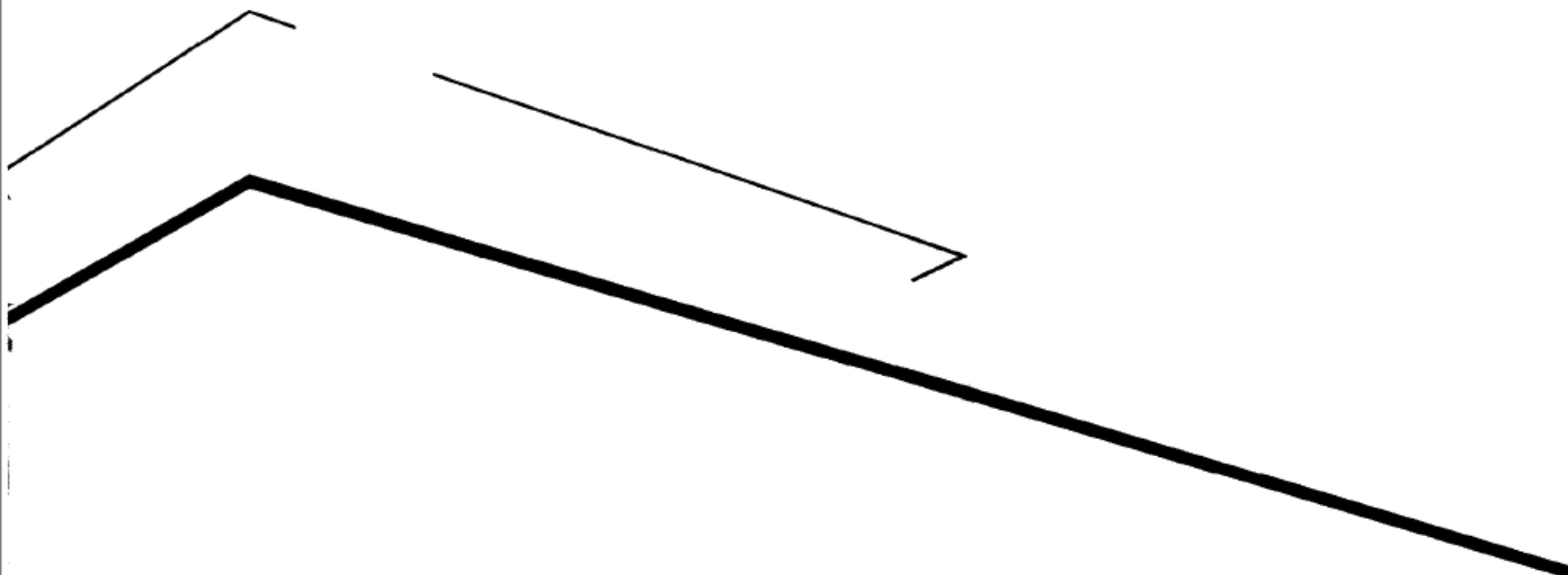


6

重庆大厦的地下及一楼为大厦的商场，共有7个入口，面向弥敦道的一面（西面）一个、北面两个、东面两个、南面一个，而最后一个位于帝国酒店后小巷转角的位置。商场内主要通道7条，纵向（东西）4条，横向（南北）3条。从弥敦道入口延伸的通道，连接着A、B、C三座的升降机大堂，并有一条通往一楼商场的楼梯。另一条连接两层的楼梯则位于第二条横向的通道上，而这也是唯一一条两端皆为商场入口的通道。重庆大厦从3楼开始分成3幢，第一幢A座靠西面向弥敦道，第二幢B、C座相连靠北，第三幢D、E座相连靠南，B、C座与D、E座为两幢对称建筑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在战时逃返故乡的香港居民重回家园，他们面对颓垣败瓦、无处容身的窘境，只能在市区边缘，搭建或租住简陋的寮屋栖身。这些僭建的寮屋，初时在市郊疏落地出现，后来沿着山势慢慢地扩展开去。据统计，1949年香港的200万人口中，就有30万人住在寮屋内。

其实港府早在1935年已考虑在较偏远的地区设立新市镇，以安置大量人口之用。然而却因战事在即告吹。1947年，英国建筑师阿拔高比也向政府旧事重提。当时民间成立的房屋协会（1948年创立）于1952年首次在深水埗建造了李屋（即后来的李郑屋村徙置区），以解决低下层居民的住房问题。可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情况依然严峻。

公屋政策的转折点——石硤尾大火

1953年12月25日圣诞夜，白田村的寮屋突然火光熊熊，转瞬间，火势已经蔓延到石硤尾百步梯处，向窝仔村直迫过来。一夜间，家园被焚毁的灾民高达5万人。这次事故迫使政府面对及解决寮屋的徙置问题。

1954年4月，市政局紧急小组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由政府直接介入，斥资兴建多层的徙置大厦，用作安置灾民及将来清拆的寮屋居民。徙置大厦以混凝土建成，既可防火防风，亦可防止大型灾难再次发生，避免人命财产的损失，和减少库房因救灾而耗用大笔开支。

由于资源有限，当局设计作为应急的徙置大厦时，务求以最低廉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兴建能容纳人口众多的住宅，因此早期的徙置大厦，难免有人口密度过高、基本设施不足等先天缺憾。然而，和寮屋相比，徙置大厦的设计规格及措施明显地更为优胜，而且租金比寮屋还要低廉。

这时期的公营房屋，分甲、乙两类，甲类公屋设备较佳，如北角村；乙类公屋则包括7层高（连地下）的徙置一、二型大厦，设施较逊。当时政府为要合乎经济原则并在最短时间内安置灾民，大量兴建乙类的徙置大厦。大厦没有安装电梯，每层共有88个居住单位，由大厦外廊连贯起来，成为居民日常的活动空间，在设计上不但促进睦邻关系，也让单位内减少吸收太阳辐射热能。此外，地下作商铺、天台作学校，提供了生活上基本的需要，使每座大厦俨如一个小社区。

廉租屋的出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展的徙置三、四及五型的廉租屋，甚受市民欢迎，这些全是中央走廊式板条型的大厦（Slab Block），四、五型的廉租屋楼高12至20层，设有电梯，可安置更多住户，每个单位更设有独立厕所及露台式厨房，直接改善了家居卫生环境。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狮子山下的安乐窝——公屋

十年建屋计划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的总督麦理浩爵士公布了一项周详的十年房屋计划，目的是为180万人提供有独立设施的公屋单位。为此，香港房屋委员会（简称“房委会”）于1973年成立，负责香港公共房屋（简称“公屋”）的发展。从此掀起了香港的新市镇发展——在偏远地区有规划地发展自给自足的社区。而配套设施也变得多元化，由康乐、教育、休闲及饮食，以至交通、社会及医疗服务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屋社区的建立，加强了居民的归属感，激发了社区的活力，进一步巩固守望相助的睦邻精神。

这期间，双塔式标准公屋的发展，成为当时划时代的设计。其中央光井不但可引进天然光和改善通风，也可改善治安，若发现可疑人物在一个单位鬼鬼祟祟地出入，只要户主在中央光井的走廊高声呼喊，楼上楼下的邻居便很容易发挥守望相助的力量，遏止罪案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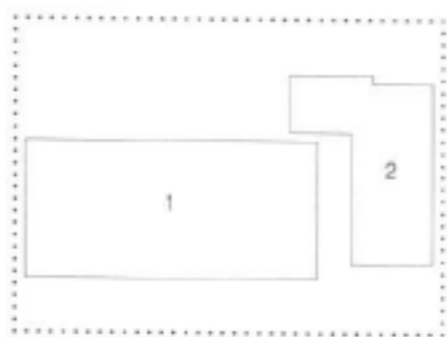
这一代的公屋设计，基本上室内只有一个生活空间，并没有“梗房”。住户需自行用家私或木板间隔或“朝行晚拆”，以便一家人吃饭、看电视、做家课、睡觉等，私人空间无疑相对地缺乏，但也促使一家人的关系变得更紧密。这时，香港亦从小康社会步入经济更繁荣的年代。

不断完善与重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委会开展整体重建计划，把破旧的徙置大厦变成设施齐备、有独立浴室和厨房的现代化多层公屋大厦。随着居民对保安及私人空间更为关注，公屋的设计也不断作出改善，例如后来的“H”形设计改善了双塔式的噪音问题，“Y”形的设计，则改善了“H”形单位互相对望而带来的私隐问题，以及进一步改善了自然通风和采光。此外，单位内的空间采用了灵活的间隔设计，让居民可按他们家庭的人口、个人喜好及生活习惯使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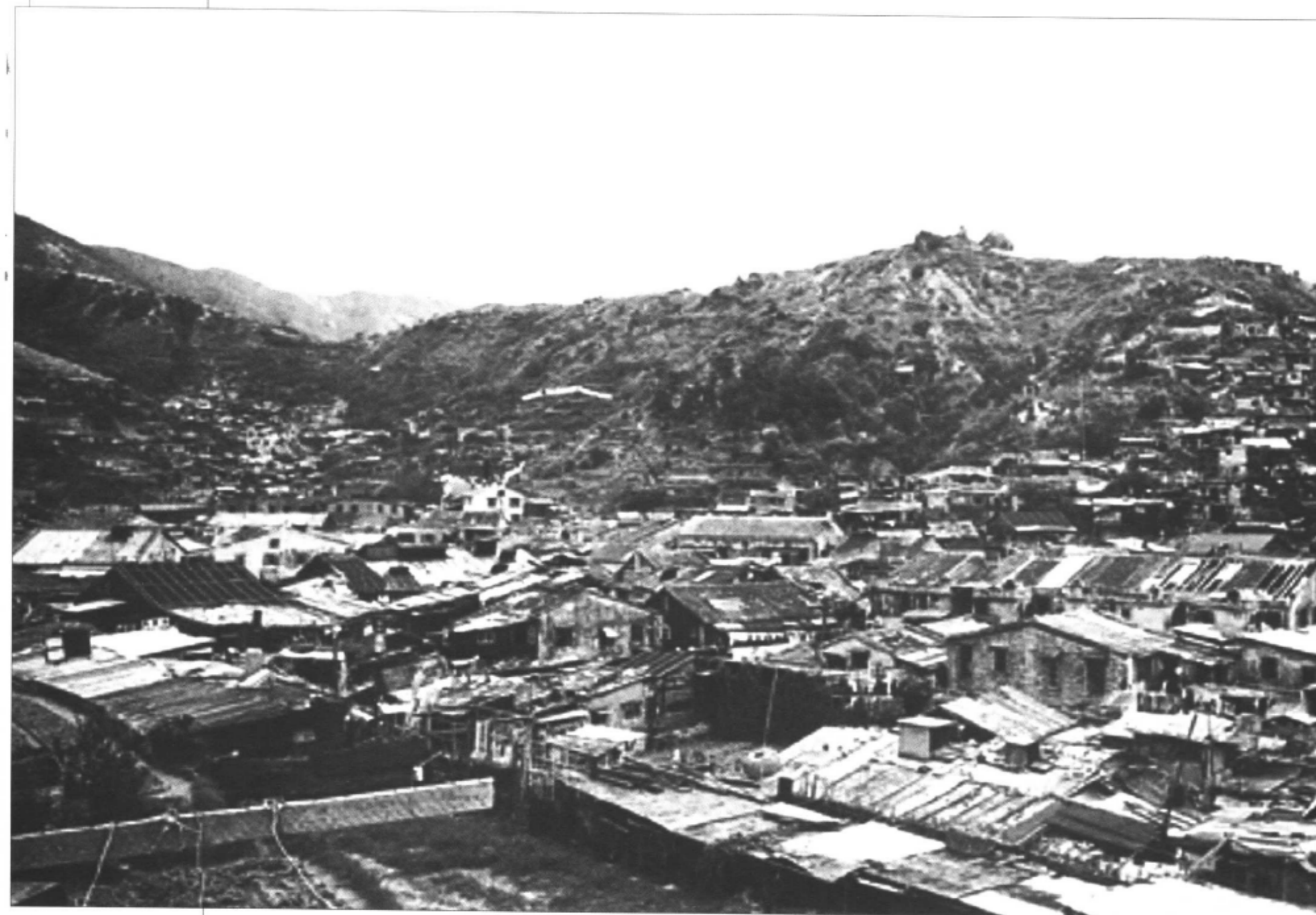
进入九十年代，为了地尽其用，十字形和谐式公屋及居屋，取代了占地较多的“Y”形公屋，在规划上更有效地运用资源。此外，房委会透过屋村管理谘询委员会，与居民一起监察管理公司的服务表现和改善村内居住环境：例如地下大堂内装设大门、防盗电锁，电梯内也安装摄录机，以进一步保障居民安全。

面对二十一世纪香港的经济转型，房屋策略亦要重新检讨。一方面通过机械化的建筑技术，采用实用的材料及设施，以有效地运用资源，探求长远的成本效益。另一方面，建筑师更需广泛地利用电脑科技，模拟环境生态（如“微气候”研究），务求在通风、采光、太阳热能的吸收和环境噪音的控制上，能配合建筑设计，进一步绿化居住空间及环境，落实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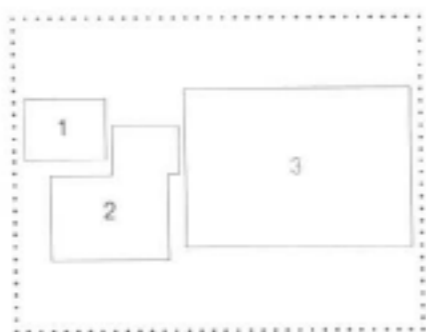


1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石硤尾。

2 抗战后寮屋的居住情况——人越住越多，屋越建越密，居住环境急剧转坏。当时的寮屋全是一、二层高的矮小房屋，房屋的建材一般都是易燃的，再加上民居中夹杂了不少工厂和工场，大量使用和储藏易燃物体，故在风高物燥的季节里，火灾的威胁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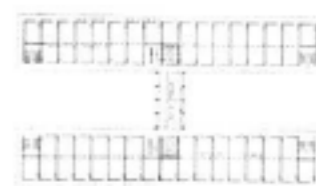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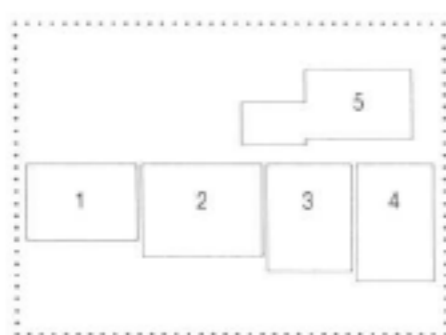




- 1 1953年平安夜，白田村首先起火。转瞬间，火势已经蔓延到石硤尾百步梯处，大部分灾民来不及收拾细软，便慌乱逃命。
- 2 石硤尾大火后灾场及受灾灾民登记的情况。
- 3 石硤尾徙置区是第一代大量兴建的标准设计公屋（乙类徙置一型），为要合乎经济效益并在最短建筑期（连地基少于9个月）内落成，以安置灾民及大量寮屋居民，住宅楼层限于6层以避免安装升降机，浴室和厕所都是共用的。单位面积由3至4人的约8平方米至10人的约22.3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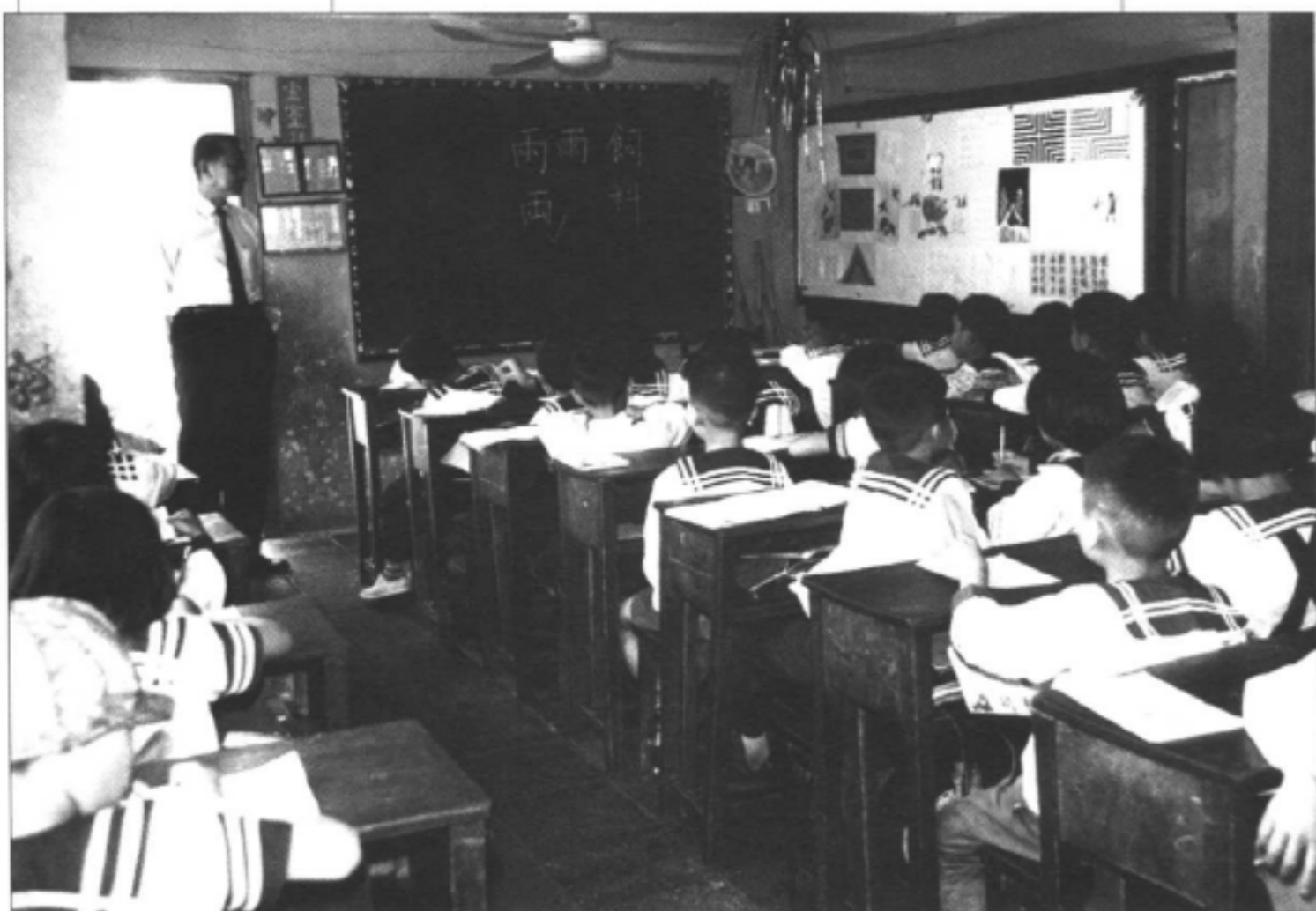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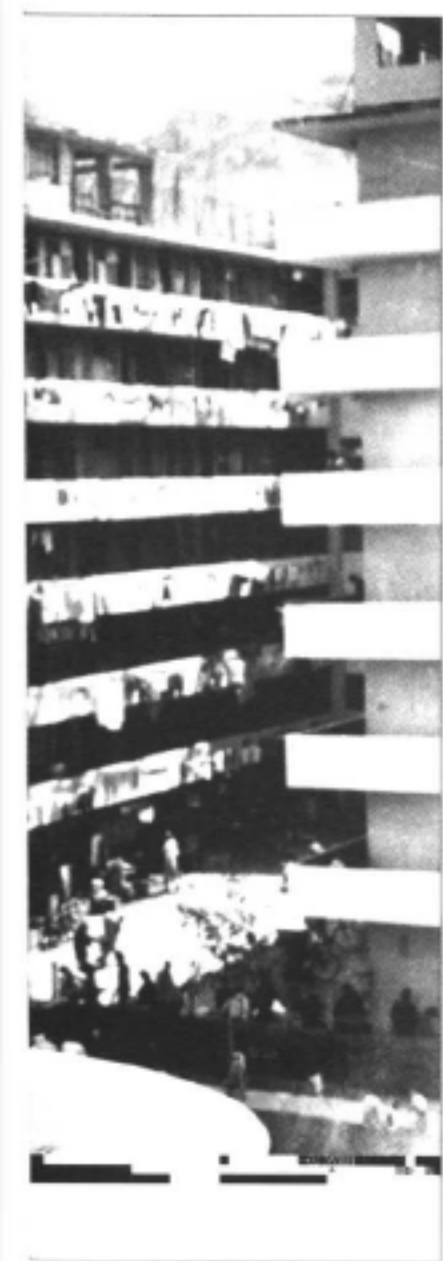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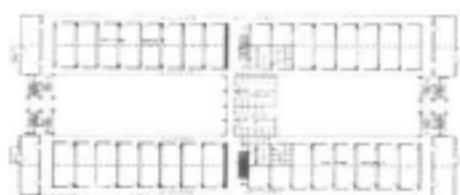


- 1 由于大部分徙置大厦天台作学校用途，学生上学便不用乘坐交通工具。课室位于大厦的楼梯旁，天台中央部分用作操场。因为每座等高的标准型徙置大厦天台大都辟作学校用途，从天台远望，尽是学校群，蔚为奇观。
- 2 徙置区的露台相通式设计，正好提供了一个邻舍交往的活动空间，是主妇平日晾衣、煮饭、闲话家常之地。
- 3 每幢“H”形的徙置大厦在设计上均会划分出前后两个庭园。在庭园内，有简陋的儿童玩耍设施。虽然设施简陋，但胜在与住所十分接近，可以老少一起消磨时间。

- 4 在极度挤迫的环境中，徙置大厦的居民都想尽办法争取空间。本应放在单位内的煮食工具，没多久便被移到门前的走廊去。
- 5 假日时与左邻右里一起玩耍或在大堂空地中打麻将，相信是不少徙置区居民难忘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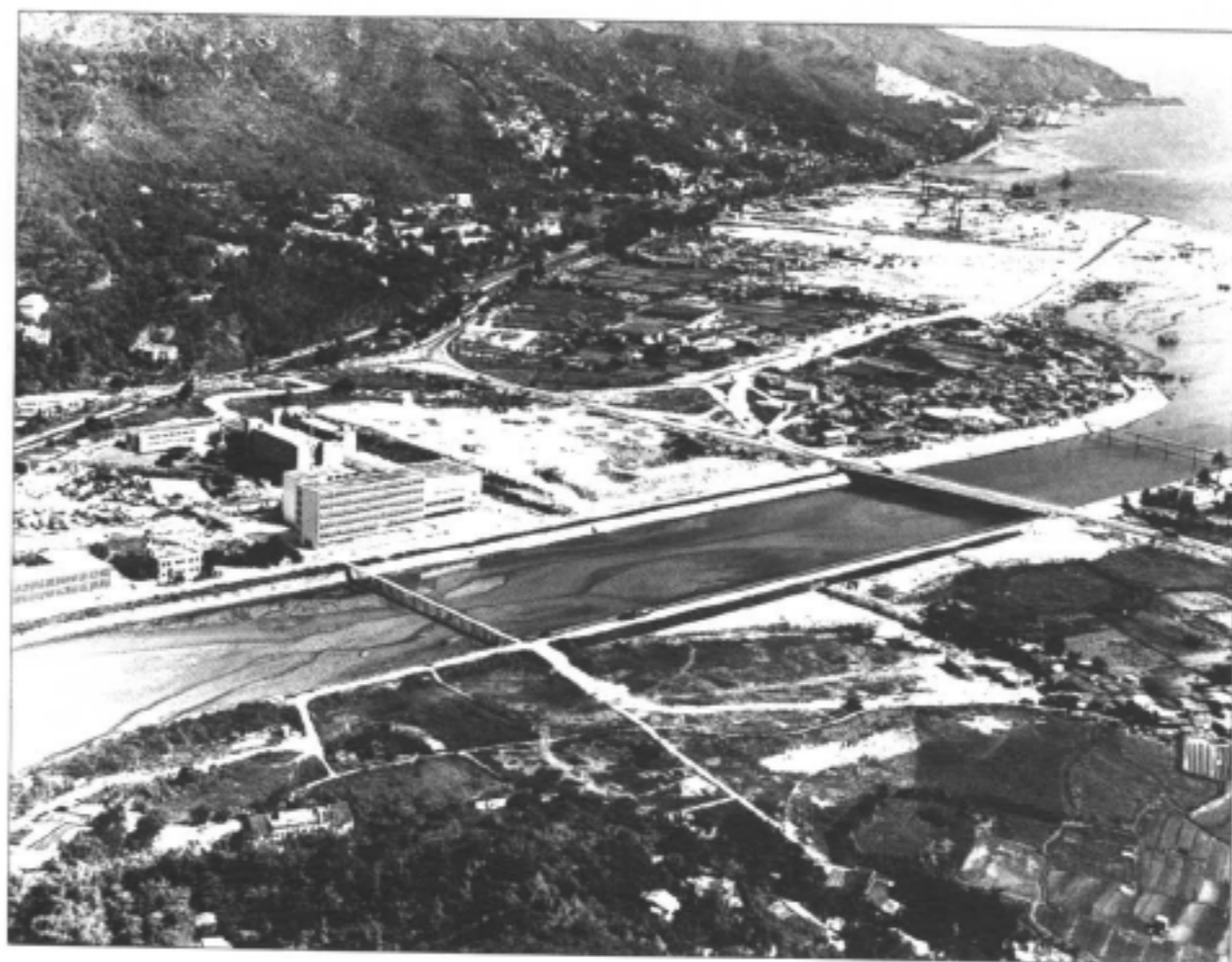


1 第一代的甲类公屋北角村，建筑成本比乙类的徙置大厦高，施工期也较长，但卫生设施、休憩及居住空间的设计，都较乙类徙置大厦为佳。

2 乙类徙置二型大厦与徙置一型的分别，在于走火楼梯的设计。前者把防火楼梯移到大厦的两端，成“日”字形，每座单位数量因此可增加24个，并改善了公共卫生设施和内园设计。

3 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建的廉租屋（徙置三型）大厦外貌：徙置三型大厦的设计，采用中央走廊进入住户单位的模式，提高了整体楼宇的实用率。走廊两边安装通风高窗，增强走廊及住户单位内的自然通风。每户单位都设有独立露台开放式厨房，单位面积由约10至15平方米不等，其中部分单位可打通以供大家庭租用。在走廊末端设有共用厕所，每两户共用一格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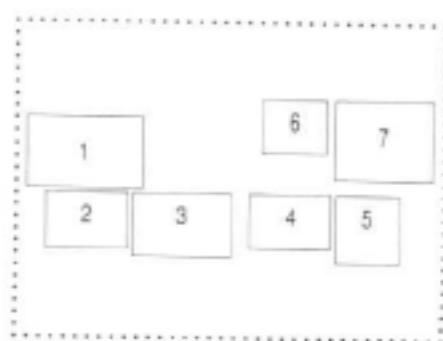
4 廉租屋徙置四型大厦外貌：由于当时治安欠佳，居民自发组织“互卫队”，保护夜归人回家，发挥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因为人口不断增加，公屋需求量大，政府决定发展高层公屋大厦，楼高12层以上，安装升降机，每层的公屋单位约有64个，继续采用中央走廊进入住户单位的模式；走廊两边又安装通风高窗，增强走廊及住户单位内的自然通风。每户居民人均面积由徙置一型的约2.2平方米，增加至约3.3平方米。



5 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兴建的双塔式大厦：为要满足大量公屋的需求，双塔式大厦的楼层增至24层，每层约有34个公屋单位。大厦的设计由两个“口”字形的结构组成，中间相连之处是升降机大堂位置，两个大厦光井直接提升每户单位及走廊的采光和通风，改善了徙置四型大厦利用中央走廊作对流通风的设计。

6 华富村住户单位的室内空间。华富村是第一个社区式规划的屋村，村内有学校、商场、停车场和休憩空间。公屋社区的建立，加强了居民的归属感，让他们逐渐建立成熟的社区网络，激发社区活力，进一步巩固守望相助的睦邻精神。随着生活素质的提高，每户居民人均面积也提升至约4.7平方米。

7 20世纪70年代填海中的沙田新市镇。当时新市镇的开发，以发展公屋及有关配套设施为先，让一个个新的社区或屋村建立以后，自然吸引住在人烟稠密的市区居民向外迁移，使新市镇迅速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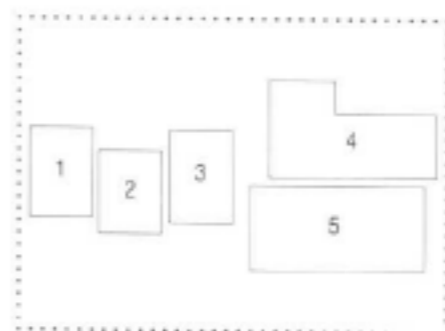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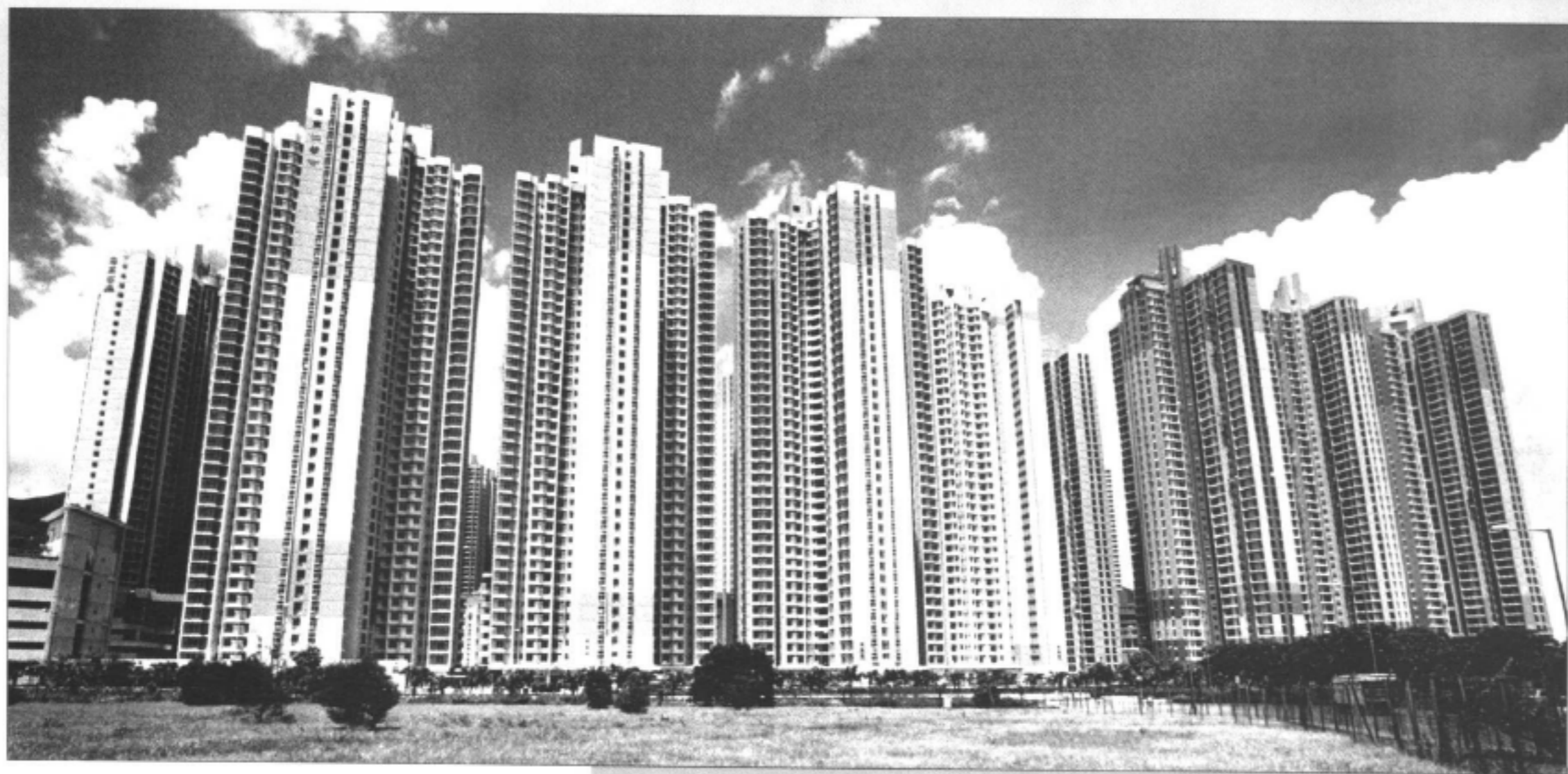
1 初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旧沙田沥源村经过翻新后，披上新的面目，反过来竟成为该村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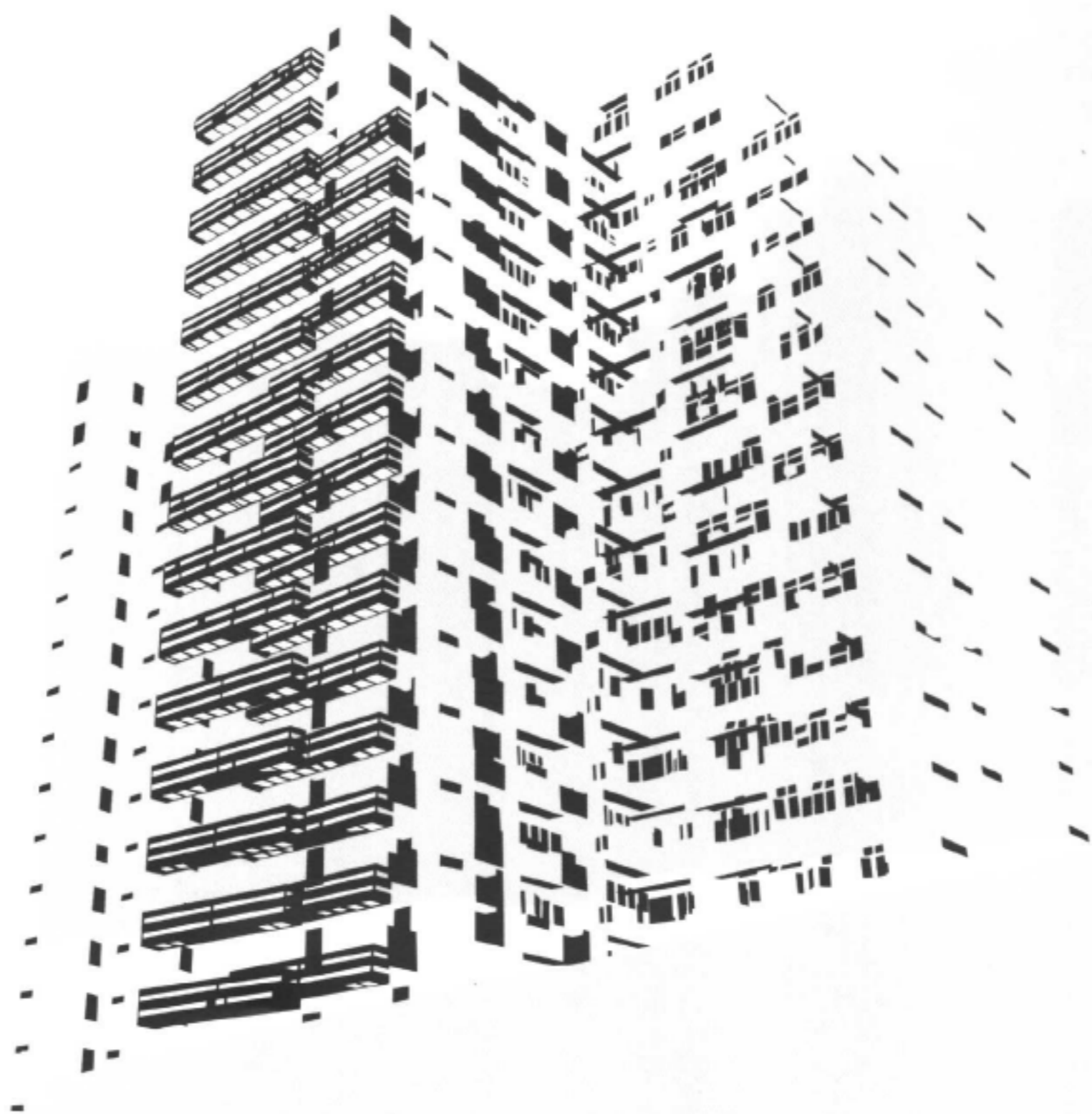
2 “H”形公屋大厦外貌。由于双塔式大厦楼高20多层，光井的面积比例直接影响光井内噪音和地下休憩空间的可用性。随着治安和生活素质获得改善，“H”形公屋针对双塔式大厦以上的问题，把中央光井打开，变为露台式走廊进入住户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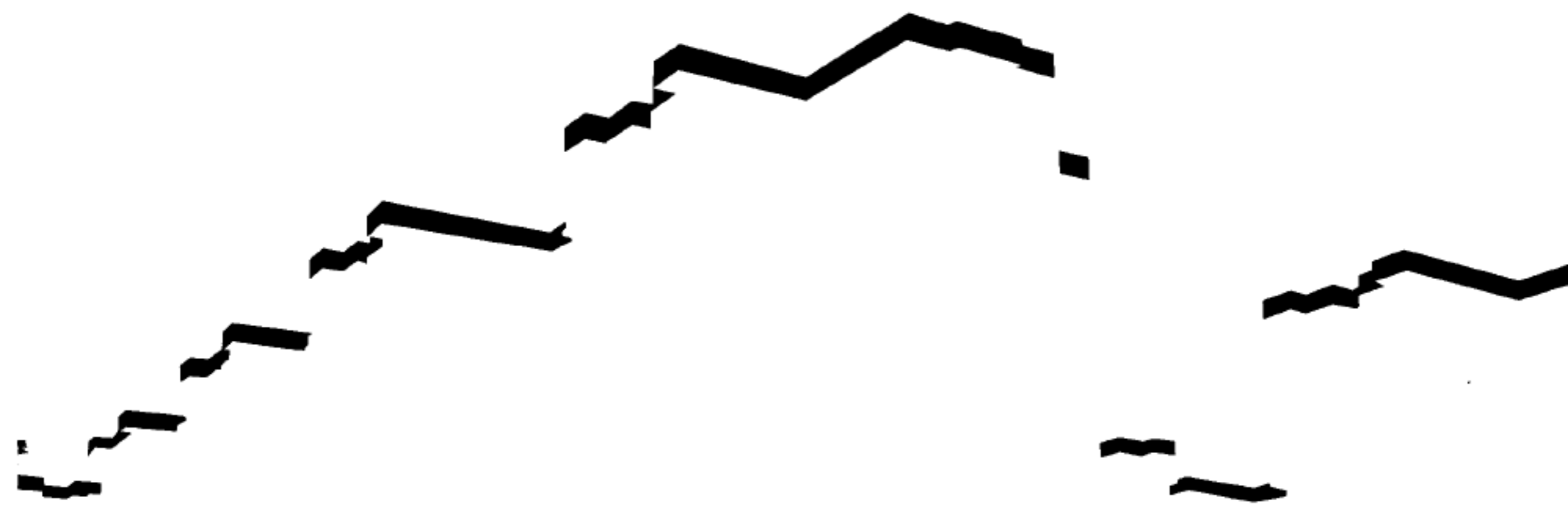
3 “Y”形大厦屋村外貌。随着公屋的楼层不断增加，为要合乎经济效益，楼宇结构的设计很重要。“Y”形大厦一般楼高35层，每座大厦的公屋单位超过800个，采用中央式走廊进入住户单位，每户设有独立浴室、厨房和晾衣露台。单位面积由47至70平方米不等。

4 20世纪90年代的和谐式公屋——马坑村及耀东村。和谐式公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出，分为一、二、三型及乡村式。其中“十字形”的和谐一型最为普遍，楼高可达40层，每层单位数量可达20个，单位类别分为1至2人、2至3人、1睡房、2睡房及3睡房，面积由21至56平方米不等。室内空间引进通风设计，并套用预制建筑组件，包括外墙、楼梯、间墙、结构墙等，提高建屋素质及成本效益。

5 二十一世纪的新市镇——逸东村。







中产人士的选择——从洋楼到美孚新村

人多地少，是我们念小学常识课时所认识的香港城市模式。人多地少的现象，引申出来，就是密集的生活环境。密集的环境，带来了不少方便，同时也制造了不同程度的滋扰。

香港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堪称世界之最。根据2001年统计，香港每平方公里里，便住了4089人，市区更甚，每平方公里住了53086人，相比上海每平方公里16364人、东京的5934人，香港的密度最高。

为了解决战后人口不断膨胀的问题，不少战前的3层、4层唐楼，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陆续改建为俗称“洋楼”的大型公寓。最出名的，是首创地下商铺的北角五洲大厦。最具规模、且日后成为大型私人屋村雏形的，是1961年落成的佐敦文华新村。

洋楼的出现确是一个另类而不俗的选择。新建洋楼向高空发展，因此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兴建，这样自然比唐楼坚固。而一些早期的洋楼利用开放式走廊把住宅单位串连起来，当住户开启大门时，细小的空间却有不错的对流风，比狭长而窄的唐楼略胜一筹。另外，洋楼符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订立的建筑法规要求，设计上确保了房间有足够的自然光和流通空气，又设有独立厨房、浴室、自来水及排污系统等卫生设施。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洋楼无疑是比唐楼更佳的选择。只是，这个时期的洋楼，空间比较狭小，建筑素质不高，也缺乏完善管理。此外，更因位于市中心，洋楼单位面积大都只有37.16平方米至55.74平方米，平均居住4至6人。1966年1月1日后政府法规有所改变，更促使地产商用尽发展潜力，因此建筑密度不断提高。

或洋楼更大、更舒适的空间，更完善、可靠、方便的配套设施，更高的生活享受和服务，包括学校、医务所、私人车位、休憩空间、购物、娱乐等。地产发展商意识到中产阶层出现了新的改变，于是首个符合上述要求的私人屋村模式遂应运而生，这就是美孚新村。

荔枝角的美孚新村，最初构思于1963年。当时，尖沙咀、旺角一带，是九龙区的商业活动中心，长沙湾则满布工厂，而荔枝角已属于近郊地区。美孚新村，其前身是成立于1893年的美国无比石油公司的油库。本来在近郊的油库区兴建大型住宅区的可行性不高，但因港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力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孕育了一群专业而年轻的中产人士，他们追求比唐楼



荃湾成为卫星城市，并计划兴建连接荃湾及九龙西部交通的高架公路。方圆16.19公顷（161877.60平方米）的大型美孚油库，正好位于高架公路旁，交通将会非常便捷。加上原址地势平坦，以及拥有海景优势，故发展潜力巨大。因此，首期发展计划，已涉及资本60亿港币，准备兴建8期99幢20层高，总数共13110个单位的大型私人屋苑。

直至1976年工程全部完竣时，美孚新村已成为可容纳7万名居民、堪称当时世界最大型的私人屋苑，发展商更号称，这是一个“城中城”的建筑创举。

美孚新村，不但是专为中产新一代而兴建的新型屋苑，而且开创了多项先河。例如它率先采用“综合发展规划”模式，将各项城市功能，全部放在一个小社区内，一改过去土地

拥有者各自发展，并缺乏一套完整规划的弊端。除了住屋之外，美孚新村有规划性地配置了学校、商铺、娱乐等城市设施和空间，使之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商业活动区之一，并吸引了美孚以外的全港人士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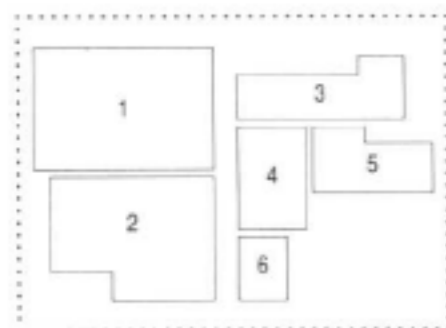
其次，善用城市设施和功能，分隔居住单位，是美孚新村的另一重要特色。整个规划将人、车、道路、广场，清晰分隔。主要的休憩、儿童活动空间，设置于平台；而2或3层高的平台，则同时是停车场和商业区。此外，多期连接的平台，使空间更见扩大，在使用上更见多元化、更具弹性。生活范围广阔了，却又没有车辆、噪音、废气、货运等环境滋扰。

除了环境的改善外，内在的设计亦见提升，超越旧有的洋楼。美孚新村20层高的大楼成十字形，并相连一起，让每一单位均享有两面或三面单边，大有利通风及采光。楼梯、电梯、垃圾槽，集于大厦的中心，改善了旧式洋楼狭长走廊的缺点。

不同的单位面积，适合不同大小的家庭。室内设置，在实用之余，也提高了档次。最特别的是，提供冷气机窗台的位置。此外，当一般洋楼大厦只是雇

用看更守卫时，美孚新邨却改聘专业管理公司，全面负责整体的管理服务。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实在极为罕见。它更拥有自己的巴士总站，甚至成为交通交汇点，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地理位置上造成的不便。

总之，美孚新村落成后，其他地产商纷纷效法，如太古城、沙田第一城、黄埔花园等，都是将邻近市区的工业用地，重新组合，建设成为新一代的中产住宅社区。而且，进一步改善密度、景观、用料、设计、实用率，以至整体规划，都力臻完美。



1 佐敦文华新村的出现，代表私人大型住宅的兴起，可算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地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的模式尚未完全成熟，加上各样客观条件如大型土地的供应，筹集资金渠道不及今天普遍等，使文华新村以至一般洋楼，只能提供基本居住的需求。相比美孚新村，从设计、配套、管理角度来看，均有不足之处。

2 北角英皇道的洋楼群，左图右起可见南天及南方大厦，右图为益发大厦，连同附近的璇宫、丽宫、五洲大厦，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这些大厦发展面积颇大，除了传统向街地铺外，更设有地面层商场，以尽量利用所有空间。可惜整体布局比较原始，并没有考虑到人流方向、空间层次、视觉效果等关系，更遑论通风、采光等基本卫生条件。

3 旧式洋楼的狭长公共走廊，部分设有窗户，方便通风。

4 洋楼通常会尽用空间，像图中多幢洋楼之间竟预留一片公众空间，比较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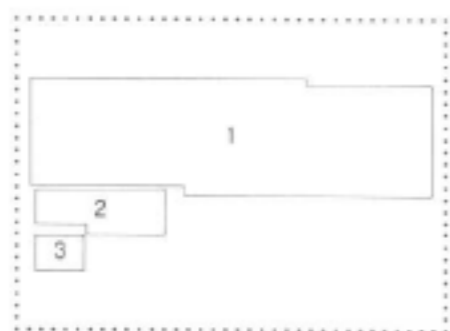
5

6

图中可见洋楼密度，特别是整个立面遍布细小的窗户，可算是香港建筑的写照。

小光井提供通风及采光之用，但光井高窄，故效果并不明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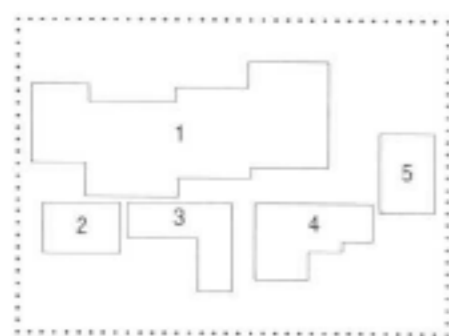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高架的葵涌道是连接卫星城市荃湾与九龙的重要干道，但它也把美孚一分为二，及带来噪音和污染问题。幸而美孚的平台内向而自成一角，所以不甚受到影响。天桥底也拥有自己的巴士总站。

2

美孚部分住宅单位和架空天桥十分相近。在注重优质生活环境的今天，这设计已不可接受。

3

美孚的密度亦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1

平台的功能成功地把人车及休憩空间分隔，造成另类的半公共空间，而平台下的停车场也十分方便。这模式影响了日后的大型屋苑设计。

2

大型楼梯连接街道及平台。

3

不同的平台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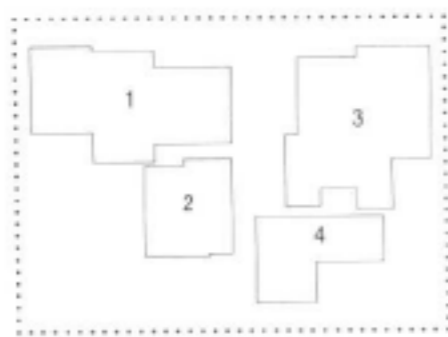
4

平台覆盖面积大，为提供更好的采光及通风予平台下的停车场及街市，建筑师特别设计了大型圆天井，也缔造了有趣的视觉效果。



5

图中可见平台与底部的关系。



1

美孚的楼层虽然不高，但楼宇之间互相紧贴，形成巨大的建筑立面；但美孚新村的成功，却见证着香港中产阶级的兴起。1973年的人口调查，显示美孚新村68%的居民为35岁以下，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背景，平均高于九龙其他地区。因此，高素质、高密度、综合规划，便成为招徕中产的成功要素。

2

美孚的规划模式，是将40英亩的土地综合整体规划。住屋之外，有计划性地配置了学校、商铺、娱乐等城市设施和空间。美孚第四期的大型商场，还有保龄球场、戏院、百货公司，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商业活动区之一，吸引了美孚以外的全港人士使用。美孚“自成一国”的模式，源于十九世纪末欧美的城市规划理念。只是美孚的住屋密度更高，设施配套更丰富。今天，这种形式，几乎是香港所有大型屋苑发展的基本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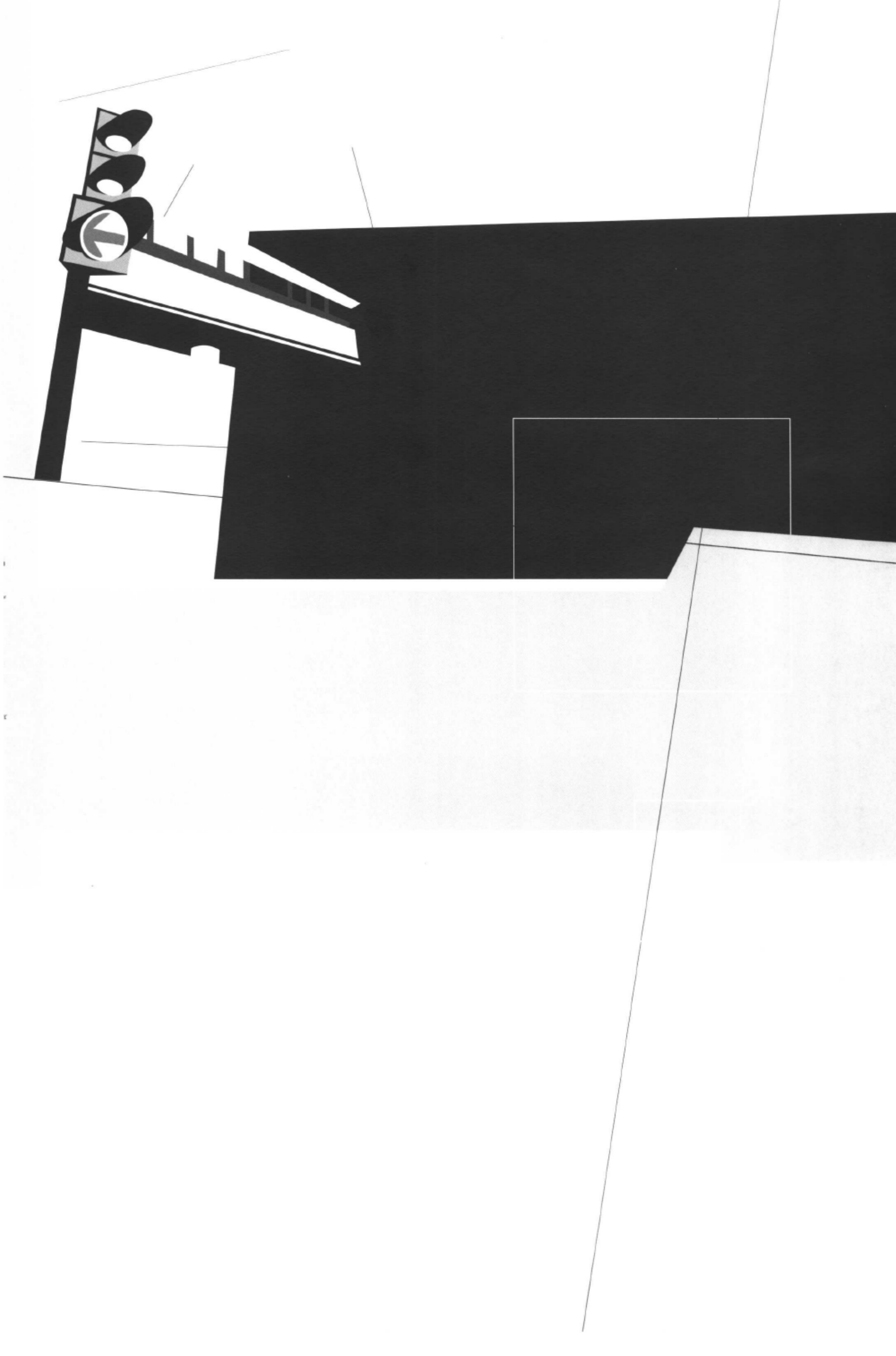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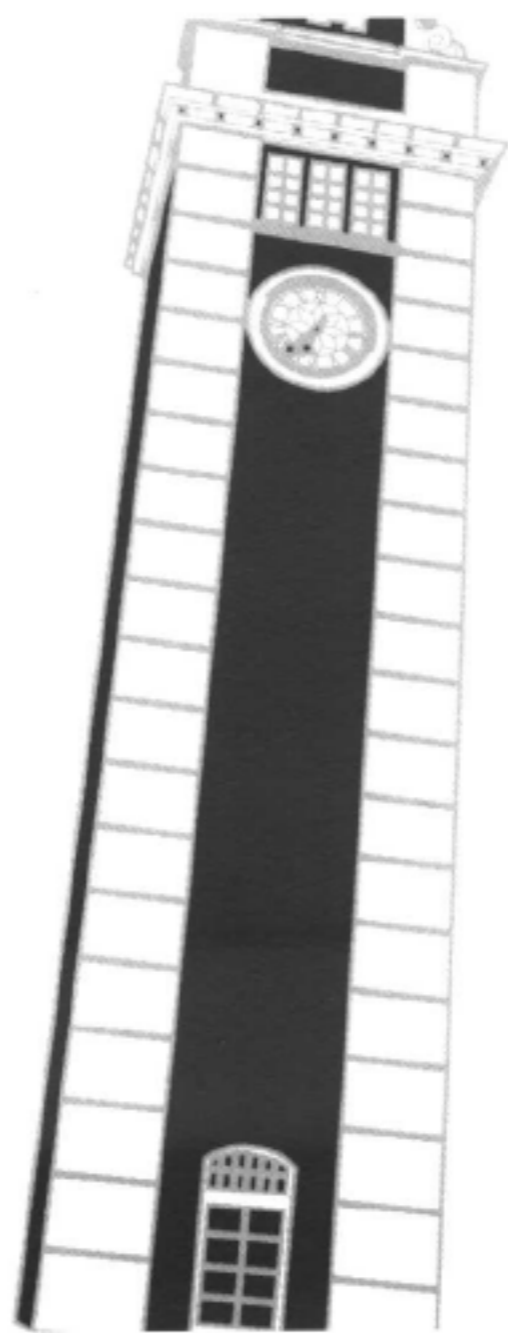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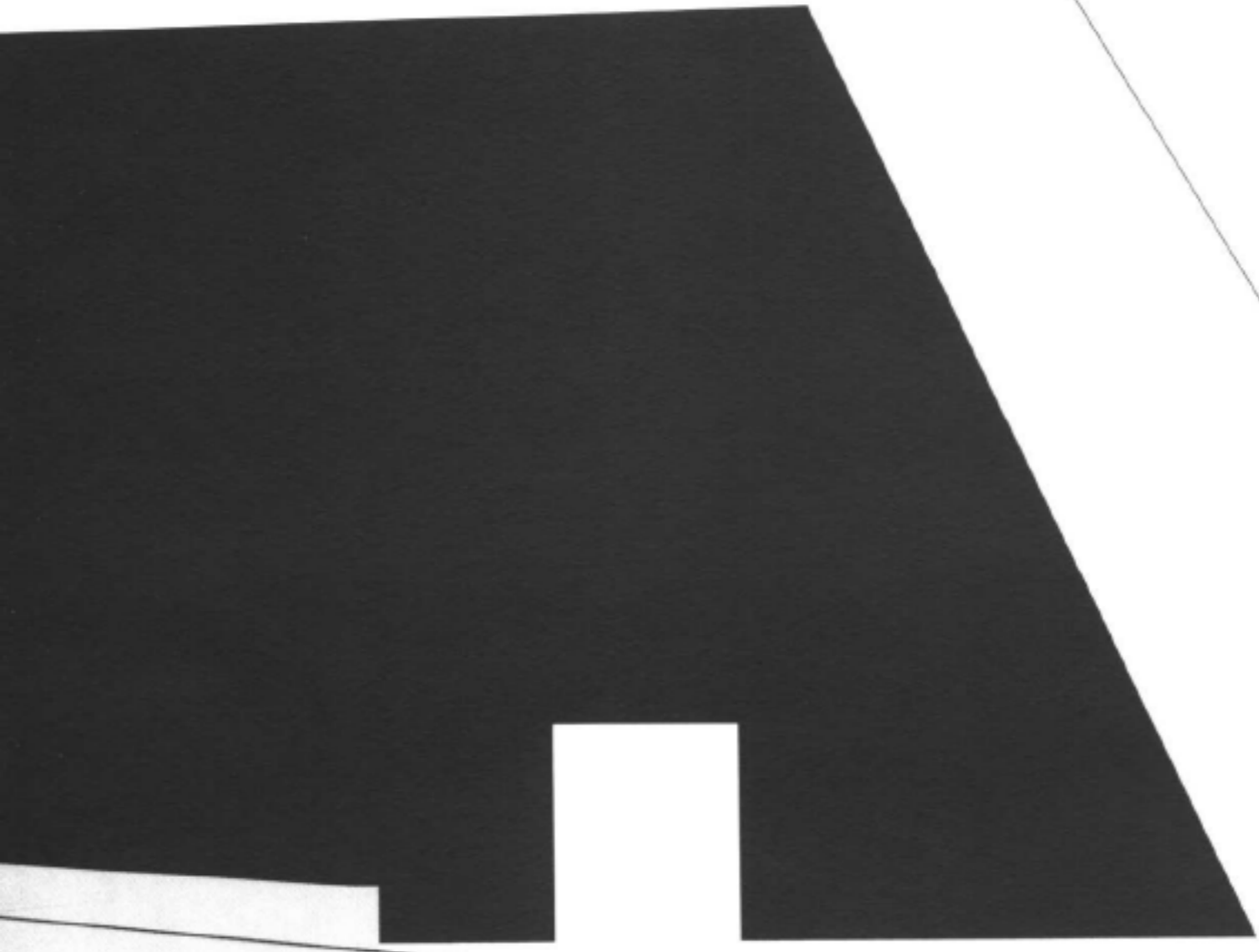
平台上的不同休憩空间。

4

在规划初期，美孚整个项目预计需时10年，分8期才全部完成。而每期均拥有个别特色，平台上的公共空间，设有水池、花园、壁画、凉亭，营造了平和、安逸、独处一隅的气氛。在当时，与旺角、油麻地、深水埗等繁嚣地区，截然不同。







交通交会处

码头建筑

香港开埠不久，中区以至上环一带沿岸，已建有不少码头供船只停泊，用作装卸货物及载客往来省港等地。当时的码头十分简陋，只是用草棚或木搭建而成，如遇台风即会被吹倒而需要重建。1898年，天星轮公司成立，码头最初设在香港大酒店前的海旁（今置地广场西北角），随着中区填海，码头亦迁至近时的干诺道中雪厂街街口，开始采用双层木船行走中环、油麻地、旺角及深水埗各线；1900年，卜公码头成。唯两码头都因抵挡不住1906年的台风而需重建。

新码头的设计，既要抵挡台风，又要令船只容易泊岸，因此码头设计呈流线型，从平面图看来，就像只小船停在海中央。从上岸处到出入口的长廊设计，方便疏导人流，主体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注重坚的功能。踏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码头再度重新设计，改善了上落通道（分层处理上落客）及候船室的通问题。然而，随着1972年海底隧道的落成，渡轮的功能已日渐减弱。时至今日，不少渡轮码头已经迁拆或建，但维系着维多利亚港交通的渡轮，仍是相当受欢迎的渡海交通工具。

缆车总站

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环一带主要是商业中心，那里的外商都喜欢聚居在太平山半山上。初期他们聘用轿夫上下山，直至1888年缆车通车后，始改用缆车代步。当时缆车的山顶站及花园道站皆采用木建造，设计简单，并附有机房（用煤为动力），属于殖民地风格，是当时重要的建筑物之一。直至1926年缆车电气化后，缆车站的建筑物，才改用钢筋混凝土。

在花园道车站的上盖，也经历过数次改建，最近一次是1983年建成的花园道圣约翰大厦（St. John's Building），建筑师吴享洪在建筑外观、物料及细部处理上，均巧妙地利用地势将车站和商厦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幢具有独特个性的建筑。

山顶的缆车站，亦经历过两次意义深远的重建。一次是1972年落成的椭圆形设计，是钟桦楠建筑师难忘的工程。他从传统中国城墙顶上的瞭望塔，汲取了“下坚上浮”的灵感，设计了名为“凌霄阁”的新缆车站（又名“老衬亭”，以纪念改建前在缆车站旁的老衬亭），两座大柱承托着椭圆形、两层高的白色主体，更成为当年香港旅游的地标。第二次是1997年落

成的山顶缆车站，集娱乐、商业、饮食和车站于一身，由英国建筑师Terry Farrell & Partners设计，成碗形、5层高的主体，由几条大柱支撑，非常具有特色。今天，从花园道车站到山顶车程，约需8分钟，乘坐缆车已成为访港旅客的必备节目。

各个城市的交通交会处，除了发挥联系地域，以至配合城市的发展外，也可以成为地标式的建筑物，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君不见尖沙咀昔日火车站的钟楼，今天已成为游客必到之地。不过，如何更有效地疏导拥挤的人流，解决通风、采光等问题，同时令建筑物具特色和富时代感，却是不同的交通交会处最终要面对的挑战。

火车总站

1910年九广铁路（英要以红砖和麻石构成，主楼对开建段）开始通车，使九龙、新界得以联系起来，翌年，更可直达广州。1916年，火车总站落成，是当时一所较有规模的西洋建筑物，具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车站主楼有一座钟楼，成为尖沙咀的一个主要地标。遗憾的是，火车总站于1978年被拆卸，用作兴建香港文化中心。幸而在当时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力保下，才使火车站旁的钟楼不致被拆掉！

新的火车总站改建于红磡，客运大堂设于平台上，下层是铁路，上层则是多层停车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香港大陆客运量激增，红磡火车总站的人流日益频繁，有需要全新翻修以增加效率。后经英国建筑师Foster and Partners建议，扩建原车站的平台，令人流大为改善。但平台是现有建筑物，未能承受过大的额外重量，建筑师遂

地下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交通网络亦全面发展，其中以香港地下铁于1975年动工最具代表性。当时正值市区物业发展的蓬勃期，大部分的地下铁站上盖都用作商住用途，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而一些大型的住宅屋苑，如杏花村、康怡花园等，亦因交通便捷而发展起来，为地铁公司及发展商，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亦是香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

1997年落成的机铁中环站及上盖(一期)的设计，简洁利落，在有限的空间内，成功地安排及照顾了人流的不同需要，亦展现出二十一世纪建筑物的现代感及实用性。

采用钢架结构，大大减低了平台的负荷，令车站顺利建成。内部灵活的设计，提高了旅客流量及速度。加上外观轻巧，配合波浪式的屋顶及大量采用天然光线，为现代旅运提供了一个愉快的环境气氛。

机场

1928年落成的启德机场，初期只作军事用途，设备简陋，只有茅棚作停机仓。至1936年才开始有民航服务，然而，机场建筑物规模仍然不大，设施亦很基本。日占时期，日本拆了毗邻启德滨的高尚住宅区，一度把机场扩建作军事用途。

战后港府将“启德”重建为军民两用机场，多样设施如客运大堂等，开始陆续建成。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喷射客机的应用，“启德”开始进行扩建，包括兴建全新的客运大楼和跑道。从此，航机穿梭于九龙城住宅区的上空，蔚为奇观。

虽然经过扩建，但因为民航业急剧发展，而新的“广体式”客机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航运主流，于是“启德”很快又需要扩建了。至八十年代末，单是机场客运大楼，已经历共5期的扩建。初期客运大楼的扩建，都是由建筑师甘洛(Eric Cumine)设计，而后期则由公务局的建筑设计处负责，是当年一座既现代化，又实用和有效率的建筑。唯因不断加建，难免影响到建筑物的完整性。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区内经济起飞，令航运量激增，亦使“启德”达到饱和。此外，航机升降所产生的噪音，也严重影响附近的居住环境；而航道太贴近民居，也使九龙许多地区的发展受到高度的限制，安全问题令人关注。其实七十年代中期，港府已经聘请顾问研究，确定赤鱘角为新机场的选址，并预期九十年代初落成，但却因香港主权问题而令计划搁置。至1984年，中英签订了“联合声明”，港府终于在1990年正式宣布在赤鱘角建造新机场。

新机场“Y”形客运大楼，是世上最大的单一覆盖建筑物之一，由英国建筑师 Foster and Partners 设计。一系列的圆拱屋顶和玻璃幕墙，塑造了一个摩登及轻盈的建筑物。客运大楼室内楼底高及空间宽敞，天花的金属板及玻璃组件，足以过滤天然光线，加上简洁的机电系统及高效率的运作，令旅客对赤鱘角机场评价甚高，成功地让新机场成为香港的地标之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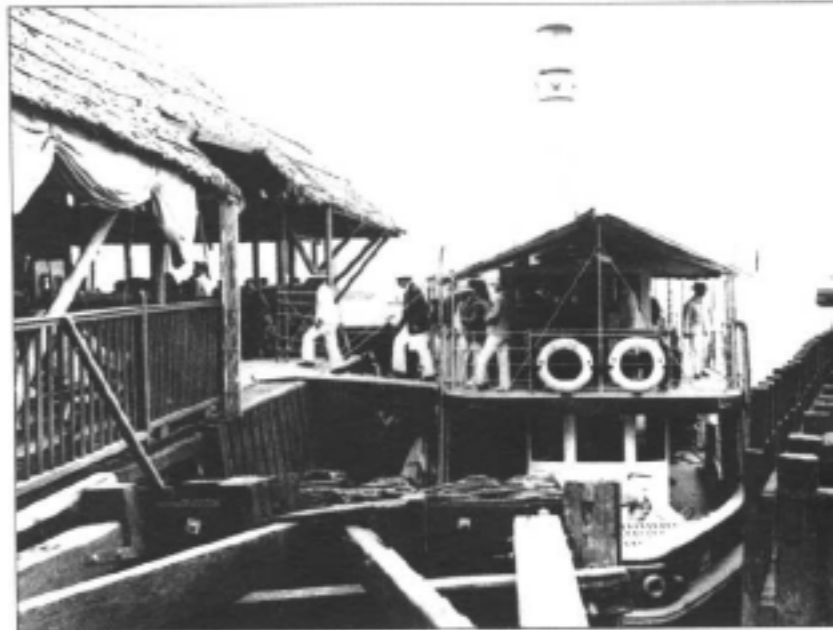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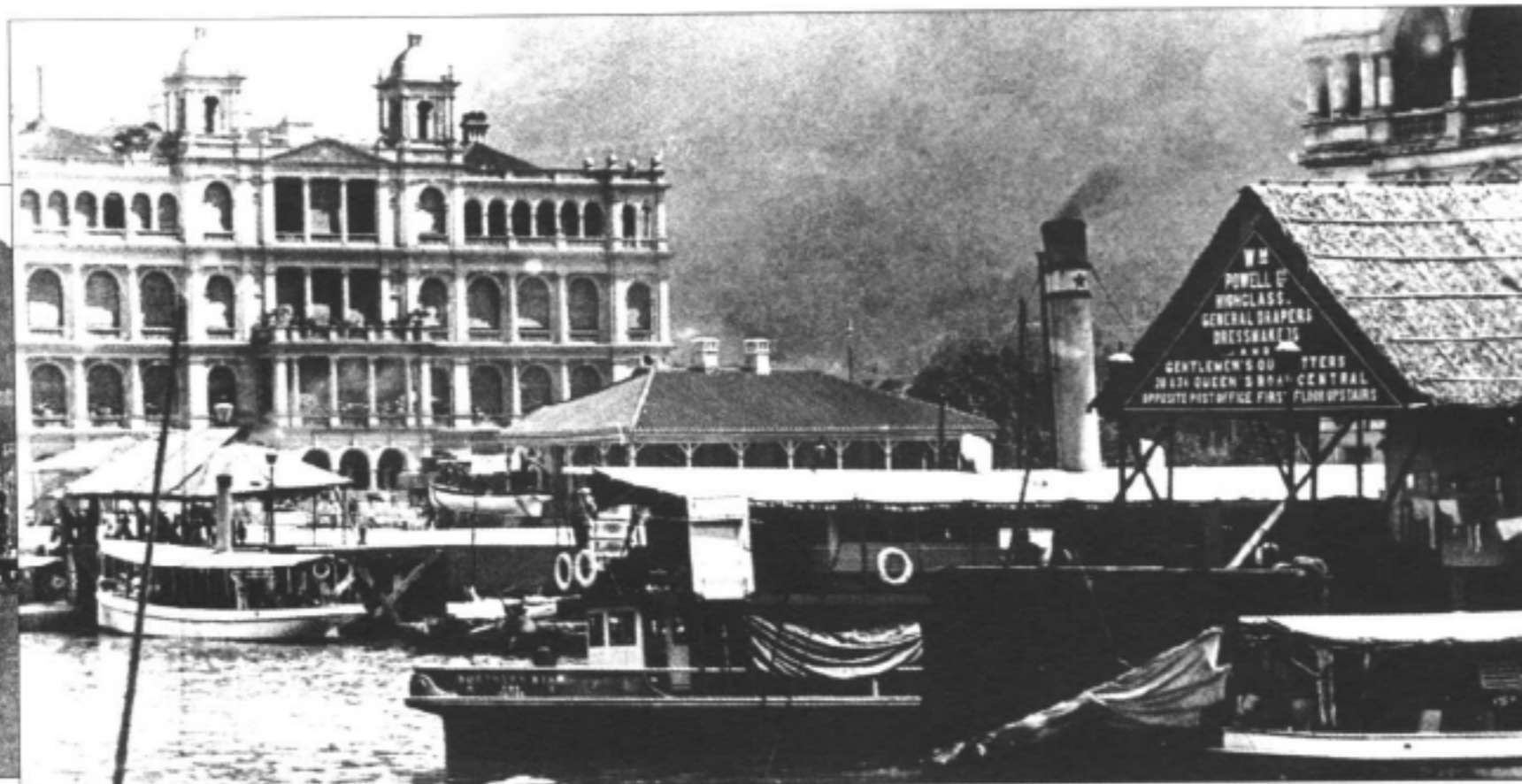
1898年天星小轮公司成立，码头最初设在香港大酒店前的海旁(今置地广场西北角)，随着中区填海，码头亦迁至图中位置(干诺道中雪厂街街口)。此时期的码头仍是简单的草棚，很易受台风吹倒而需要重建，约摄于1900年。

2

约1900年刚建成的卜公码头。其前身为毕打码头，因1890年开始的填海而需重建并命名为卜公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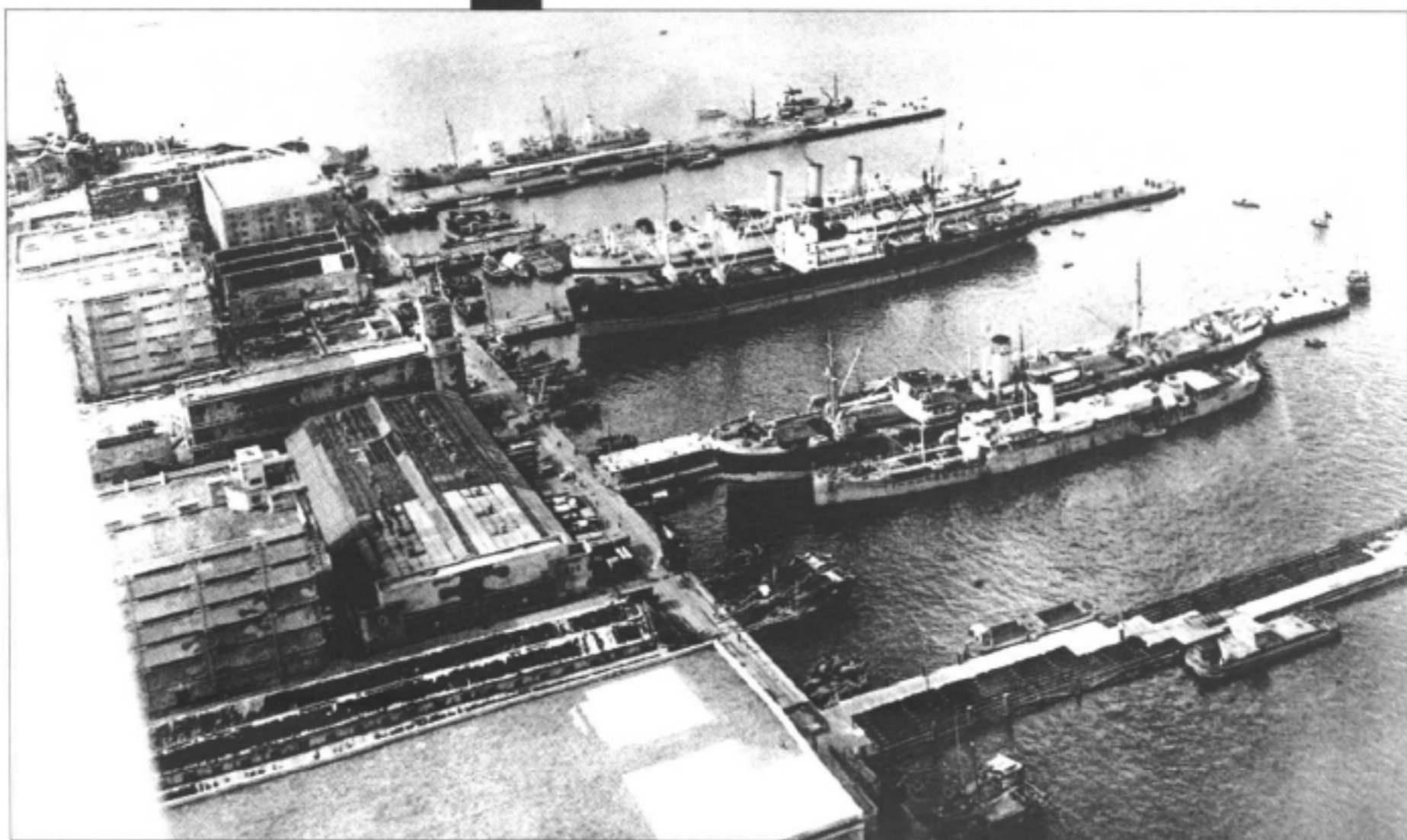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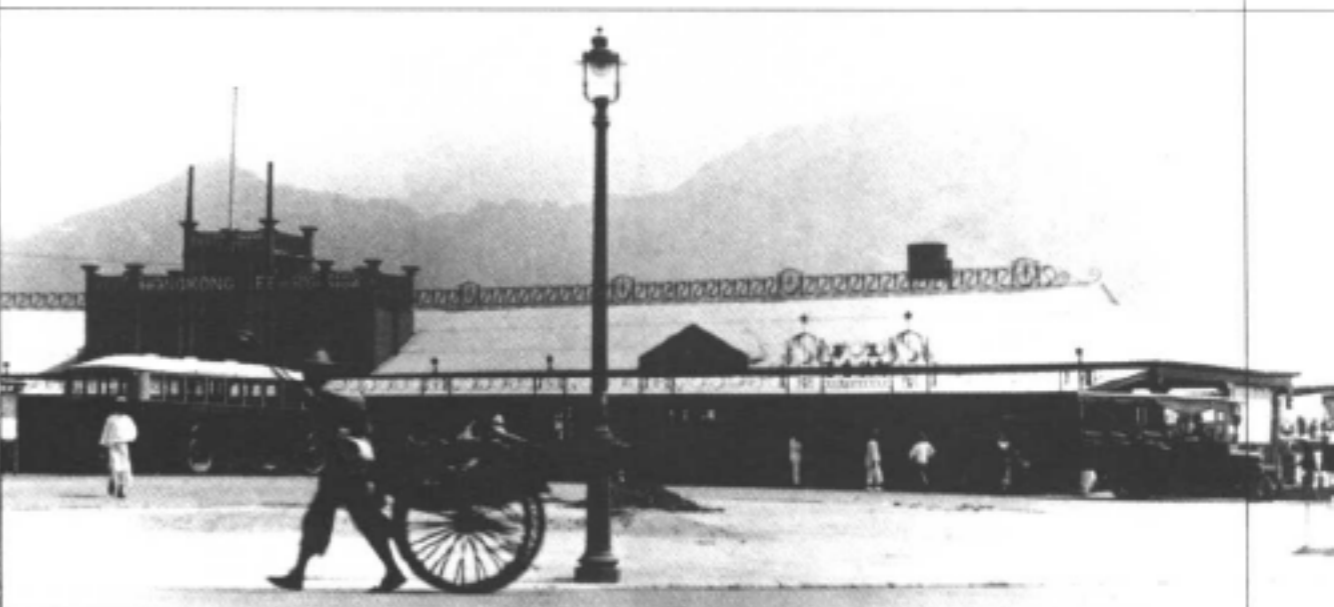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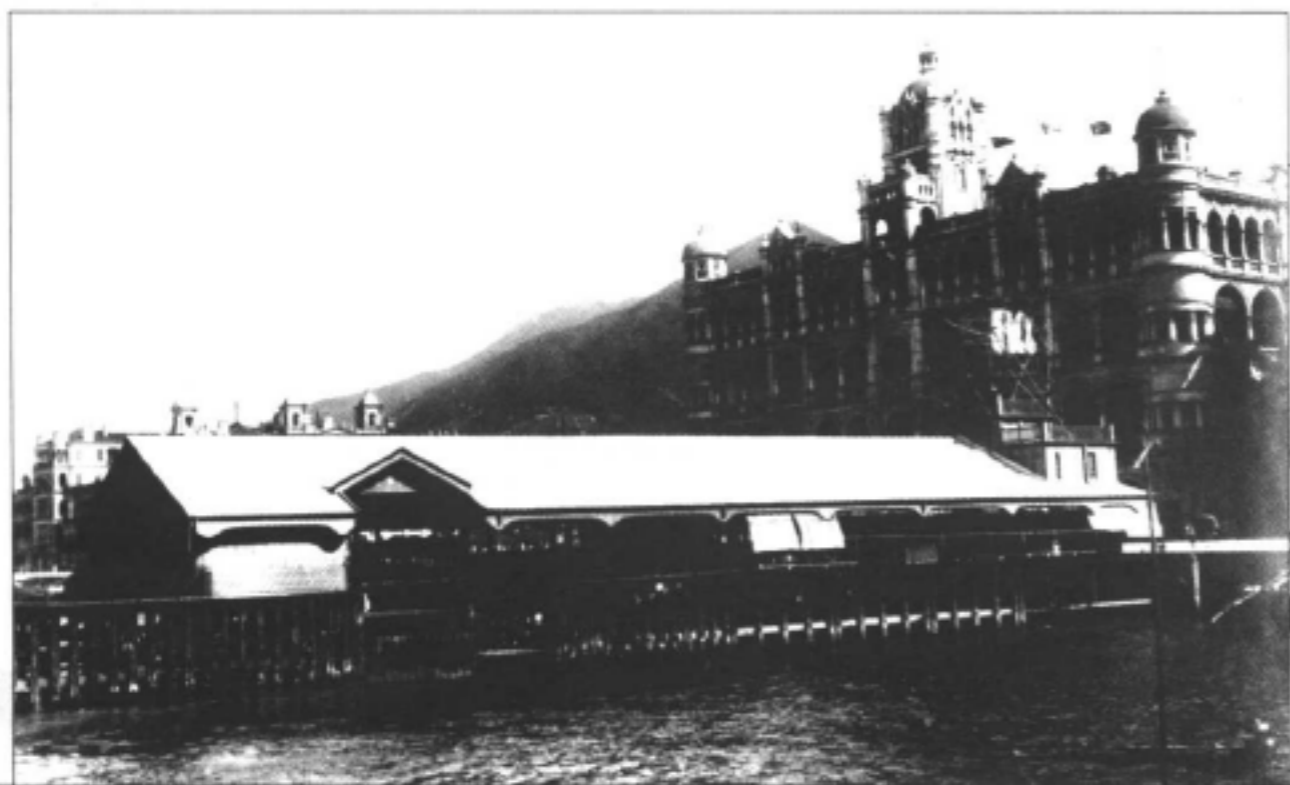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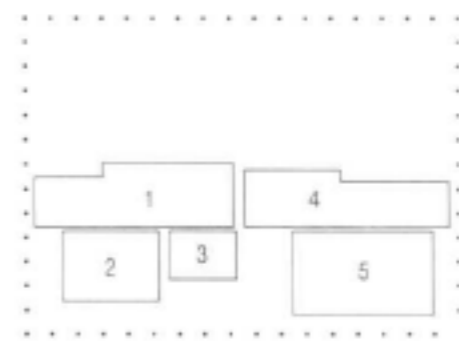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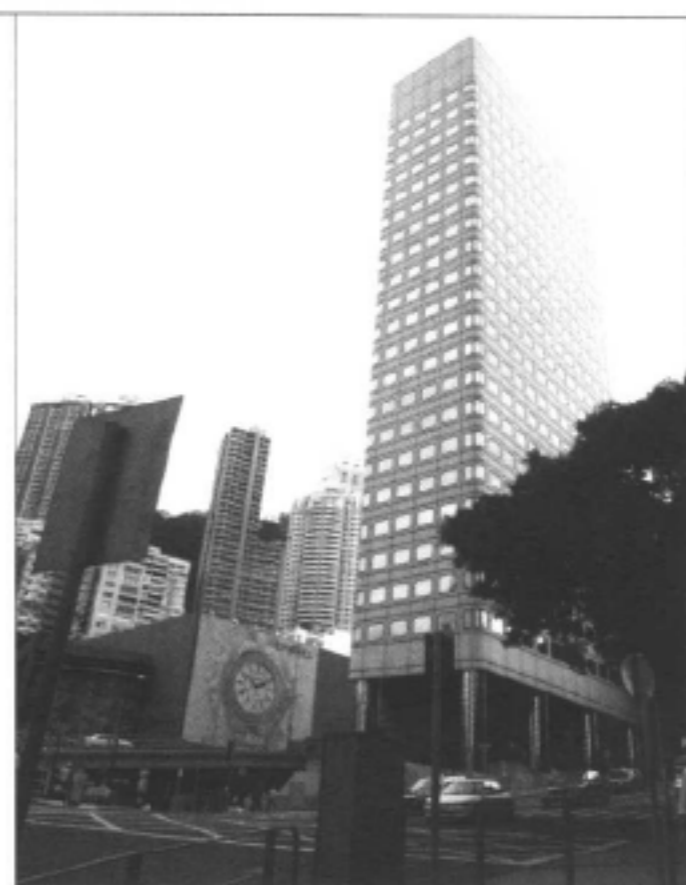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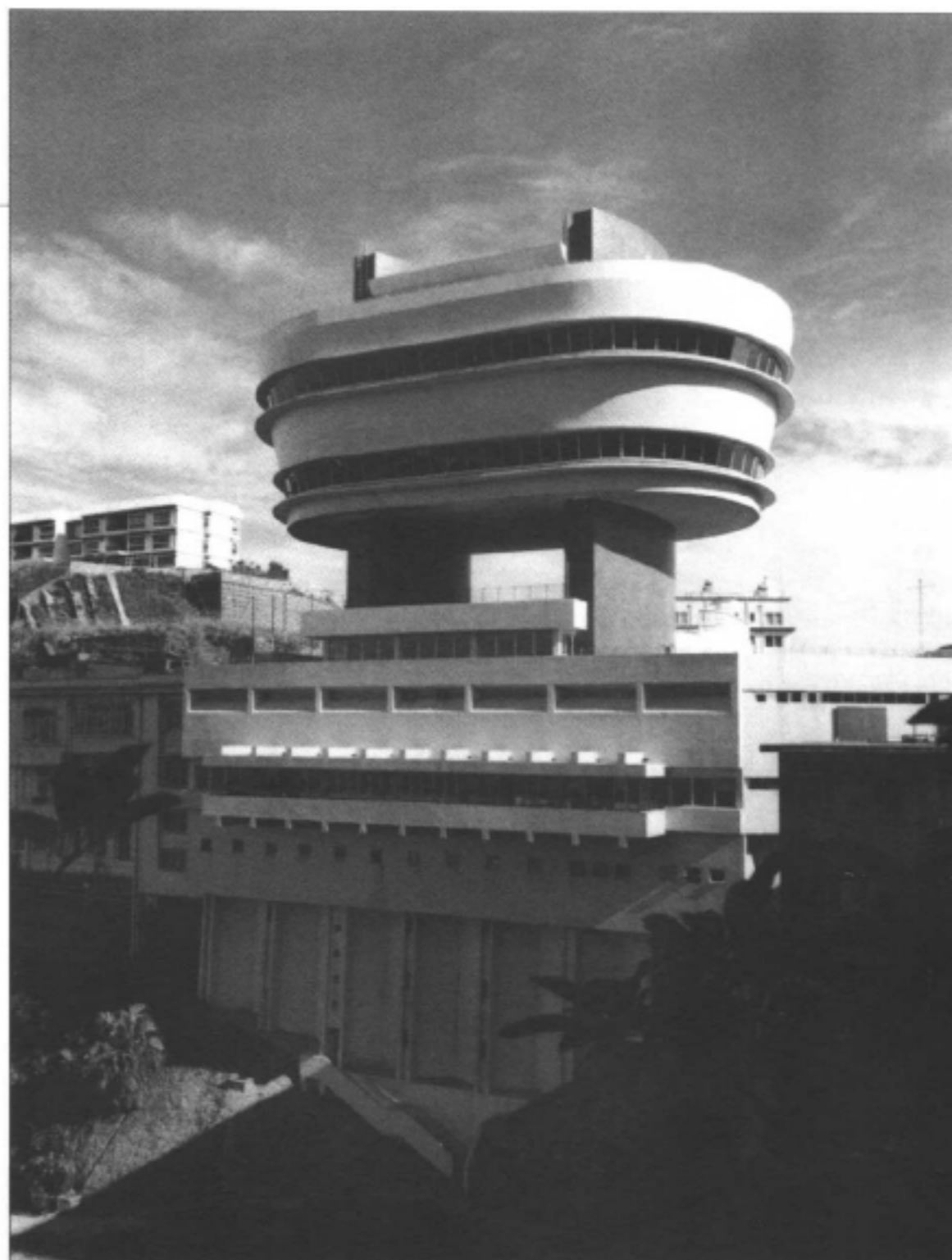
约1910年的尖沙咀天星码头上落客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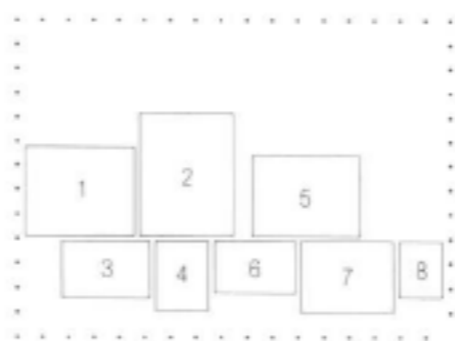


历经1906年的台风后，天星码头遭毁重建，并盖成图中的样子。左图为约1910至1920年的中区天星码头，右图为约1936年的尖沙咀天星码头。新码头的设计比第一代较坚固，从上岸处到出入口的长廊可令乘客免日晒雨淋的不便。

20世纪40年代末的尖沙咀海旁（即现时海运大厦及海港城一带），原是货仓及一系列码头所在，图左上角可见尖沙咀火车站。







1 早年的缆车站皆采用木结构，设计虽然简单，却具有殖民地风格。图中可见在附近工作的苦力。

2 香港太平山炉峰峡山顶缆车站上的凌霄阁，曾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重要的地标。鹅卵形的建筑物，以两根由楼梯、升降机、管道组成的巨柱所支撑，建筑物内设中、西餐厅、购物商场等。建筑师钟华楠希望建筑物像船桅上的观望台一样，让游人饱览港岛四周的景色。

3 1997年建成的山顶缆车站，设计成碗形的主体，由几条大柱支撑，非常具有特色。下面的平台提供了一个360度观赏香港夜景的瞭望台。

4 1983年建成的花园道缆车终点站——圣约翰大厦，建筑师巧妙地利用地势将车站及商厦融合在一起。外墙使用全铝合金挂板幕墙及镜面不锈钢圆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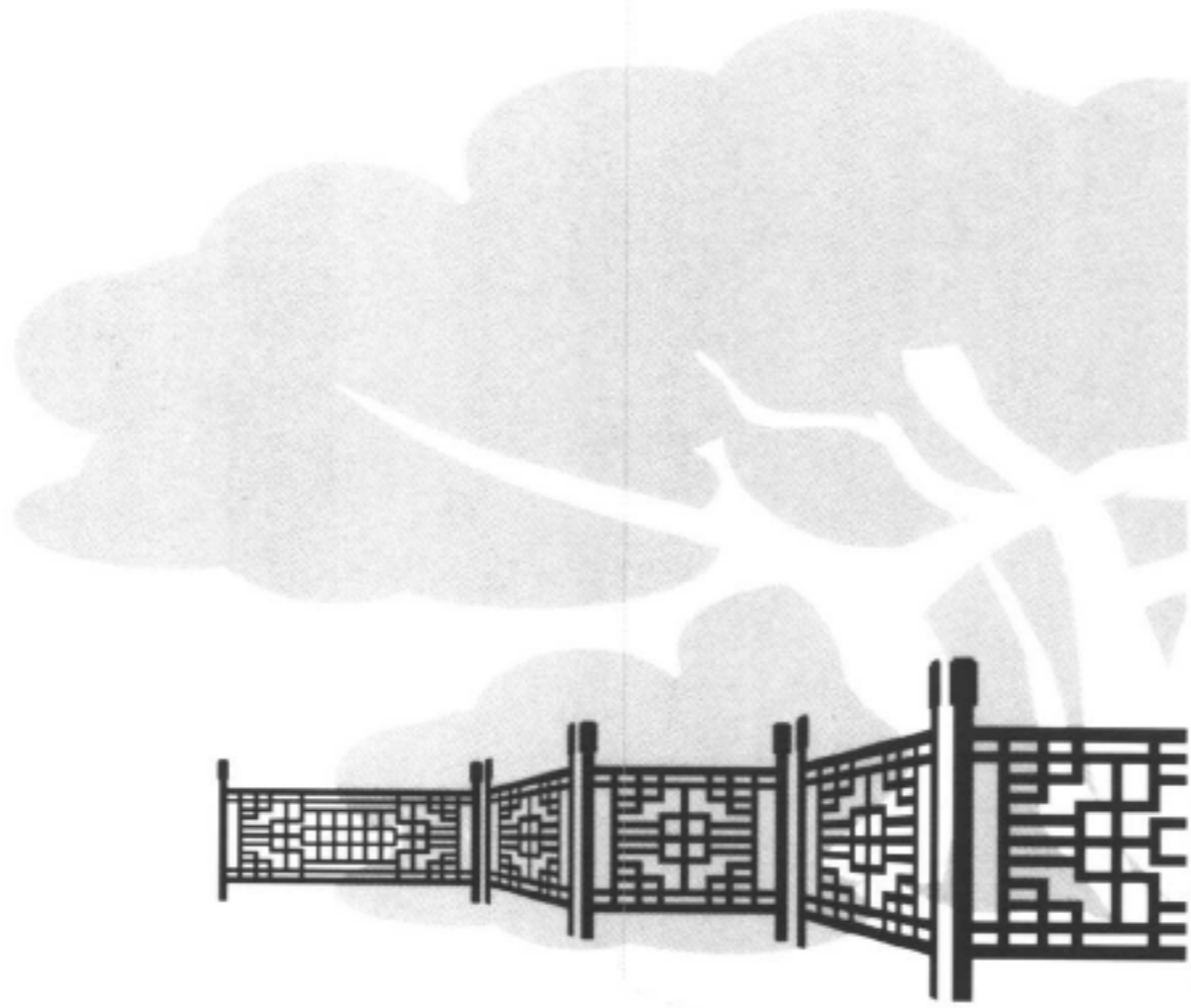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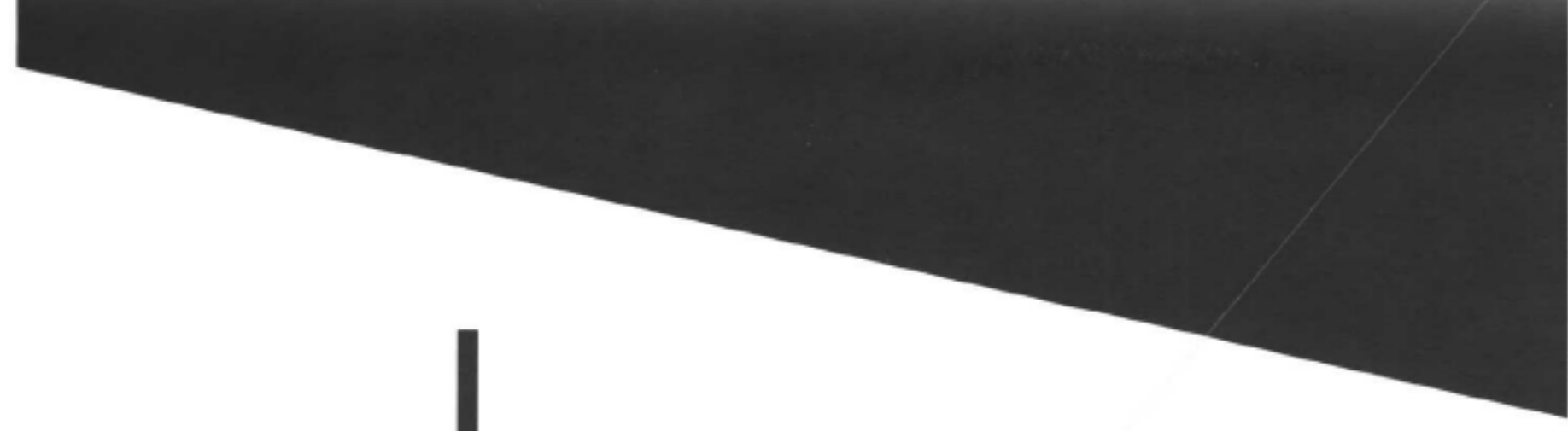
5 尖沙咀火车总站，是当年一所较具规模的西洋建筑，车站主要以红砖和麻石构成。主楼对开建有一座钟楼，现已成为尖沙咀主要的地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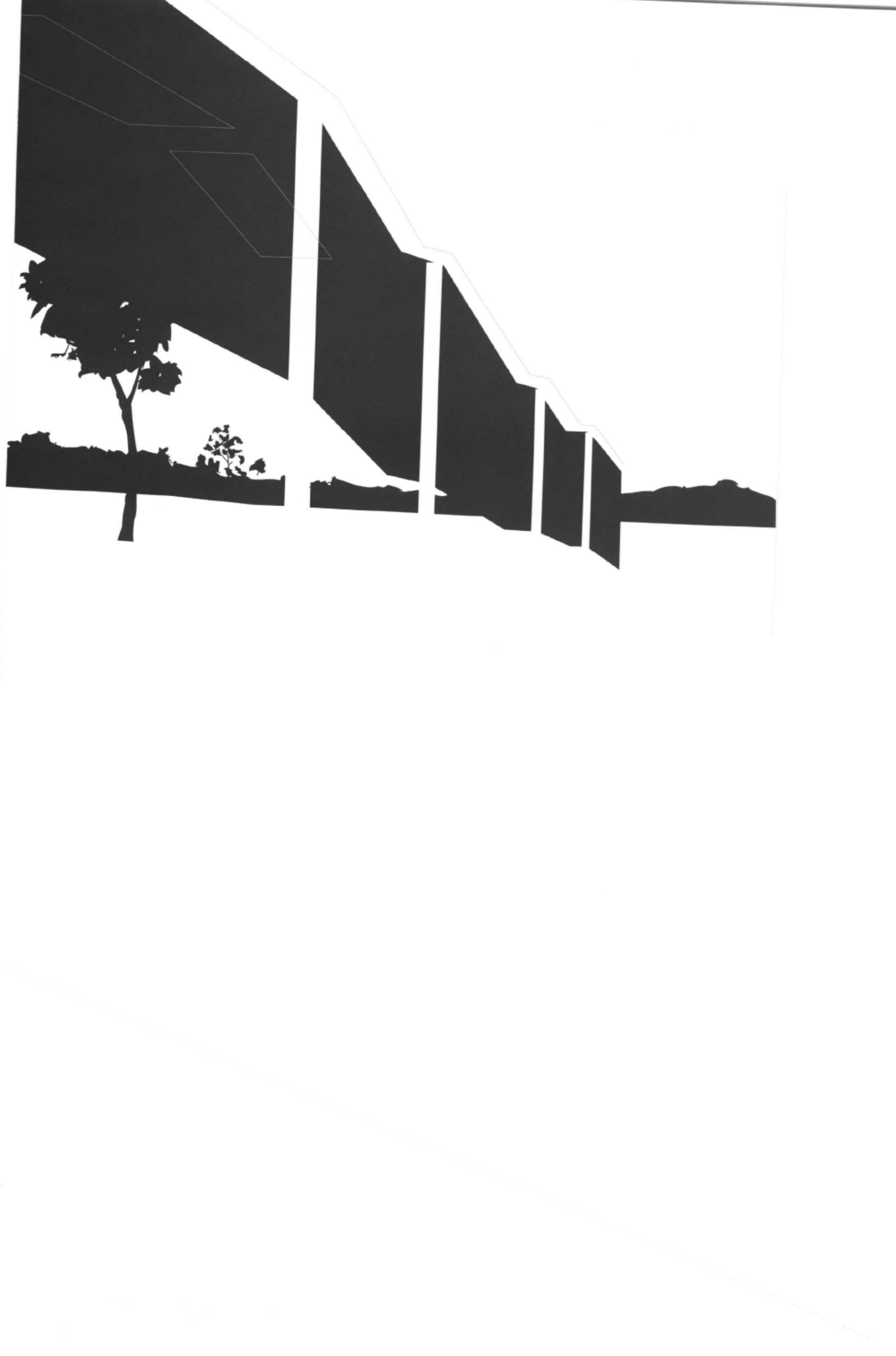
6 香港赤鱗角国际机场的“Y”形客运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覆盖建筑物之一。圆拱形及透光的屋顶、玻璃幕墙令室内富有空间感，而且可以节省能源。

7 1962年落成的启德客运大楼，新客运大楼作密封式设计，楼高7层，在顶层设有指挥塔。为加快人流，大楼分“离港”及“抵港”上下两层，曾是东南亚最大型的机场大楼。

8 中环地铁站的设计富有时代感，线条简洁利落，实而不华，而且人流安排亦很流畅。







城市的公共空间

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

公众空间，可说是我们社区和城市内极具价值的财产，它不单提供城市的休憩及康乐设施，亦随之提高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质素，促进了各阶层的交流及人际关系。

公众空间，也可解作开放给所有市民作各种活动的地方。香港的公众空间，可从面积大小、功用，以至它实际开放给公众的程度而作出分类。这些不同种类的公众空间，于香港历史中不同的时段兴建，亦随着城市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和政府的政策而改变。

街道

此乃最初及最有功效的公众空间，源自疏导行人和货物运输的需要。1841年英国进占香港后，建成了第一条正式街道——皇后大道。此后街道的功能，随着城市结构的复杂化而有所改变，如庙街和通菜街（俗称女人街）的主要功能已用作商业活动；旺角的西洋菜街，夜间已变成行人专用区；而兰桂芳则成为晚上的消遣场所。除了传统形式的街道外，在这数十年间，利用新科技建成的街道亦纷纷出现，比如中环、湾仔区的行人天桥网络，以及通往半山区的自动行人电梯系统等。

社区的公众聚集点

在华人的社区里，传统习俗喜欢在庙宇前举行各种庆典活动，这可追溯到英国政府统治香港以前。油麻地天后庙（大约建于1840年）前的空地，至今仍是普罗大众休憩聚集的地方。

早年的英国政府，明白提供设施给市民作为聚集点的重要性，于是在1869年在中区兴建了第一座大会堂（位置与现在的大会堂不一样），它外围的空间与大厦大堂，同样是为市民休闲聚集而设计。1962年，肩负同样功能的新大会堂落成并开始服务大众，直到今天。



公园

香港首座由政府兴建的公园，是位于中区港督府旁的植物公园（1872年建成），即今天的香港动植物公园。这个公园的建设，原是为满足当时在香港居住的英国侨民而设。

1957年为了配合香港岛北的填海工程，政府在铜锣湾建成了今天的维多利亚公园，它是由早期的青草地演变为现在的多用途康乐和消闲公园。政府除了建造大型公园外，随着儿童游乐场协会成立而促成香港首个儿童游乐场地后，从1922年起，也把公共开放空间的建设，作为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项目。目前各区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公园，甚至发展了海旁公园（如尖沙咀和湾仔的海旁公园）、郊野公园（如西贡的郊野公园），以及可供探索海底世界的海岸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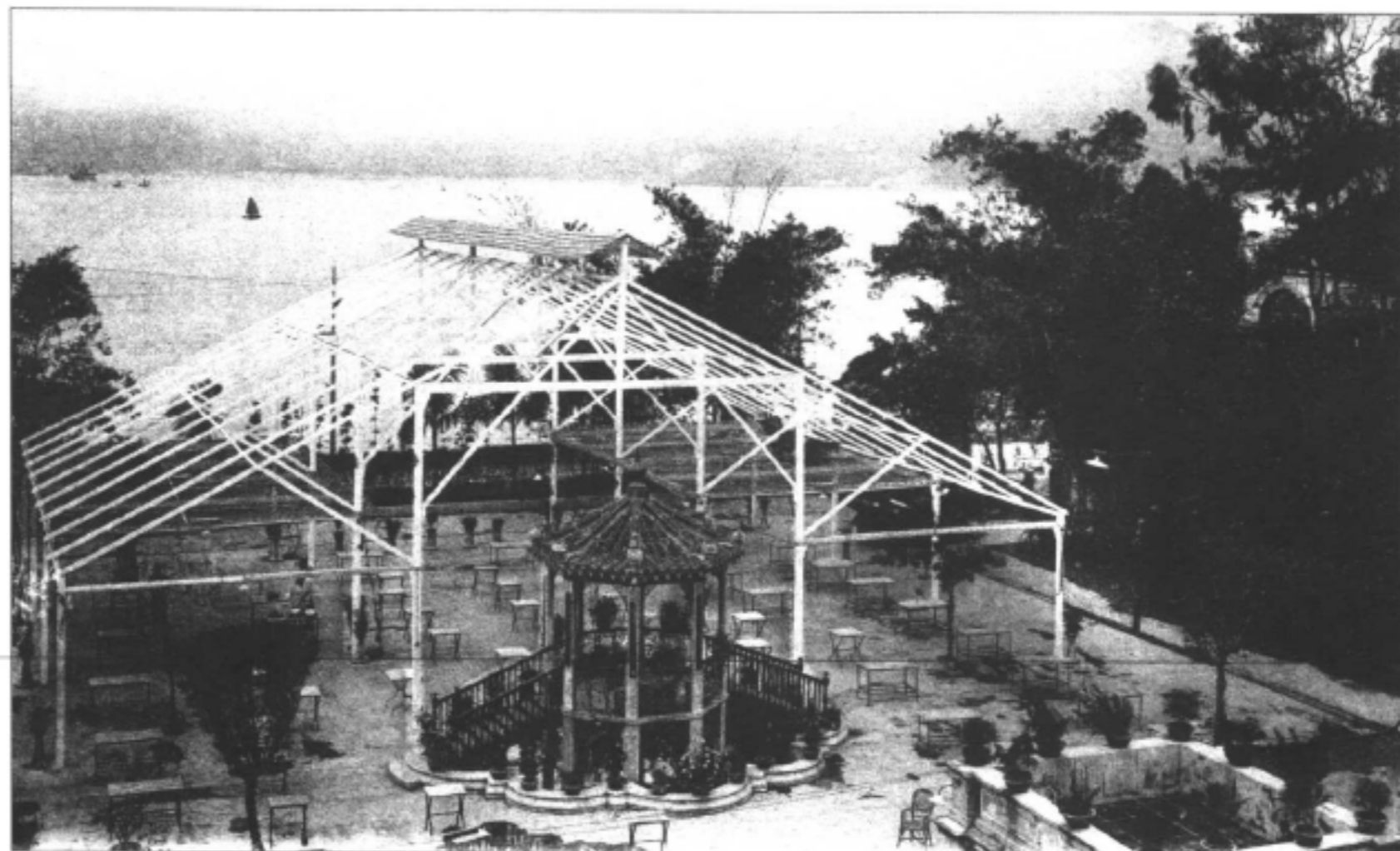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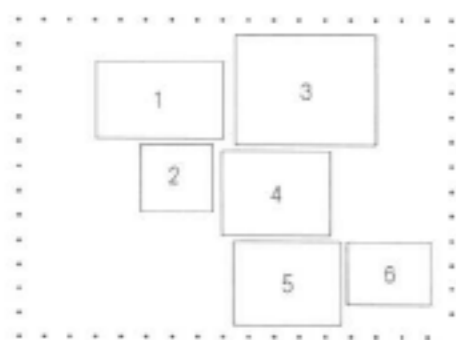
广场

位于中区的皇后像广场，于1889年建成，它原来的面貌与今日的外观，已有很大的差别。皇后像广场是香港第一个正式建造和最受重视的公众空间。在此之前，大型的活动，尤其是与中国人有关的活动，大概可以追溯到现今荷李活道公园所在的“大笪地”。这片空地，原是英军占据香港的第一个落脚点，后来才扩建为市民举行公众活动的场地，当时有“平民夜总会”之称。现在，某些私营商场前的空地也是香港主要的公众空间，但这些大型商场（如时代广场），主要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以公共空间作为吸引人流聚集的手段，与前述广场的性质有所不同。

游乐园地

大部分香港成年人，应该还记得小时候常到的机动游乐场，例如已被拆掉的荔园游乐场（建于1950年）。这类香港的游乐场，可追溯到1907年的渝园和1923年的名园和太白楼。香港政府为了提供市民康乐所需，亦曾兴建不少康乐中心。不过这类设施，大都为推广体育项目而设，例如游泳池和体育馆等。唯自七十年代开始，主题公园也成为新的焦点建设项目。在迪斯尼公园还未建成之前，1977年开始运作的海洋公园，仍是香港最大的公众娱乐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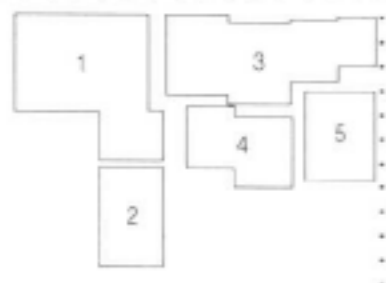
以上对于香港各类公众空间的探讨，多少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明白围绕在身旁的空间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成长。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公众空间发展的过程，体会到当中的优缺点，然后为未来寻求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使我们将来的城市生活条件，可以进一步提升。



- 1 20世纪20年代位于北角的名园游乐场，乃香港游乐场的始祖之一。虽然设备不能与今日的大型游乐场相比，但也是早期香港人一个理想的公众娱乐空间。
- 2 约1895年的皇后大道中，当时街道空间的功能，主要是为疏导行人和货物的运送。在当时的香港街道两旁，已开始有商业活动，这也是香港一般商业街（上居下铺）发展的起源。
- 3 二十世纪初期，位于现今荷李活道公园所在的“大笪地”，是当时市民举行公众活动的场地，有“平民夜总会”之称。图中正进行文武庙的庆典。现时在上环海旁的“大笪地”，也是参照当时的模式而建，但活动范围已只限于商业买卖。
- 4 建于1889年的皇后像广场，相连当时的皇后码头，是一个正式建造给公众活动的空间。在英国殖民政府年代，它是每任港督举行就任仪式的地方。图中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日占时期曾被日军运往日本。战后始运回香港，并安放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直至今日。
- 5 1880年的美利阅兵场，图中可见正在举行阅兵仪式。
- 6 1870年的植物公园，即今天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当时因为没有高楼大厦的阻隔，从公园可瞰览整个维多利亚港。







1 相当于西方的广场，位于油麻地天后庙前的榕树头，是一个典型的华人社区聚集的地方。直至今日，它虽然已被改建为一个公园，但这空间的功能，仍然被一般市民作为休闲和聚集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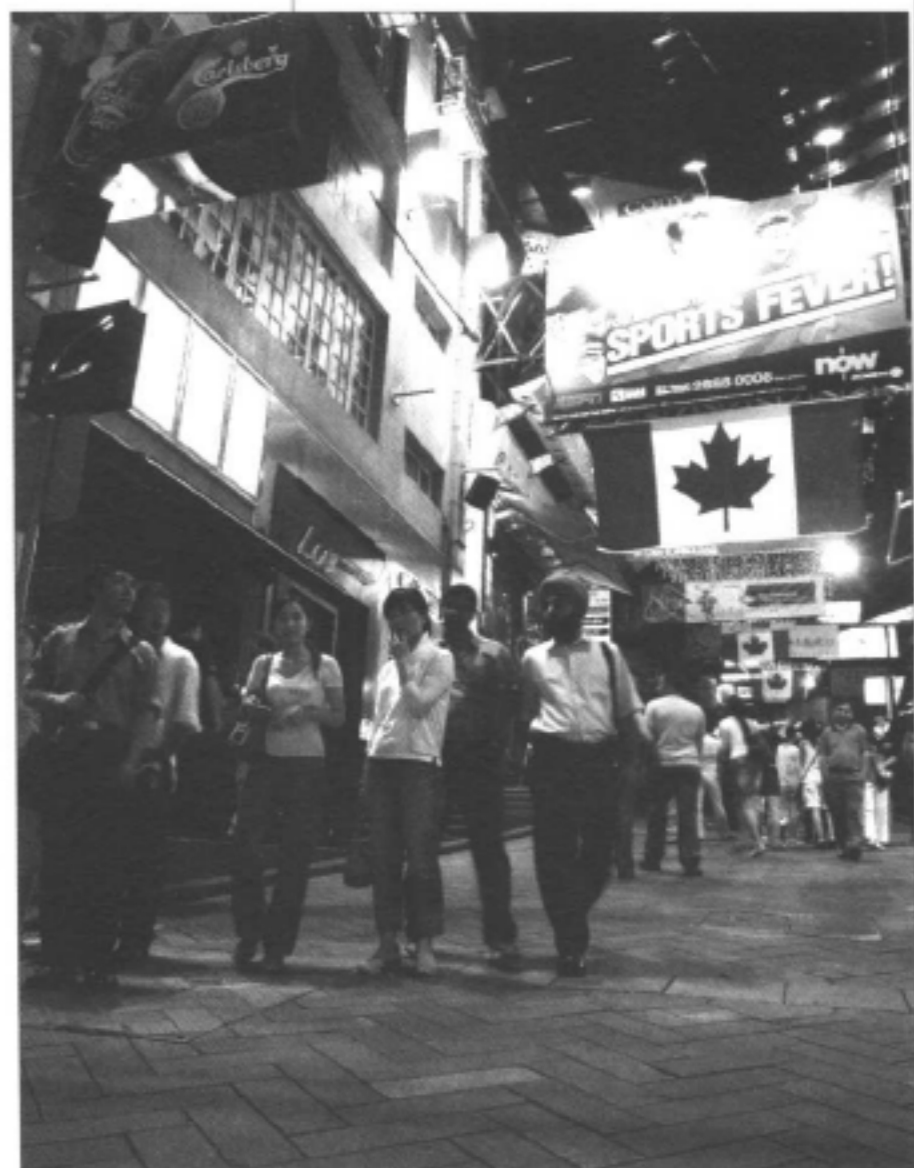
2 位于尖沙咀的海旁公园，见证着香港公共空间的转变。它从一条海旁的行人大道，转为一个吸引游人的观景地方。其中星光大道的建成，更令它变成一个外地游客必到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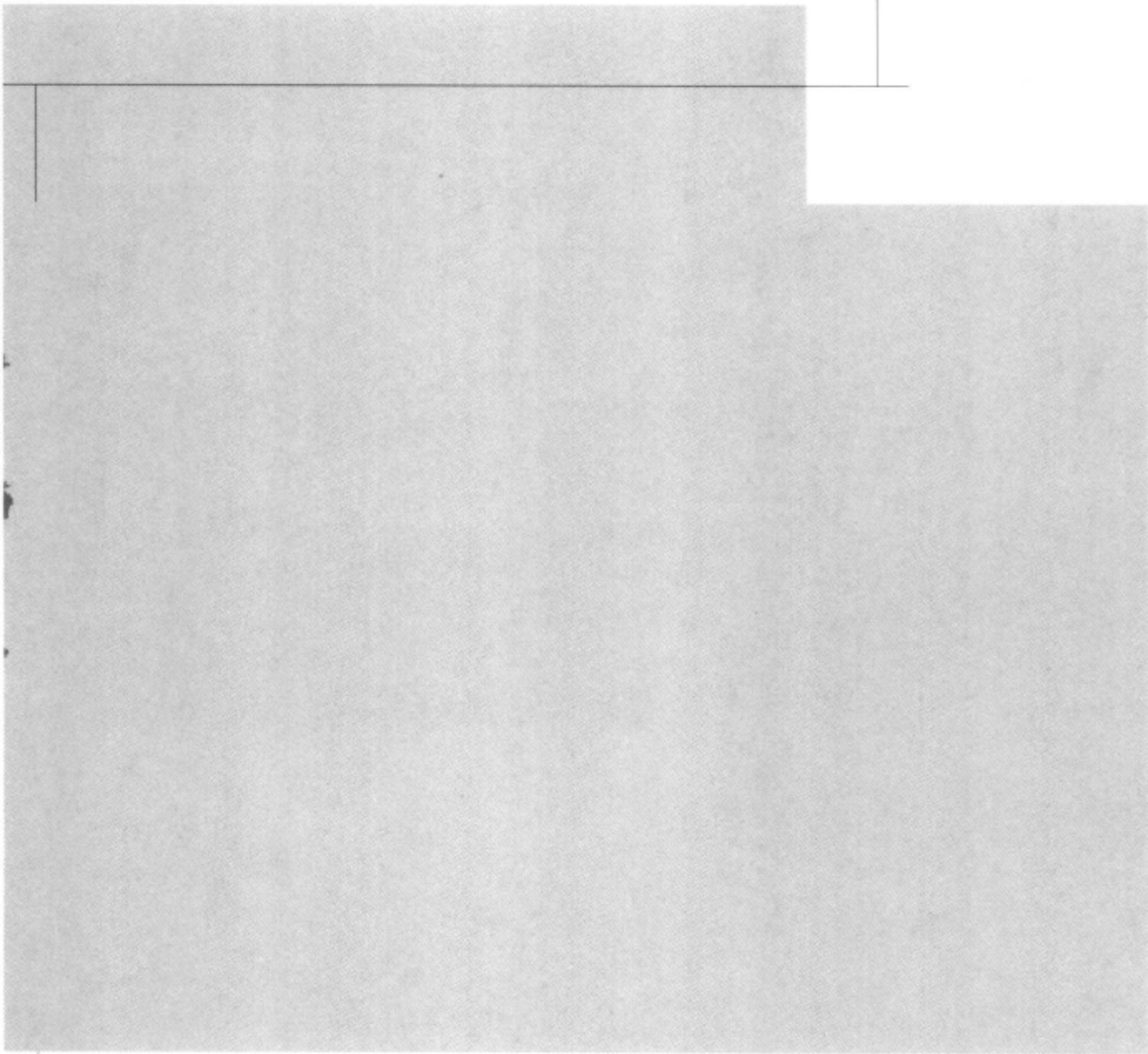
3 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是为配合1957年香港岛北的填海工程而建造的。原来公园内大部分的草地已被新建的设施，如球场、游泳池等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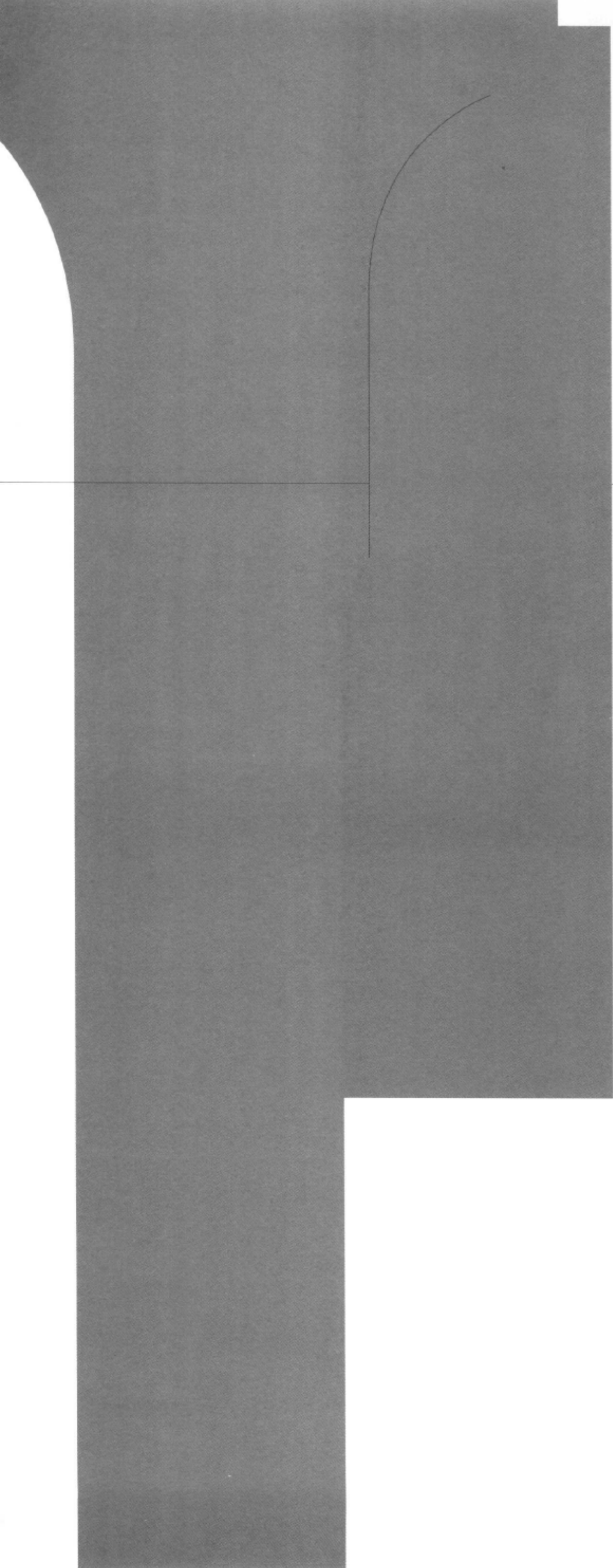
4 随着科技的发展，崭新的街道模式也随之出现，通往半山区的自动行人电梯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5 现今街道的功能，为适应城市的复杂化而改变。白天是一条普通街道的兰桂芳，在晚上则变成一个人群聚集的消遣场所。









上华人社会对西方传入的思想的抗拒，于是教堂设计亦变得中国化。铜锣湾的圣马利亚堂、湾仔的循道会香港堂（已拆卸重建）、窝打老道的圣德肋撒堂、香港仔的天主教圣神修院、九龙城的圣三一堂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抗战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最艰难的时期。由于人口激增、社会资源有限，无论在物质及精神生活上，皆极度贫乏，教会因而

担当了提供物质支援的社会服务角色。这时期既是教会办学的高峰期，也可说是教堂建筑的黑暗期。这并非表示期间没有教堂建成，而是由于土地缺乏，教会资源均集中于通过教育及社会服务传扬福音，故教堂多与学校相连，甚至置于其中。建筑设计以学校为主，教堂为副。风格上从早期的多姿多彩转趋平淡简朴，外貌有如一般校舍。

踏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蓬勃，

渐渐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事事讲求经济效益，许多具历史性的建筑物都难逃拆卸重建的厄运。政府有鉴于每周只用一天的教堂，未能符合地尽其用的原则，故不再拨地给单纯兴建教堂之用。从此香港的教堂建筑便结合社区设施，如社区中心、幼稚园，甚至住宅或办公室等商业元素，成为此期间教堂建筑的特色。随着社会的转变，教堂的功能从早期的超凡脱俗、中期的社会支援，演变为今天的开放友善，并与社会有更多方面的接触。

今日的教堂建筑，受到多方面的思想冲击，如教会使命、对礼仪要求的改变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 建筑风格的影响。因此，设计较重于演绎教会团体的聚集，及服务社会的角色，多于显示神的伟大及权威。细节也趋简约，重神似多于形似，重体验 (Impression) 多于表达 (Expression)。布局亦以团体感为主，不再为分辨阶级而设。故此座位的安排亦从过去的长方形单向排列，演变成半圆形围绕着圣坛排列，平面则较呈方形及扇形。建筑物的整体气氛更为亲民，从以往的神圣化，演变为人性化了。二〇〇二年始建的圣公会荆冕堂，便是一例。



教堂建筑

在城市空间漫步，偶尔会碰上一两

幢有别于一般的建筑物。它们纵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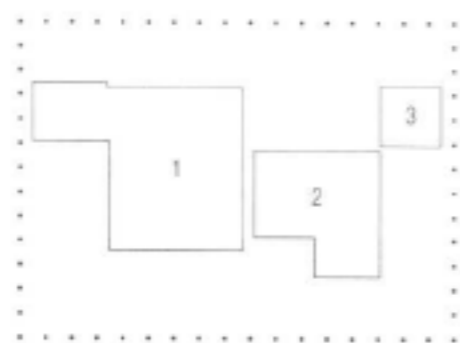
被旁边高耸入云的大厦比下去，却充满着标致漂亮的建筑元素：高高的柱子，尖尖的屋顶，秀丽的飞拱，窄长的窗户，装嵌着丰富图案的彩色玻璃，使人不禁肃然起敬。这都是「神的庙宇」(Temple of God) 教堂建筑的特色。

自古至今，建筑物的设计均受着功能、美学、技术及社会思想所影响。对比于一般建筑，教堂的设计更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民对神的国度及人神关系的演绎。在芸芸建筑群中，它标记着天国于俗世的临在，让建筑物加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据圣经所载，信徒聚集参与崇拜礼仪，是为纪念基督的牺牲和救赎工程。在功能上，教堂可以说是一个信徒聚会的空间。两千年来，信徒均在教堂内听道、领圣餐、祈祷及唱圣诗。因此建筑师往往需要营造一个庄严、真诚、和谐、宁静及平安的气氛，好让信徒能够体验神临于人群中的感觉。

香港开埠只有百多年历史，教堂的规模虽然不能与欧洲的大教堂相比，但仍不乏经典之作。香港早期的教堂建筑，主要受西方流派影响，设计上多仿照西方的建筑风格。像位于花园道的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以及坚道的天主教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便是早期建筑的代表者。这些传统的教堂，平面呈长方形或十字形，多沿用左右对称的设计，正门及圣坛分别在中轴线的两端，圣坛背后则设有十字架、彩色玻璃或壁画，信徒的坐席在中轴线左右两旁。圣坛与信众以栏杆分隔，神职人员及圣诗班均有特定的坐席，以突显阶级之别。外形方面，秉承歌特式或诺曼式风格，讲究比例及对称，装饰物亦非常丰富。

香港教堂的另一特色，就是中西合璧，这建筑风格尤其流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由于中国衍生了脱离自西方教廷的「三自教会」，主张自养、自治、自传，加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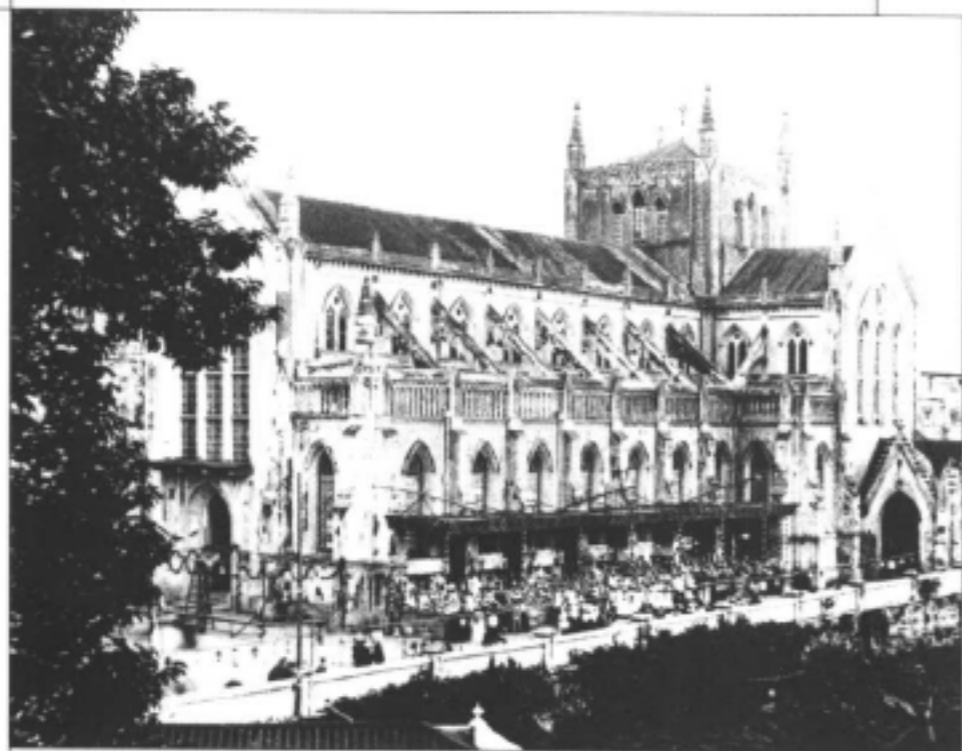
位于坚道的天主教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建成于1888年，是一座仿歌特式教堂，以麻石柱及石块建成。由于技术所限，手工不及正宗歌特式那么细致纤巧。教堂成十字形的平面布局，长63.06米，阔18.29米。主楼高21.34米，位于交叉部分的尖塔则高41.15米。祭坛设在中央的塔楼之下，以获取充足的天然光线。外墙上的飞拱壁(flying buttress)、尖顶窗及着色玻璃至今仍然保存。教堂外的前院是给信众作冥想及祈祷之用。前院的钟楼部分已被拆卸。

2

现址花园道的圣约翰座堂，建成于1884年，属“诺曼式”建筑。它的平面呈十字形，圣坛面向东，入口在西面，而建于入口处的塔楼矗立，从沿海地区均清晰可见。屋顶上的锯齿形围墙，富有歌德色彩的尖顶窗及绚丽的着色玻璃，皆是教堂的特色。

3

约1910年的坚尼地道佑宁堂，建于1891年，属意大利风格建筑，唯现已拆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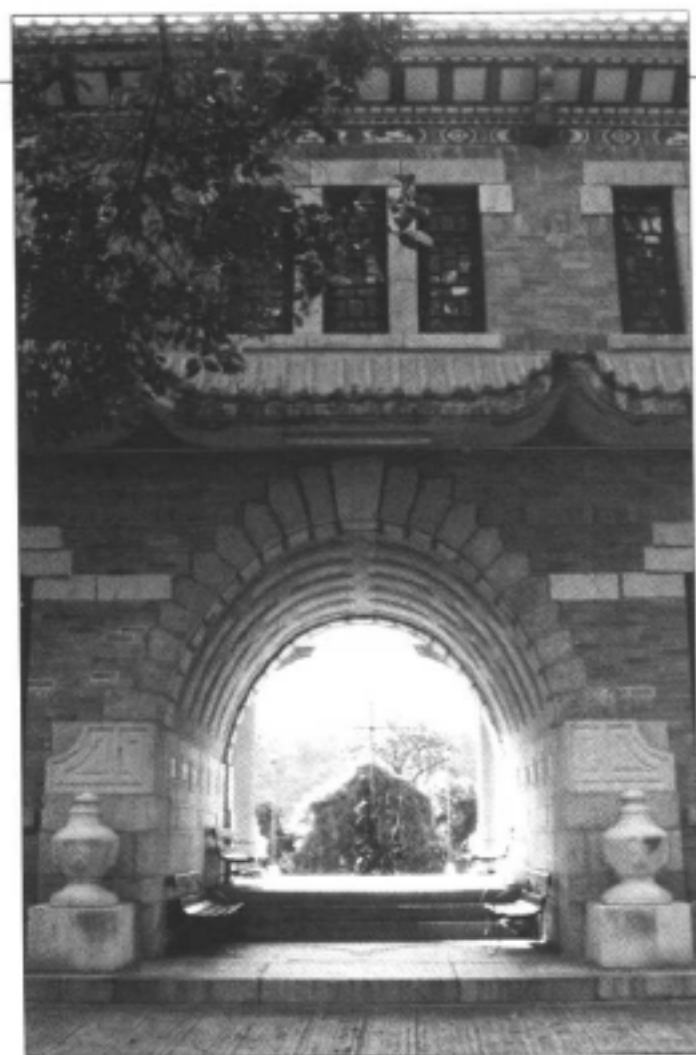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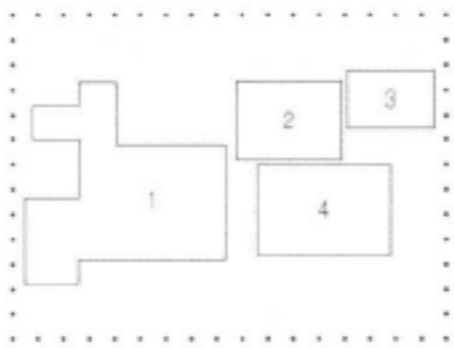
1

位于香港仔的天主教圣神修院，建于1930年，充满传统中国建筑元素，一层的屋檐恍似塔楼式建筑，最底层以麻石装饰，使台基部分更加稳固。

2

约1960年的循道会香港堂旧堂，于1936年建成。当时只有约5,000平方尺的三角形地段，令建筑设计难度大增。加上位于交通要塞，如何配合功能及外形设计成为建筑师的一大挑战。整座教堂以钢筋混凝土为结构，红砖作外墙。塔楼位于西面的尖端，顶部以中国式凉亭作钟楼，连同两旁所设的多个小阳台，均盖以翠绿的玻璃筒瓦屋檐，教堂建成后即成为湾仔区最引人注目的地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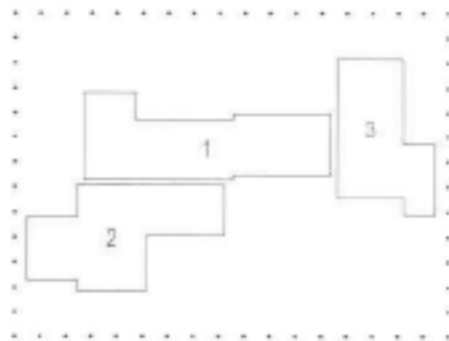
4

位于铜锣湾的圣马利亚堂，建于1936年。教堂以钢筋混凝土为结构，外形充满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雕栏玉砌，红墙绿瓦，斗拱雀替等。正门前一道梯阶置于中轴线上，有如古建筑的台基，使教堂更显宏伟肃穆。梯阶两旁均有单钩式栏杆，更添古雅气氛。正立面有七脊顶火山墙屋顶，正门及侧门亦有弯曲上扬的屋檐，盖以翠绿筒瓦。八角形的窗户，装嵌了中国式花窗，好不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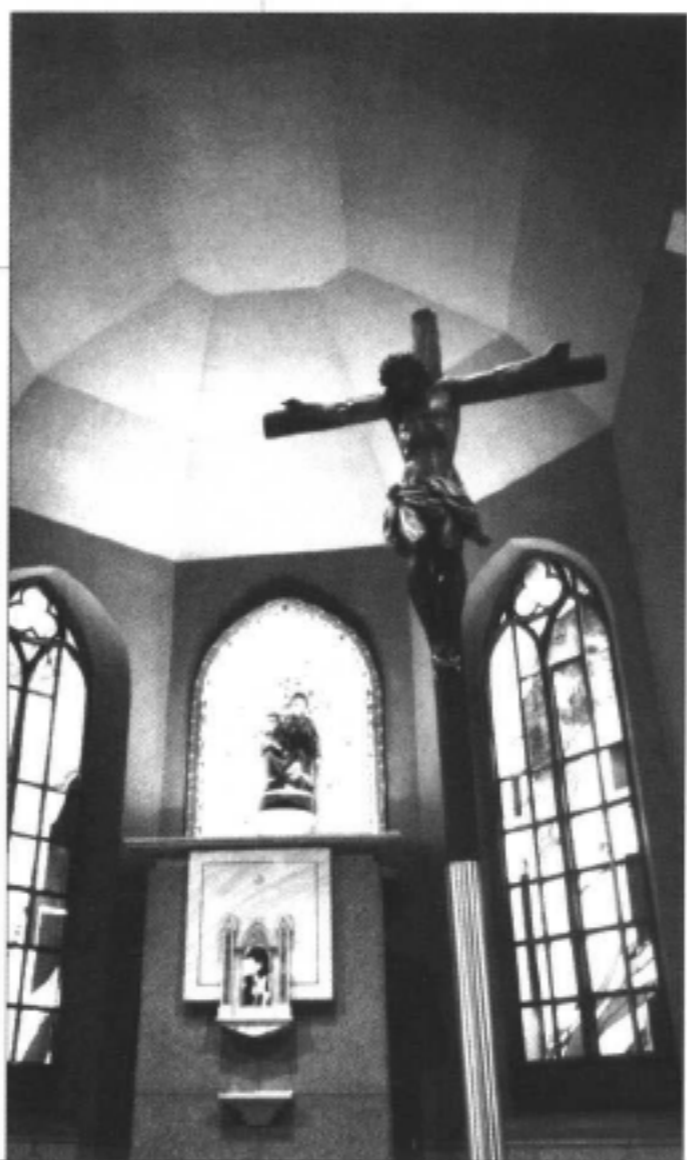
3

位于九龙城的圣三一堂，至今已有115年历史，而其建筑物则落成于1937年，从门楼到建筑主体都充满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如翠绿瓦顶，飞檐斗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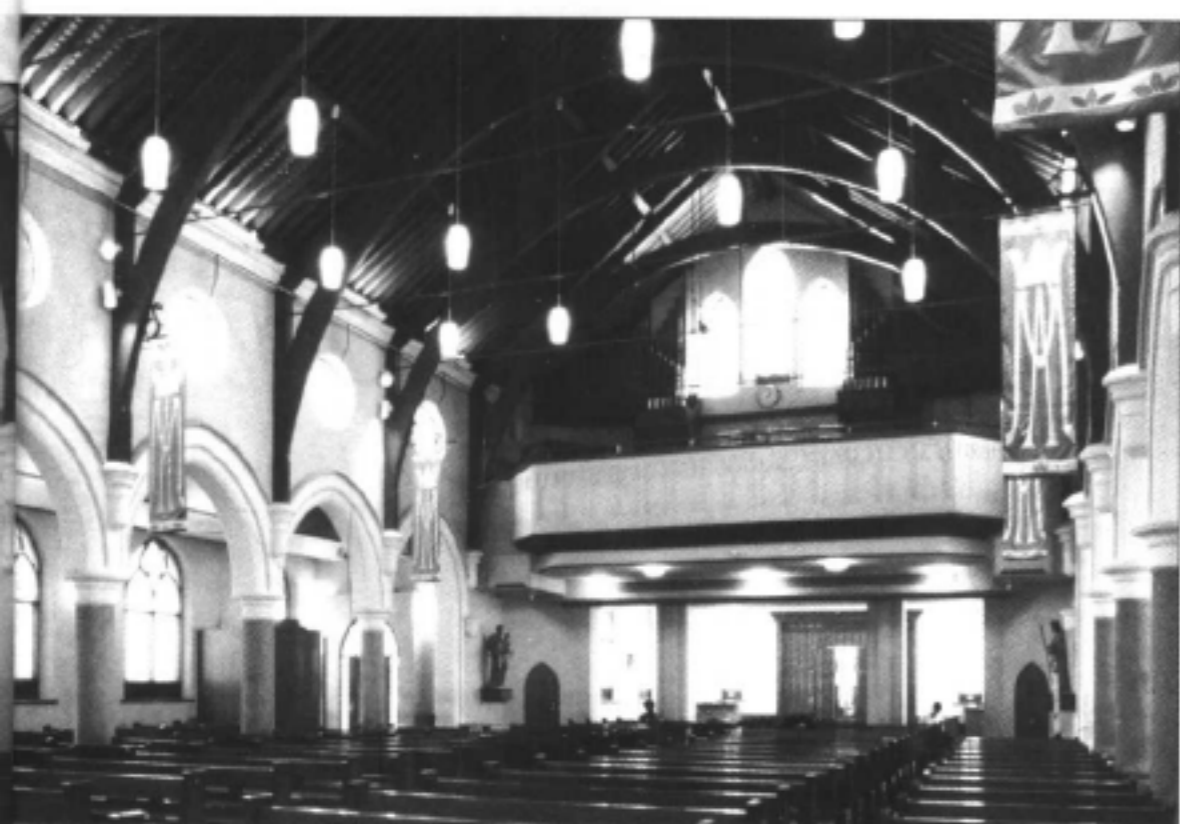


尖沙咀的玫瑰堂，于1905年落成。虽然体积不大，亦是仿歌特式的设计。以麻石柱及混凝土结构承托木制的屋顶。教堂于1990年重修，增添了现代色彩，当中的艺术着色玻璃以抽象的图案表达了基督救赎的圣迹。重修工程不但没有淡化歌特式的古典风格，尖顶窗户更被加建的木窗花以增强窗户的垂直感。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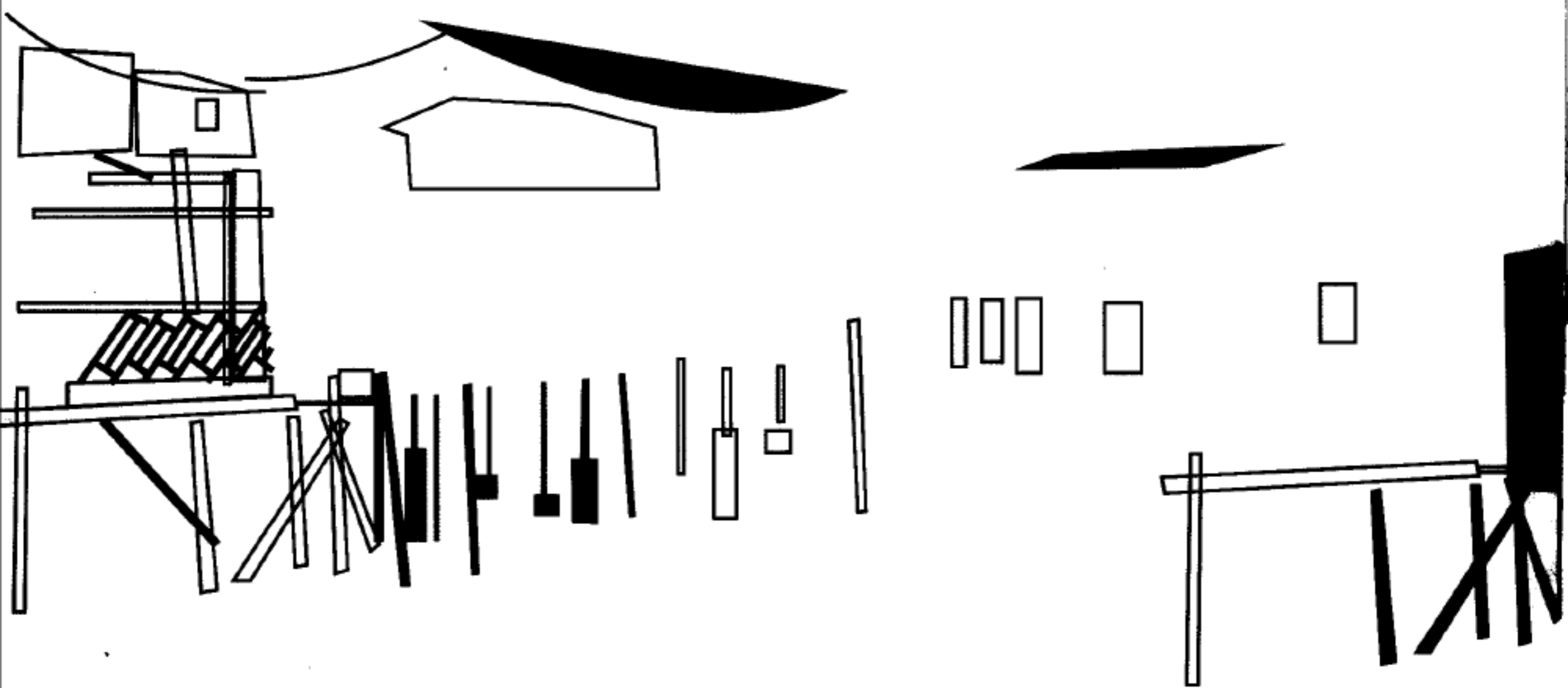
于2002年建成的圣公会荆冕堂，坐落于荃湾区闹市中。由于占地面积细小，建筑师把扇形的教堂设置于高层，以围绕在外墙的梯阶从地面入口连接至教堂。信众从繁嚣的闹市沿阶梯进入教堂的旅程，均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以展示于整个社区。在功能上一则可洗涤净化信众心灵，二则将信徒皈依神的进程传向社会。教堂内部采光尽量利用天然光线，光线通过天窗及着色玻璃窗进入教堂，以增添神圣及庄严的气氛。白色的小教堂更与周遭破落的旧区形成强烈的对比。



3

循道会湾仔香港堂于1998年完成拆卸及重建，它的演变足以见证香港教堂建筑及规划的历史进程。重建一座有60年历史而亦是湾仔区地标的教堂殊不容易。重建后的循道会香港堂大楼在同一的三角形细小地块上融合了教堂、宗教设施与商用办公室，20层高的大厦立在教堂上端。钟楼亦建于原处，外墙并用红色麻石铺砌，使人难以遗忘的红砖教堂于是重现湾仔。该设计既符合香港地尽其用的原则，又保存了教堂的庄重及教会在该区的历史任务。







存较破落的
棚屋区中窥
视一二。

战后，政府为水上居民发出登记牌照，使渔民子弟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而棚屋的形制及建造物料，亦随着时代演变，改为坡顶的最新造法，即是以申甸木为主干，或加建至两层高。

二〇〇〇年七月大澳棚屋发生大火，令位于沙仔面约九十户历史最悠久的棚屋群毁于一旦。为了恢复棚屋群的旧有面貌，规划署、香港建筑师学会，联同大澳居民，努力按原貌进行修建。同时，新一代棚屋样式，亦随之衍生。

虽然，棚屋这种建筑类型，并非以砖石堆砌的正统建筑，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棚屋代表了水生建筑的特质，依水而生，随潮水涨退而变化，蕴含了渔民的生活形态。在大小不一的木造框架下，上一代渔民的生活规律，包括捕鱼、作业、起居及社交等活动，都与棚屋的空间互相配合，息息相关。棚屋与棚屋之间，既可提供公共空间，又可保护个人隐私，是多变性和融合了私有及公众空间的生活场地。

这种真实反映大澳渔民生活状态的民间建筑，拥有非常活泼的生命力。更与水、陆两路，互通互连成为交通网络，结成棚屋群。这种既方便、复杂又特殊的交往空间及社区聚落，其丰富的场所感及生活味，是其他刻意设计的居住屋苑不能相比的。



郑炳鸿

水上建筑 大澳棚屋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大澳，位于香港离岛大屿山西侧，远离香港市区，是现今硕果仅存的水上原居民社群。而大澳的棚屋，亦甚具地方特色，反映了珠江三角洲沿海的水生民居形态，不但为水上居民提供生活空间，亦是这区早期渔乡的缩影。

棚屋是非常简单的木架结构，可按各户所需，自行调整大小及手法。今天大澳看见最古老的棚屋，已具有百多年历史，一般比较细小，造型与小艇舢板极为相似。根据大澳原居民陈述，二十世纪初，大澳渔民除了上岸补给作业所需之外，大部分时间均在船上。为了防避台风及便于守望相助，遂于河涌浅水处停泊舢板，并肩而排。

事实上，大澳的棚屋远至新石器时期已经存在，称为木栏式建筑，是濒海常见的建筑形制，今天许多东南亚国家仍可见到。

日子久了，渔民以船作屋，是为棚屋的雏形，造法简单直接。后来渐渐演变以花岗石条为桩基础，其上架以实木为骨干，半弧形屋顶以木条桁架支撑，外包具有隔热用途的葵叶再以镀锌铁皮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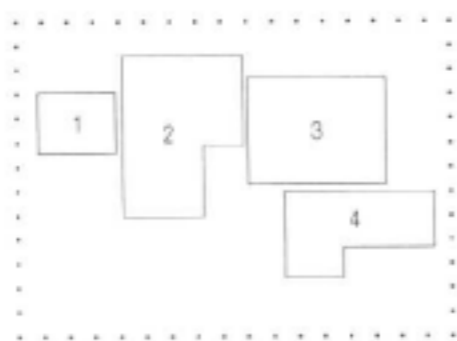
这种旧式的棚屋，还可从现



1910 – 1920's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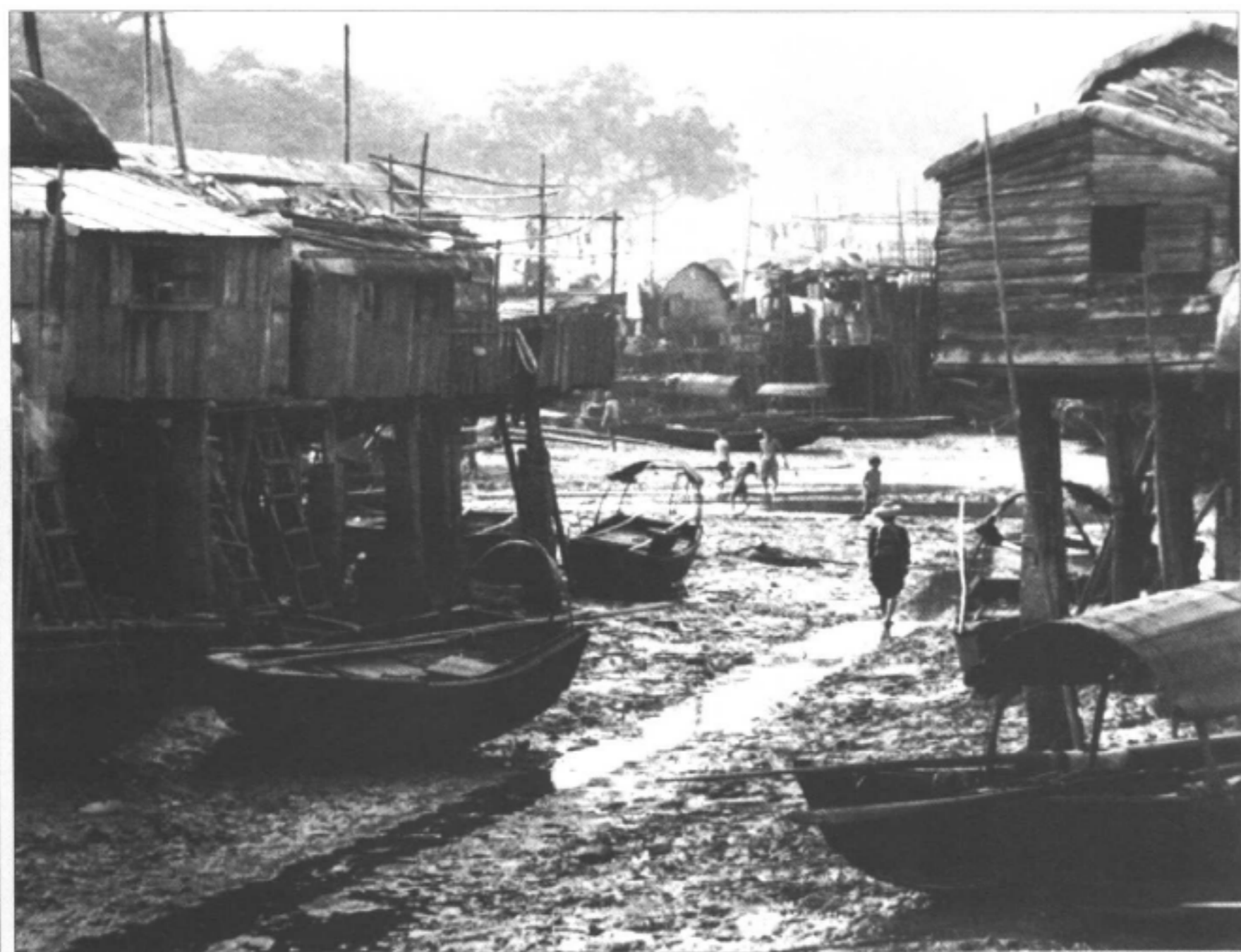
1 1937年大澳棚屋造型与舢板极为相似，而实际上居民亦必须乘搭舢板往返。

2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棚屋，图中可见连绵相接的棚屋群早已形成，渔民与陆上居民当年有明显的生活分区及高低不等的社会地位。

3 摄影家陈迹拍摄的大澳早期的照片，记录了水退时的河冲。大澳聚落的称谓，亦多以“冲”为名，如一冲、二冲、三冲等。

4 2000年7月的大火后，沙仔面一带的棚屋毁于一旦，满目疮痍。

195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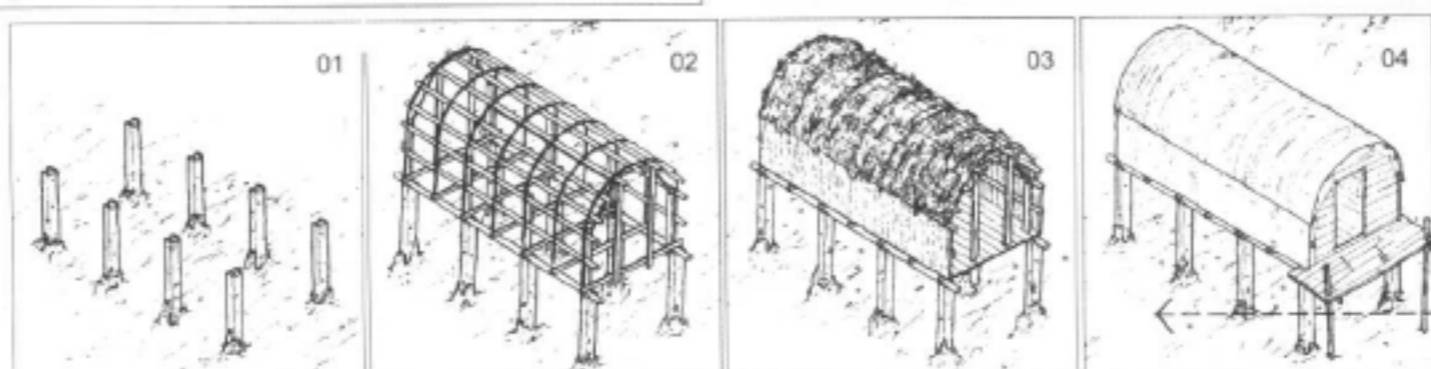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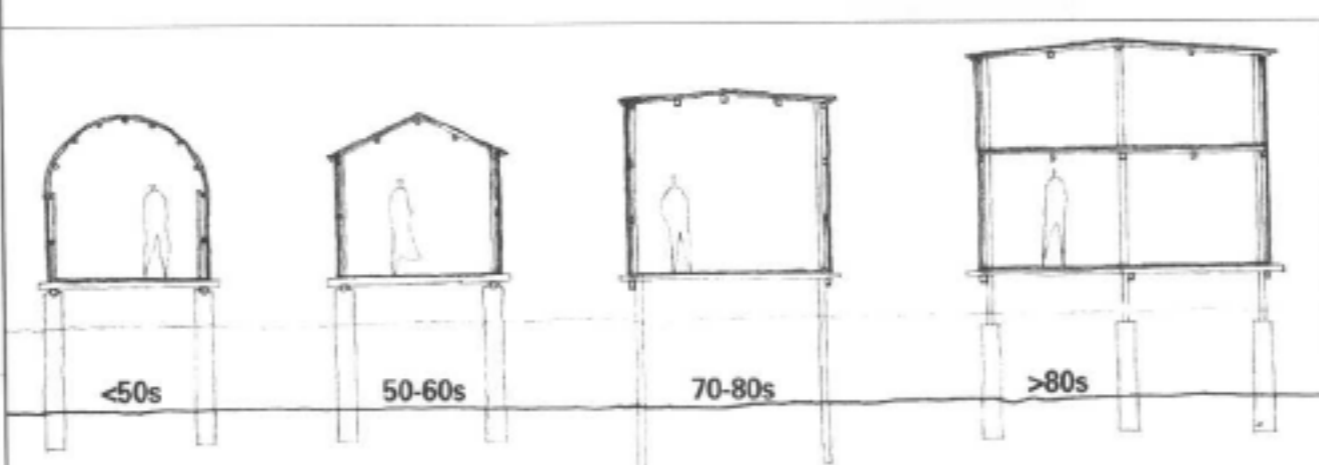
2000



1950's



1980's



195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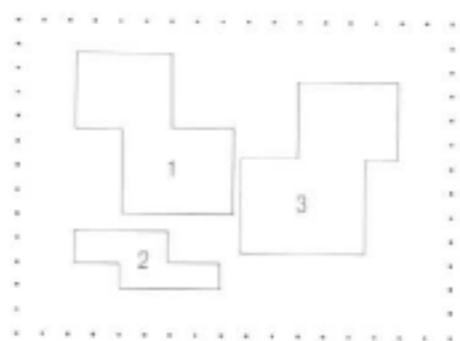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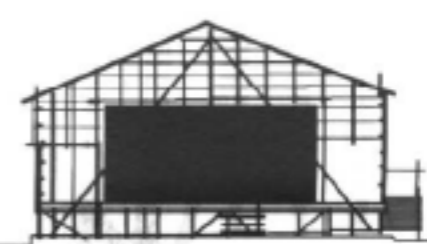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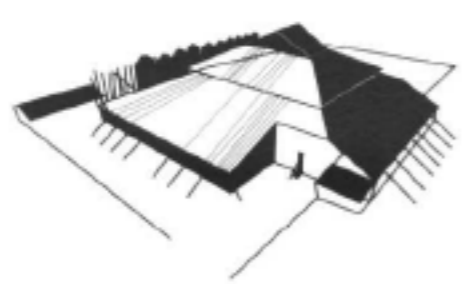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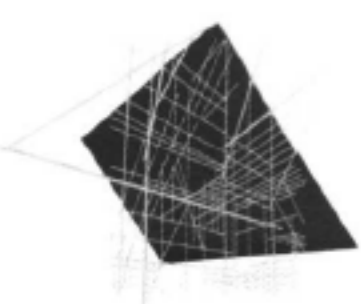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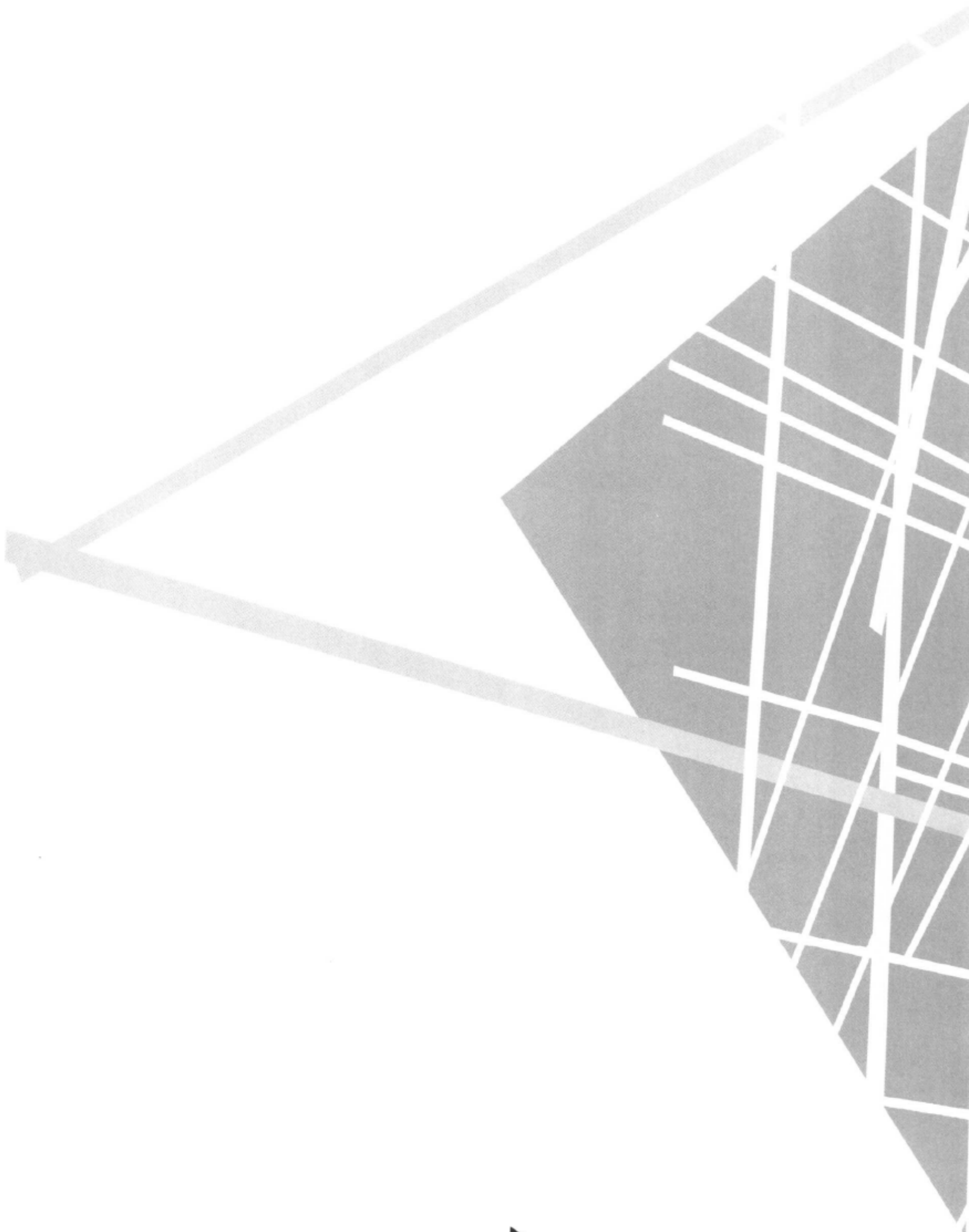
198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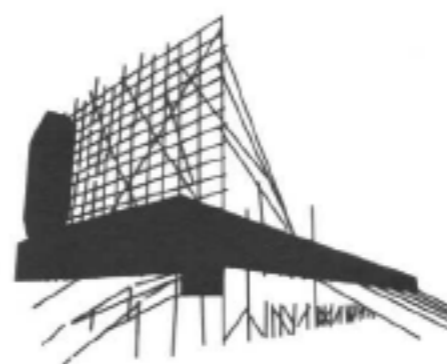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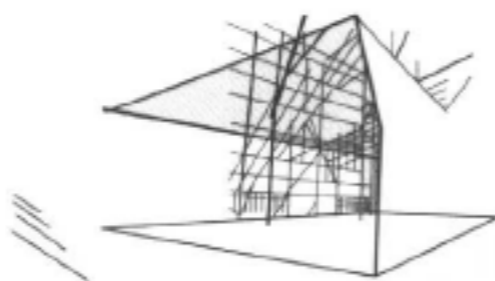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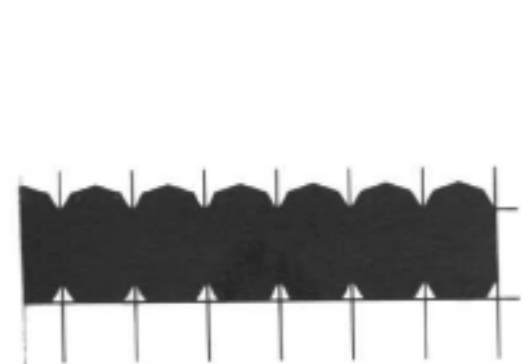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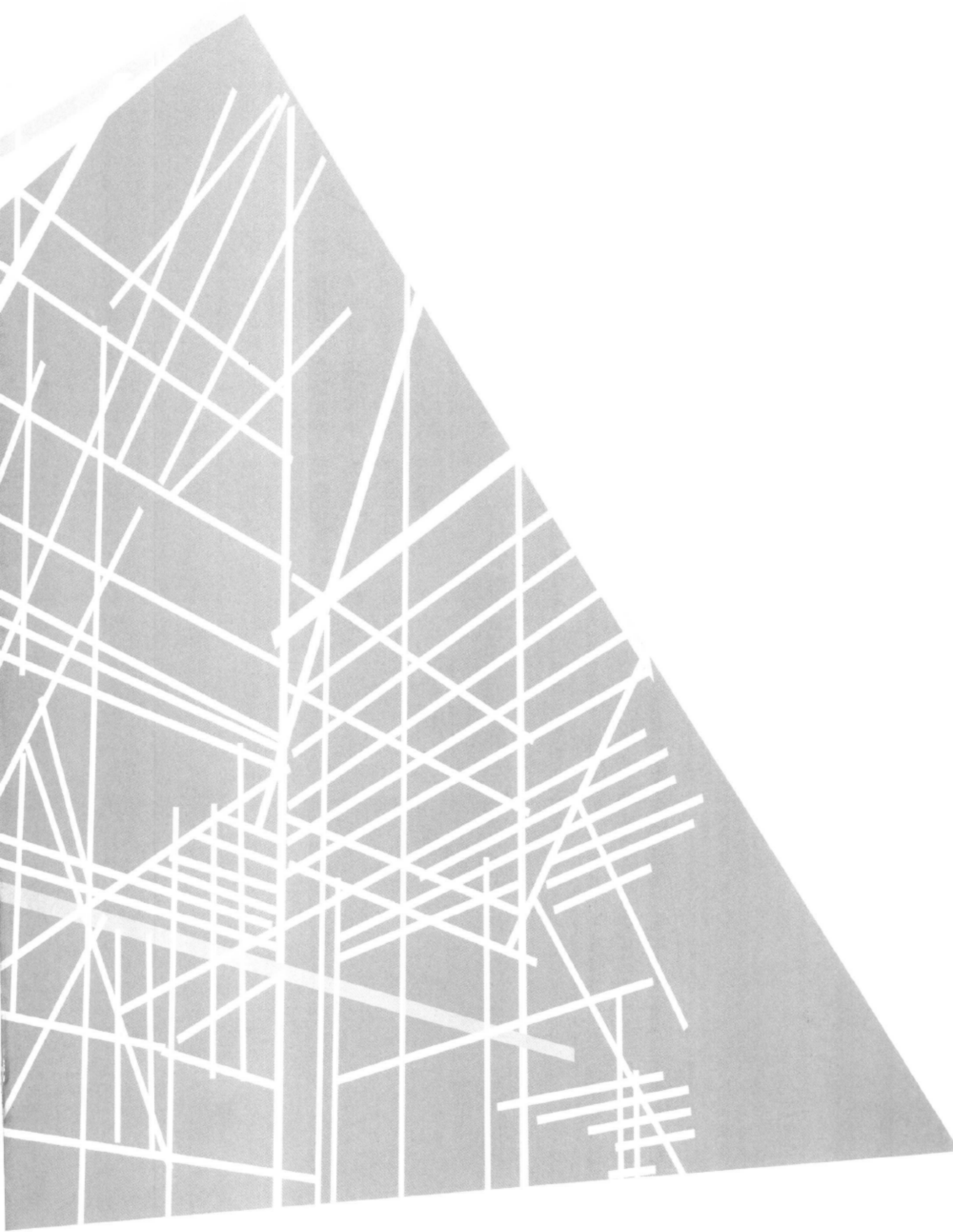
1 陈迹先生分别于20世纪50及80年代拍摄的大澳棚屋聚落。下图可见连接不同河冲聚落的新基桥已建成。此外，棚屋造型略有变化，但原本平静和谐的环境，基本上仍然保存下来。

2 图为根据大澳居民描述，重构棚屋的建造及演化过程。

3 20世纪50及80年代的大澳，下图可见在原有盐田上搭建的多层建筑，与小巧有机的棚屋聚落对比，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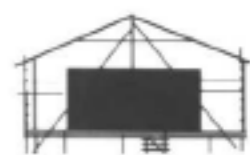


竹棚的大小不一，主要按现场环境及观众人数而定，其中尤为精巧的，要算是蒲台岛及山道天桥搭的戏棚，它们巧妙地依山势拾级而建，充分发挥了竹棚建筑灵活性。

竹棚戏台的盖建看似简陋，但当中考虑的结构及功能分布，都非常合理，如竹竿间之距离约三尺，均以人体肩膀与坐股间的距离为准。而竹棚坐向与戏台布局，皆面对庙中神位视线，与中轴连成直线，代表戏曲表演以娱神为主，娱人为辅。

世代相传的竹棚师傅，手势熟练，竹竿到了他们手里，像有了生命似的。他们根据戏棚的长阔高度，打好腹稿，正是「胸有成竹」。程序是先竖主竿，再立支撑，待总体框架确立后，再配桁架，外盖铁皮。就这样，一般能容纳三百人的戏棚，均可于一星期内建成，其形态多以纵向的主轴为屋脊架起，行内称「龙船脊」；而较大型的可容纳五百至一千位观众的戏棚，为解决结构要求及突出其高度，多采用横向屋脊的形式，称「大金钟」。

此外，也有建筑师利用竹竿轻、有弹性以及被中国人视为高逸、刚直象征等特性，营造一些独特的空间，把建筑物本身提升到艺术创作的层次。二〇〇〇年代表香港到柏林参展、由严迅奇设计的竹亭（临时剧场），便是一个好例子。



临时建筑

竹棚、戏台

郑炳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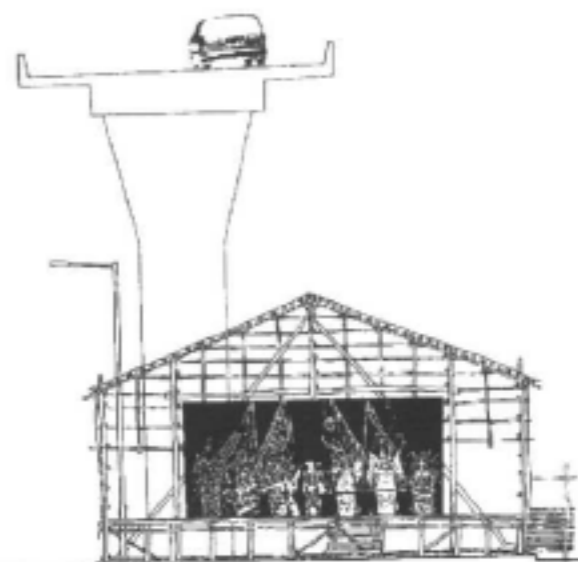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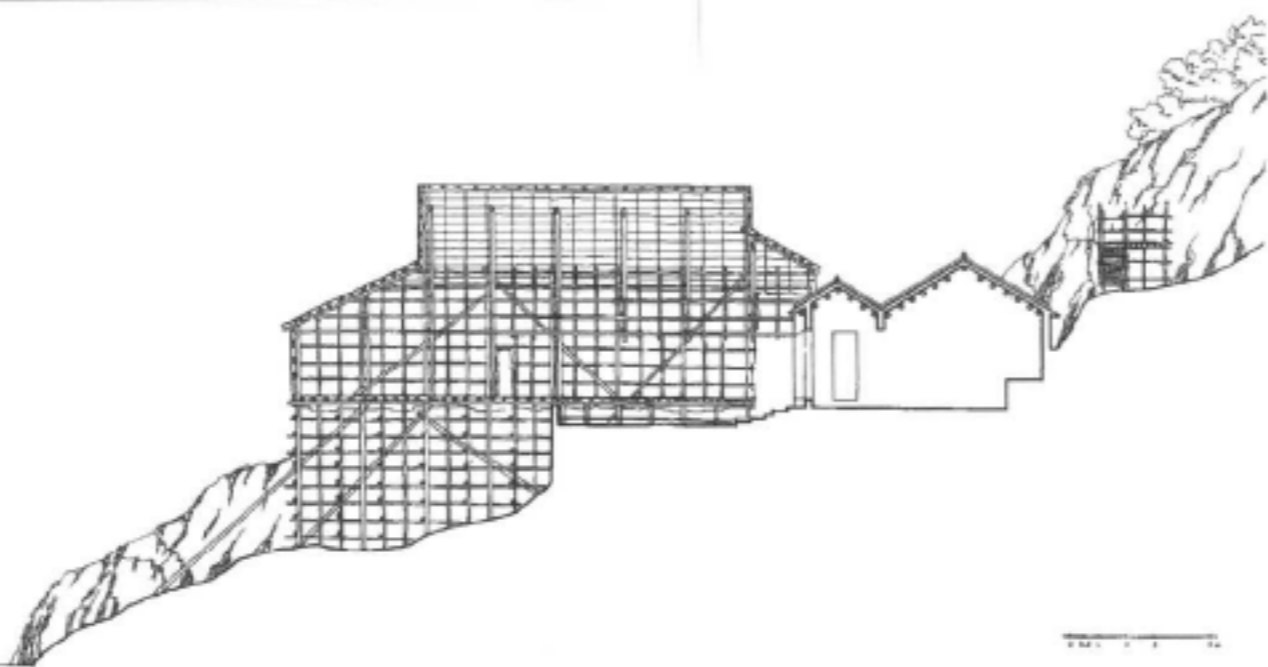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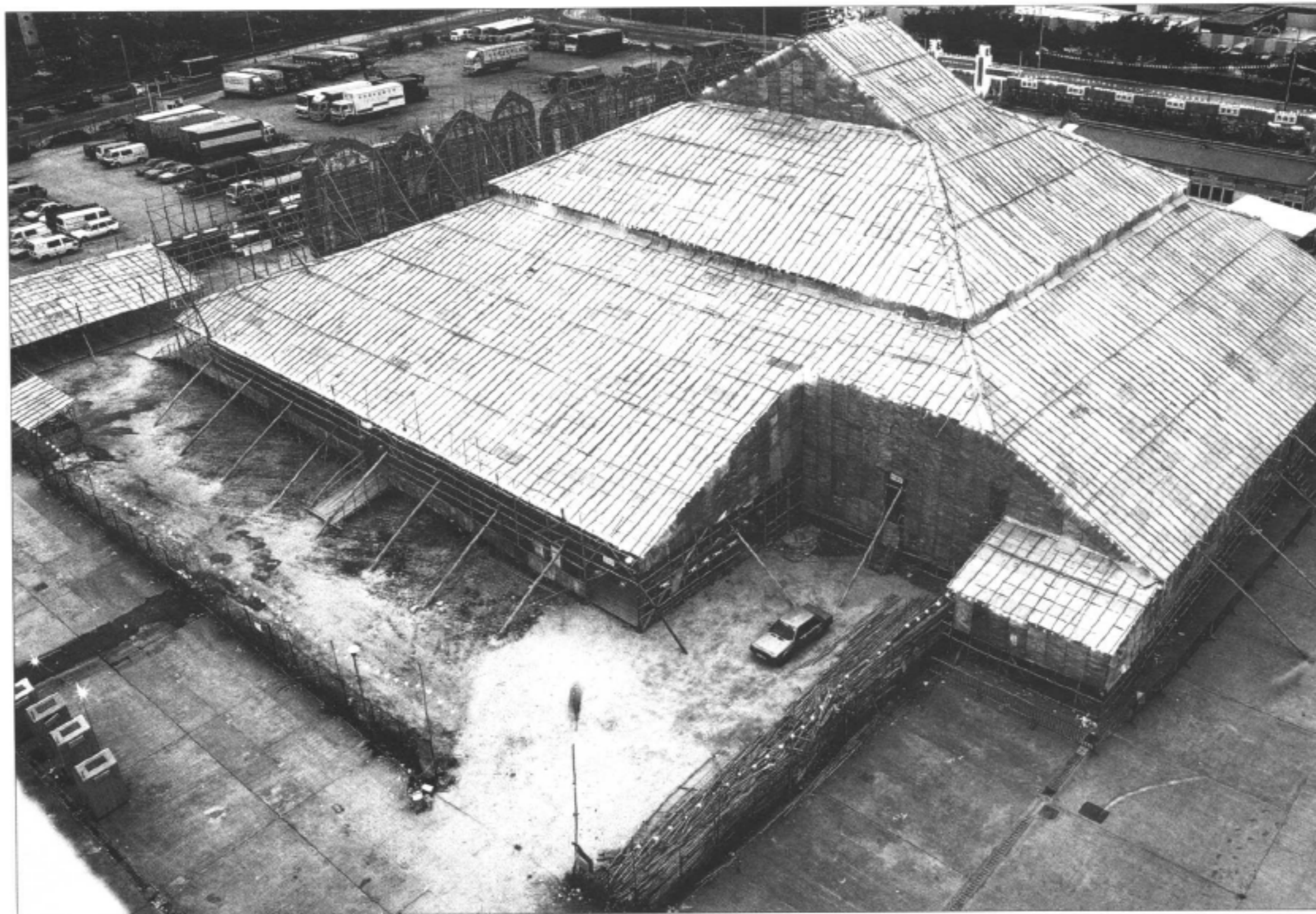
香港既是现代化的「玻璃之城」，亦是草根竹木所盖建的一座双面城市。外国游人到访，对城中的摩天大厦，惊叹不已，更对在半空搭建中的临时竹棚啧啧称奇。而对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这种临时建筑形态却似是司空见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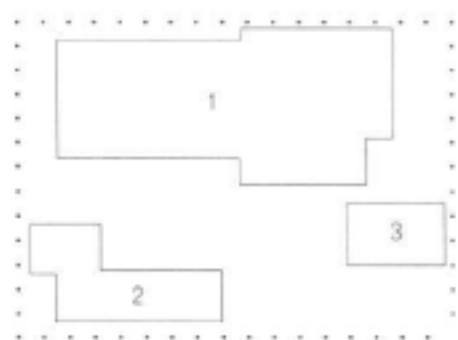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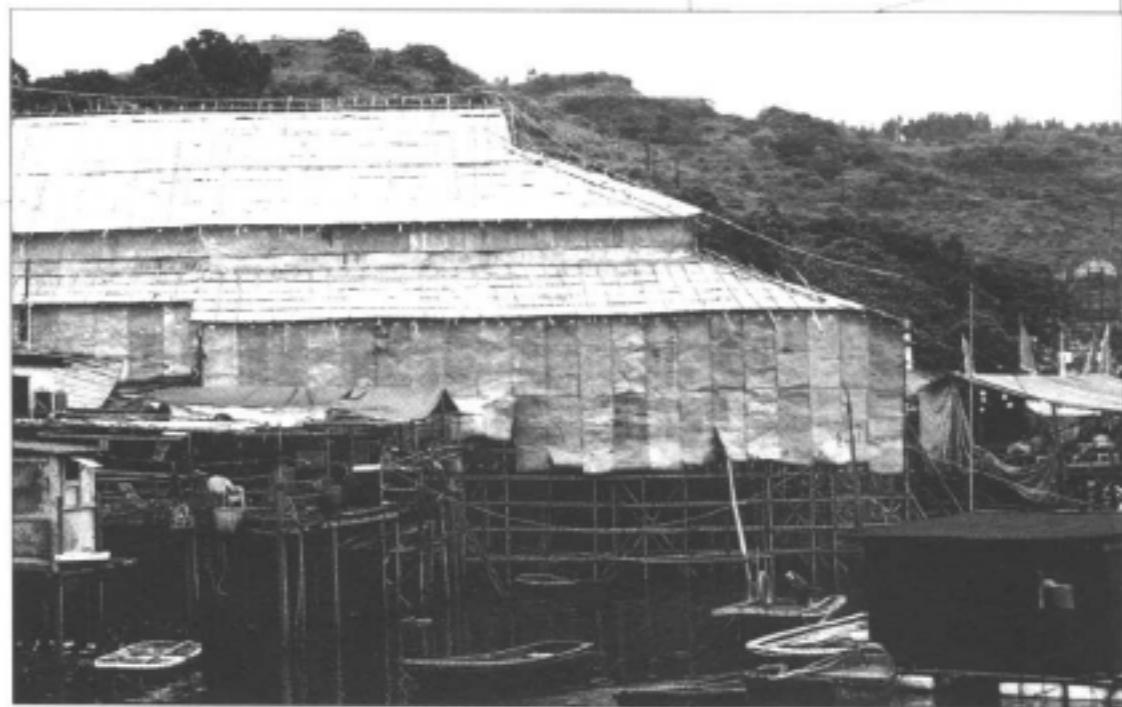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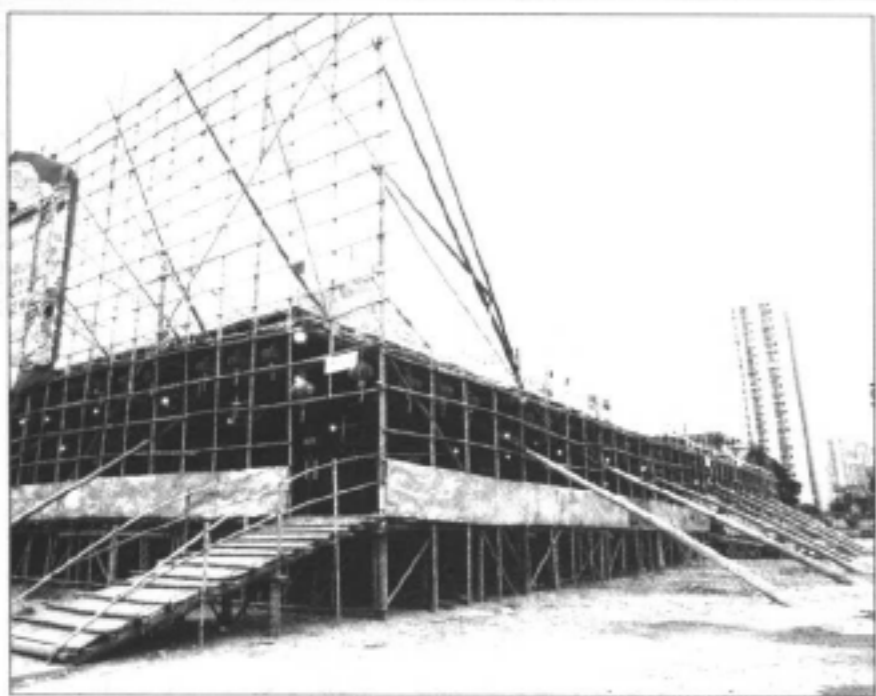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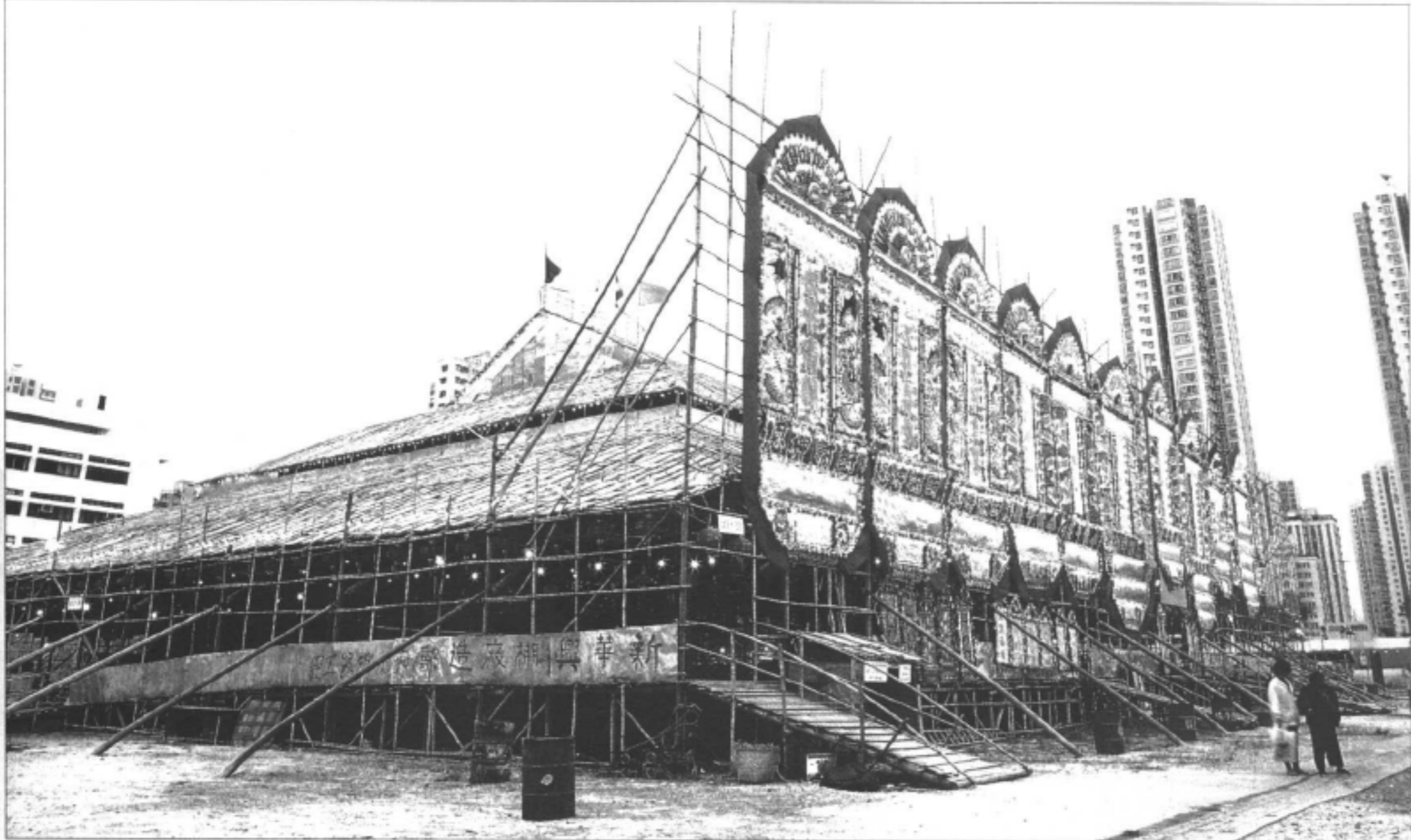
「竹，中空有节，遇风而不屈，君子也！」对竹的赞颂，古往今来，皆有之。

除了文人雅士的赏味外，竹在实际用途上，也是数不胜数，尤以在建筑营造上的应用，由来已久。远自汉朝墓碑的雕刻中，我们便看到当时已经利用竹枝架起「棚阁」（即现称工程棚架）作建筑施工之用。时至今日，不论是简单的外墙装饰，抑或是数十层高的建筑施工，仍是大派用场。此外，早期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游走乡间的戏班所建的临时戏棚，都是以竹竿搭建，并盖以茅草。

在香港，每年在天后宝诞前后，水上人家按照传统搭棚演戏，以酬谢神恩。而香港潮籍人士，则喜于盂兰节时分，在市区内设坛献祭，公演神功戏，以饗鬼神。

现在社会情况改变，竹造戏棚亦随自身及环境而变化，在香港地少人多的都市环境，虽然多有掣肘，但其活泼的状态，却不惜于狭窄的城市空间，反而更能表现出这种传统工艺的适应力及生命力。为了善用城市空间，多数的竹搭戏棚，均于球场或大厦间的城市空隙中，寻找表演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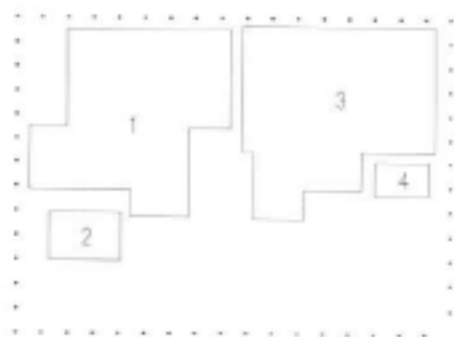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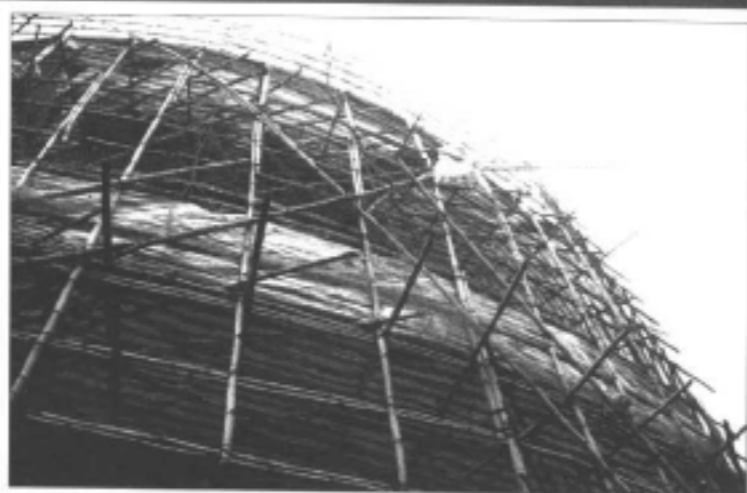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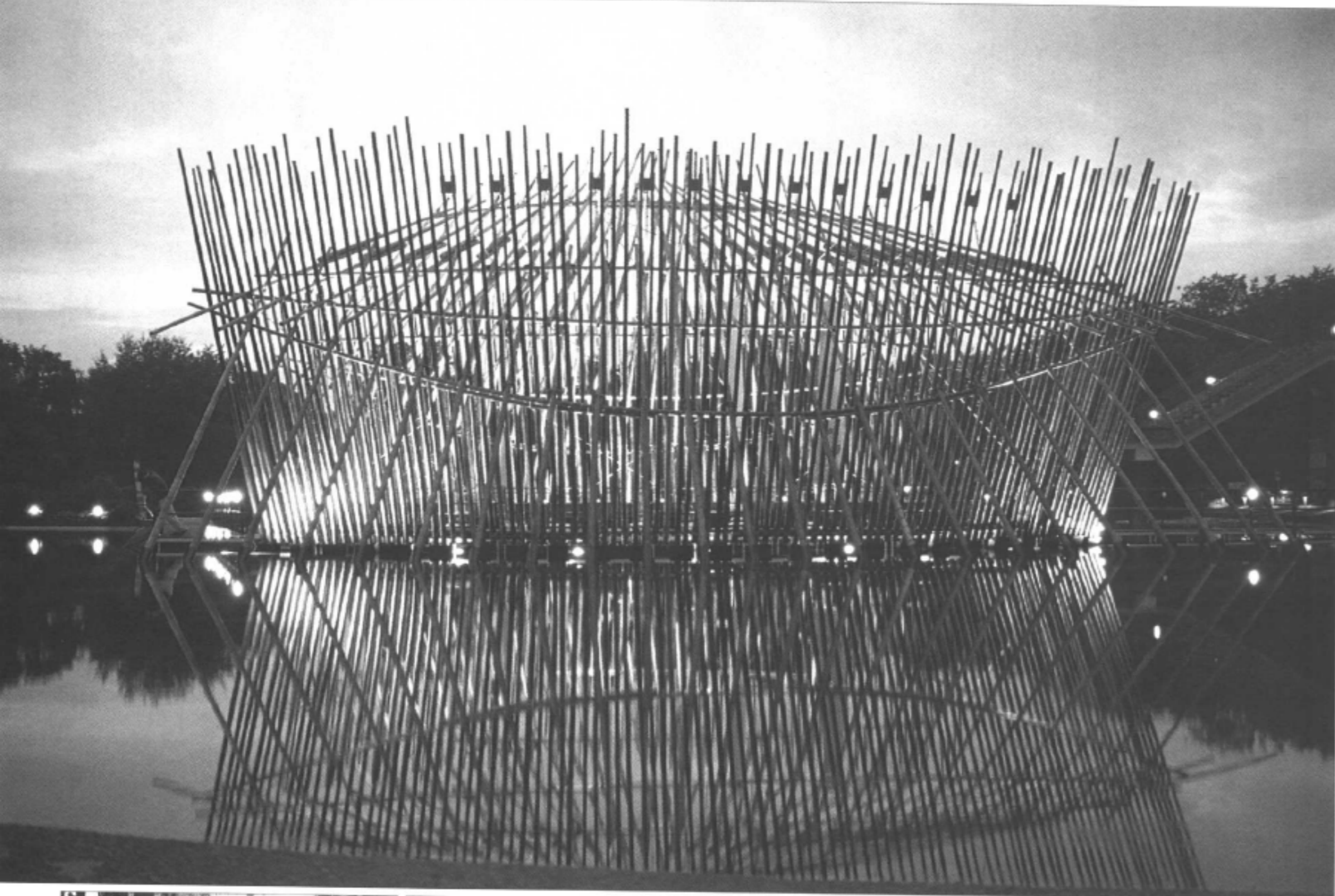


1 为配合十年一次的打醮庆典，建于元朗的“大金钟”形戏棚，可容纳3000观众。

2 搭建于蒲台岛及山道的戏棚，均巧妙地利用山势拾级而建，表现了竹棚的灵活及可塑性。

3 布袋澳戏棚建于半地半水岸边，一为扩大可用地面，二为方便舢板停泊，承传了中国南方沿海聚落的古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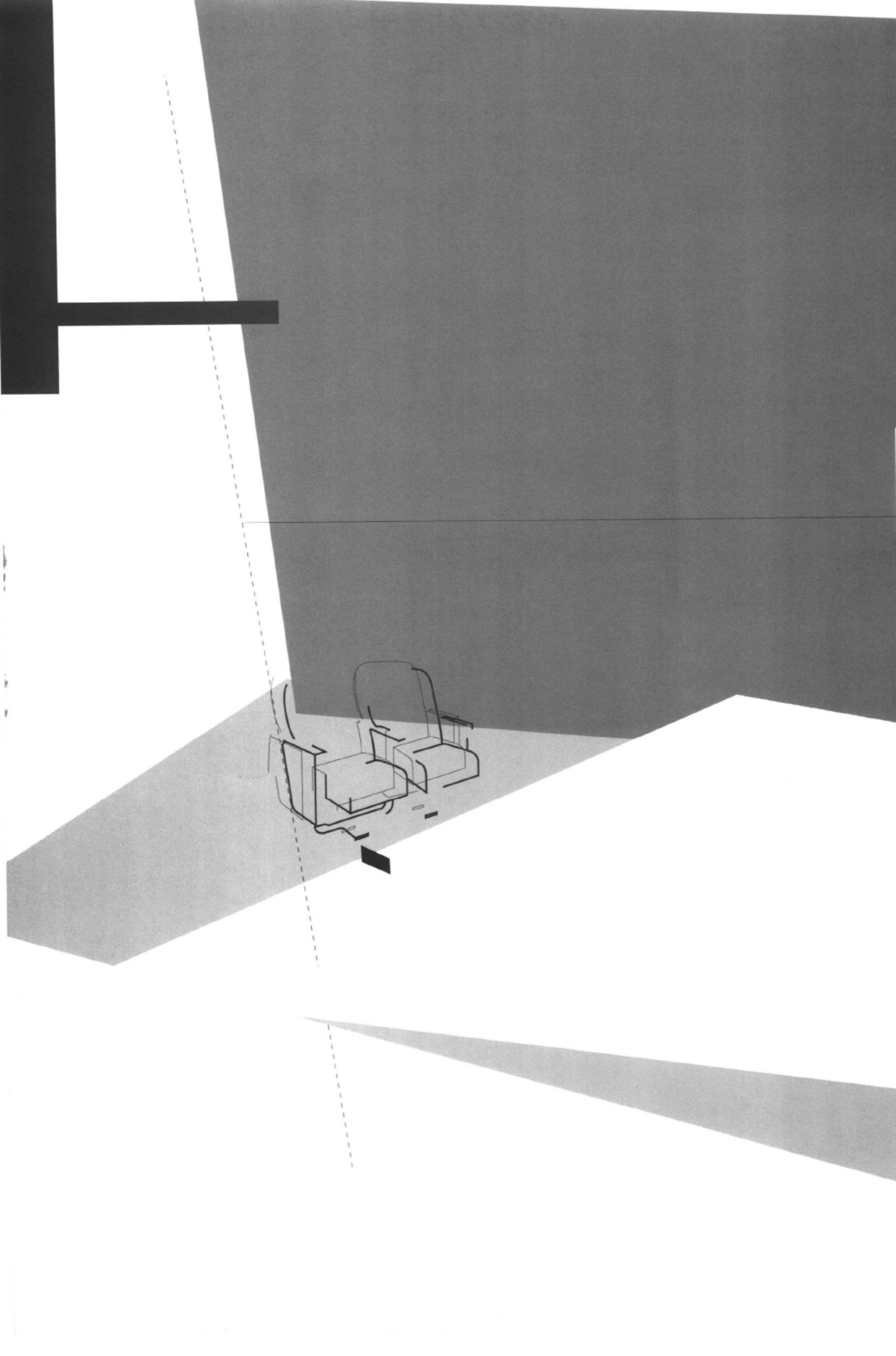


1 有盖的公众戏棚是香港独有的造法，亦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罕见的大跨度公众空间。

2 竹搭戏棚为吸引及方便观众，均不设围帐，是名副其实的公共表演艺术场所。

3 竹棚的现代应用，包括外墙维护、高空棚架及艺术舞台。

4 竹枝的立体结扎工艺既简单又合理。经竹棚师傅用竹篾（现在改用塑胶）束缚后，均非常坚固。



不日上映

迷人的都会空间 ——电影院

黎东耀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一般（尤其低下层）香港人心中，“看电影”是一项隆而重之的活动。到“龙头戏院”看卖座片当然要亲身在街上“打蛇饼”排队买票，如此已使这活动变得矜贵。然后，无论是一家大小，或情侣约会，皆盛装出席，而且极少迟到，反会提早到戏院外的街头小贩卖买蔗、蒸花生，或到大堂买饮品、爆谷等食物，再到豪华而宽敞的大堂，挤上数十分钟等候，看着大堂大钟逐秒移动，热切期待。

终于要开场了，票务员拉开绳栏，逐一撕掉观众手上的票根后，观众鱼贯入场，顺着大楼梯拾级而上，再穿过楼上大堂，最后才进入漆黑的空间。就是这样，看电影简直就像朝圣般，先要经过一道道仪式。此情此景，昔日在专门放映港产片的丽声、总统戏院，放映西片的碧丽宫、海运、利舞台等，时有出现，但现在只能偶尔在新光戏院粤剧演出时方能得见。

当年的戏院基本上全是单幢建筑，入口对街，每间戏院只有一间大影厅 (Auditorium)，较豪华者如分别于1904及1928年落成的太平及高升戏院更设有厢房、梳化床、椅位及板位等，其余则多数分前座、后座及超等，或分成堂座及楼座，只是这类戏院至今已所剩无几，且通常只可在发展速度不快的旧区中觅得，如五十年代开业的红磡宝石戏院。

1962年落成的新声戏院，为早期“混合式”发展的例子，戏院旁建有10层酒店及商场；而1965年落成的娱乐戏院重建项目，则混合于19层商厦及商场之中。此后落成的戏院，多以类似混合模式发展。九十年代新建或改建的戏院，再从一个映室 (House) 增至多个映室，部分更老实地自称

“迷你戏院”，八十年代落成的旺角百老汇戏院是最早期出现的“迷你先驱”之一。因为空间狭小，基本上已没有任何楼座或超等之设。

戏院建筑另一个趋势是，它们与街道这种公共空间的沟通越见减弱。首先，单幢低层的戏院建筑已几近绝迹，因此不能用建筑物本身建立市民对戏院的视觉印象。其次，作为建立观众心中对戏院的空间印象，以及看电影的前奏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过渡空间——戏院大堂，多不复见。今天许多新戏院虽仍设迷你“大堂”，但纯为分流进入不同迷你映室的人流而设，如湾仔影艺戏院大堂内的元素，包括售票处、电影海报、剧照及影评，甚至负责“验票”的票务员，皆直接面向街道，而“验票”与进入映室之间的“大堂”只是一条比一般走廊阔一点的通道空间而已。

此外，戏院入口亦由传统的临街形式变成位于商场上层，完全失去与



街道的接触，藏身于旺角新世纪广场深处的GH旺角戏院便属此例。为了争取与街道接触而在地面设有最低限度面积的售票处，观众便需经升降机分批上至离地数层、甚至10层高的映室，如铜锣湾重建后的利舞台戏院。结果离场时可能需要走百多级楼梯至天旋地转。说来奇怪，现今新戏院入场时不提供正式的过渡空间，却在散场时给观众过度的过渡空间，此现象亦为香港特有。

香港戏院的演变，也许是港人生活及思想的反映。在这高速多变的社会，一切皆以直截了当、灵活变化为目标。仪式作为达致某种象征意义的间接途径，其所耗时间恐怕是大部分分秒必争的港人所负担不起的。而且仪式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固

定的习俗来维持的，因此在瞬息万变的香港都市，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这一秒某仪式达致某象征意义的功能，在下一秒已失去作用，甚至背后象征意义亦变得无关紧要。

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旺角百老汇戏院，亦率先摧毁戏院的隆重仪式的空间传统，一方面其因应香港高密度特性而采用的垂直或多映室迷你戏院形式，可谓是至今戏院主流形式的先行者；另一方面它的“后巷式”售票等候“大堂”，以及通往各层映室的封闭式扶手电梯间，使香港这垂直都市在住宅、办公室，乃至工厂之后再加添一类多层综合性大厦类型。但随着其他更多非正式化戏院的陆续出现，这“后巷式大堂”已不如初面世时那样突兀及使人不安，换个角度看，反而可被视为香港都市混沌/混乱美学的一种表现。

其实现在于香港看电影，“戏院”已非唯一选择。香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及各区大会堂，已成为经典/另类电影播放的主要场地，而且与日渐没落的商业戏院形成此消彼长之势。也许当我们放下对

旧式戏院感性上的偏爱，目前主流戏院的建筑空间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许在这高速发展的都市，戏院空间会以更多无法预计的新形式出现，亦未可料。



1925年开幕、20世纪80年代末被拆卸重建的利舞台，曾以乔治亚风格的独立式建筑建立了市民对戏院的视觉印象，并成为铜锣湾当年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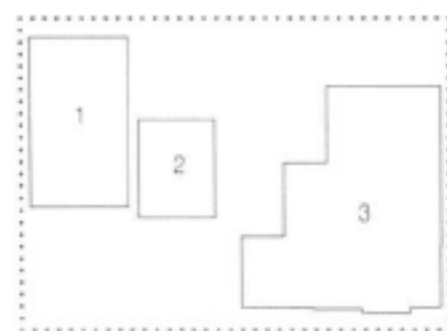


1953年落成，位于尖沙咀弥敦道与金巴利道交界的乐宫戏院(后拆卸改建成美丽华酒店)，建筑师为巴马丹拿 (Palmer & Turner)，其富巴洛克式流线型的大堂，设有喷泉水池，如今已难以在其他戏院中找到。

2

20世纪70年代落成的新光戏院，使人重拾旧式戏院由街道、大堂、楼梯至映室之间一连串前奏仪式的集体记忆，也是最后一座仍有戏曲表演之戏院。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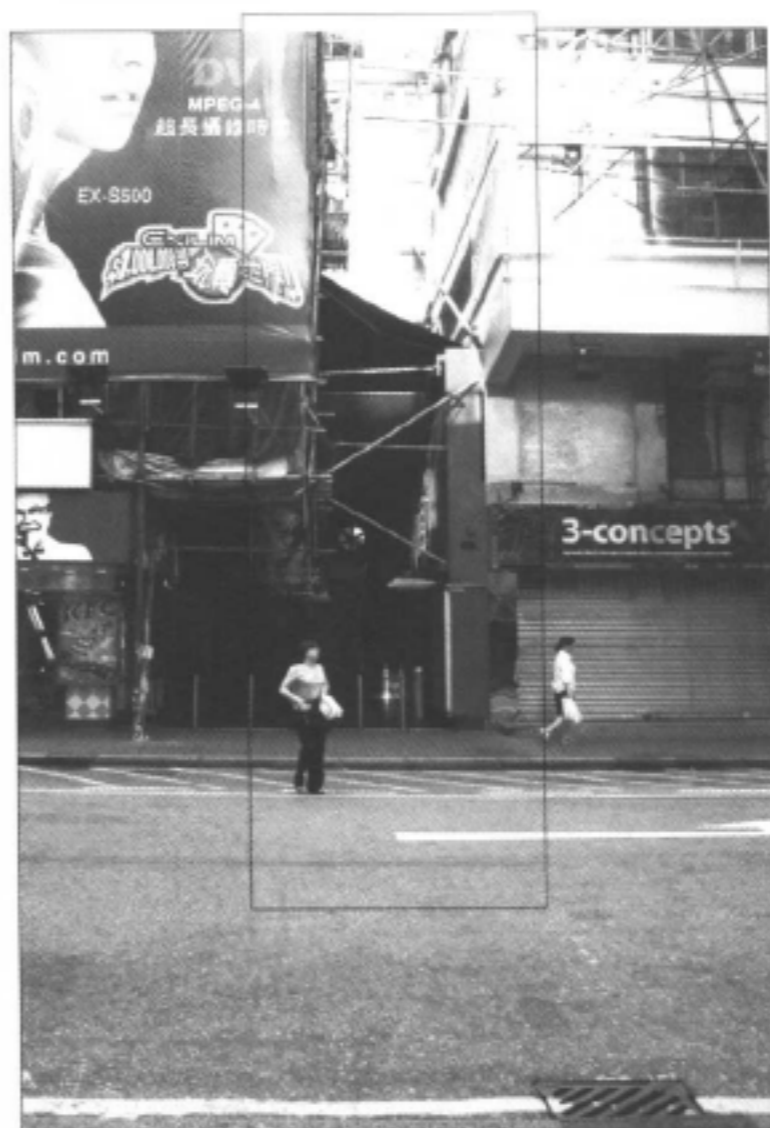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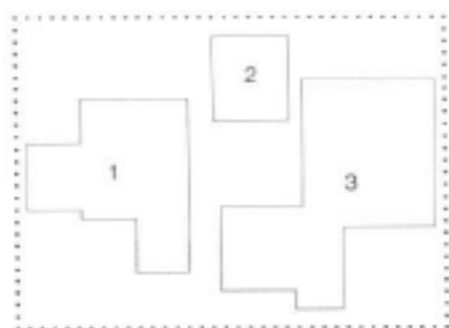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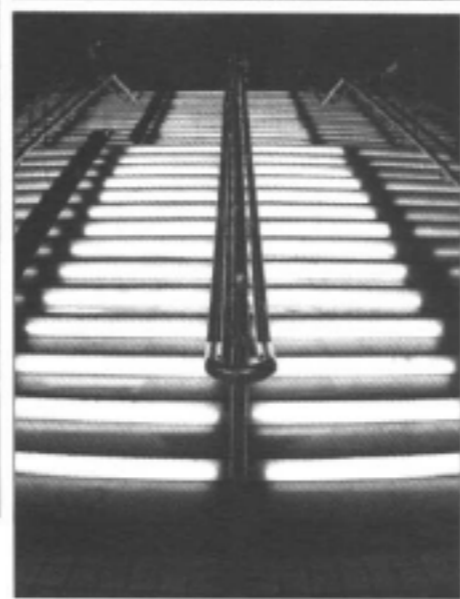


旺角百老汇戏院的“后巷式”售票等候大堂，在20世纪90年代翻新后，加上大型鲜红色胶布饰面，配以灯光效果，是香港都市混沌/混乱美学的一种表现，也成为旺角街道一个既融洽、又突出的地标。

2003年开幕的铜锣湾总统戏院，由AGC设计，其单幢建筑形式及金属网配以灯光效果的外墙设计，表现了它与都市对话的意欲。

20世纪60年代开业的翡翠明珠戏院，后于1999年重新开幕，由关永康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既重现了旧式戏院前奏的仪式空间，也巧妙地把街道引进戏院与所在商场，甚至可视为创造了一条升起的新街道。戏院两端的灯光梯，把街道人流视线引向上层多重性空间(戏院大堂/商场回廊/升起式街道)。然后观众一如旧式戏院般经过能俯瞰大堂人潮的扶手电梯，才到达楼上的映室。建筑师在此示范了一次戏院过渡空间、商场通道空间及街道空间的相结合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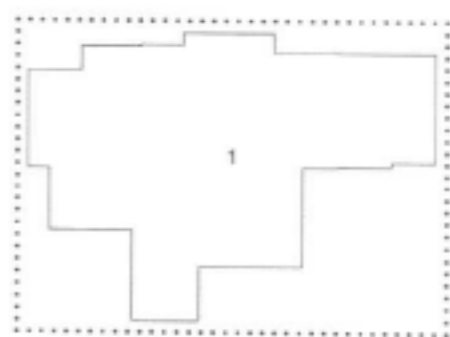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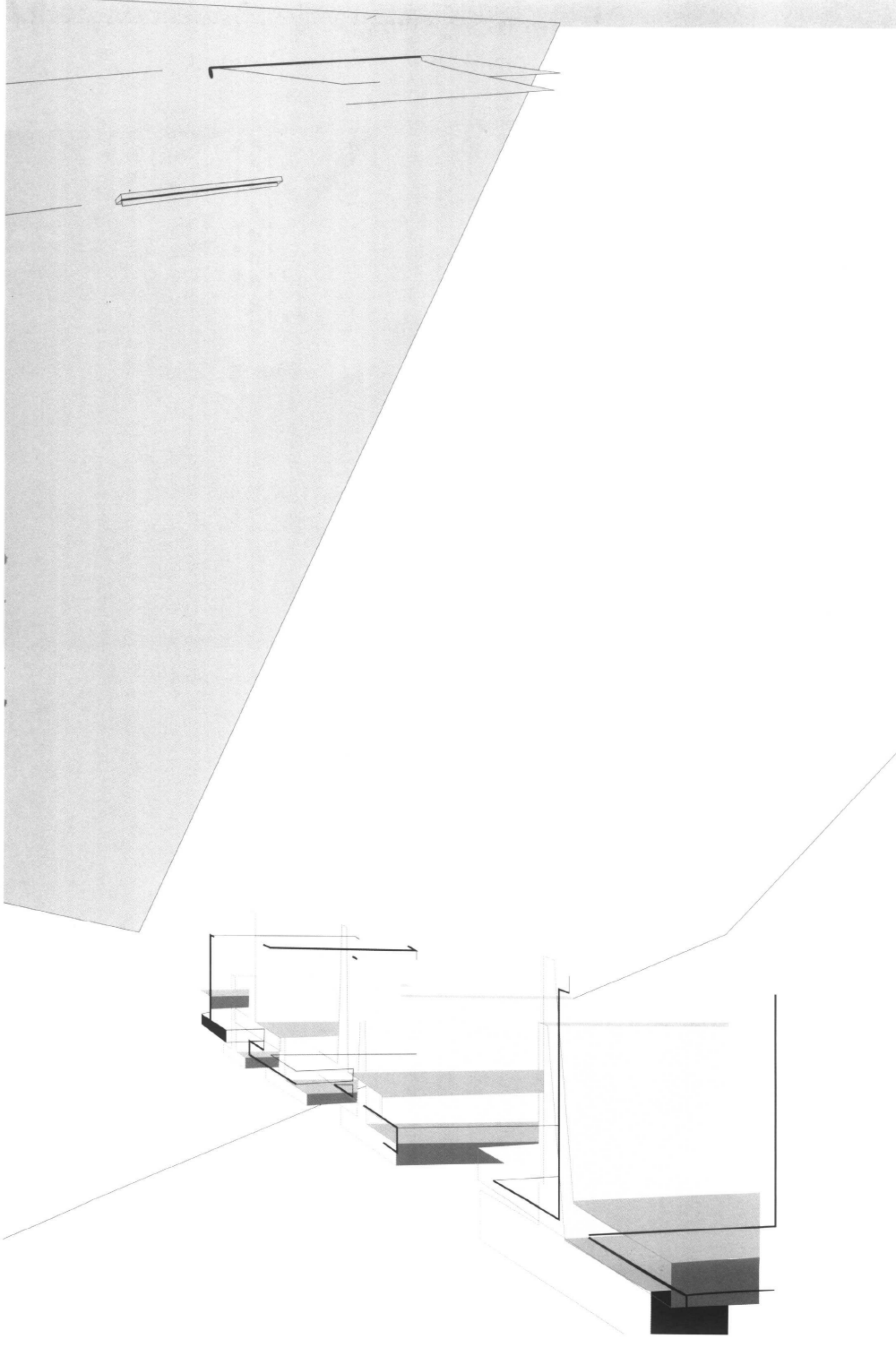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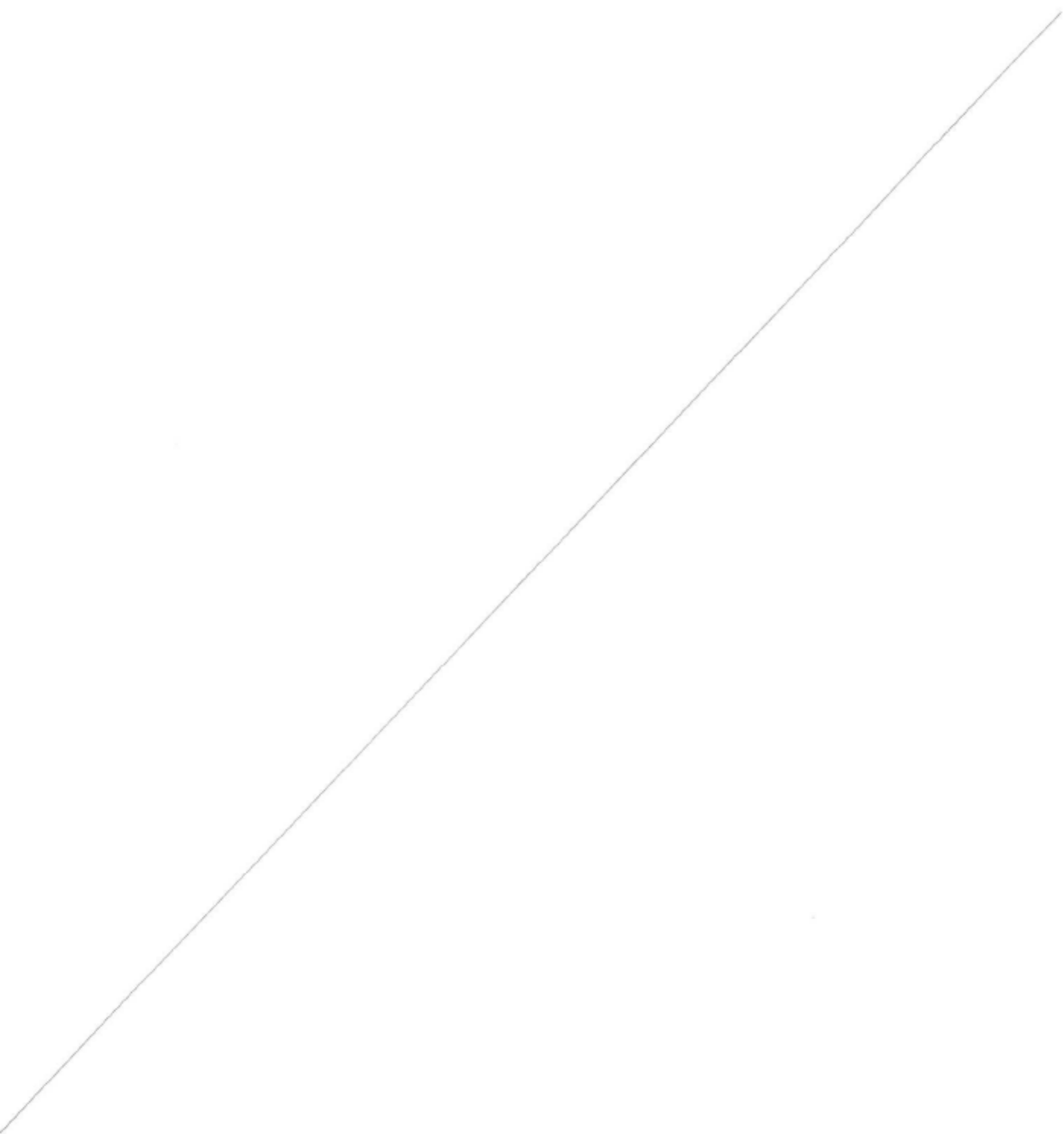
1996年开幕的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由Edge作室内设计，以火车站类比手法，试图提醒观众看电影所需的隆重仪式传统。此概念得以实现，受惠于其单幢建筑形式及面向身处屋苑广场空间之入口等条件因素。戏院结合电影相关物品商店、文化书店加咖啡室(间中举行现场表演或研讨会)，再加上邻近的户外广场空间，形成了一种近似文化中心及艺术中心的艺术活动气氛，此亦是香港戏院形式的另一种趋势。



1







内，则恐极不卫生。此外，也有露天茶寮，如昔日的黄大仙、牛头角以及现在的白田村。

传统的酒楼，今天仍可找到的有湾仔的龙门大酒楼，以及香港仔的珍宝海鲜舫，后者的紫禁城式室内设计，更代表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众品味的中式华丽装饰风格，今日看来，虽有点夸张庸俗，却又别树一帜。而醉琼楼、泉章居与龙江大饭店等旧式客家菜馆，则偏向沉实而简约的风格，其经营模式虽接近酒楼，但室内设计亦较接近传统茶楼。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表面上茶楼与酒楼有合流之势，实际上是酒楼已取代传统茶楼的位置。一方面，战后不少酒楼已由只经营晚市渐变为兼营早、午及茶市，此举大大影响茶楼的生意。

另一方面，亦与香港战后都市发展模式大有关系，因茶楼规模一般涉及地下一至两个铺位连楼上数层唐楼，甚至整幢三至五层高的战前唐楼，皆为茶楼或酒楼物业而无其他商业或住宅用途。但自六十年代以后，把数幢各占细小地段的

茶楼、酒楼、茶餐厅

茶楼、酒楼、茶餐厅，是香港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移民海外的港人，不少都会趁着假日，长途跋涉地到当地唐人街，享受那一盅两件、中西混合式食物，以及那封闭而嘈杂的环境。

传统的茶楼与酒楼，原是两类不同的行业，茶楼多以日市为主，食物以点心和「靚茶」为重点，夜间没有宴席；而酒楼则以晚间宴席为主。香港最早的茶楼为一八四六年开设于中环的三元楼和杏花楼，而早期的酒楼多设于上环及石塘咀一带的妓院附近，如金陵、广州、陶园、万国等，它的大量出现，主要始自一八九七年夜间宵禁解除之后。

早期茶楼通常各层茶价不同，有所谓「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踎」及「米贵上高楼」之说，更有不少茶楼于高层设有歌坛，而传统的茶楼有较多自然光线引入，甚至窗户大开，形成一种融入社区的街坊气氛，如现存的旺角得如酒（茶）楼与旧莲香楼等。正因有自然通风，故可容许茶客把雀笼挂在铁钩或横杆上，也略为减轻座位旁痰罐的细菌传播能力，否则，若放在新式空调茶楼

唐楼合并发展为一幢高层大厦已成为普遍趋势，而原有唐楼中的旧式茶楼也因而几近消失殆尽。

在旧式茶楼渐被淘汰的同时，新建的酒楼则趋向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甚至加入了西方古典建筑装饰及的士高灯光。这些新式酒楼多采用封闭式设计，窗户多不透光，形成与世隔绝的气氛。反而茶楼趋向以更细小的面积，并以最实用、简单与经济装修的「茶居」形式出现。这些改变是否反映香港中下阶层在八十年代与今天的两种审美品味呢？

我们可在香港十居其九的茶餐厅发现以上典型横、直向的空间分层模式，尤其当它们位于旧式住宅大厦或细面积地段发展物业的地铺内；此外，它们也会因应不同的身处位置而改变，如在公共屋村、大型屋苑或商场内等，可见茶餐厅空间与香港都市肌理的息息相关。而香港茶餐厅最有趣之处，却在于上述典型性以外的空间变化，尤其在比较旧式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以前）茶餐厅中，更见多元化。

撇开空间变化这种「行内」的层面，也许对一般人来说，茶餐厅空间给人一种最直接的感觉，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甚至是一份市井的味道。因此，很多香港电影都不约而同地以茶餐厅作为重要场景，以表现某一年代、某种阶层的生活气息，以及美学品味，如《亚飞正传》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怀旧浪漫，《行运一条龙》的低下层百态，《PTU》的警察夜宵食堂，《旺角揸住人》、《旺角风云》、《亚飞与亚基》、《九龙冰室》等的黑社会社群生活等。当中没有正式设计师「设计」的茶餐厅用料、颜色、装饰等，就是最直接表现出茶餐厅气氛的元素。若硬要用设计词汇来说明，就是每间茶餐厅的「风格」表现所在。

相反，近年部分新式茶餐厅，多委托正式设计师设计，也如酒楼般趋向集团化经营，使茶餐厅的空间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既看到主题化设计（如澳门、怀旧等主题），也看到不同装饰物料的极端拼凑，以及「简约主义」港式诠释的高档风格。这些都是与旧式茶餐厅一样，迎合某年代顾客品味的实用性表现，但已扭转了过去旧式茶餐厅那种率性而为的「非设计性」，以及本地独有的空间运用与美学风格。借用建筑学者Wong Chong Fai用以评论新加坡JUNCTION 8美食广场之言：『它们「挖空」了人们被灌输的建筑学应用与意识形态。』若能循这方向阅读香港的其他事与物，我们也许能以一种更自主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欣赏、理解和批判。

若说港人品味之反映，便不得不谈另一土生土长的食店类型——「港式茶餐厅」。我们可于同具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和马来西亚看见相类似的经营及空间模式，从而推断茶餐厅之起源与殖民地历史有一定关连。因一些殖民地虽以本国人为主，但饮食文化难免受西方宗主国（英国及葡萄牙）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一些混合式食物之食店，并间接影响此类食店之「室内设计」及装饰风格。而香港「茶餐厅」有别于西式的「餐厅」及中式的「茶楼」、「茶室」，也有别于近年常见的「西式咖啡室」，以及早期殖民地时代已开始附设于酒店内的「高级咖啡室」。

不同茶叶的奶茶，以及相信是由香港人独创的鸳鸯（奶茶加咖啡），使它们成为日渐西化的港人到中式茶楼吃点心与饮中国茶以外的另一选择。但使茶餐厅成为港人食店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加入了更多适合港人口味的「主菜」，由中式粥、粉、面、饭，至西/港式牛、羊、鸡、猪扒，又或煎火腿、肠、腌肉、蛋，配即食面、米粉、通心粉、意大利粉或饭。而「茶餐厅」（「茶」加「餐」的「厅」）此一名称，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日渐取代「冰室」。

相比茶楼，香港传统茶餐厅一般面积较小，如位于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通常只占一个街号的地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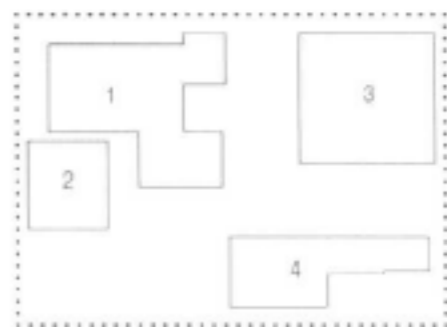
面积不过千尺，形状多为深窄长方形，通常近铺面一边有一小段楼底极矮的梯底位置，多用作收银处，或全店最具私密性的座位。铺面一般四至八米阔，有些铺面并无门墙分隔室内外，只用风闸或风扇，实行自然通风，使室内外空间相通。更多的例子是铺面全作玻璃墙，门置中央，室内近门两边分作面包、西饼柜（方便途人购买）及收银处；有些则把收银处放一边，另一边放用玻璃围起来的粉面档或烧腊档。再往内看，则是茶餐厅空间的灵魂——座位。要说茶餐厅座位，不得不提一般茶楼均找不到的靠墙厢座（卡位）。多数顾客皆爱选「卡位」而坐，因其较非固定台椅舒适，而且感觉较具私密性。对店员来说，卡位的椅底也可用作储物功能。最窄的茶餐厅可放一排卡位加一排散座（非固定台椅），阔者可再在中間加设矮间墙，再在矮墙两边各放一排卡位，而在每排卡位之间可放散座，如此类推，随铺位阔度重复的横向空间分层。再往内便是水吧，水吧旁边是一条走廊，可通往水吧后的厨房，之后便是厕所，最后是通往后巷的后门。有些在后门与后巷之间，还有一片屋后空地，通常用作洗涤餐具，有时厕所也设在空地上。

当然，所谓「茶餐厅」在香港也有其演变过程。它们早期多以「冰室」之名出现——一种以供应西式小食与饮品为主的食店，与供应西餐主菜的「餐厅」有所分别。而所谓「西式小食与饮品」，则可能加入了适应香港人口味的制法，如菠萝包加牛油，比英式奶茶浓烈得多，并混合



1

旺角得如酒楼，前身为20世纪40年代开业的得如茶楼，是典型设有地下过渡大堂的旧式酒楼/茶楼例子，大堂外更放有当年茶楼必备的电动木马/飞船。如其他传统茶楼一样，“得如”也有较多窗户，以引入自然光线。





2

图为20世纪90年代临清拆前的得云茶居。得云茶居开业于19世纪80年代，兀立于皇后大道中与文咸街交界，其装饰风格使它一度成为该区的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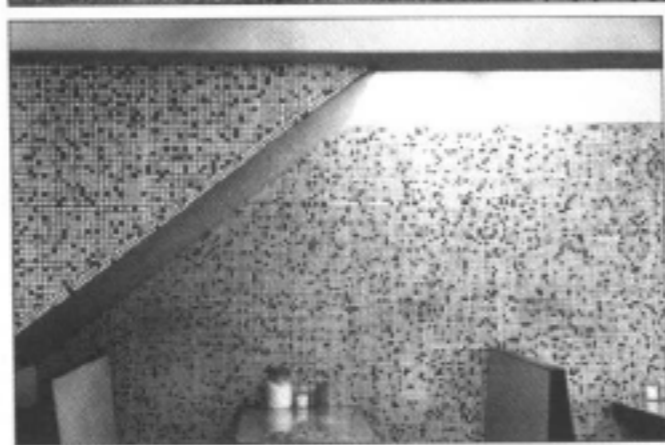
3

20世纪20年代开业的西环多男茶楼，见证了该区的不少历史，唯于1993年亦难逃拆卸的命运。

4

1971年大火后重建的香港仔珍宝海鲜舫，是当年大众品味的中式华丽装饰风格的极端表现。正如其旧宣传单张所言：“舫中用膳，犹如置身于昔日宫廷，满目尽皆精雕细琢之建筑。”但酒楼大部分地方已于2004年重新装修，原来风貌已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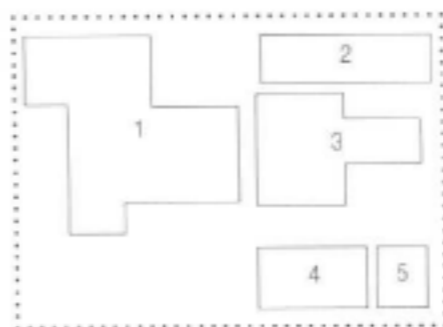


1

约1963年开业的旺角中国冰室，是香港典型的双层茶餐厅，并拥有少见的宽敞中空跨层空间，由上层俯瞰，可感受纯以空间营造的豪华感觉。而冰室上层也出现一个茶餐厅常见的梯底空间，置身其中，更添一份被包围的安全感。

2

20世纪60年代开业的土瓜湾白宫冰室，被所处大厦楼梯分成两部分，内外厅一静一喧，使进入内厅时顿感别有洞天。





3

1950年开业的油麻地美都餐室，全店灵魂在于上层横跨整整两边的大横条窗，一边面向庙街，另一边对着榕树头。坐在敞开的窗旁，恍似同时置身油麻地两个最有趣味的户外公共空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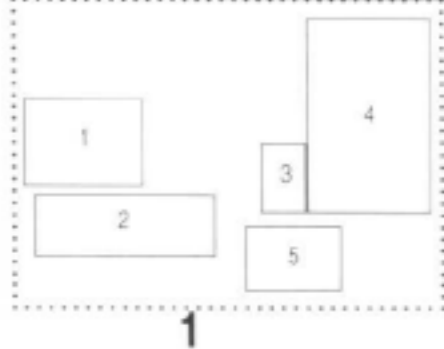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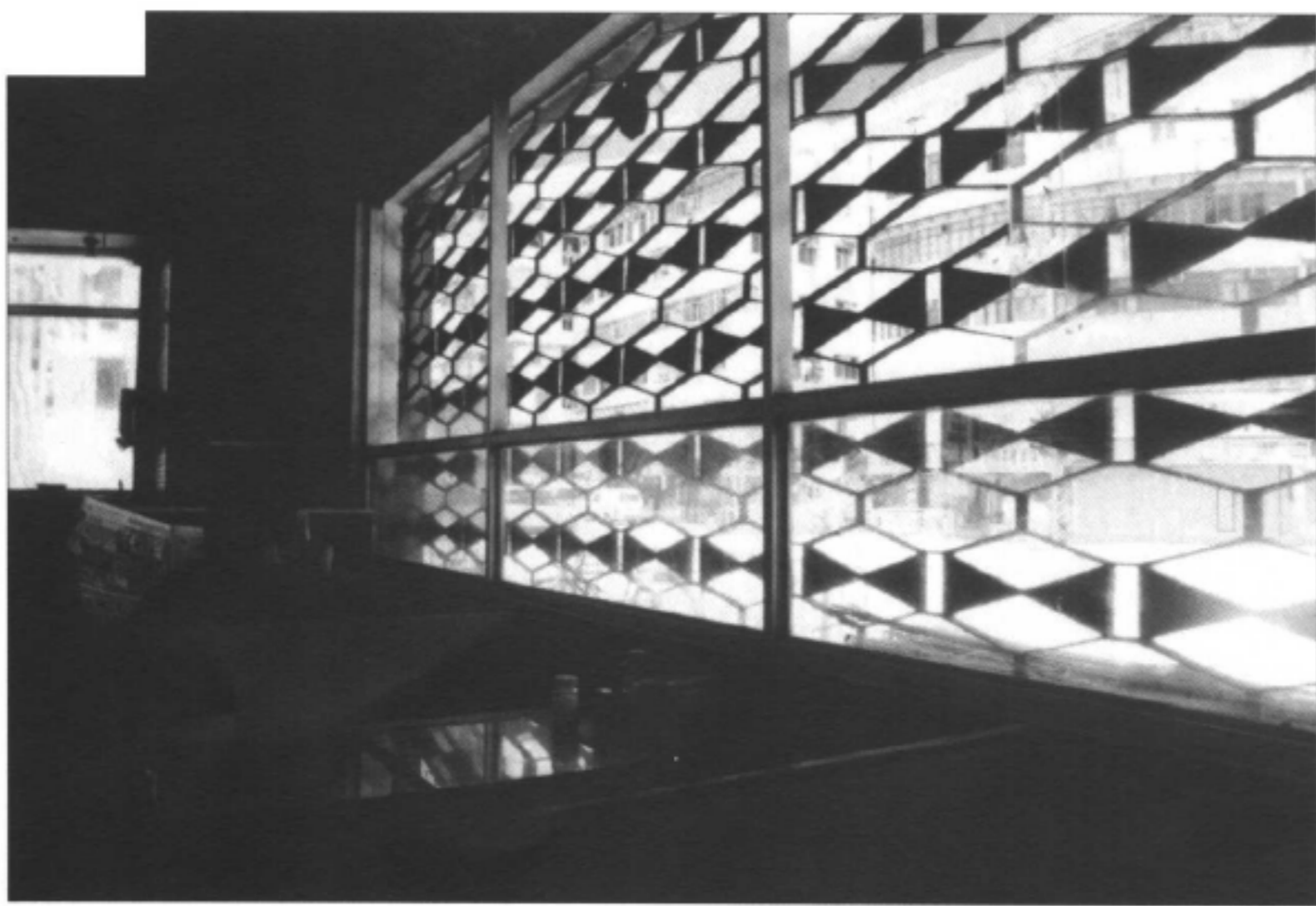
4

1980年开业的白田村兰园咖啡室，为向外开敞的空间，但重点在户外的座位，因屋村依山而建，因此前景景致开场，加上罕有地挂满顾客带来的雀笼，为整个空间增添了不少听觉元素。

5

约1963年开业的西环联华茶餐厅，可见香港典型的旧式楼宇的阁楼结构。因外厅近水吧部分上设阁楼储物室，形成低楼底空间，与近铺面部分逾5米高的空间形成强烈对比。





1

1 白宫冰室的图案窗花除了为外墙作装饰外，也在阳光透入室内空间时，营造出浪漫而神秘的气氛。

2

2 1965年开业的红磡文华冰厅，店铺装饰属“黑白”风格，当中隐约可见克制的选色与几何的装饰。据说是由当年曾任则师的店东设计。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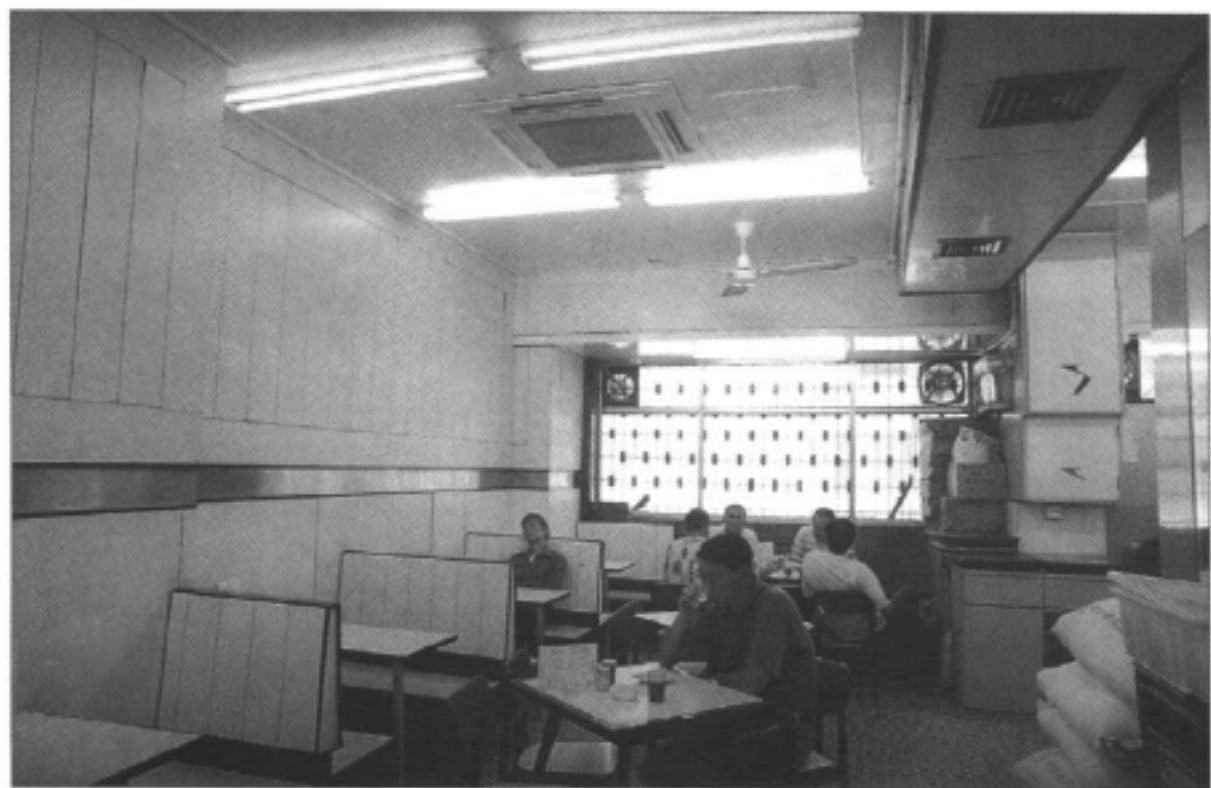
3 美都餐室内两幅极具历史价值的马赛克瓷砖铺砌的墙壁之一，可反映当年施工的精湛，因瓷砖组幅之间的不规则缝隙控制极具难度。而同样以非几何秩序组成的马赛克砖墙，在香港可能仅余深水埗的百吉旧式凉茶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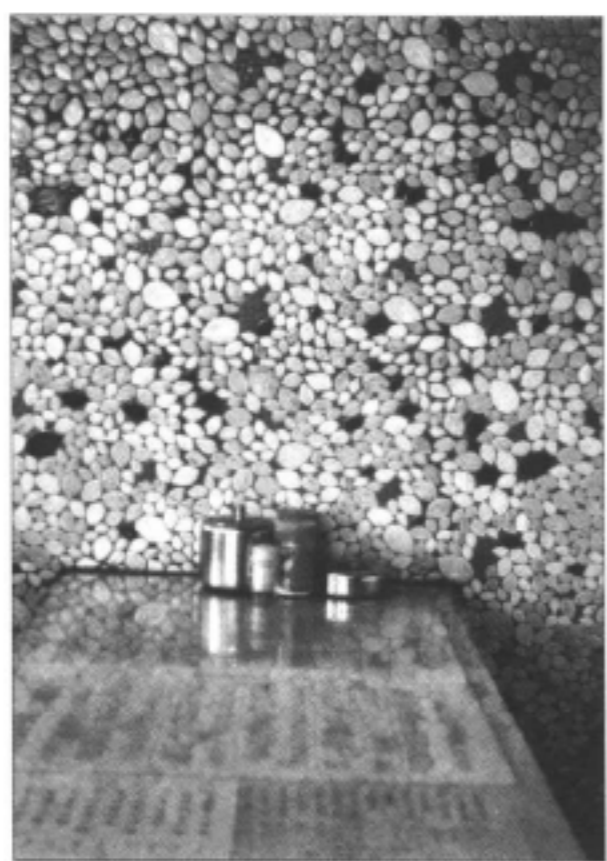
4

4 在美都餐室短短的一段楼梯内，已见多种物料及图案的拼凑，如马赛克、柚木、胶板、铝、不锈钢及玻璃等，却不显混乱与庸俗。

5

5 亚伦冰室墙上的餐牌，本身已是一幅有趣的拼贴画。







吴启聪

百年建筑的人事境物

二十三位香港建筑师及事务所小传



9 10



陆谦受
1904—1992



人称“陆叔”的陆谦受属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祖籍广东新会人，但自小跟随父亲到英国生活，1930年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回到中国后，他出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科长，今天矗立外滩的中银大楼便是他的原作。二次大战期间，陆谦受在后方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建筑，其后和另外4位留学英国的建筑师合办五联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移居香港后，续任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师。他在港期间的作品并不广为人知，而且数量不多，但各有独特之处。陆谦受更是现代

主义的先驱，他设计的鲷鱼涌丽池大厦、浅水湾大厦均显出他对空间和外观的同等重视。他的名言为：一件成功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际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徐敬直 1906—?



11 12

徐敬直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56年的创会会长，1930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2年在上海创立兴业建筑师事务所。他早期建筑风格偏向中式仿古外貌，但配以现代建筑技术和物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香港后，他的设计手法全面改变，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的简约空间、线条及功能的演绎。其中北角国民收银机大厦、旺角麦花臣球场、农甫道新亚书院等特别明显。徐敬直在香港的作品颇为丰盛；如北角的丽池酒店夜总会是六十年代的高级娱乐场所，觉士道童军总会提供青少年活动空间。除了推动专业发展及管理“兴业”的业务外。他在1964年出版一部用英文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Chinese Architecture, Past and Contemporary)。书中归纳了他多年来对设计的研究，也论及中国建筑的出路。他相信未来建筑师必须具备对自己文化及历史的尊重和认识。同时也要吸纳西方先进科技，使两者合而为一。徐敬直称这种折衷模式为中国文艺复兴建筑。



国民收银机大厦

13 14

阮达祖 1906—?



恒生银行大厦

阮达祖在香港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再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并获建筑学学位。学成之后，他选择到上海实习，其后在广州执业，但阮达祖的事

业却始创于香港。五十年代中，阮在港开办 T.C.Yuen and Company，并开始接手大型设计项目。当中的恒生银行大厦更是香港早期的全钢结构及全玻璃幕墙盖面大楼，“恒生”因此被誉为当时最瞩目及高级的高级办公楼之一。这项复杂工程的完满结果，实有赖阮达祖在土木工程及建筑两方面的配合。阮达祖的建筑风格简单平实，注重空间和结构部分的合理编排。其后他设计的东英大厦、香港仔渔光村都显出这如出一辙的手法。两者都是十分香港制造的建筑。



今天的建筑处前身是公务员的一部分，负责统筹及设计政府物业，而当中大多是公共建筑，如医院、官立学校、警署、监狱、政府办公楼、民康康乐设施等。初期的公务员建筑师大多是来自英国的年轻专业人员，希望来到殖民地有所发挥。政府建筑物虽以实用为主，但仍不乏出色的设计。十九世纪的中央警署、二十世纪的英皇书院使用西洋古典建筑手法，利用外观塑造权威形象。五十年代的伊利莎白医院、下亚厘毕道政府合署，都在平实之中显露现代主义的理性功能编排，和周遭的地理环境配合。有见香港欠缺建筑组织推动专业进步，多名公务员外籍建筑师更于五十年代初发起创立专业团体，即今天的香港建筑师学会。今天的建筑处屡获设计殊荣，其中海防博物馆、西贡海边及码头的复修工程等，更夺得香港建筑师学会周年奖项。



政府合署

范文照 1893—1979



范文照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
海享负盛名。他设计的上海歌
剧院由于拥有出色的音响效
果和历史价值，得到上海市政
府列作保留建筑，并于2001
年将整幢迁移。范文照1922
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建
筑系。早期的设计风格偏重古
典形态及装饰韵味。当现代主
义在三十年代从欧洲席卷全
世界时，他开始受到这套新建筑
思维的影响，并提出“首先科
学化，然后美术化”的观点。

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后，范
文照锐意改变设计手法，此
后设计的铜锣湾豪华戏院、
观塘银都戏院都呈现简洁明
快的建筑空间及形态。后期
作品中，北角长康街的小教
堂最为优雅。范文照是战后
香港建筑师中的佼佼者，不
论名声或经验均十分出众。
香港大学建筑系的早期毕业
生不少曾在其事务所受训，
期后各成为业内翘楚。



北角长康街循道小教堂



陆谦受
1904—1992



人称“陆叔”的陆谦受属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祖籍广东新会人，但自小跟随父亲到英国生活，1930年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回到中国后，他出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科长，今天矗立外滩的中银大楼便是他的原作。二次大战期间，陆谦受在后方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建筑，其后和另外4位留学英国的建筑师合办五联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移居香港后，续任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师。他在港期间的作品并不广为人知，而且数量不多，但各有独特之处。陆谦受更是现代

主义先驱，他设计的鲗鱼涌丽池大厦、浅水湾大厦均显出他对空间和外观的同等重视。他的名言为：一件成功的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际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徐敬直 1906—?



徐敬直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56年的创会会长，1930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2年在上海创立兴业建筑师事务所。他早期建筑风格偏向中式仿古外貌，但配以现代建筑技术和物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香港后，他的设计手法全面改变，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的简约空间、线条及功能的演绎。其中北角国民收银机大厦、旺角麦花臣球场、农甫道新亚书院等特别明显。徐敬直在香港的作品颇为丰盛；如北角的丽池酒店夜总会是六十年代的高级娱乐场所，觉士道童军总会提供青少年活动空间。除了推动专业发展及管理“兴业”的业务外。他在1964年出版一部用英文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Chinese Architecture, Past and Contemporary)。书中归纳了他多年来对设计的研究，也论及中国建筑的出路。他相信未来建筑师必须具备对自己文化及历史的尊重和认识。同时也要吸纳西方先进科技，使两者合而为一。徐敬直称这种折衷模式为中国文艺复兴建筑。



国民收银机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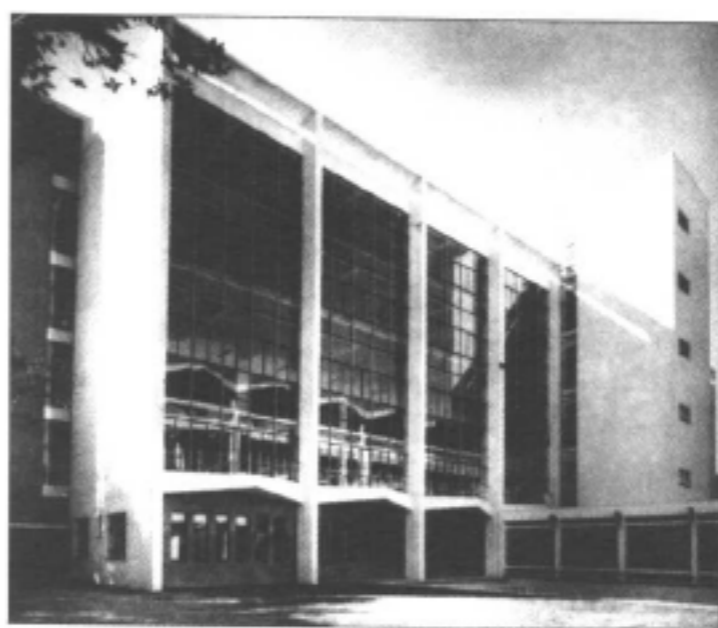
阮达祖 1906—?



恒生银行大厦

阮达祖在香港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再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并获建筑学学位。学成之后，他选择到上海实习，其后在广州执业，但阮达祖的事

业却始创于香港。五十年代中，阮在港开办 T.C.Yuen and Company，并开始接手大型设计项目。当中的恒生银行大厦更是香港早期的全钢结构及全玻璃幕墙盖面大楼，“恒生”因此被誉为当时最瞩目及高级的高级办公楼之一。这项复杂工程的完满结果，实有赖阮达祖在土木工程及建筑两方面的配合。阮达祖的建筑风格简单平实，注重空间和结构部分的合理编排。其后他设计的东英大厦、香港仔渔光村都显出这如出一辙的手法。两者都是十分香港制造的建筑。



旧香港大学图书馆

能说流利英、粤、上海语的甘洛是中英混血儿，他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战前在上海租界曾担任城市规划公职及开设锦明洋行 (Eric

Cumine and Associates) 提供建筑设计服务。1943年间，他被日军收进非战俘集中营。1949年后到香港，他受利氏家族委托，设计了名噪一时的使馆公寓 (Embassy Court)——一幢高级洋房大厦，从此甘洛便确立了他的业界领导地位。整个五十至七十年代，他的公司设计了超过一千个项目，当中有著名地标如启德机场、富丽华酒店、北角村、苏屋村、港大图书馆等。他给予公司中的年轻建筑师很大自由度，



15 16

甘洛 Eric Cumine

1906—2002

但也要求负同样大的责任，因此很多建筑师后来都能独当一面。甘洛的成功令事务所运作到八十年代。对于中西文化冲击和差异，他有着独特的见解，并轻松地阐述于一本小书内。甘洛历任港府及不同社团多项公职。甘洛退休后返回英国定居，但他的设计已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基泰工程公司 1920—1960



关颂声



万宜大厦

1920年创立于天津的基泰是中国战前最具规模的建筑师事务所。它的主合伙人是关颂声、朱彬和杨廷宝，因此亦称关朱杨。基泰的设计出色，经验丰富，加上和当时政府关系密切，所以业务遍及全中国大陆以至香港。五十年代初，朱彬由国内来到

香港，而公司业务也持续发展。其中1956年完成的万宜大厦是最受人赞许的作品，从而树立了一级办公室设计的典范。万宜大厦的室内冷气商场及扶手自动楼梯是当时全港首创。1958年建成的德盛大厦更拥有香港第一幅玻璃幕墙。六十年代的陆海通大厦集戏院、商场、食肆、办公室于一幢建筑物内，这种复杂的混合功能设计后来更成为香港的一大特色。朱彬作为基泰在五六十年的香港负责人，间接地大大推动了本地建筑的设计水平。基泰的其他作品包括牛津道英华中学、湾仔的先施保险大厦、东亚银行旺角分行、美丽华酒店等大型建筑。朱彬在192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他是香港建筑师学会创会会员之一。

17 18



周李建筑工程师事务所 1920s—1970s

由周耀年、李礼之所创立的“周李建筑”应该是战前最大规模的华资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周耀年是香港大学工程系的早期毕业生，李礼之则是留英的建筑师。周、李和华人社团关系不俗，因此东华三院、保良局不少工程都是由他们负责的。现存的作品包括港大校长府第、何文田协恩小学、中环中华总商会大厦等。它的早期设计蕴含简朴的装置艺术元素，也有不少中式图案的演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出生高峰

期，周、李设计了很多各有特色的学校，大都是平和、结实但可用性十分高的建筑物，故此可谓校舍建筑专家。



中华总商会大厦



司徒惠1913—1991

21 22

集工程师、艺术家于一身的司徒惠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建筑师，曾举行个人的油画及水彩画展览。他的作品既感性、优雅，也不失工程师的精密和严谨。战后数十载，在欠缺建筑师的情况下，司徒惠设计了很多高质素的楼宇，如李宝椿大厦、蓝塘道的玛利诺书院及佐敦的循道教堂等。其中循道教堂到今天仍有着历久不衰的感觉，整座建筑物的空间布置、光影效果和细部设计均有精心考虑。



佐敦循道教堂

司徒惠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早期建筑师及工程师，他的设计反映了他对建筑结构与物料的表达及重视，校内很多建筑物因此均用混凝土外墙，不事修饰。司徒惠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62年的会长。

23 24



哥顿·布朗教授

Professor Gordon Brown

1917—?

作为香港大学建筑系首位主任，哥顿·布朗奠基了本地的建筑教育，是港大创系时的教授，且兼顾巨细无遗的事项。曾任伦敦建

筑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的建筑系主任的布朗教授，主张理论结合实践，更不拘束于课堂知识。他要求学生探索不同阶层的生活模式，了解社会现象，以追寻自己的设计根源。他能促使学生投入、爱上建筑，及坚信设计的社会意义。除教学外，布朗教授和学生共同设计了香港大会堂，然后交给公务局执行施工。香港和九龙华仁书院也是他的作品。他的风格建立在现代主义基础上，但手法细致，空间和外形的考虑十分周详。哥顿·布朗教授于1956年离任，后赴美国考察民居设计。



大会堂



欧阳昭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后来港在甘洺事务所工作。1958年加入

王泽生、伍振民的公司。1972年和王泽生共组今天的王欧阳建筑工程师事务所。欧阳昭的学术背景兼备建筑及结构工程，因此他能别出心裁地考虑和解决设计与施工上的困难问题。“王欧阳”的作品多、规模大，而且往往涉及复杂技术，代表性的有：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太古广场、时代广场、黄埔花园等。作为香港最具经验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欧阳昭坚信建立公司的长远专业地位远比个人名声重要。他也相信毅力、不断尝试及灵活思考是成功建筑师的必备元素。欧阳昭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70-1971年度的会长，也是多个建筑及结构工程专业学会的资深会员。



太古广场

廖本怀 1929—

廖本怀的事业生涯始于香港大学建筑系，
成于华富村。他有着多年的公共房屋设计、
策划经验，这使他笃信建筑师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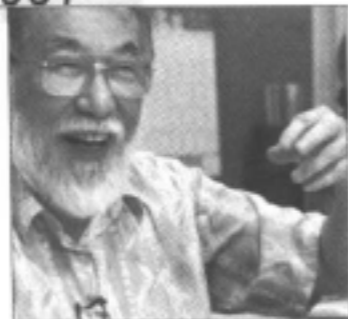
是为大众塑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廖本怀先后全力参与兴建华富村、和乐村、福来村和马头围村；
望这些建筑物不只提供混凝土的躯壳，也提供人性化的空间。1973年，廖本怀提出居者有其屋计划，
致力在政策层次上给予市民一个中产的住屋选择。1960年离开香港

大学教学职位后，廖本怀的仕途稳步向前。1980年被委任为房屋司，1985年当上政务司，1987年成为中英联络小组成员，到1989年退休。从建筑师到政府决策官员，廖本怀抱着同一宗旨，即确信每份工作都必须做到满意为止，不同的挑战更需运用学问来面对。同样地，他认为建筑师的学问来自广阔的人生视野，及积极思考的精神。



华富村

钟华楠 1931—



29 30



山顶老衲亭

钟华楠，是香港现时最资深的建筑师之一。他虽然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但却十分推崇传统中国文化精髓，特别如崇尚自然、邻里互助、和谐共济等优秀传统。钟华楠从中国古典园林悟出了其设计和人生的道理，并曾在香港两所大学设专题讲座。他的设计也往往融汇中国理念。他早期的代表作：山顶“老衲亭”便是从中国城墙瞭望塔中得到灵感。“老衲亭”配合四周地形，利用高耸的位置及独到的外形营造地标效果。和中式古塔一样，它成为周边，甚至全港的视觉焦点。他其后的作品包括城市大学校园及港湾道公园，均贯彻中式空间及视觉意念。钟华楠认为成功的建筑师必定拥有一份超然的自信及使命感，也须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要关心那些生活在建筑里的居民，更要努力思考如何缔造富有中国内涵的建筑。

在香港长大、毕业于伦敦巴特利特建筑学院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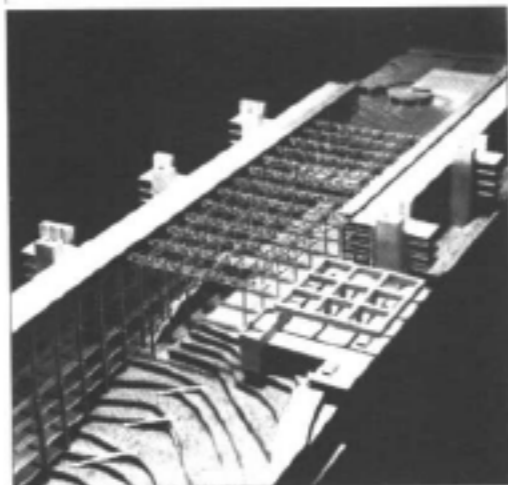
黎锦超教授

1934—2003



31 32

黎锦超教授将他的一生奉献给建筑教育。他前后担任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主任及建筑学院院长共25年。在他的领导下，建筑系被提升到蜚声国际的地位。黎锦超教授直接或间接地教导过的本地建筑师超过1,500名。可以说，今天香港超过一半的建筑师都是他的门生。黎教授生于香港，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因战争缘故，



科技大学设计比赛冠军得奖作品

他11岁前仍目不识丁，但凭着聪敏和努力获奖学金到美国留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得硕士学位。黎教授的治学态度认真深入，他对设计有着敏锐的触觉，评论或考核学生功课时，往往用严谨及积极批判的角度进行分析。他鼓励年轻建筑师到世界各处多游历、多观察和多想象，但同时需认真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根源。黎锦超教授一生获奖无数。他坚信现实建筑和学院派的概念设计是互动互补的，因此他传授的不单只是建筑，而是一个结合实践和思考之道，也许更是一种生活的精神。

走廊的问题。为适应香港高密度、寸金尺土的环境，李景勋首先改变剪刀楼梯，并放置在高层住宅内。今天常见的窗台，也是他为改善室内空间质素而设。1984成立协建建筑师有限公司，更是最早进入国内的香港事务所之一。1980-2001年担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名誉讲师，他传授的不仅是理论，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承担，和对知识的持续追求。李景勋热爱中国文物，对清代玻璃艺术品的研究更独有心得。他的收藏品曾作专题展览。李景勋是1975-1976年度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

李景勋

Andrew Lee King Fun 1935—



李景勋195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其后负笈澳洲深造，1959年获墨尔本大学建筑学学位。李景勋曾先后在香港、马来西亚及澳洲工作。1962年创立李景勋建筑师事务所，1973年改称李景勋·雷焕庭建筑师事务所。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设计的宝宁大厦别具创意，成功地改良了旧式大厦住宅狭长

33 34



油麻地宝宁大厦

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建筑系，并师承现代主义大师Walter Gropius的何弢不只是建筑师，他深信出色及有生命力的建筑必须涵盖美学和艺术元素。作为当代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创作坚守尊重文化、崇尚自然及人本精神等意义。他的建筑、绘画、雕塑，都表现出朴实醇厚而又充满动感变化的构图形象。战后的香港建筑大多以功能化、效率化为

出发点。何弢设计的香港艺术中心，却摆脱一贯模式。他利用复杂的功能安排来衍生紧扣而简洁的空间布局，再加上中庭的强烈视觉效果，整体上显示出娴熟的现代建筑设计技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弢的设计为香港注入一股新的文化气象，引领香港市民产生一种新的建筑观感。何弢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96-1998年度的会长。



何弢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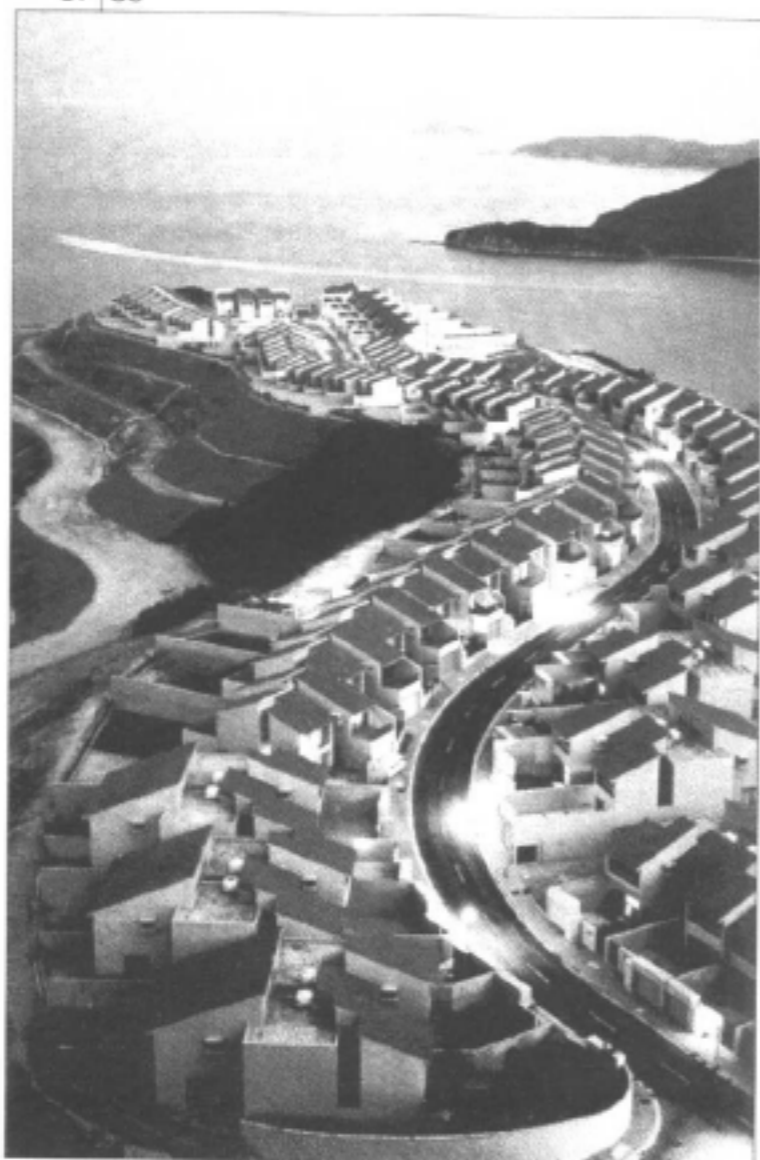
35 | 36



香港艺术中心

何承天 1938—

37 | 38



愉景湾



何承天196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借着当时的地产升浪，何承天开始涉足多个大型住宅项目的设计。加入王董建筑师事务所后，他有份负责的美孚新村更是当年香港最庞大的建设。及后的喜来登酒店、置富花园、愉景湾奠定了他在优质大型项目的设计领先地位。在1984年的中英谈判期间，和日后

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何承天积极发挥了协调和联络9个专业团体，以确保过渡后的专业资格能得以维持。1987年何承天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2003年成为古物古迹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建筑师的挑战就是要面对多变的环境，随时适应及调整。热爱音乐、艺术，能弹奏小提琴的何承天是香港建筑师学会1983-1984年度的会长。



木下一 James Kinoshita

木下一的建筑师生涯见证了香港的急速发展年代。他是日裔加拿大人，在文尼吐巴大学 (University of Manitoba) 及美国麻省理工(M.I.T.) 修读建筑。在美国工作数年后来到香港，在巴马丹拿建筑及工程师事务所担任项目设计。他早期的两项主要

工程：中环希尔顿酒店和康乐大厦 (今怡和大厦) 都是香港的重要城市标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两幢建筑物的建成，象征了香港从一个普通城市踏入国际都会的行列。从1960年至今，木下一视这里为家园，经历过香港的变迁和顺逆，并在艰难岁月中仍享受建筑师创作路程的喜悦和满足。他的设计秉承现代主义的理性及明快轮廓，充分结合和展示建筑结构于形态上。木下一的成功代表香港建筑师行业的高度兼容和合作性。不论国籍人种，只要努力，就能在香港发挥所长。



希尔顿酒店

刘秀成教授 1944—



刘秀成教授在中国出生，于圣保罗中学毕业后前往加拿大文尼吐巴大学修读建筑。其后在温哥华私人事务所执业，也曾任市政府规划部门负责设计及行政工作。1974年回香港大学，先后出任教授及系主任职位，2004年退休。在港大的30年间，刘秀成教授贯彻教学与实践相配合的理想。他是学校设计专家，其中香港国际学校、法国国际学校、澳洲国际学校均获杰出设计奖。他的学校形态明朗，视觉、颜色、线条，绝不含糊。而且能配合



法国国际学校

地理环境，因此外形多变，充满外观及空间层次感。作为大学教授，他认为诱发学生自我完善，引导他们发展自己的概念，以及推动团体及批判精神最为重要。刘秀成教授的设计正代表这套思维，通过多变丰

富的学校空间来鼓励、刺激思考及创意。刘秀成教授是香港建筑师学会2000-2002年度的会长。现任立法会建筑、测量及规划界别议员。

龙炳颐教授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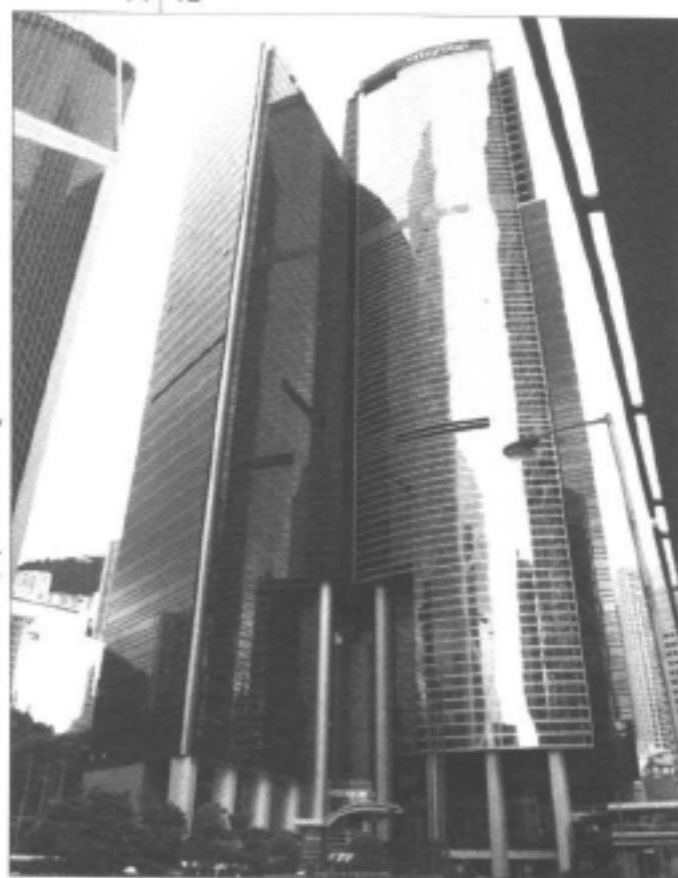
龙炳颐教授多年来大力鼓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特别在此经济主导的社会风气中，建筑师更需要确定本土建筑的文化价值。龙炳颐教授1975年毕业于美国俄立岗大学，1978至1983年任职何弢设计事务所。在未负笈美

国之前，曾师从范文照。在美国期间，参与Christopher Alexander之俄立岗校园规划 (Oregon Experiment)，并负责美术博物馆之扩建设计。1983年任教香港大学建筑系至今。从多年的教育生涯中，龙炳颐体会到建筑师有义务，也有能力肩负文化遗产的保育责任。在教和学的过程中，他期望学生能对自身传统有所尊重及了解，更希望这种认知能得以承传。龙炳颐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也身兼多项公职，其中包括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理事会主席、前古物古迹咨询委员会主席、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主席、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员会主席、博物馆委员会副主席，及市区重建局非执行董事。



严迅奇是本地杰出的建筑师。1983年获巴黎歌剧院国际竞赛一等奖，1989年加拿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方案竞赛获优异奖。严迅奇的作品充满个人风格，他注重

使用简明线条来显露建筑轮廓，也精于处理外形构图，和操控空间的开放及视觉连续性。多个早期创作中，以花旗银行大厦最能代表他的手法。2004年参加中国广东省博物馆国际竞赛，再成功击败多个国际建筑师，夺得设计权。严迅奇协助推动本土文化艺术，现为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也是香港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香港建筑师学会资深会员。



花旗银行大厦

参考书目

围村

-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Rural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1979.
-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Centr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e, Ho Yin and Lynne D. DiStefano, A Tale of Two Villages: The Story of Changing Village Lif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H. Hase & Elizabeth Sinn edited, Beyond the Metropolis: Villag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1995.
- Wang, Weijen, Axial Inver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Ritual Axis in Hong Kong's Walled Villages, Hong Kong Papers i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Vol. 1, 1988.
- 王其钧《古往今来道民居》，台北：大地地理，2000。
- 深圳博物馆《南粤客家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陆元鼎、杨谷生主编《中国民居建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陆元鼎主编《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2000客家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 潘安《建筑学博士论丛——客家民系与客家聚居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 A Staff Correspondent, Hung On-To Memorial Library compiled, Time to Remember [series I-I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 Barbara-Sue White selected & edited, Hong Kong: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han 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Ed van der Elsken, Hong Kong, Heaton, Moor, Stockport, England: Dewi Lewis, 1997.
- Gillian Chambers, Supertrader: The Story of Trad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1989.
- Scott Rutherford edited, Hong Kong, Singapore: APA Publications, 1998.
- Hong Kong Commerce & Industry Department, A Commercial Guide to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Industry, 1949.
- Hong Kong Extravaganza: A Picto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xtravaganza, 1978.
- John Malcolm Warner 编、王无邪译《百年前之香港》，香港：政府印务局，1970。
- John Warner compiled, Hong Kong Illustrated: Views and News, 1840-1890, Hong Kong: John Warner Publication, 1981.
- Maggie Keswick, The Thistle &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and Co., London: Octopus Book, 1982.
- Malcolm Purvis, Tall Storeys, Palmer and Turner, Architects & Engineers: The First 100 Years, Hong Kong: Palmer & Turner, 1985.
- Nigel Cameron, The Hongkong Land Company Ltd.: A Brief History, Hong Kong: Nigel Cameron, 1979.
- Norman Owen, Elfed Roberts, David Lung, Scarlet Cheng, The Heritage of Hong Kong: Its History, Architecture & Culture,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Ltd., 1999.
- Trea Wiltshire, Hong Kong: Last Prize of Empire,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1991.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Hong Kong & the West until 1860 [electronic resource], Hong Kong: The Libraries, 2000 (Web Resources, 951.25 H77 U)
- 丁新豹、黄迺锸《四环九约：博物馆藏历史图片精选》，香港：市政局，1994。
- 朱维德《香江旧貌》，香港：天地图书，1997。
- 李申《风水商业楼：港岛区》，香港：千惠，1989。
- 柯立斯着、李周英等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北京：中华书局，1979。
- 香港商业汇报编《香港建造业百年史》，香港：香港工商业汇报，1958。
- 香港铜锣湾街坊福利促进会编《铜锣湾：百年成长，怀旧迎新》，香港：香港铜锣湾街坊福利促进会，1998。
- 高添强《香港今昔》，香港：三联书店，1994。
- 梁炳华《香港中西区风物志》，香港：中西区临时区议会，1998。
- 麦烽摄《香港曾经是这样的》，香港：摄影画报，1997。
- 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1。
- 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
- 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9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
- 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香港：三联书店，1997。
- 郑宝鸿《港岛街道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
- 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出版社，1948。
- 萧国健主编《油尖旺区风物志》，香港：油尖旺区议会，1999。

唐楼

- 1 Anthony Yung and Suen, Wai Man, No. 6 Shing Wang Street-A Photographic Survey of a Chinese Tenement.
- 2 Lung, Ping Yee David; Ho, Chi Ching Ivan & Lee, Ho Yin, Tong Lau--A Compilation of Measured Drawings of Tenement Buildings in Urban Areas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3 E. G. Pryor, Housing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 Ferdinand K. H. Cheung, Tenement Buildings: In the Light of Their Origin, 1999.
- 5 Lukes S. K. Wong edited, Housing in Hong Kong: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Hong Kong: Heinemann, 1978.
- 6 Oho Johann Golger, Ballungsraum: Hong Kong, S.1.: S.N., 1970.
- 7 Oho Johann Golger, Squatters and Resettlemen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2.
- 8 Pang, Yuk-ling, High Density Housing for Low Income Groups, Hong Kong, Parkville, Vic.: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64.
- 9 Philip Hartclark, Hong Kong: A Survey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from Inception to the Present, S.1.: S.N., 1968.
- 10 Tang, Wa Harward, Kwok Tak Biu, Licht Street, Wanchai, HKU Measure Drawings.
- 11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 Hong Kong Architecture: The Aesthetics of Density, Munich: Prestel, 1993.
- 12 Winston Sung, Study of Chinese Tenements in Hong Kong.
- 13 《香港历史中式建筑》，香港大学建筑系测绘图集（上），贝思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 14 《香港历史西式建筑》，香港大学建筑系测绘图集（下），贝思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九龙城寨

- 1 Grey Girard and Ian Lambot, 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 Chiddingfold Surrey, Watermark Publications(UK) Ltd., 1993.
- 2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After 1899 (<http://www.flex.co.jp/kowloon/home.e.html>)
- 3 Suenn Hon, Interview with Aavon Tan, "An Architectural Study on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Preliminary Findings," 1992.
- 4 The Mysterians Fort (<http://www.touristguide.hk.com>)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 Hong Kong Architecture: The Aesthetics of Density, Munich: Prestel, 1993.
- 5 可儿弘明《大图解九龙城》，东京：岩波书店株式会社，1997。
- 6 官本隆司《九龙城寨》，平凡社株式会社，1997。
- 7 黄南翔《香港古今》，香港：奔马出版社，1992。
- 8 鲁金《九龙城寨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88。
- 9 萧国健《九龙城寨史论集》，香港：显朝书室，1987。
- 10 郑宝鸿、佟宝铭编著《九龙街道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

狮子山下的安乐窝——公屋

- 1 香港房屋委员会各年年报。
- 2 梁美仪《家——香港公屋四十年》，香港：香港房屋署，1999。
- 3 杨汝万、王家英合编《香港公营房屋五十年——金禧回顾与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3。

交通交汇处

- 1 David Johnson, Star Ferry: The Story of Hong Kong Icon, Auckland, New Zealand: Remarkable View Ltd., 1998。
- 2 宋轩麟《香港航空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3。
- 3 郑宝鸿、佟宝铭编著《九龙街道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

百年建筑的人事境物

- 1 C. C. Hsu, Chinese Architecture: Past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in Peh Amalgamated (H.K.) Limited, 1964.
- 2 Chung, Wah Nan compile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1989.
- 3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 4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 5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Architectural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MIT Press, 2002.
- 6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7。
- 7 何强《何强筑梦》，香港：天地图书，2000。
- 8 龙炳颐著《香港古今建筑》，香港：三联书店，1992。
- 9 钟华楠《亭的继承：建筑文化论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

戏院

- 1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Vol. 9, No. 2, Jul. - Sep., 1951.
- 2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Vol. 10, No. 1, May - Jun., 1953.
- 3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Vol. 17, No. 3, Oct., 1962.
- 4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Feb., 1965.
- 5 许焯权《空间的文化：建筑评论文集》，香港：青文书屋，1999。
- 6 郑宝鸿《香江风月：香港的早期娼妓场所》，香港：香港大学艺术博物馆，2003。
- 7 龙炳颐《香港古今建筑》，香港：三联书店，1992。
- 8 郑宝鸿《港岛街道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

茶餐厅

- 1 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Steven Izenour,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
- 2 Wong, Chong Thai, "Cacophony: Gratification or Innovation", in Gulsum Baydar Naibantoglu and Wong, Chong Tai edited, Postcolonial Space(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7.
- 3 刘蜀永、萧国健《香港历史图说》，香港：麒麟，1998。
- 4 郑宝鸿《塘西风月》，载《信报》，2002年12月11日。
- 5 郑宝鸿《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饮食场所》，香港：香港大学艺术博物馆，2003。

作者简介

陈翠儿，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及城市设计）硕士，1998年成立AOS建筑事务所。曾参与策划的项目包括：2021 Emerging Hong Kong Architects、香港建筑中心、设计香港新展望、香港青年建筑师联盟。合著有《建筑师的见触思》。

蔡宏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及卢德岛设计学院，曾经在 Foster and Partners 任职董事，负责香港国际机场及红磡火车站等项目，1999-2003年在香港大学建筑系任教，现为香港艺术中心艺术学院荣誉学术顾问及校外考试委员。

林社铃，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后赴英国约克大学深造古建筑保育硕士课程，现任职于香港政府建筑署，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及修缮项目，曾因复修大夫第、颯廷书室、敬罗家塾九龙寨城公园、敬罗家塾及天主教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等项目而获奖。

何志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新成立之测量课程，先后取得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硕士(1985)及文物保护硕士学位(2002)。现职建筑文物保护顾问，除在本港外，也在上海、绍兴、深圳及澳门参与建筑文物之保护规划。

冯永基，现任建筑署高级建筑师，热心艺术创作及环境保育，曾获有关重要奖项30余个，包括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90)、香港建筑师学会周年设计奖(1999、2000及2003)。著作有《建筑师的见触思》(合著)及即将出版的《香港公共建筑》。

陈丽乔，198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并于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获香港青年建筑师奖。现职巴马丹拿建筑设计事务所董事，作品苏州喜来登酒店(2004年香港建筑师学会境外作品奖)、顺德文化四馆等。业余从事艺术创作、教学及写作。

张海活，1973年出生于香港，2000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2003-2005年为德国史图加特 Academic Schloss Solitude 驻机构艺术家，现为EDIT Design Ltd.合伙人。

杨炜强，1998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多年来从事建筑设计及教育工作，曾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现自组设计公司 EDIT Design Ltd.，从事建筑室内设计及公共艺术项目。曾多次到访福建、山西及西藏等地考察传统民居，学术论文曾于 UIA, mAAN 及 IASTE 等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长濑礼子，日裔美国人，毕业于夏威夷大学 Manoa 分校建筑系。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是由一群现任香港房屋署的建筑师组成，当中会员在过去数十年间曾先后参与规划、设计及统筹香港的公屋发展。

源耀邦，香港及加拿大注册建筑师，分别在英国伦敦大学及美国卡内基密宁大学考取建筑理学士及建筑硕士，曾在伦敦、纽约、波士顿及温哥华任职建筑设计，1998年在港成立源耀邦设计事务所。

吴永顺，198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并于1994年取得城市设计硕士，同年获颁香港青年建筑师奖，从事宗教建筑设计及研究多年。现为AGC Design Ltd. 董事及香港大学建筑系兼任助理教授。

吴启聪，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笃信建筑历史是生活的见证。

黄新猷，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86年加入建筑署，现任建筑署总建筑师，参与的建筑设计及工程策划，包括机场、学校及文康设施。

朱卓雄，分别于1995与1998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及澳洲悉尼大学建筑系。现于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项目是有关香港街道与行人的模式。

杜永德，199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取得香港建筑师注册认可后，回归香港大学展开学术探索之旅，醉心于解构香港城市空间文化，现正撰写博士论文，钻研香港的私人 / 公共空间的吊诡。

郑解鸿，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设计硕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雅砌建筑设计事务所总监。一系列获奖设计层面广泛，从公共洗手间到青年旅舍，从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保护到城区发展规划。

黎东耀，199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现为香港珠海学院讲师，并从事建筑及室内设计工作。嗜好到戏院看廉价早场、流连旧式茶楼及茶餐厅与街坊谈论国家大事。

鸣谢

按笔画序

- | | |
|--|--------|
| AGC Design Limited | 林云峰教授 |
| Hongkong Club | 林颖妍小姐 |
| Hongkong Land | 高沛珊小姐 |
| HSBC Bank | 高添强先生 |
| Jardine Matheson Group | 崔颂笙先生 |
| Man Hing Hong Group | 陈海明女士 |
| P & T Group | 陈健先生 |
| Royal Asiatic Society-Hong Kong Branch | 陈广成先生 |
| Swire Properties Ltd. | 陈丽乔博士 |
| 恒生银行 | 张容美卿女士 |
| 美都餐室 | 冯邦彦教授 |
| 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 | 黄醒芬女士 |
| 香港大学建筑系 | 黄锦星先生 |
|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 | 温卫能先生 |
| 香港天主教教区礼仪委员会 | 叶启俊先生 |
|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 | 廖洁连教授 |
| 香港房屋委员会 | 赵绮铃小姐 |
| 香港建筑师学会秘书处 | 赵翠盈小姐 |
| 香港政府档案馆 | 刘秀成教授 |
| 香港历史博物馆 | 刘洁芬小姐 |
| 2000年大澳工作坊的中大建筑系同学 | 郑宝鸿先生 |
| Dr. Waters | 潘宛珊小姐 |
| Miss Joyce Ho Wing Yi | 谈可儿小姐 |
| Miss Karen Pui Hoi Yan | 卢玮銮教授 |
| Mr. Chris Chan | 萧立基先生 |
| Mr. Raymond Chan | 龙炳颐教授 |
| Mr. Robert Nield | 钟华楠先生 |
| Mr. Victor Tai | 钟宝贤教授 |
| Ms. Crystal Fok | 颜肇祈先生 |
| Ms. Stephenie Wai | 邝绮雯小姐 |
| 大澳居民 | 严迅奇先生 |
| 王嘉欣小姐 | 饶双宜小姐 |
| 何承天先生 | |
| 吴享洪先生 | |
| 李淑欣小姐 | |
| 李景勋先生 | |
| 李灿辉荣休教授 | |
| 沈埃迪先生 | |
| 周寄欣小姐 | |
| 林中伟先生 | |

图片出处

括号内为图码

香港历史博物馆

p. 14 (1); p. 15(4上); p. 22(2-4); p. 23(1, 5);
p. 24(1-3); p. 25(4-6); p. 30(1-5); p. 31(6);
p. 32(1上); p. 40(1-3); p. 41(4-5); p. 43(4);
p. 52(1); p. 53(3); p. 62(1-2); p. 63(3);
p. 100(1-3); p. 101(4-5); p. 102(1); p. 103(5);
p. 108(1-2); p. 109(3-6); p. 116(1); p. 117(2-3);
p. 126(1-2);

颜肇祈

p. 31(7); p. 33(2-4); p. 34(1上); p. 43(3);
p. 44(2); p. 47(5); p. 68(2); p. 68-69(3); p. 103(8);
p. 110(1); p. 111(3-5); p. 121(3右); p. 143(3);
p. 144(1上及右下); p. 145(2, 3左及右上);
p. 146-147(1); p. 157(3左); p. 162(2, 3);
p. 163(6); p. 164 (10); p. 166(20, 24); p. 167(26);
p. 169(36); p. 171(45);

香港房屋署

p. 74(1); p. 75(2); p. 76(1-2); p. 77(3); p. 78(1-2);
p. 79(3-5); p. 80(1-3); p. 81(4-7); p. 82(1-3);
p. 83(4-5);

Far East Architect & Builder

p. 162(1, 4); p. 163(5, 7, 8); p. 164(9, 11, 12, 14);
p. 165(15-18); p. 166(19, 21, 23);

黎东耀

p. 144(1左下); p. 154(1); p. 155(4); p. 156(1);
p. 157(2, 3右, 4, 5); p. 158(1-2); p. 159(3-5);

崔颂笙

p. 90(2中及右, 3); p. 92(1左一及右二, 3);
p. 93(4右); p. 94(2); p. 95 (3上右, 下左、
中及右, 4右);

吴启聪

p. 88(1-2); p. 89(3-5); p. 90(2左); p. 95(3左上);
p. 166(22); p. 167(28); p. 168(34); p. 170(42);

高添强

p. 14(2上); p. 15(3, 5); p. 17(6); p. 65(4);
p. 66(1-4); p. 67(5); p. 142(2);

何志清

p. 14(2下); p. 15(4下); p. 16(1-3);
p. 17(4-5);

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

p. 54(1-3); p. 55(4-5);

冯永基

p. 34(2-3); p. 35(4-6);

张海活、杨炜强、长渊礼子

p. 68(1); p. 69(4); p. 70-71(1);

李淑欣

p. 46(2-3); p. 102(3-4); p. 118(1);
p. 119(3-4); p. 121 (3左);

陈广成

p. 32(1下); p. 46-47(1); p. 110(2); p. 171(45);

郑宝鸿

p. 42(1); p. 63(4); p. 119(2); p. 154(2); p. 155(3);

陈迹

p. 127(3); p. 128(1上); p. 129(3上);

郑炳鸿

p. 127(4); p. 128(1下); p. 129(3下); p. 134-
135(1-3); p. 136(1-2); p. 137(3下, 4);

严迅奇

p. 137(3上); p. 171(44);

P & T Group

p. 43(2); p. 44(1); p. 170(40);

Hongkong Land

p. 43(5); p. 45(4);

AGC Design Limited

p. 120-121(1-2);

万宜大厦

p. 45(3);

冯邦彦

p. 47(4); p. 142(1);

叶启俊

p. 90(1); p. 92-93(1左二及右一, 2); p. 93(4左
及中, 5); p. 94(1); p. 95(4左); p. 145(3右下);

香港机管局

p. 103(6);

香港民航处

p. 103(7);

欧阳昭

p. 167(25);

廖本怀

p. 167(27);

恒生银行

p. 164(13);

钟华楠

p. 102(2); p. 168(29-30);

黎锦超教授

p. 168(31, 32);

李景勋

p. 168(33);

何毅

p. 169(35);

何承天

p. 169(38);

王董建筑事务所

p. 169(37);

木下一

p. 170(39);

刘秀成教授

p. 170(41);

龙炳颐教授

p. 170(43);

黎家豪

p. 34(1下);